

省幸 北嶽起烽 獨據地
 重 萬里天午夜 滿屋驚
 夢 山外燈火 照無眠 馬蘭路上
 春影 鷄子河邊 戰陣連今日 京華
 香話 應新人 執筆 寫第一
 一九六五年 歲次丁巳 春 吳昌碩 吳昌碩
 侯萬湖 光緒四十四年 柳松

邓拓书法

1996 年 5 月在北京八宝山灵堂
全家在灵堂中合影

丁一岚（左二）左侧是邓拓二哥的女儿邓全





晚秋

丁一岚于 1991 年秋摄于
北京，70 岁生日留念。



1996年5月全家团聚左起：邓壮、邓小虹、邓小岚、丁一岚、邓岩、邓云；前：郭北满；后：刘明明



邓拓故居“第一山房”

丁一岚 29 岁
时与邓拓合影
(1950 年摄于北
京北海公园)



1959 年全家
合影
前排左起：邓小虹、
邓鸥予、邓壮
后排左起：邓淑彬、
邓小岚、邓拓、丁
一岚、邓岩、邓云



目 录

关于这部书的几句话·····	丁一岚
引子·····	8
第一章 少年执笔复从戎·····	11
第二章 梨花一枝春带雨·····	38
第三章 毛锥十载写纵横·····	55
第四章 人间长此忆真情·····	73
第五章 云山比翼双飞梦·····	92
第六章 记者生涯当自励·····	113
第七章 文章满纸书生累·····	134
第八章 健笔终存天地间·····	164
第九章 断骨留魂证苦衷·····	198
第十章 乌塔孤依觅朝晖·····	222
第十一章 八方泪洒马南邨·····	238
第十二章 死生继往即开来·····	263
后记·····	306

关于这部书的几句话

丁一岚

曾经有几位作者提出为我写传，我都婉言谢绝了。我自认为一生几十年，没有动人的阅历，没有耀眼的业绩，平平凡凡，忙忙碌碌的一生，没有什么好写的。有时，有些特殊的机遇，也是客观条件赐予的。比如：1949年10月1日我参加了开国庆典的实况转播工作，当时有几位老播音员都可以去，组织上指派齐越和我参加了。当然，我们都觉得很荣幸，有机会参加这样伟大的、振奋人心的大典，使我们亲身处在光芒四射的环境中，似乎身上也披上了一抹霞光。但是，对我来说，这是完成了一次重大的工作任务，算是我一生中光荣的一页，而我仍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广播工作者。

春风文艺出版社组织出版一套丛书，叫《×××和他的一家》，其中有邓拓。青年作者庞盼应下来了，诚恳地几次找我，我想不能因为我一家，影响了出版社的计划，于是，我只好尽量为其提供方便了。

邓拓，在事业上的成就，横溢的才华，无私无畏的胆魄，尤其是最后差不多将近十年风风雨雨中所历经的坎坷，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历史的一个注解。尽管如此，邓拓在世时，仍以拳拳之心，真诚地对党的事业进言，对社会上的种种不良倾向奋笔疾书，写出了许多直到今天仍然让人们难以遗忘的好文章。然而，又恰恰是这些文章，致使他最后身遭横祸，终于悲愤地离世。

我陪伴邓拓生活了二十多年，我有我的事业，有我独立的生活，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并不算长，但是同甘共苦的时间也不算短。老邓三十岁才开始爱情生活，也许由于他诗人的气质，感情浓重，灵感充溢，每每我们团聚或分别时，他常常今天挥笔写一首诗，明日随口吟诵一阕词，这一切，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浪漫色彩。

邓拓走了，我们的家还存在。在他被冲击诬陷后的十三年中，由于可以理解与想象的原因，我和孩子们过着受打击，受歧视的凄苦生活。这些年，使我们懂得了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曲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认清了人心的善或恶，懂得了如何在逆境中生活，因此，要保持乐观和自我奋斗的精神。

我和孩子们都不愿意回顾那一段生活，它，太使人痛苦了。但是，缺少了主人翁后，延续下来的三十多年的家庭生活，记下来也有它的意义；希望通过这些不该发生的悲痛、苦难——不只我们一个家庭，按全国计算，估计至少有几万，几十万个家庭——让人们能记取那沉痛的教训，使那悲惨的历史绝不要再重演，则是一切善良人们的初衷与企望。

1997年10月于京寓

引 子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巫咸遍地逢冤狱，上帝遥天不忍闻。
海瑞丢官成惨剧，燕山吐凤化悲音。
毛锥三管遭横祸，我欲招魂何处寻？^①

这首诗，记叙了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那一年，几个丑类搭上了被错误导航的历史航船。假革命之名涌起黑风恶浪，其势汹汹，向渴望美好善良的人们扑来，卷走了多少英才高士的生命！在这场“红色风暴”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我们的传主——邓拓。

历史会记下这个日子：1966年5月17日。那是个漆黑的夜晚，白天一浪高于一浪的批判喧嚣，渐渐平息了下来。在北京遂安伯胡同的一所院子里，邓拓书房的灯光，整整亮了一夜。窗外的紫藤萝架向地上投下斑驳的倒影，初夏的微风细草，也停止了合鸣，万籁俱寂，然而，邓拓的胸中，却翻滚着一股烈焰！

^①这是在1979年迟开的追悼会上，“三家村”惟一的幸存者廖沫沙为邓拓写的挽诗。

他能忍受观点的论争和批判，能忍受罢官与靠边站，却不能忍受那些别有用心造的谣、诬陷，那些对人格莫大的侮辱！他要申辩，却被扼住了喉咙，不允许发出自己的声音；他欲抗争，可茫然四顾，该向何处抗争啊！一个战士，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被解除武器。几十年“毛锥纵横”的生涯，他以笔为枪，写下了多少深刻感人，大气磅礴的锦绣文章，那是为一个壮丽的事业呐喊，为一个崇高的理想自觉地奋斗。而今，这支笔，却只能用来写下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话了。

他写啊，写，六千言从胸中一泻而出。他要洗清强加于自己身上的污垢，要向那些害人的魑魅作最后的一击！字里行间，回荡着铁骨铮铮的声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写完这封给组织的长信，夜已深，该给亲人写几句了。他那颗支离破碎的心，倏地，收得更紧！一岚，我的爱妻，我的战友，我能对你说什么呢？从滹沱河畔相恋，到一起战斗在党的新闻战线，我给你写过多少诗词、多少信，那是我们美好爱情的乐章。可如今，我却不能保护你们，甚至我的存在，都成了你和孩子们精神痛苦的根源。如果我的死能稍稍解除你们的创伤，我也会含笑九泉！

我的孩子！如花朵般的五个孩子啊！你们是那样健康、活泼、聪明、正直，你们纯洁的心灵里还揉不下一粒砂子。挚爱的父亲一夜之间成了可耻的“叛徒”，这是多么残酷的打击！面对你们那惊恐含恨的眼神，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但我丝毫不怪你们，只愿我的离去，能还你们一个平静的生活。

夜雾深沉，邓拓忍着周身疼痛的发作，给妻儿写下简短却饱含深情的遗言。然后，长叹一声，撂下紧握了一生的笔……

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党员、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邓拓，就这样匆匆走完他生命的最后路程。十年浩劫的序幕，从此全面揭开。直到十三年后，阴翳散尽，日月重光，他的沉冤才得以昭雪。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从未忘记他；他的妻子、儿女，也没有忘记过他。人们深深怀念这位博学多识，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这位一身正气，诗情满怀的“党内才子”。邓拓和他一家的命运，是和我们整个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这个风云变幻，大辉煌伴着大磨难的世纪的一个缩影。

第一章 少年执笔复从戎^①

故 乡

5月17日那个漆黑之夜，在邓拓结束自己生命的漫漫长夜里，他都想到了什么，忆到了什么，我们已无从查考。但我们可以推测，他曾循着自己生命的轨迹，回溯到了源头——他魂牵梦萦的家乡——福州，回到了五十四年前孕育了他生命的“第一山房”。

邓拓的故乡是值得骄傲的。

福州近郊有个竹屿村。古时候，这里是闽江的一个岛屿，因岛上多竹而得名。竹屿村土地肥沃，风景秀丽。南宋时，邓氏家族的许多人，从河南南阳迁到这里，成为村中一个大姓，以“栟榈”作为族志。竹屿又是个颇有文化传统的村落。南宋时期，村中建有东野竹林书院，理学家朱熹曾在此讲学。元末，

^①邓拓诗《寄语故园》。

有学者邓定隐居不仕，结屋于竹溪之上，自题其堂为“耕隐”。明代，这里更是名人辈出，其中邓厚岳曾邀诗友在此结社吟诗，以至被称为“竹林后七贤”。邓厚岳的住宅为“竹林草堂”，清代改名为“七贤祠”。院旁建一座“乡贤邓公祠”。邓公祠原有一方匾额，为鸦片战争时期与林则徐并肩作战的闽浙总督邓廷桢所书。

竹屿是邓拓的祖居，而他的故居则是城中的“第一山房”。

福州古称闽侯，别称“三山”，又有“三山藏，三山现”的说法。三山现，即城中的于山、屏山和乌石山，三山鼎立，成犄角之势；三山藏，即三山以外冈陵较低的地方，陆续盖起的房屋，将这些冈陵掩藏了起来。“未忍经过第一山，柴门叩处只常关”，这是邓拓的老友李拓之悼念邓拓的诗句。第一山即邓拓故居所在地，位于福州城内乌石山东端，中隔天皇岭，实际上是乌石山延伸出来的一块台地。这里巨岩高耸，浓阴蔽日，有故人摹取宋代大书法米芾行书“第一山”三字，刻在岩壁上，这就是“第一山”的由来。

在中国近代史上，福州得“西学东渐”的风气之先，出过林则徐、严复、林纾这样的政治家、思想家；而这“第一山”也不是等闲之地。早在南宋绍定年间，这里便出过一个名叫黄朴的状元，以后元代的黄济、清代的陈轼、叶观园、林材等学者，先后在这里著书立说，使这一方水土浸染上浓郁的儒雅之气。

第一山北麓有一座小楼，楼边山坡上遍植榕树、柳树、芙蓉和芭蕉，庭院里有个天井，院中花木扶疏，草长莺飞。楼后有座高高的古塔，楼前立一石碑，上刻“第一山房”。八十五年前，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邓拓，就出生在这里。

父 亲

竹屿邓姓为八闽望族，文风甚盛，曾出过两个举人。邓拓的父亲邓仪中（鸥予）先生，便是清朝最后一科举人。

邓家书香世代。宋代，邓拓的始祖邓肃，曾住福州永安市北栟榈山，自号栟榈居士。后来他的子孙迁居各地，均以“栟榈”作为族志。聚居在福州竹屿村的邓姓，也是“栟榈”一支的子孙。

邓拓的先人世居竹屿，到他的祖父邓燮香（长椿）这辈时，才迁入城内南后街宫巷口居住。这次迁居是否因家道中落，不得而知。可知的资料是：燮香以做酱菜生意为生，他为人正直，持家勤俭，将继承诗书家风的希望，寄托在子孙身上，对儿子仪中的学业很是看重。

仪中生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他天资聪颖，自幼就能写一手好诗文，被住在第一山房附近的严家女主人看中了。

原来，第一山房曾数易其主，先为陈、杨两姓别业，光绪间又归严家所有。严家也是书香门第，单生一女名爱美，与仪中同岁。仪中考中秀才不久，严家就托媒说亲，招仪中入赘严家。一般习俗，入赘后要改姓，但因竹屿邓氏宗祠祖传，凡取得青衿的子孙，每年可领一份膏火费，以资鼓励，所以，仪中入赘严家，仍旧姓邓，并且继承了第一山房的产业。

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仪中中举。按当时规定，中了举人就要做官，仪中当了广西一个偏僻小县的知县。但家风和禀性都使他对官场的一套格格不入，有一次外出遭土匪抢劫，

更使他厌于兵灾匪祸，愤而离职，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国文教员。

竹屿村中有一座祠堂，名叫“笃行斋”，中祀邓氏系为官清廉，有政绩的子孙。凡是为官不正，做过危害百姓事情的人，不论官位多高，均不得入祀。在这种宗风的影响下，清代竹屿邓氏虽有十七人出身科举，但官位显赫的并不多，他们多数从事了教育事业。

竹屿这个文化教育之乡，历史上出了不少优秀教育人才。仅邓拓一家，父子、兄弟、姑嫂、叔侄都执过教鞭，真可谓是“教育世家”。^①

仪中思想开明。邓拓降生的前一年，辛亥革命爆发，福州城里革命党人聚会，孙中山亲临会场演讲。仪中听到这个消息，连声对家人说：“有幸，有幸，乃吾国人之大幸！”1959年，身居北京的邓仪中老人已届耄耋之年，仍每日读书不止。一天，他重读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感慨系之，用毛笔在书后写下一段感言：

“当戊戌政变之年，予二十七岁，在南营廖氏祠应力师聘课，其俩公子先已饱览时务报及康之不恶谭之仁学等。八月某日席次，闻陈玉萱侍御抵师所报六君子就戮，予愤痛甚。今又戊戌，阅六十年重览斯帙，不知作何感想耶。

八十七叟识于京寓 鸥予”

鸥予先生写下这段话时，是去世的前二年。作为清末最后一科举人，对维新、革命有这样认识，实属难能可贵。这样一位父

^①参见铁帆《邓拓的祖居和故居》。

亲，对后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旭 初

1912年2月26日（农历正月初九），一大早，“第一山房”的院落里洋溢着一股浓郁的喜庆气氛，随着一声嘹亮的婴啼，邓家又一个男性子弟降生了！此时，正值清晨旭日初升，这真是一个好兆头。满心喜悦的仪中为新生儿取了个响亮的名字：旭初。外祖母看到家中又添一个外孙，为他取名“右任”，取谐音“又一人”之意。“旭初”和“右任”，是我们的传主上学前使用的名字。

旭初排行最小，上面有仨兄俩姐。

虽是诗书之家，但家中人口多，开销大，仅靠父亲一人教书的收入，生活还是相当拮据的，他的二姐后来回忆说：“家里穷，常年吃薯米粥，穿的是补了又补的身面衫，夜里洗了熏干，白天再穿。雨天穿木底鞋上学。”幼小的旭初过早地尝到了生活艰辛的滋味。他常常跟着哥哥们到野外拣柴草，搂树叶，钓螃蟹，挖竹笋；每逢祭祀的日子，他就去庙里当役生，赚得一点微薄的报酬，贴补家用。

生活虽清寒，子女教育却是家中头等大事。旭初刚刚懂事，祖母就拿来核桃仁、杏核教他练“心算”；家里收了南瓜，摘了豆角，也总是让小孙子数数。每当夏日的傍晚，祖母就搬一把竹椅，坐在院子里，手摇一把大蒲扇，和着凉爽的晚风和啾啾的虫鸣，给围在身边的孙儿们“说古”。祖母识字不多，却能看画本、记账，有一肚子的故事。旭初最爱听她讲梁山泊的

英雄好汉、讲历史上民族英雄“打仗”的故事，讲家乡福建杰出人物的传奇轶话。祖母常念叨的故事里，有一位邓氏族姓里的英雄邓茂七，他是明朝福建沙县一带的农民起义领袖。他带领农民队伍，同官军作战，杀富济贫，号称“铲平王”。这位英雄的祖先给旭初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长大以后，还专门研究考证过这段历史资料，并写有“五百年前是一家”，“神州定铲平”的诗句。

父亲邓鸥予是个淳朴平和慈爱善良的人，对子女却极为严格，“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父亲写在壁柜上的这句古训，督促孩子们勤奋不怠地学习。每天，邓家的孩子们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然后完成父亲规定必须遵循的晨课——练字和背诵古诗文。旭初几乎是从会说话起，就跟着哥哥姐姐，哼哼呀呀地背诵诗文了。先是一些启蒙性的短诗，年龄稍长，父亲就教他系统地背诵历代著名诗人的诗词，古文则从《论语》、《孟子》等一类典籍开始，再由《春秋》、《左传》、《史记》、《通鉴》，到唐宋八大家。父亲从旁指导、讲解，不时要儿子将精彩的段落背诵下来，就这样，旭初在小时就对祖国的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旭初自小爱写大字，四五岁就开始练字了。起初他练“描红”，后来就“临帖”。父亲认为书法是一个人文化修养的基本功，收集有不少名家碑帖，像颜帖，柳帖，欧帖，魏碑拓片等。在父亲严格的指导下，小旭初逐渐掌握了握笔、运腕、基本笔划与间架结构，字写得一日比一日好。

写大字不仅能启迪心智，陶冶情操，而且可以磨炼意志和毅力。为了节省纸墨，旭初自己用麻草扎成“扫帚笔”，从第一山附近的旧城楼搬来几块大方砖，又从井里提来一桶清水，

用大草刷子蘸着清水在大方砖上写字，这种方砖的吸水性好，随写随干，可以反复地写。瘦小的旭初挥着“大笔”，运足气力，写了一字又一字，父亲则站在他的身后，指点他的“悬腕功夫”。

山房主人在教孩子知识的同时，更注意培养他们正直诚实的品质。父亲常对子女们说，“诚”“信”是立身之本。家中庭院有一口深井，遇有天旱，邻家的水井干涸了，父母就打开大门，让邻居到自家取水；每到端午节前后，祖母总要采摘一些自家山坡上的“六月麻”竹叶，让孙儿们分送给邻居包粽子；邓鸥予懂些医道，他曾在自家门口挂牌行医，为人号脉开方，为乡亲解除病苦。在长辈的言传身教下，旭初从小便有一副古道热肠。有一次，邻家婶婶的丈夫病了，需要煎服白苻离花。旭初听说后，便一声不响地跑到自家房里，拿出一个珍藏着干花的纸盒子给那婶婶送了去。只有姐姐知道，这些药材是弟弟一点点地积攒了许多日子，准备卖后买一套新毛笔用的。

还有一次，邓家院子里突然来了一窝蜜蜂。旭初认出，这是头年春天刮台风时，邻居四太婆家丢失的一窝蜂。四太婆为此伤心叹气了好些日子。小旭初决心将蜂还给四太婆。他用纱布装在一顶草帽上做了面罩，又找些破布裹上手臂，爬到树杈上去逮蜂王。几只蜜蜂对这位“入侵者”发起了围攻，在他裸露的脖颈上狠蜇了几下。小旭初忍住疼，用树枝小心翼翼地取下蜂王，终于将一窝蜂引回四太婆家。四太婆喜出望外，苍老的脸笑成了一朵菊花，不住地说：“真是好仔，真是好仔！”

在父辈严格有方的教导下，邓家的孩子个个健康成长起来。二哥仲轲从小喜欢绘画，又写得一手好字，师范毕业后担任福州几所中学的美术教员；三哥叔群十三岁考取清华学堂留美预

备班留学美国，获得康乃尔大学植物病理学博士和森林学硕士学位，解放后成为我国著名的真菌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三姐淑彬毕业于福州女子师范学校，一直在福州教书。

对孩提时代的读书生活，邓拓始终十分怀念。许多年后，他从北京给父亲写过一首《寄父》诗，其中就有“猛忆儿时课读虔”这样深情的句子。

子 健

1919年夏天，七岁的旭初进入福州市闽侯小学读书，改名邓子健。

闽侯小学在离第一山房不远的道山路口天皂岭附近，学校设有国文、手工、算学、体育等课程。子健的国文、史地成绩特别好，教过他的国文教员、文天祥诗文研究者黄兰坡老人回忆说：“这个学生很聪颖，他在课堂上发问很好，爱动脑子，爱读一些爱国诗人的作品。”

1919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辉煌的年代。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掀开历史新的一页。福州是“五四”运动“闽案”的中心。福州的爱国学生和市民纷纷走上街头，贴传单、游行集会，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八闽气象，为之一壮”。小小的子健，虽然还不能深刻理解这场运动的意义，但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激动。他和同学们来到市区南大街口，看游行队伍由远及近，“民国万岁”、“还我青岛”、“时日曷丧，与汝偕亡”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这一切在他心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小子健的生活视野迅速扩大，从狭小

的第一山房，扩展到民族民主斗争的广阔天地。“闽案”，可以说是他人生的第一课。

子健在闽小读了四年，1923年升入福州三牧坊中学。这所中学的前身是凤池书院，北伐军入闽后，三牧坊中学与乌石师范合并改为福建省立第一中学。直到1929年高中毕业，子健在这里度过了六载读书生涯。

凤池书院的师资力量很强，教学严格，注重校纪的整肃，还聘请一些留学过日本的教员，主张“富国强种”。几十年来，这里培养了一些社会知名人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学校开设师范、商业、普通等科，子健上的是普通科文史地学。

子健自幼爱好古代传统文化，读文史地系，为他提供了极好的读书机会，他开始贪婪地大量阅读古典文学名著和历史书籍。他的家里就有不少藏书，以子部和诗集最多，也有晚清和“五四”运动前后的书刊，如康有为、梁启超的文集，福州人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另一位福州人林纾用流畅的文言文翻译的欧美国家的文学作品等。父亲邓鸥予虽然中过举人，但思想并不保守。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到中国的启蒙马列著作，如《史的一元论》。《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等，关心时事的父兄们都注意收集。子健上中学后求知欲越来越强，他先是“闭门读遍家藏书”，不论平装的，线装的，他无所不读，百看不厌。渐渐地，家藏书已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了。离家不远有个乌石山图书馆，子健成了那里的常客。他爱读屈原、司马迁、苏轼、陆游等大诗人词人的作品和《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小说，对进步书刊更是情有独钟，从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苏曼殊

的《断鸿零雁记》到蒋光赤的《短裤党》，常常读得忘了吃饭的时间。他还同几位要好的同学订了“君子协定”：谁找到一本好书，要互相传看。他常与傅衣凌、李拓之等好朋友一起，读书作文，议论时政，而子健常常会冒出一些新名词、新见解，令同学们刮目相看。

这时的子健充满对生活的憧憬和知识的渴求。他的兴趣多种多样，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增长知识的机会。为了弄清佛教、基督教的教义和差别，他曾跑很远的山路，听一位叫圆瑛法师的高僧讲经，到基督教堂听牧师布道，还阅读过《新旧约全书》；为了学好英语，他不满足于课堂的讲授，通过二哥认识了一位很好的英文老师，课外经常去这位教师家请教、练习。他还结识了一位懂拳术的中学体育教师，利用晚上时间到他家去学少林拳。

福州是一座英雄的古城。大义凛然的文天祥，曾在这里抗击过异族军队；民族英雄戚继光曾在这里同倭寇血战；抗英爱国的“左海伟人”林则徐，在这里立有“林文公忠”祠堂；十九世纪这里曾爆发过反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此外还有清代爱国诗人、林则徐的族兄林昌彝，有戊戌变法中遇害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黄花岗起义烈士林觉民等等。林觉民是少年邓拓十分崇敬的一位英雄。烈士从容就义前留给妻子的那封著名的《绝笔书》，曾经收进当时的初中国文课本，子健和同学们爱不释手，能够琅琅背诵。烈士为国家和人民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给了他很大的教育。林觉民烈士的故宅，与林则徐祠堂相去不远。子健在凭吊瞻仰时，产生了游历访古的莫大兴趣。他遍访家乡历史名人的遗迹，对有些古迹，还要寻根问底进行考察。后来他常用的一个笔名“左海”，就包含了对故乡

的怀念和对“左海伟人”的崇仰之情。

子健的踏游带有很浓的文化意蕴。福州这座古文化名城，有不少文物古迹，父亲爱收藏古人字画，学美术的二哥也喜欢搞收藏，这些都对子健产生了影响。他常跟着兄长到乌石山“搜奇访古”，临摹写生。山上的凌霄台，天章台，般若台，道山亭等处有二百多段摩崖石刻，其中有唐代书法家李冰阳的篆书，宋代程师孟，蔡襄，朱熹等名家的题刻手迹，邓氏兄弟常来这里观赏、习摹，留连忘返。

子健自小就表现出诗词方面的非凡天赋。他常把同学们请到山房来，学着大人的样做“折枝吟”，即是折取七律诗中的一联，要求对仗工整，平仄严格，立意高深的才可取胜。“折枝吟”又叫“诗钟”，作诗时点一根香，缀上铜钱，当“火焚缕断，钱落盂响”，就要作出好诗，获胜者可得到奖品，是福建文人中流行的雅趣。

子健六七岁就跟着二哥到附近文庙观看大人作“诗钟”。父亲觉得这是小孩子“练艺”的好法子，也很支持他们去。一年“重九”日，子健和小侄女依全在乌石山上玩耍，远远看见乌塔上拉起了灯笼，有阵阵吟诵声传来，是诗钟！两个孩子兴奋地跑来观看，只见一位主考官端坐上首，正吟出一句唐诗“海日生残夜”，让人们应对，台下一片议论之声，诗的下联是“江春入旧年”，但按规定，现成的句子不成对。大人们一时都被难住了。这时，子健突然想起前不久学过的另一句唐诗，脱口而出：“圆柳变鸣禽”。考官沉吟一下，连说：“也可，也可！”见对上的人只是个十来岁的小学生，当即奖了一把雨伞。回到家，父亲高兴地夸道：“吾儿未冠即能诗也。”从此以后，子健对“诗钟”兴趣更浓了。每逢学校放假，他就约几位同学到

家里的小书房做诗钟。有时兴起，干脆“连床共榻”，彻夜燃香对诗，唱和评比，乐此不疲。

当时的中学课本里收有五代著名诗人罗隐的七绝《咏蜂》，诗曰：“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一次，语文老师出了一个题目：《读罗隐咏蜂七绝有感》，叫学生自由地写一首和诗。子健当场步罗隐原韵和诗一首：

踏遍深山十二尖，艰难生计不须占！
世间多少伤心客，何惜捐输一滴甜？

后来，邓拓在他的《燕山夜话》“咏蜂和养蜂”一文中，记述了这件往事，并写道：“现在看起来，我的和诗当然十分幼稚。不过，那时对于蜜蜂的辛勤劳动和人间为生计而操劳的广大群众，已经有了相当的同情。”

子健在凤池书院读书的几年，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1924年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6年北伐军进入福州城，福州各届人士纷纷举行街头欢迎集会，古城处处响起“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革命军人发表演讲，动员工农起来革命。随着革命形势高涨，一些进步书刊也大量传到福州。子健和同学们争相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的《新潮》和经常刊登鲁迅作品的《晨报副刊》等，革命真理像明灯一样照亮年轻人的心。

在学校里，学生们也举行演讲会，宣传革命道理。有一次，学校举行关于时事问题的演讲比赛，子健勇敢地走上讲台，谈古论今，批点时政，畅言无忌，他的演讲获得了第二名。子健

不仅思想活跃，还很有文艺才能，唱歌，演剧，绘画，作诗，写文章，样样是把好手。这年夏天，他在自创的夏扇上画了一幅题为《抚孤松而盘桓》的水墨画，表明自己要像青松一样，具有不畏霜雪，坚贞不屈，傲然屹立的品格。

在高涨的革命形势下，福州城青年学生兴起结社之风。子健也和几个进步同学一起，组织了“野草社”，自刻自印《野草》刊物。他们写诗作文，抨击社会时弊，阐述革命理想，自喻为在严冬中勇于抗争，以顽强的生命力迎接春天的野草。

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也蔓延到了福州。国民党的“新军阀”以围剿“赤色刊物”为名，搜查学校，逮捕学生，枪杀革命群众。在反革命阴霾之中，子健思考的目光变得深沉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这是他和同学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当时，各种思潮展开了论战，如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都使他发生极大的兴趣。他从那时起，就喜欢分类收藏资料，为后来参加讨论打下思想基础，做好资料准备。在这种探索中，关于怎样“挽救国家命运”的答案，已开始在他心中萌芽了。

1929年子健高中毕业了。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任职的三哥邓叔群，来信催他赴南京报考清华学堂，并说一切读书费用由他承担。他希望小弟同自己一样，能留洋深造，学成回国，走一条实业救国的路。

子健来到南京在三哥处住了几天，对这位长自己九岁已是著名科学家的兄长，他是尊敬的。清华这所三哥引为自豪的高等学府，对他也不是没有吸引力。但对现实问题十分关注的子健，隐隐觉得自己向往的是另一条生活道路。

他告别三哥来到上海。这是子健第一次出远门，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上海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临考前一晚，他被同学拉去看了一场电影，第二天考试误场了。幸而当时上海各大学招生时间不统一，他在第二次考试中被上海光华大学政法系录取。为此，兄弟之间还发生了一场争论。三哥听说小弟没考上清华，很不高兴。子健反问三哥：“你以为上清华和留美才能学到东西吗？才是青年人的正路吗？”

在他的心目中，上海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中心，中国现代文化界人才荟萃之地。他决心在这里系统地研读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寻找挽救国家民族命运的真理。

子健就要离开家乡亲人到上海上大学了。这是一个秋日的傍晚，母亲细心地为爱子打点行装，准备干粮。她忍着泪水，拿起儿子的衣服缝补着，“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正是这种情景的写照。平时和小弟一起学习、干活，相处得最亲密的二姐，也偷偷拭着眼泪，为弟弟准备书籍。父亲从城里雇来一辆人力车，一家人在夕阳的余晖中目送游子离去。

子健从福州台江泛码头乘船，只身一人向上海驶去。汽笛声声，轮船驶出闽江口。子健凭船而立，望着身后渐渐隐去的故乡山川，离愁别绪涌上心头。他默默地吟诵着一首题为《别家》的诗：

空林方落照，残色染寒枝。
血汗斑斑湿，杜鹃夜夜啼。
家山何郁郁，白日亦凄凄。
忽动壮游志，昂首天柱低。

吟罢，一股豪情壮志油然而生。

小子健像一只羽毛初丰的雏鹰，迎着前面的暴风骤雨，飞向人生的更广阔的天地。

人 世

经过两天两夜的海上颠簸，子健登上黄浦江码头。上海这座灯红酒绿，人称“十里洋场”的东方大都市，又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文化活动的中心。子健一到这里，就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他就读的学校原属圣约翰大学，后因师生们不满美国籍校长对爱国运动的压制，另辟新址建立了光华大学，告诫学生“读书勿忘救国，救国勿忘读书”。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曾应邀来校做过《文学与社会》的著名演讲，一些社会名流也被邀到学校任课或演讲。

子健住在福州同乡开的会馆里，白天按时到学校上课，然后到图书馆阅读，晚上回到住处关在小屋里，通宵达旦地刻苦攻读。房主人见他终日闭门苦读，开玩笑说，这个小老乡，真是书呆子。光华大学学习条件简陋，但课程设置严格，学习氛围很浓，子健所在的文学院把“基础学科必充实”，“各种学说，无所偏颇”，“观察实际”，“自行读书”，“理论与技术并重”等五条作为“教授宗旨”，开设的课程有行政法，比较宪法，中外史地，政治学，英文，经济学等课。学校新开的选读课“经济名著”中，有亚当·斯密、李嘉图、卡尔·马克思、库巴卫克诸家之代表作。入学后一个学期，子健就广泛地阅读了一些经济学和哲学名著，选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1930年春，他到上海一年后写了一首《书城》的诗，真实地记

录了当时的苦读生涯：

两间憔悴一儒生，长对青灯亦可惊。
不卜文章流海内，莫教诗酒误虚名。
得侔前辈求真意，便是今生入世诚。
白眼何妨看俗伦，幽怀默默季书城。

其中“得侔前辈求真意，便是今生入世诚”两句，表达了他要学习前辈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精神，为人类解放的事业奋斗一生的心愿。

子健在光华大学读了两个学期。正在这时，轰轰烈烈的左翼文化运动，像磁石一样吸引了他。

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八大联”在上海成立。无产阶级作家、艺术家和社会科学家团结联盟，壮大了队伍，开辟了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和理论建设的新局面，也影响了大批青年学生。这年冬天，子健参加了“社联”。

“社联”的活动，主要是在党团组织的秘密领导下，配合当时国际国内的斗争，发动群众，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散发标语传单等。它非常注重成员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严厉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社联”领导成员王学文、艾思奇等主办刊物发表有关经济、哲学的文章，曾给子健很大影响。他一面在学校出壁报，办刊物，宣传辩证唯物思想，一面走出校门，到上海工人聚居的地区，向工人群众普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子健主要活动在上海法南区打浦桥一带的贫民窟聚集区。在乱坟场和臭水浜边，有许多用芦席和茅草搭起来的，人称“滚地龙”的茅草棚，这里住着成百上千个失业工人和从农村逃荒来的人。他们拖儿带女，靠乞讨、拣破烂、拉黄包车维持可怜的生存，日夜挣扎在死亡线上。子健和几个同学在中共法南区委的领导下，办起工人夜校，帮助他们识字、读书，同时讲解一些“人为什么有贫有富”的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道理。他们还在法商电车公司组织电车工人的罢工斗争。和城市贫民、工人的交往，使子健接触了中国社会实际，更加深入了解了劳动人民苦难沉重的根源，从而坚定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的决心。

因为经常外出参加进步活动，1930年6月他被学校除名，离开了光华大学。

1930年冬天，子健十八岁，在上海法南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夏，他参加了上海法政学院的考试，插班进入该校政治经济系。从此，他一边读书，一边积极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先后担任过中国“社联”区党团书记，上海反帝大同盟区党团书记，中共上海法南区委宣传部干事、宣传部长和南市工委书记等职。

铁 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斗争情绪高涨。上海地下党根据人民群众中激发的爱国热情，多次组织活动，掀起了反帝爱国的热潮。9月底，法政学院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向全

体师生发出宣言：“国难当头，团结起来，挽狂澜于即倒，救国家危亡于千钧一发。”学校组成抗日演讲队，分赴卢湾、八仙桥、龙华路等地进行抗日宣传，还邀请著名学者李达、潘梓年等到校演讲中日问题。10月，一部分留日学生归来，子健作为学生会干部，出面接待留日的中国学生，并请他们作形势分析报告。

子健日夜奔波于工厂、学校，组织工人学生参加斗争，他还两次和同学们一道，由上海到南京，投身于抗议示威的行列。

但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正严重干扰着民族革命运动的正常进行。以王明、博古为首的“左”倾盲动主义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不懂得在白色恐怖严重的环境下，应保存革命力量的道理，而是一味指挥蛮干。每逢“五一”劳动节，十月革命节等革命节日，子健所在的法南区委和南市工委，都要奉命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在外国巡捕和国民党军警的高压下，这种游行只能采用“飞行集会”的形式，即事先通知团员和进步群众，在指定时间来到闹市区。先是装做买东西，时间一到，有人燃放爆竹发出信号，人们迅速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演讲、散发标语传单，然后向外滩一带游行。这样的集会游行虽能起到一些宣传鼓动的作用，但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往往是游行刚刚开始，警车就呼啸而至，队伍被冲散，巡捕和暗探见人就打、就抓。不知有多少同志在这样的活动中被逮捕和屠杀，给党的工作造成极大的损失。子健和同志们对这种作法深感忧虑。当时，在中央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张稼夫，就多次写过报告，希望改变这种作法，充分利用合法身份，多做调查研究工作。他的这些报告，都是经过与他发生纵向联系的邓子健转给党中

央的，但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反响。

终于，在一次中共法南区委组织的纪念广州起义的活动中，子健也被捕了。

子健被捕后，先被关在上海市公安局南市分局。警探认出了他就是多次在群众集会中演讲的人，认为是个重要嫌疑犯。子健被带上手铐脚镣，和一些政治犯一起，秘密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后又转到苏州反省院。

在反省院，敌人千方百计地威逼子健，要他交出党的关系。那时子健代表法南区委负责与张稼夫同志等人联系，敌人从叛徒嘴里得知一些情况，逼他供出与张稼夫的关系，子健一口咬定不认识这个人。狡猾残暴的敌人软硬兼施，一面指使叛徒出面劝降，一面动用刑具，用烧红的铁钳烫炙他的双腿，用皮鞭轮番抽打。子健咬着牙关，始终一言不发，用自己的坚贞保护了党的组织和同志。

在监狱里，与他一同被关押的多是党的同志和进步人士。狱中不许谈话，难友们就互相传抄牢房墙壁上的“题壁诗”，互相激励斗志。当时广泛传诵着恽代英烈士著名的《狱中绝诗》和杨匏安烈士的《临行别狱友》，这些烈士遗诗深深打动了子健年轻的心，他和几位难友机智地从看守那里弄来一些废弃的纸烟盒，学着先烈的榜样，也写下了不少狱中诗。出狱后，他把这些诗手钉成册，取名《南冠草集》。“南冠草”是明末民族英雄夏完淳在狱中所写一本诗集的名字，子健素来敬佩这位在抗清复国斗争中从容赴死的志士，以“南冠草”为书名，表明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宁死不屈的决心。遗憾的是，因为战乱，这本诗集没能保存下来。后来由他本人和友人的回忆，留下了八首。其中两首是这样的：

转狱今二度，丹心永不磨。
孤灯看瘦影，短梦断南柯。
血迹殷半壁，雷声动一阿。
铁窗风雨急，引吭且狂歌。

囚徒期破晓，狱卒守残更。
碧海终填尽，黄河必涤清。
今朝穷插棘，来日矢披荆。
万众摧枯朽，神州定铲平。

子健在苏州监狱被囚半年，得了肺病。1933年秋，他的父亲邓鸥予辗转打听到他的下落，千里迢迢来到南京和苏州，设法营救。子健的三哥邓叔群当时已是著名的科学家、南京中央大学一级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他四处奔走，联系蔡元培等知名人士保释子健。在他积极活动下，子健终于被保释出狱。他写下《出狱》一诗，表达自己渴望投身新的战斗的心情：

放歌一曲大江东，千古风云人望中。
有限朋交嗟宿草，无多骨肉怅飘蓬。
只身天地余残泪，一眼河山尽断魂。
莫道群生都懵懵，明朝四野又烟烽。

中 州

子健出狱后，与党的组织失去联系，带着一身伤痕和病痛

回到福州家中。母亲看到心爱的小儿子回来，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她忙不迭拿出自产的蜂蜜、鸡蛋，要为饱受牢狱之苦的爱子好好补补身子。为了安慰母亲，子健答应在家中调养一段时间。

他采访故乡旧地，拜访了几位老师和同学。当时正是中国民主革命深入发展、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左翼文化战士，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肩头的责任。他一边秘密地寻找党的关系，一边思考着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这时，中学的同学、好友傅衣凌正好从厦门回来度假，他们相约到乌石山图书馆去看书。子健认真地翻阅一些报刊，想补上因半年多的监禁对外界形势了解的空缺。他发现，入狱前开始的中国思想界的哲学论战，仍在激烈地进行。资产阶级哲学教授张东逊和叶青等人在《新中华》和《再生》杂志上发表文章，挑起一场所谓“动的逻辑”和“静的哲学”的辩论。面对这些著名的学术权威，子健毫不畏惧，站出来挑战。1933年10月，他以“邓云特”为笔名，在《新中华》半月刊上发表《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①批驳张东逊等人诋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论点。这是我们目前读到的邓拓最早的理论文章。这篇文章论理深刻透彻，显露出较高的理论水平。那时子健刚刚二十一岁。

1933年11月20日，福州城发生了著名的“闽变”。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公开宣布和蒋介石决裂，成立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子健立即参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担任文化委员会专员兼外交部秘书，负责宣传联络。福建

^① 《邓拓文集》第一卷。

人民政府在福州人民中掀起抗日反蒋的热潮，民众革命思想高涨，引起国民党右派的极度恐慌，调集大批军队进攻福建，日本帝国主义也公然出兵相助。内外夹击，福建人民政府终于寡不敌众，于次年1月宣告失败。“闽变”失败后，子健受到通缉，被迫回到上海，在老同学李拓之的帮助下，在浦东中学教了几个月书。这期间，他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参加了薛暮桥、孙冶方等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活动。

秋天，大哥邓伯宇从河南来信，让他去开封继续学习，说那边有大嫂管家，可以照顾生活。子健在上海一时找不到党的组织，想完成学业，回原校是不可能了，他也想有个安静的环境完成早已孕育的一些写作计划。于是，他给大哥回信：“中州也许是小弟的安身之所。”

子健来到开封，插班进了河南大学经济系。大哥从自己的住房中腾了一间小屋给他。伯宇是省政府的一位职员，大嫂是一位妇科医生。子健课余兼任了汴济中学、西北中学的英文和历史教员，以减轻兄嫂的经济负担。下课回来，还帮着大嫂洗衣烧饭。

当时经济系主任是罗章龙（当时已改姓名），在德国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罗章龙亲自讲授《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课，此外，三十年代一些著名学者如李达、范文澜、邓初民等人也先后到河南大学讲授哲学、历史等课。子健对这些课及经济学史、经济理论等课程很感兴趣，同时，还系统阅读了一些历史书籍。

与此同时，子健开始进行历史研究和著述。他在河南大学的同学周震中后来回忆说：

“我第一次去看邓拓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那

间又矮又窄的住房，和朴素简陋的被褥桌椅，而是他那琳琅满目的两大架图书和桌上堆满的书报杂志，以及正在写作的摊开的稿纸。这与其说是一间学生的宿舍，倒不如说是一个作家的书房。”

在这个比较安定的学习和写作环境中，子健作为一位青年史学家的才华得到展露。不到三年时间，他写出近十篇共十几万字的学术论文和一部二十多万字的历史著作——《中国救荒史》，这些论著深入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经济问题，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尤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救荒史》，在救荒史研究上作了开拓性的工作。

这部二十五万字的历史专著，是他在离开开封前，利用暑假的一两个月时间紧张地写作而成的。炎热的夏天，他在陋室里铺开了一张张历史资料卡片，挥汗如雨地进行这项“啃酸果”的工作。书馆催稿很急，大哥伯宇、侄子邓应增和几位同学都来帮忙整理资料、誊清手稿。子健落笔如疾风骤雨，用左手拉过已写的纸张，纷纷堆落地上，四位抄手都赶不上他一人的速度。他早上只喝一杯牛奶，夜里饿了就啃几块饼干。^①就这样夜以继日，终于完成了这部中国救荒史研究的“扛鼎之作”。

1935年冬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一二·九”运动。北平学生抗议日寇侵占我国东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一二·九”运动后，北平学生联合会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如火

^①据李拓之《悼念亡友邓拓》。

如荼的学生运动很快蔓延到古城开封。1936年夏，子健积极参与了“民先”的活动，担任了“民先”开封支队的总支队长。他经常深入到青年学生中间，组织读书会、座谈会，为大家分析全国救亡运动的形势，鼓励同学们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他知识丰富、思想敏锐，对科学、历史、文艺等各种问题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很得青年学生的钦佩与信任。

这年，中共北方局鉴于开封地下党组织曾遭受严重破坏，委派刘子厚同志到开封建立联系并检查工作。刘子厚一到开封，地下党员就向他介绍了子健。

后来，刘子厚回忆他对邓拓最初的印象：

“这是多好的年轻人啊！聪明、沉着、有学问，第一次接触，就感到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子健把刘子厚安排住在他任教的西北中学里。从此，开封的“民先”组织与北平的“民先”总部取得了直接联系。刘子厚多次到开封传达总部指示，帮助工作。一天傍晚，子健匆匆赶到刘子厚的住地，说，女师有一“民先”成员被捕，必须立即转移。他帮助刘子厚从西北中学转移到南大街一个小旅馆里。果然，不久街上就警笛大作，警察和蓝衣社特务开始到各校搜查抓人。子健对刘子厚说：“开封活动余地太小，小店也不安全，必须马上离开。”他和刘子厚商定先回北平。

然而，这时开封城已是军警林立，车站上把守严密，要离开谈何容易。子健回家与大哥大嫂商量，决定由兄嫂护送刘子厚离开。当天夜里，他们打扮成商人一起到火车站，大哥大嫂买好票，把他们送上火车。后来，刘子厚回忆这次虎口脱险的情形说：“当时形势确实十分紧张，邓拓明知我是什么人，当时一般人躲都来不及，他却冒着极大风险千方百计安置我，最

后还让他大哥大嫂担着身家性命的风险送我脱险。这一切，说明了邓拓对党对同志的深情和革命的坚定性。林彪、‘四人帮’污蔑这样的好同志是叛徒，真是胡说八道！”

子健随刘子厚到北平后，向“民先”总部汇报了工作，在北平双塔寺一带住了下来。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座古都名城，对祖国传统历史文化有浓厚兴趣的他，多想到各处名胜古迹去游历观赏一番啊！但当时政治形势紧张，特务活动猖狂，北平不是久留之地。经过考察和了解，党组织初步决定恢复子健的组织关系并派他到苏北地区工作。临行前，正值1937年6月下旬，河南大学开始毕业考试。子健是毕业班学生，他先回到开封，想参加完考试再走。谁知，当他考完最后一门功课，刚刚走出学校大门，一辆警车早已等候在那里，几个蓝衣社特务一拥而上，将子健逮捕了。

这是他第二次被捕，敌人逼迫他交出联系人。但子健十分沉着与从容，他的联系人刘子厚已安全返回北平，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联系人。敌人无计可施，找来一个被捕的学生与他对质。子健泰然自若地否认与这个人认识，并严厉斥责了他。就这样，敌人始终没有得到证据。

当时，全国抗战形势风起云涌，一大批“政治犯”抗议国民党“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中共中央也利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迫使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加上子健的大嫂是开封有名的妇产科医生，认识不少上层人物。在她的积极活动下，1937年7月，子健被捕不到一个月，就被释放了。

子健到开封后，曾写诗寄给上海的李拓之：

天末惊飙起，中州客梦寒。

心潮奔日夜，剑魄隐风湍。
大野云龙啸，高空白鹤盘。
何时追逝景，奋翅越重山！

他多么渴望飞越崇山峻岭，投身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啊！

奋 翅

出狱后，邓子健参加了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商震领导的前线服务团，慰劳抗战军队。他来到河北束鹿一带，看到前线英勇抗战的中国官兵，深深为中华民族不甘屈辱的精神所感动。束鹿以西，是共产党即将开辟的晋察冀边区。子健在战地服务队听到一个喜讯：工农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在太原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子健早就想到中国的“西北角”——解放区去了，他曾给友人的信中说：“西方有巨人焉，吾将往从之。”在他心目中，“集合着一批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边区，才是抗战救国的圣地。

正在这时，日寇轰炸开封，形势吃紧，大嫂要搬往西安躲避。1937年9月的一天，子健与大哥全家登上西去的火车，车过太原，子健避开暗探的耳目悄悄与大嫂告别，独自跳下火车。

在太原灞陵街的八路军办事处，子健见到先期到达太原的北平市委书记黄敬。两个同龄的年轻人互通了姓名。当子健得知对方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黄敬知道对方就是青年史学家邓云特时，两人真是一见如故，相识恨晚，马上热烈交谈起来。子健告诉黄敬自己两次被捕失掉组织关系

的情况，黄敬表示立即代为向组织报告，并向他介绍了华北抗战的形势：平型关大战后，八路军挺进华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山西，聂荣臻将军已率领八路军115师开进五台山，着手建立晋察冀根据地。

黄敬问子健，今后打算怎么办，子健毫不犹豫地回答：“到前线去！投八路军去！”

新的战斗生活召唤着他，新的革命天地吸引着他。子健在福建人民政府时期，曾用过“邓拓洲”这个名字，此时，他正式改名邓拓，表达开拓未来的豪情壮志。

这时的邓拓还不会想到，在他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中，会遇到一位梨花一样美好的姑娘，开始一段浪漫的战地恋情。此时此刻，那姑娘正像他一样，怀着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辗转跋涉在奔向光明的路上。

第二章 梨花一枝春带雨

三十年代的天津，被英、法、日、德、俄、意、奥、比（利时）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割据为租界地，日本侵略者更是虎视眈眈地窥视平津，企图吞没整个华北。山河破碎，满目疮痍。

和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全中国人民一样，天津市民和爱国学生，也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天津私立三八女子中学，是由思想开明、有见识的先生创办的一所进步女子学校，教员中有不少早期的共产党人和进步爱国人士，她们经常给学生们讲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讲高尔基、雨果、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也介绍鲁迅、邹韬奋等人的文章。在他们影响下，那些初涉世事的女孩子们，逐步懂得了抗日救亡的道理，向往一个没有异族压迫、封建剥削、自由平等、妇女独立的社会。她们组织起学生自治会，团结同学们投入方兴未艾的救亡活动。

在这些风华正茂的学生骨干当中，有个文静秀气、举止端庄的女孩子。她年龄虽小，干起工作却大胆泼辣。她有很好的口才，演讲起来，声音清脆甜美，加上门门功课总是拔尖，在同学中很有威信。她，就是学生自治会的副主席刘孝思。

孝思的父亲刘渭生，本是福州人，年青时学过海员，后来

到北方铁路工作，当了一名会计科员。1919年前妻董玉英去世，他娶了贤惠通达的肖若兰。若兰是大户人家的姑娘，过门时，家中已有三个孩子，但温婉贤淑的若兰对前妻的子女视同己生。1921年生下孝思，后来又有了弟弟。在母亲的影响下，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们亲密无间，家中充满挚爱的亲情。

在当时，铁路会计的薪水是不低的。但父母不善理财，刘渭生还有个打牌的嗜好，加上子女多，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最严重时，竟无米下锅。每到学期初，几个孩子要交学费、买校服，可难坏了渭生若兰两口子，只好去借高利贷。因为没钱买校服，有时开学几天了，孩子还不敢去上学。尽管如此，父母还是坚持让子女读书，但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男孩子上学可以由家里出钱，女孩儿要上学，可得自己挣奖学金。这多少有点“重男轻女”的味道。好在刘家女孩子个个争气，孝思和大姐孝懿，考上了三八女中的奖学金，二姐孝德考上了不收学费的师范。但孝懿终于因为家中困难、弟妹多，上了没几天就退学了。

孝思是家中出类拔萃的女孩子，她生得美丽文静，亮亮的眼睛，白皙的皮肤，常穿一件浅蓝色碎花格旗袍，齐耳短发，显得朴素而又端庄。她不仅学习勤奋、刻苦，而且对周围同学也非常热心。

当时的天津，中国人居住的海河以北叫“中国地”，这里是天津居住条件最差的地方。坑洼不平的土路，破破烂烂的民房，与租界地花花绿绿的洋房形成鲜明对比。孝思每天要从家中经过法租界、英租界，步行五十分钟去上学。她亲眼看到，在租界地里，洋人趾高气扬，中国人却低三下四，亲眼看到穿大皮靴、挎军刀、耀武扬威的日本兵，向华北增兵，铁蹄践踏

美丽河山；亲眼见到富人们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而穷人则卖儿卖女，沿街乞讨，冻死街头。中国人为什么受欺侮，社会为什么这么不平等？她小小年纪，心中就有了郁懣和不平。

本来孝思只是个单纯善良的女学生，她的功课很好，尤其是语文、英语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她文静娴雅，正与邻家的一位男孩，潞河中学的高中生徐威悄悄谈恋爱。政治似乎离她很远，她只想好好读书。但残酷的现实打碎了少女玫瑰色的读书梦。后来发生的两件事，更激起了她强烈的民族恨，爱国情。

“七七事变”前，天津的日本驻军强征大批华工在日租界修筑军事设施，工事修好后，就悄悄将劳工处死，尸体扔入海河。那一阵子海河常有浮尸漂过，尸体面部都被镗水腐蚀，惨不忍睹。开始人们并不知道这些浮尸的来历，后来日本驻军的罪行渐渐被揭露，在天津人民心中激起极大的义愤，国恨家愁像地火一样燃烧起来。

还有一次在天津体育场召开全国运动会，各地的运动员队伍都穿着五彩纷呈的运动衣，只有来自东北的运动员，穿着素色的运动服入场。黑色——代表黑龙江，白色——代表长白山。这是东三省儿女在为失陷的白山黑水哀悼啊！在场的孝思心中既痛苦，又激动，中国人，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的啊！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平津学生互相呼应，天津的爱国学生也举行了“一二·一八”大游行。三八女中的学生会主席徐克立，副主席刘孝思以及薛明、陈晶、田冀、任致等都积极投身到救亡活动中去。她们参加读书会，形势讨论会，组织歌咏队。每逢学联布置罢课行动，总是挑学习好的同学去和老师交涉，而孝思常被委派担当这一角色。她们在三八女中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民先支队”，还参加

了天津妇女救国会，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她们深入到女工当中，和女工交朋友，办工人子女识字班，开展成人义务教育，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她们教工人们唱救亡歌曲，“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十五岁的孝思常到家附近的卷烟厂女工中去义教，教的第一课是：“我是中国人，我要打日本。”

1936年5月28日，天津“民先”队和学联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孝思她们的动员下，三八女中学生除两个新转来的小同学外，全部参加了游行。游行当天，校方紧闭校门，不许队伍出去。同学们一拥而上，冲出校门，汇入游行大军。孝思负责携带游行用的宣传品，她穿一件淡蓝色旗袍，雇一辆三轮车，把标语、传单压在三轮车座板下，来到集合地点。她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特殊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有人带领大家唱起了救亡歌曲，不少同学激动得流下热泪。为了对付反动军警的镇压，学生们组织了敢死队，孝思和徐克立、薛明等都是敢死队员，她们冒着高压水龙，走在队伍最前面。这些年轻的女学生，第一次昂首阔步，像个出征的战士，为捍卫自己神圣的国土奋勇抗争！

“五·二八”游行是孝思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此她从一个只有朦胧爱国意识的、善良好学的女学生，变为有自觉的爱国主义思想，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行列的新战士。

出 走

在老校长张人瑞的支持下，三八女中的进步力量非常活跃。

教师张秀岩、董劲秋（大董）、董明秋（小董）等都是共产党员；学生中也有党的组织，徐克立、薛明、陈晶等相继加入了共产党。孝思受党员教师同学的影响，阅读了不少中外进步书籍。高尔基笔下的革命母亲、搏击暴风雨的海燕、鲁迅对黑暗社会无情的揭露批判、萧军萧红描写的东北沦陷区人民的不屈反抗、巴金的《家》等小说中冲破旧家庭奔向光明的新青年……都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学生中还传看着一些来自苏区的小册子，里面有红小鬼穿大军装的很神气的照片，有抗日女英雄在原野上策马驰骋的画片，这一切，都令热情奔放的女学生十分向往。但这时她在政治上还比较幼稚，崇拜自由主义，怕入党受纪律约束，因而并未争取入党。

孝思的家庭，是个比较守旧的家庭，对子女管束很严。这也难怪，女孩子大了，世道又这么乱，做父母的怎能不操心呢？家中规定，下学必须回家，回来晚了就要受到训斥。孝思是个听话孝顺的女孩子，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在外参加社会活动，从不对家人提起；有时回来晚了，走在路上一见路灯要亮了，就赶紧小跑着往家奔。晚上，好和兄弟姐妹围坐在一张大圆桌旁做功课，家中常让他们看些旧书，功课之余，姐妹们争相背诵《木兰辞》、《长恨歌》、《葬花吟》等古诗词作为文字游戏。谁也猜想不到孝思心中的“秘密”，只有和孝思最知心的二姐，从妹妹的言谈举止中猜到了几分。

不久，情况有了变化。1936年暑假后，三八女中换了董事长和校长，新上任的沈慧如校长思想保守，解聘了一批进步教师，对抗日救亡活动百般压制，民先组织被迫转入地下。10月，孝思和同学从报上获悉鲁迅先生病逝的消息，十分悲痛。她们出了一期悼念鲁迅先生的壁报，同学们纷纷围拢来观看着、叹

息着。沈校长却幸灾乐祸，冷嘲热讽地说：“鲁迅死了，该哭你们的高尔基啦。”不久，“双十二事变”的消息传来，爱国学生们无不拍手称快，沈校长却如丧考妣。有的同学想起鲁迅逝世时她的拙劣表演，便讥讽说：“这回该有人哭了！”引得同学们一阵大笑，沈校长狼狈不堪。

新改组的三八女中校方趋于反动。一些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同学操行被评为乙等，面临取消奖学金、失学的危险。然而，校方禁止同学们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却无法禁止学生唱歌。一下课，孝思她们就领着同学们高唱救亡歌曲。她们最爱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激昂的歌词振奋着女孩子们的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女学生也要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

这时，华北日益吃紧，日寇又搞什么“华北自治”，成立了冀东伪政府，想分割中国。蒋介石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妥协，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引起人民极大的愤慨，“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①刘孝思她们打定主意，投奔延安，投奔那块抗日的热土！1936年底山西阎锡山在共产党的团结政策推动下，打出了抗日的旗帜，成立了“牺盟会”。徐克立与孝思商量，先去太原，再转道去延安。

这天晚上，孝思和往常一样，与兄弟姐妹围坐在大圆桌旁。她想，要走了，总该对家中有个交待，不然，家人还会以为女孩子是被人拐跑了呢！她用胳膊挡住日记本，给父母写下留言。她遮遮掩掩的姿态，引起二姐孝德的注意。第二天孝思出去了，

^① 《北平学联罢课宣言》。

很晚还没回来。孝德找到妹妹的日记本，家人一看，不禁大惊失色：“糟了，孝思走了！”家中老老少少，兵分几路，到火车站、码头去寻找堵截，忙得不亦乐乎。正当各路“追兵”空手而回，无计可施的时候，孝思回来了。原来，她只是去找火车票，并没打算这天走，却没想到事情败露了。

惊魂未定的父母怎么也想不到，一向温顺和婉的小女儿会这么大胆。他们轮番把孝思训了一通，并把她软禁了起来。关了一周，见女儿没什么动静，以为她打消了走的念头，就放她出去上学了。孝思回到学校才知道，董劲秋老师和徐克立已经走了。

沈校长为了弄清徐克立的去向，在作文课上出了一道作文题《她走了》。沈校长把题目写在黑板上，就走出教室。孝思趁机对同学们说，我们谁也不要提徐克立走的事！她想，这沈校长实在狡猾刁钻，何不借她出的题目奚落挖苦她一下？孝思提笔用幽默讽刺的口吻写了起来：一个教师上课出完题目走出教室，教室内顿时哗然，议论声、呼声四起，教师一回来，立刻鸦雀无声了。沈校长看到这篇作文，气急败坏，却又无计可施。

1937年初夏，孝思快毕业了，为了避免再出现“五·二八”事件后进步同学罢考的场面，校方千方百计吸引同学参加会考。校长对孝思说：“你成绩不错，如果考得好，学校保送你上高中。”这年学联没有安排罢考，孝思参加了会考，取得了好成绩。但正在这时，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了。孝思再也没去过学校，她知道，自己真的该走了。

“七七事变”后，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日军长驱直入进入华北。天津有个法国桥，一边是法租界，一边是中国地，

而这时“中国地”被日军占领，老百姓过桥都要被搜身，向敌人弯腰鞠躬，鬼子常闯入老百姓家，用刺刀挑着乱搜乱翻。天津人尝到了当亡国奴的痛苦。为了避免受辱，刘家先把几个女孩子送到法租界的一个朋友家暂住，“三八”同学任致家也搬到了法租界。同学们一个个悄悄地走了，田冀去了晋察冀，薛明、叶瑾去了南方……孝思和任致四处奔走，通过一个男同学，她们辗转和大董先生取得了联系，终于找到了通往延安的道路。

这时，火车已经不通了，只能坐船走。她们买了9月20日的船票。孝思悄悄做着上路的准备。她每天穿两件大褂出门，脱一件在任致家，就这样一件件积攒着出门的衣物。谁知，她的秘密行动又被细心的二姐孝德发现了。一天，她把妹妹叫到一旁，问：“你是不是又想走？”孝思说：“姐姐，局势这么乱，在天津当亡国奴的滋味实在不好受。出去，也许能找一条出路呢！”孝德觉得妹妹说得有理，又见她意志很坚决，决心帮助她出走。

任致家里比较富裕。为了顺利出走，调皮的任致想了一条妙计。这天，她慌慌张张地回到家，对妈妈说：“我已经被特务盯上了，不走只有死路一条，走了可能还有一条活路。”吓得她妈妈六神无主，只好眼泪汪汪地掏出两百元钱，给她做路上的盘缠。

20日这天，两个女孩子如出笼的小鸟，悄悄离开家门。她们尽可能地化了妆：穿上二姐孝德从一个有钱的朋友家借来的缎子花旗袍，绣花鞋，戴一副墨眼镜，装成阔小姐的模样。孝思还偷偷拿了几块父亲的大烟块，准备万一被家人追上，强迫回去，就以吞大烟自杀相威胁！

她们从海河乘上小船，到塘沽换乘去烟台的海轮。

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举目皆是逃难的人。到了塘沽码头，大船上已挤满了难民、老弱妇孺，饥啼悲号，惨不忍睹。大船上的人抡着斧子不让小船靠近。这样的场面，令孝思和任致这两个第一次离开家门独自闯入社会的女孩子感到惊心动魄。

经过一番周折终于登上了海轮。她们坐的是没有窗户，又闷又热令人窒息的底舱。憋得实在难受，就来到上层甲板透透气。甲板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满面泥汗的人，人们用缸子舀着海水洗脸、漱口。在异族侵略者的铁蹄下，这幅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景象，又一次深深刺痛了女孩子那敏感的心。

所幸的是，在船上她们遇到了一批和她们一样流亡的学生。船航行到海上，面对滚滚滔滔的海水，迎着凉爽的海风，大家一起唱起了救亡歌曲，激昂的旋律使学生们振奋，激起对新生活的向往。就这样，孝思和任致终于逃离了天津，

后来听说，她们走后家中简直闹翻了天。任致的妈妈怕孝思家追究责任，先发制人地到刘家去找。但这次，女儿是真的远走高飞了。

她们经烟台、潍坊、济南，一路过着流亡生活。由于党的安排，她们走到哪里，都能得到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帮助。她们睡在中学教室的地铺上，山东老百姓非常同情这些流亡出走的学生，纷纷募捐、支援，烙了糖饼、炖了肉菜慰劳她们。孝思任致融汇到了流亡学生的队伍中，他们几人一排，肩靠着肩、手挽着手，一路走，一路慷慨激昂地唱着歌，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

这时的孝思，虽有民族觉悟，但还没有阶级觉悟。她出来的主要目的只是能够继续求学。她们一心想到延安上红军大学，但到了济南，听到国民党的学生会造谣说：“延安没有一所学

校了，已全部跟着队伍上前线了。”她们产生疑惑，就来到南京，找到先期来到这里的薛明等人。薛明是受党的委派打入国民党青年干部政治学校的，但由于国民党控制很严，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正设法逃离南京去延安。正在这时，孝思从《解放周刊》上看到陕北公学和抗大的招生简章，决心去延安投考。她们和地下党接上了关系，开了介绍信，坐火车返回徐州，转道西安。两天后，终于和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上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给这批学生编了队伍，用小毛驴驮着行李，领他们徒步行军去延安。

一个多月的曲折奔波，终于踏上了这条通往光明的道路。一路上，孝思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得又快又稳。别人累了就轮着坐坐毛驴，而孝思一直是用自己的双脚，走在最前面。同行的人很羡慕，问她：“你怎么那么能走路？”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孝思从小学到中学天天步行很远的路练出的功夫。就这样，他们步行了十多天，于10月底来到了陕甘宁边区，来到日思夜想的延安。

延 安

延安是全国爱国同胞心中的圣地，每天都有大批知识青年从全国各地朝圣般涌向这里。十六岁的女学生刘孝思第一次踏上祖国大西北这片神奇的土地，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巍巍宝塔山，清清延水河，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层层叠叠的黄土坡，坡上飘动着像片片白云样的羊群，放羊的陕北娃扯开嗓子，吼着粗犷悠扬的“信天游”……她觉得这一切都美极了。终于冲出

牢笼，来到这片自由的天地。她的心中充满幸福喜悦和对新生活的向往。

和许多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一样，孝思也给自己改了名，依“孝思”的谐音叫刘啸诗。

更令她兴奋的是，在延安，她们见到了过去的老师董劲秋、董明秋，还与三八女中的同学徐克立、陈晶、薛明等重聚在一起。大董、小董老师是她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者和引路人，现在，师生们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亲密战友，怎不令人激动！一开始她们还按过去的习惯叫“董老师”，老师们却笑着说：“不能这样叫，咱们都是同学，叫我们大姐好了！”

啸诗被分配到陕北公学第一期第七队。延安的学生生活充满朝气，男女同学穿着清一色的灰军装，圆鼓鼓的军装掩盖了女孩子苗条的身材，一眼望去与男生简直没什么两样。他们在食堂吃着大馒头、小米粥，女学生的脸都吃得红扑扑的，显得更加健美，但延安生活也是艰苦的，冬天西北风刺骨，窑洞里只有一个炭火盆，上课经常是在露天。有时上军事课，手冷得拉不动枪栓，记笔记钢笔却冻得流不出水。这对大城市来的青年学生真是一个考验。同来的任致想家，还偷偷哭过。从小吃过苦的孝思，此时革命热情正高涨，倒也并不以为苦，还常常安慰鼓励伙伴。

公学的校长成仿吾，班主任邵式平，都是理论水平很高的老同志。政治课上，讲民主抗战的道理，讲“中国向何处去”，讲中国革命分两个阶段：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第一阶段；然后，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些崭新的理论像磁石一样吸引了啸诗年轻的心，她开始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这时，她不禁想起初恋的男友徐威。在天津时，孝思是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但她并不要求男友也和自己有相同的思想观点。徐威的父亲是铁路上的电气工程师、段长，家境比较富裕，也不大关心政治。孝思喜欢徐威的翩翩风度，喜欢他在运动场上的矫健身姿。分手时，他们相约等抗日胜利了再见面。那时她没想到抗日战争会打那么久，也没想到从此二人会走上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到延安后，她还与徐威通过信。可是现在，自己要终身托付给中国共产党，走上一条艰苦奋斗的革命道路，再与徐威保持恋爱关系似乎不大适宜了。于是，啸诗下决心提起笔，结束了这段恋情。

1938年2月，在班主任邵式平和指导员李士杰的介绍下，啸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月她从陕北公学毕业，来到位于桥儿沟教学的中央党校继续学习。党校对外十分保密，学生很少到校外活动，许多同学改了姓名。刘啸诗嫌原来的姓名太难写，特别是繁体的“刘”字，笔画太多，于是改名为虹。

那时，中央机关和学校相距不太远，领导同志或是住在山坡的窑洞里，或是住在山沟沟的一排排土坯房里。毛泽东、博古、陈绍禹、王若飞等中央领导人，有时来学校探望大家，还给学员们上过大课。1938年9月于虹她们党校两个班的同学毕业，毛主席来到她们住的小院给毕业班同学讲话。毛主席穿一身宽大的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裤腿上补着一块方补丁。他对同学们说：“你们到地方上工作，头一条要深入群众，首先当群众的学生，向群众学习，其次才是当群众的先生，启发群众，引导群众……”于虹听着、记着，她觉得，毛主席的话是那么通俗易懂，像嘱咐儿女远行一样，平和而又亲切。

昔日文静腼腆的于虹，在这样一个热火朝天的革命大熔炉

中，性格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她变得热情活跃，爱唱爱跳。由于热衷集体活动，半年后，她被推举当了脱产的俱乐部主任，办公室就设在桥儿沟教堂东边的尖顶上。许多年后，她携女重返延安，指着那个尖顶对女儿说：“当年，妈妈就是在那个尖上住的！”

俱乐部主任虽是个“芝麻官”，担子却挺重，得保管文体器材，还得组织文体活动。革命队伍中向来重视开展各种文体体育活动，延安又是人才济济的地方，有歌剧院、京剧团、话剧团等。当年上演的一出话剧名叫《中秋之夜》，通过侵华的日本兵中秋之夜思念女儿的剧情表现反战的主题。那女儿就是从苏联学戏剧回国的孙维世扮演的。还有京剧《打渔杀家》，由江青扮演桂英儿。这些“名角”对服装要求很高，可难为了于虹这位俱乐部主任，有时为了取服装，她一天要跑城里好几趟。

1938年初冬，中共中央在桥儿沟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期间，俱乐部主任于虹每天晚上都组织晚会、球赛和武术表演等招待开会的首长。年过半百的朱总司令爱打篮球，常常披挂上阵，和年轻人较上了劲，不赢球就不下场。打得时间长了，大家怕总司令太累，就像哄孩子一样，互相使个眼色，让朱老总赢几个球，心满意足地回去休息。一来二去地，聪明活泼的俱乐部主任于虹便在延安出了名。许多年以后，这些老师、首长们，还记得当年那个年轻姑娘为大家张罗文体活动时的风采。

六中全会结束前，上级布置一周内要排出一部反映地下斗争的话剧，这可把于虹难坏了。没有现成的剧本，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又没有地下斗争的经验，凭空怎么也变不出一台话剧呀！急得她直在屋里打转转。幸好后来会议提前闭幕，话剧

不演了，才算解了围。

革命摇篮中不仅孕育着青年战士的革命激情，也不可避免地培育着纯真的爱情。在党校学习期间，于虹和同班同学赵石英悄悄相爱了。赵石英是烈士赵世炎的侄子，爱写诗，爱幻想，有一种自由潇洒，当时被称为“小资味儿”的气质。两个年轻人爱得很深，他们常常避开人群，拉着手，搂着肩来到延水河畔，边散步，边谈心。但这段浪漫的爱情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人生道路上一次新的转折——毕业分配来到他们面前。

11月，六中全会结束后，中央号召延安的知识青年到敌后去，到前线去。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也迫切需要这些有为的革命青年。各大军区、根据地的首长都来了，轮流作报告，介绍各地区的政治、军事等情况。彭真讲晋察冀、讲唐山煤矿工人的地下斗争；贺龙讲晋绥；陈毅、项英讲江南新四军的活动情况……一天一个动员报告，像“竞选”发表演说一样，个个讲得那么生动诱人，深深吸引着渴望投入战斗的青年们的心。于虹是天津人，把晋察冀看成自己的家乡。晋察冀根据地开创时期的情况和唐山等地的地下斗争，深深吸引着她。她向往看到这个最早建立的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去工作，就报了名。

那个时候革命青年在选择志愿时是很少考虑个人问题的，况且组织上对赵石英另有安排，他被分配回自己的家乡——大后方四川工作。尽管有点难舍难分，但于虹和石英还是忙着打点行装，准备奔赴各自新的战斗岗位。

离别那天，他俩又一次来到延水河畔。还是那片明朗的天空，还是那条熟悉的小径，但从此，他们将天各一方，山重水复，只盼战时的飞鸿，不至阻断两地的相思。他们相约：今后如能再相遇就永远生活在一起。

跋 涉

11月底，于虹与同赴晋察冀工作的一百多个青年战友编好队伍，由彭真、刘仁同志带队，徒步向抗日战争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太行山区进发。

一路上星夜兼程，备尝艰辛。既有平坦的大路，也有山间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陕西省与山西省之间横亘着黄河，他们分乘两条大帆船渡河。河面上波涛汹涌，浊浪翻卷，木船在风浪中上下颠簸起伏，令青年们感到惊心动魄。他们齐声唱起《黄河大合唱》，雄壮的旋律伴着惊涛骇浪把他们送到彼岸。

来到山西省，须跨过太原北面的同蒲路。当时，铁路、公路都被敌军占领，沿线有碉堡封锁，不时还有敌伪军巡逻队走过。穿过封锁线，只能夜间急行军。他们从下午四时太阳快落山时出发，第二天上午十时到达预定地点，连续急行军十八个小时，行程一百四十里。半夜临近公路、铁路时，他们背着行李，一路小跑，一口气跑了三十里地。这些学生兵行囊里都有不少书，跑步行军实在不轻松。有的女孩子实在跑不动了，只好边跑边扔掉一些心爱的书籍。夜色中，他们低声传着口令，保持联络。通过村庄时，村里人都已入睡，周围黑沉沉静悄悄的，只听到他们急行军脚步声。然而，他们却常会发现一些老乡默默地站在村庄的角落里为他们指路。原来，这是我方的联络员，他们在那里监视敌情，随时向过路队伍汇报四周的情况。夜行军使青年们感到既紧张，又神秘，还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到达休息地后，他们一头扎在老乡的土炕上，睡得比什么

时候都香甜。这一夜，他们实在太累了！

一行人走过延长、清涧、佳县等地，行程约二千多里，途经山西岚县。

岚县是一二〇师师部所在地，这天，一群灰头土脸，又累又饿的学生兵一头撞了进来。“这不是俱乐部主任于虹吗？”贺龙师长一眼认出那个圆圆脸的漂亮姑娘。在这里，他们受到师部热情的接待。

有一件事，丁一岚至今想起仍觉得好笑。

于虹和几个女学生娃娃兵在县城里逛来逛去。岚县虽是个小县城，但因驻着师部，市面还算得上繁华热闹，街边铺子里、饭馆里飘出吃食的香味，直往女孩子鼻子里钻，馋得她们一个劲儿地咽口水。离开城市一年多了，每月只有三元津贴，她们肚子里早已是清汤寡水。不知不觉地走进一家饭馆，巧得很，贺龙师长、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和夫人李真正在这里设宴招待客人。贺师长一见她们就招呼道：“过来过来，一起打打牙祭！”女孩子们先有些不好意思，但禁不住美味的诱惑，还是坐下大吃起来。师部的宴请已是残局，她们没有注意主人是何时离席的，只见饭馆伙计又端上了四盘热气腾腾的炒菜。这时于虹她们才着急起来，口袋空空如也，怎么付账呢？伙计看出她们的心思，笑吟吟地对几个发窘的女孩儿说：“放心吃吧，这是师部给你们要的菜，特意招待你们的！”

行军中这格外丰盛的一餐，使女孩子们久久地回味。

快要开始新的生活了。到敌后工作是有危险的，需要再换一个名字。叫什么好呢？那时党员还不是公开的，有人开玩笑说，叫两个字的都是共产党员。于虹就把“于”字分开成为“丁一”，又觉得岚县的“岚”字很好看，就改“虹”为“岚”。

从此，“丁一岚”这个名字，就一直伴随着她了。

他们继续前行，经过定襄，最后到达目的地——平山。

第三章 毛锥十载写纵横^①

1937年9月，五台山麓已是深秋天气。当日寇向华北展开全面进攻，迫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到华北敌后河北、山西、察哈尔三省连接的山岳地带，迎击向晋东北进犯的日军。9月25日“平型关大捷”，一一五师一举歼灭板垣师团一千多人，是中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此后，八路军开始分兵开辟敌后抗战根据地。11月7日，太原失守的前一天，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成立了，一一五师副师长兼政委聂荣臻将军，担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五台山上，树起一面抗日救国的战旗。

正在这金秋时节，一辆敞篷大卡车载着十几位来自敌占区的知识青年，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向边区进发。他们中间有队长黄敬和决心投笔从戎的邓拓。一路上，他们看到的是战争造成的满目疮痍：田地里无人收割，到处是萎黄困倒的禾黍；农家的谷场上堆着来不及簸碾的燕麦和谷子，有钱人丢下房地产逃走了，穷苦人有的背井离乡，有的绝望地困守破碎的家园，听凭命运的摆布。山村小镇、大街小巷到处可以见到衣衫褴褛、

^①邓拓诗《晋察冀日报终刊》。

扶老携幼的难民，人们凄凄惶惶哭泣着失去的故园和遭受奸淫杀戮的亲人。这一幅幅惨状，激起邓拓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愤恨！即将开始的战斗生活，又使他充满向往与憧憬。他写下《寄语故园》一诗，向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表达此时的心情：

四年执笔复从戎，不为虚名不为功。
独念万众梯航苦，欲看九州坦荡同。
梦里关河闻唳鹤，兵间身世寄飘蓬。
寄语故园双老道，征蹄南北又西东。

由于战事的影响，这首诗无法寄给父母。直到全国解放以后，邓鸥予老先生才见到儿子十二年前写给自己的这首诗。

途经五台县，聂荣臻司令员在路边的帐篷里亲自接见了他们一行。看到这些朝气蓬勃、满腔热血的青年，将军的脸上充满笑意。草创中的抗日根据地，是多么需要这些有文化的年轻人啊。他仔细询问了大家的姓名、年龄和籍贯，当问到一个个瘦瘦高高、文质彬彬的青年时，对方答道：“我叫邓拓，开拓的拓，福建人。”“哦，开拓的拓，好的。”将军高兴地说，“我们这里是创业，也要开拓。”

第一次见面，聂司令员对邓拓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时隔多年，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我很喜欢他那种爽朗的性格。他首先告诉我，他已经学会了识别和采集很多种野菜，为的是日后困难时能借此充饥。可见他已经作了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他的革命决心是多么

坚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又是多么充沛！”^①

军区要转移到河北省，他们翻越一座又一座大山，跨过一条又一条河流，在崎岖的山道上徒步跋涉。9月的五台山已开始下雪，朔风吹过，地都冻裂了。严寒丝毫冷却不了年轻人高涨的抗日热情，他们一路走，一路唱着歌，还互相学着当地方言。经过两天两夜的行军，终于到达了河北省阜平县。

阜平，到处洋溢着边区草创时期的火热气氛。邓拓一到驻地，立即与党的组织取得联系，恢复了隔断多年的组织关系。他先是在边区省委担任秘书长，后来省委成立军政干校，邓拓被安排到干校当政治教员，讲授哲学、形势和时政。黄敬同志向大家介绍说：“邓拓同志已经是大学的教员，是个青年学者，对历史和经济很有研究。大家在学习上的事可以找他。”邓拓马上更正说：“我不是大学教员，同大家一样，是一介书生。应向这里的老同志们学习。”这个新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以他的诚恳和谦虚，一开始就给同志们留下好感。

同样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邓拓的学识与才华。有位当时在晋察冀做新闻工作的同志回忆说：

“一次会上，有从北平来的几位英美籍教授讲话，我看到一位身穿绿色军服的青年在做翻译，他气宇轩昂，从容自若，口齿流利清晰，讲得有声有色。每说完一段话，全场响起一阵轰鸣的掌声，并夹杂着口号声。我惊奇山沟里竟有这样的人才。后来听说这位青年翻译叫邓拓。”^②

^①《邓拓诗词选》序。

^②见智良俊《怀念邓拓同志》。

1937年12月，边区省委党刊《战线》创刊，邓拓参加了编辑工作，还为刊物封面题写了刊名“战线”二字。他一面根据党在边区的各项工作以及国内时事起草编发有关文件，一面以“恽忒”为笔名为《战线》撰写稿件。春耕时节就要到了，他很注重写有关生产的文章。邓拓本来对经济很有研究，在这里，他有机会结合实际，对山区农村的经济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写了《春耕问题》、《战时经济建设》、《从土地所有制谈起》等文。他那学者的健笔，为解决边区的实际问题写下了新的篇章。老作家康濯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从城市到农村，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说起来容易，放下大知识分子的架子是不容易的。这点上，邓拓做得很好。”

共产党员邓拓，终于越过关山阻隔，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开始新的战斗了。

办 报

邓拓来到敌后战场，原想投笔从戎，献身沙场，没料到，战争需要他拿起的武器，仍是手中的笔。1937年12月11日《抗敌报》的创刊，使邓拓从此与新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抗敌报》原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办的一张三日刊石印小报，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最早的一份报纸。1938年3月初，日寇对晋察冀边区发动春季“大扫荡”。3月5日，阜平城内的抗敌报社遭敌机轰炸，石印机连同正在印刷的第二十四期报纸都被炸毁。报社随军区领导机关向西转移，来到五台山中的大甘河村，重新安装机器出报。4月中旬，中共晋察冀省委

决定将抗敌报作为省委的机关报，报社组建了新的领导班子，邓拓受命担任报社主任，主持抗敌报工作。这一年邓拓二十六岁。从这时起直到1948年6月，整整十年当中邓拓带领报社全体同志，一手拿笔，一手拿枪，高举着这面“敌后千百万人民抗战斗争的旗帜”，为党的新闻事业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

抗敌报设在五台山坳、滹沱河边一个隐蔽的村子里。邓拓上任后，第一次主持编辑工作和报社规划会议，就制定了三条方针：一是无论敌后游击战多么频繁、艰苦，一定要坚持出报；二是增加评论，配合战争的需要，积极组织社论、专论和短评，加强指导性战斗性；三是争取改为铅印，缩短刊期，改三日刊为隔日刊，及时向敌后人民进行新闻报道。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从冀中秘密运来铅印机和一副四号铅字，没有铸字炉和字模，他们用胶泥做成翻字盒，用字坯翻铸成字模，一个一个地铸字；没有浇版机，他们用旧印刷机底台改造而成；没有铅，就向老乡收购锡酒壶，用熔解的锡代替铅浇版；没有油墨，他们发动群众刮锅底烟灰，掺上松香、大麻油代替。邓拓亲自和同志们一起刮烟灰，弄得满脸乌黑。大家自豪地将这自制的油墨命名为“黑人牌油墨”；没有纸，就用老百姓糊窗户用的麻纸代替，还自己建起造纸厂，用稻草、麦秸、玉米秆、麻绳头等做原料，用石碾子压碎煮成纸浆，在火墙上一张张烤成纸。邓拓对这来之不易的纸张和铅字十分珍惜，发现地上散落着一个铅字，也连忙拾起来，心痛地说：“嘿，宝贝，宝贝！”看到有破损的纸张，他总要工人修补后再用，连一小片残纸也不肯丢弃。就这样，他们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1938年8月16日，第一张铅印的抗敌报同群众见面了。这张用四号字排成的清晰美观的报纸，是边区党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喉舌，是一支坚强的文化铁军和人

民对敌斗争的精神支柱。当时在山西完县搞抗日救亡工作的田流回忆说：“在工作中我们非常想知道全国抗日形势发展的情况。正在我们急切期望着的时候，《抗敌报》出版了。当我看到第一期《抗敌报》时，我激动得哭了，我是流着热泪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的。1938年以后，每接到一期《抗敌报》，我就被激动一次，总把它带在身边，反复阅读，并把报上的消息告诉群众。”

从1938年6月到12月，不到半年时间，《抗敌报》共出版75期，刊出社论、评论和重要文章72篇。邓拓除了全面负责报纸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外，还亲自撰写稿件，绝大多数社论、评论和重头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邓拓在写作上多才多艺，“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消息、通讯、散文、评论、诗词，什么都拿得起。他写文章的速度，用“倚马可待”形容丝毫也不夸张。许多社论，他是在马背上构思，完成腹稿，一到住地就“笔走龙蛇”地赶写出来，正可谓“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他的这个本事，适应了戎马倥偬的战争生活的需要，也配合了战时新闻宣传的时效性。

1938年9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八路围攻”，邓拓连续写了三篇社论：《加紧战争动员粉碎敌人围攻》、《怎样进行坚壁清野》和《反对麻木不仁与惊慌失措》，动员军民“反围攻”。当载有他第三篇社论的报纸开印时，敌人已逼近五台山区，报纸印了一半，不得不拆了机器转移。转移途中，电台里传来军区政治部和边区党委反“围攻”的文告。为了及时把党的声音告诉群众，邓拓把队伍带进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偏僻小山村瓦窑村坚持出报。贫苦的乡亲们清理出几间柴房作排字房和机器间，借给几张桌子当排版的案子。他们坐在乡亲的

门槛上，伏在膝盖上写稿、编稿，就着麻油灯碗拣字、排版、印刷，昼夜不停地抢出了四期报纸，发表了《中共晋察冀区党委关于粉碎日本强盗新进攻的号召》、《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告全边区民众书》以及邓拓写的《认清当前战争形势》和《战时宣传鼓动工作》等重要文章。报纸刚刚印发完，敌人已逼到龙泉关，离瓦窑村只有十公里了。他们立即转移到平山县卧龙村继续出报。

《抗敌报》不断传送着八路军抗战前线的胜利消息：四五月间的冀中齐会河间大战，六月的神堂堡大捷，十月的灵寿陈庄大捷……这些战斗给日军主力以重创，击毙了常冈、宽治、水源、清水、西夫等敌酋。1939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一分区部队在易县黄土岭，包围痛歼日本精锐部队二千余人，亲临督战的阿部规秀中将指挥官被迫击炮弹炸死。这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打死的第一个日本高级将领，这个阿部正是日本帝国首相阿部信行的家庭成员。11月25日的《抗敌报》在一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胜利消息，并进行了连续报道，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战斗热忱，也震惊了日本朝野。东京《朝日新闻》连续三天用通栏标题写着“明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并哀叹：“皇军自创始以来，在以往众多战役事变中，关于中将的战死尚未见有先例。”

《抗敌报》在战争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受到党和人民的一致赞扬，被称为“民族的号角”。（见聂荣臻为《抗敌报》创刊五十周年题词。）八路军总部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延安《解放》杂志撰文称赞：“晋察冀的报作工作确是做了模范，并给了我们很宝贵的经验。”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来边区考察后，在《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写道：“《抗敌报》是晋察冀边区

舆论界的权威，同时也是抗战新文化的播种者。”以笔作战的胜利豪情充满邓拓的心怀。1938年12月他写下真切感人、气势磅礴的诗篇《勸报社诸同志》：

笔阵开边塞，长年钩剪风。
启明星在望，抗敌气如虹。
发奋挥毛剑，奔腾起万雄。
文旗随战鼓，浩荡入关东。

游 击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北方分局，彭真兼任分局书记。北方分局决定1940年11月7日，将隔日刊的《抗敌报》改为《晋察冀日报》。邓拓担任了分局党报委员会书记、《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同时担任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

1941年到1943年，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国抗战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1940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与德、意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12日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接着日寇先后入侵菲律宾、泰国、缅甸、香港等亚洲国家、地区。日本侵略者妄图迅速灭亡中国，将中国变为它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后方基地。他们疯狂地对抗日根据地加紧“清剿”、“扫荡”和“蚕食”，实行极其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边沿地带制造大片“无人区”，甚至施放毒气弹和进行细菌战，企图摧毁敌后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

在这极端恶劣、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下，邓拓提出“游击

办报”的思想。当时有人议论道：“逃命都顾不着，还办什么报！”邓拓却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的报，决不能停刊，报纸的存在就说明根据地军民在坚持战斗。”他提出：“凡有二十四小时较安定的时间，绝对保证出报一期。”

为了适应游击办报的需要，邓拓带领报社同志对印刷设备进行改造，他提出：“万一敌人把大路封死了，牲口用不上，能否人背肩扛铅印机呢？”报社有个能人，印刷工人牛步峰，在邓拓启发下，研制成了一台木制的轻便铅印机。这台铅印机只有手提箱大小，三十公斤重，拆装方便，人背肩扛即可行动。转移到一个新地方，借老乡一张饭桌，几分钟即可装好开印。为了表扬牛步峰的事迹，邓拓请抗敌剧社在边区群英会上编了一首歌：“劳动英雄牛步峰，无师自通，会印刷，会装订，掌握红炉，会做木工……”

铸字和排字的工人也分别把铅字的字身缩小，把字架改成可拆可装的轻便架子，把字盘装进特制的木箱中，铅字减少到三千个。全部印刷设备，用几头牲口就可以运走。记者、编辑，只用这三千常用汉字写稿。这就是后来盛传的佳话：“八头骡子办报”和“三千字内做文章”。他为了应付最大的困难，邓拓把报社职工编为两个梯队，一是武装梯队，负责侦察敌情，放哨保卫，抗击敌人袭击，掩护人员转移；二是出报梯队，人员精简到最低数，担负编辑工作，新闻电台和排字印刷、发行。生活管理精简成十几个人，其他人员则分散隐蔽到农村深山里去。

1941年8月，七万日伪军分四面向边区扑来，一路上实行所谓“铁壁合围，梳篦扫荡，反转出击，辗转抉剔”的战术，所到之处，满目焦土，尸横遍野。邓拓接到北方局通知，要报社9

月1日前转移到阜平。这时敌人距报社所在的平山县滚龙沟只有二十公里左右了。邓拓指挥大家坚守岗位，突击编发赶印出十期报纸，配合反“扫荡”的宣传动员。当印完最后一期报纸，掩蔽好留下的物资设备，邓拓率领队伍出发，不料，敌军已封锁了通往阜平的道路，报社陷入四面包围之中。邓拓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地指挥队伍化整为零，分散突围，与敌人周旋于高山峻岭。在最危急的时刻，他对同志们说：“如果敌人向这座山冲来，我们万一走不脱时，就和他们拼，宁死不当俘虏。你们有手榴弹，在万不得已时，要拉开它和敌人同归于尽；我和老谢（报社党总支部书记谢荒田）有手枪，会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这次突围，报社牺牲了三位同志。

滚龙沟山峦叠嶂，沟大洞多，山势险峻，又有群众的支援，邓拓决定就在这里游击办报。1941年9、10两个月中，在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山村铧子尖，敌人一来，他们就分散转移，将印刷设备埋藏山中；敌人一走，他们又迅速回来，挖出机器印报，就这样往返七次，印报32期，留下晋察冀日报史上“铧子尖七进七出”游击办报的佳话。

“北营遭遇战”是另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1943年9月24日晚，报社来到灵寿县北营村。天黑漆漆的下着淅淅细雨，队伍从村东头悄悄摸索进村。本来这一带的村庄是没有敌人的，队伍前面的武装班见村头的村公所有灯光，也没有太介意。谁知稍早些时候，一股敌人已从村西头进了村，占据了村公所。武装班的同志一进院，劈面遇见了敌人。他们一面大喊：“有敌人！”让部队撤离，一面与敌人接上了火。这股敌人也如惊弓之鸟，立即上了房，密集子弹向部队飞来。邓拓前面的一个同志和身后的背夫都应声倒下，身下坐骑也被打倒在地。他

从地上一跃跳起，迅速指挥身边的几位同志“快往后山撤！”部队被打散，又迅速分为三路小队摸着夜路向山坡高处撤去。敌人搞不清对方的虚实，也不敢追赶，打过几阵枪后便没了动静。邓拓和战友们脱险后清点队伍，发现三位同志牺牲，一人负伤。他们继续转移，来到一个海拔两千余米，四面环山，只有三户人家名叫“日卜”的小村，安起机器出报。当日寇发现，调头袭来时，报纸已由交通员秘密发出，报社也已转移了。战斗结束后，邓拓写下《反“扫荡”途中》一诗：

风雨山林路，悄然结队行。
兼程步马急，落日水云横。
后路歼顽寇，前村问敌情。
棘丛挥斤斧，伐木自丁丁。

《忆日卜》则将这种艰苦的游击生活写得颇有诗情画意：

忆得昨宵篝火红，战歌深思倍匆匆。
枕戈斜倚蓬茅帐，假寐醒时月正中。

百 姓

在反“扫荡”最艰苦的日子里，《晋察冀日报》的坚持出版，极大地鼓舞了群众在敌后坚持抗战的信心。敌人侵入边区内地，烧杀抢掠，散布谣言，说“晋察冀边区垮了”。可报纸仍在出版，并且通过广大的民兵发行网，源源不断地送到老百

姓手中。百姓们奔走相告：“咱们《晋察冀日报》还出着，边区垮不了。”当时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于力老先生，有感而发，写下《阅报》一诗：

新报犹然排日来，可怜鬼子妄相催。
凭他东荡西冲猛，扫着村村裂胆雷。

邓拓看到于老的诗，十分兴奋，当即和诗一首：

挺笔荷枪笑去来，巍巍恒岳岂能摧？
攻心一纸歼顽寇，更听千村动地雷。

《晋察冀日报》在报道抗战重大战役的同时，还对边区的社会生活进行广泛的反映。他们详细报道了日寇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一桩桩血腥罪行，燃起同胞的复仇火焰；他们报道过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的抗战献出宝贵生命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柯棣华，使人们看到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他们报道过机智勇敢，把敌人带进我军包围圈而自己被挑在鬼子枪尖的放牛娃王二小和为牵制敌人爬上险岭，跳崖殉河山的狼牙山五壮士，激励着边区人民的抗战热情；他们还报道过在聂荣臻将军的关心下，两个失去父母的日本幼女被中国军民送还敌方的事迹，将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与敌人的残暴兽行形成鲜明对照……与此同时，他们还及时报道了边区的春耕土改、民主选举等老百姓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使报纸真正成为“抗战文化的播种者”。

1938年9月，灵寿县发生了一起极其令人痛心的不幸事件——

—抗日救亡工作者，抗日自卫队基干队员刘庆山，因为揭发区长和助理员的贪污行为，反被诬告，被县长非法枪决。这一事件引起群众的极大义愤。《抗敌报》派出记者进行专访，向社会连续报道冤案真相，并发表《关于刘庆山事件》的社论，指出：“在抗日根据地里，发生这样的事件，显然是一个严重的不幸与耻辱。”呼吁边区政府立即彻底查究，严惩犯罪县长和贪污官员，保障抗日工作者的生命安全。报纸说出了广大群众的心声，犯罪分子终于得到应有的惩罚。邓拓以“关白”为笔名写了一首《吊拴牛（刘庆山小名）》的诗：

献身家国出田间，杀敌心雄起揭竿。
奔走危疆嗟枉死，激昂斗志厉如山。
一夫但得擎长剑，片息宁教活丑獐？
知汝重泉犹切齿，未寒热血骨先寒！

《晋察冀日报》创办伊始，就以富于特色的副刊紧紧吸引着边区的爱国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最有名的两个副刊是文艺副刊《海燕》和通俗性副刊《老百姓》。这两个副刊都是在邓拓亲自倡议下办起来。《海燕》是边区第一个文艺刊物，主编顾宁，主要刊登报告文学、街头诗、墙头小说、街头剧本等。《老百姓》则是邓拓和编辑们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群众所关心的内容的一项尝试。在创刊号上，邓拓发表《先说几句》的发刊词：

“俗话说得好：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咱们老百姓不是秀才，但天下事还是要知道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出了‘老百姓’。‘老百姓’是给咱庄稼人、手艺人、买卖人和所有做

活的人看的。‘老百姓’是告诉老百姓知道天下事，在今天来讲，就是告诉老百姓知道日本鬼子怎样不讲道理来欺侮咱们，咱们又怎样起来赶走日本鬼子。……咱们中国老百姓，向来是不敢随便说自己想要说的话的。因为从前当官的，不许咱们老百姓说话，就是所谓‘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但是现在，一天一天民主啦，就是说老百姓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啦。当官的是咱们老百姓自己选举出来的，他当然是不能不许咱们老百姓说话。所以这个‘老百姓’报，还要咱们老百姓大家都在上面来说咱们自己想说的话。”

《老百姓》真正是“老百姓自己的报纸”，内容主要是给边区百姓讲抗日战争的大事，讲各种政策，讲科学文化卫生知识，回答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老百姓》上的文章短小精悍，通俗易懂，深受村干部和群众欢迎。每逢吃午饭或晚饭时，村民们常常一手端着一碗菜饭，一手拿一个窝窝头，蹲在家门口、大树下、碾子旁或庙台上，边吃、边听民校教师或屋顶广播组选读《老百姓》上的文章。许多国内外大事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就是这样传播到老百姓当中去了。

此外，报社还出版一种专给敌占区人民看的地下报纸《实话报》，向北平、天津、保定、张家口、石家庄、太原、大同等生活在敌人铁蹄下的同胞发送，介绍根据地的情况和国内外抗战形势，帮敌占区的老百姓看穿日寇、汉奸叫嚷的“皇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的骗人鬼话。

“老 邓”

战争年代，生活非常艰苦。报社工作人员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一斤四两（16两秤）粮食、三钱盐、三钱油、五分钱菜金。由于敌人不断进行“扫荡”，疯狂地抢掠破坏，就是这个定量也常常不能保证，有时每天的粮食只有一点黑豆面，吃不饱，大家就挖野菜充饥，有的同志因此中毒，脸面浮肿。邓拓是全报社最忙最累的人，他身体不好，患有胃病，但他坚持与同志们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化。有时，炊事员为了照顾邓拓，给他熬点小米粥，但他舍不得喝，亲自端给吃黑豆面闹肚子的同志喝。管理科的同志见他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又吃不下饭，怕他时间长了拖垮身体，提出每天给他增加两个鸡蛋补补身体，但他坚决不同意。几位报社领导不得不专门开了个会，把给邓拓补助两个鸡蛋的事形成决议。

1939年报社驻在马兰村时，一部分印刷设备安在铁官寨山下一个叫苇沟的地方。秋天山洪暴发，河水猛涨，苇沟工人眼看要断粮了。邓拓听到这个情况后非常着急，亲自过河去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河水又大又猛，一个巨浪，他被急流冲倒，幸而身边的同志一把将他抱住，才没有被山洪卷走。

1944年开展大生产运动时，邓拓和同志们种了三分地的红薯。初春，他领着大家上山修塘蓄水，第一个跳进冰凉刺骨的泥水中。从种到收，邓拓始终和大家一起劳动。秋后一算账，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大家高兴地焖了好多红薯，还送了一些给老乡。当时报社搞了纺线、捻毛线、织袜子、卷纸烟、做肥皂，还和别的单位一样，完成一人一年缴纳公粮80斤小米的任务。

邓拓在工作上更是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当时担任编辑的智良俊同志回忆说，一天深夜，勤务员冒着寒风，奔跑四五里，

送来报纸清样请邓拓同志审阅。但是邓拓同志太劳累了，怎么叫也叫不醒。智良俊想，老邓那么累，真不忍心打扰他，不如让他多睡会儿，自己替他分担点工作吧。于是他替邓拓看了清样，因为版面缺几百字需要补白，他就将早已看好的国民党某官员讲抗战的一份电稿拿来付排了。第二天报纸印出，邓拓一看大为惊诧，忙追问是谁让登的。智良俊只好说明原委，并申辩说按当时的编辑方针这类稿件是可以登的。邓拓说，上级规定，这类站在英美立场讲抗战的，不应登载，并连连责怪智良俊为什么不叫醒他。这一来，报纸只好停发一天，重新编印，浪费了不少纸张，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智良俊愧悔万分，从这件事上，他看到邓拓对工作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极端负责的精神。

还有一次，美英联手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报纸出了个“号外”，说这是开辟了“第二战场”。当时的上级认为不应这样评价，对报社提出了批评。本来这件事不是邓拓直接处理的，但他承担了全部责任，主动进行了检查。邓拓就是这样，对别人很宽，对自己很严，对编辑、记者既爱护又信任，大家都把他当成良师益友，亲切地叫他“老邓”，上上下下，从没有人对他以职务相称。

毛 选

邓拓和《晋察冀日报》是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宣传者。1942年7月1日，邓拓为《晋察冀日报》写了《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当时还没有“毛泽东思想”的统一论称）

的社论，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统一完整的体系，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的新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论著之一。

邓拓一向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对毛泽东本人也是十分尊敬和钦佩的。1938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邓拓读后激动地说：“《论持久战》写得太精辟了！实际、雄辩、逻辑性很强，通篇充满了辩证法，是指导抗日战争的理论武器，要让边区的干部和人民很快都能读到。我们的报社，不但要出报，还要出书，还要办成出版社。抗战一周年就要到了，我们就用‘七七出版社’的名义，先印这本书吧！”

《论持久战》是报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此后，凡是毛泽东有新作问世，报纸发表后都要印成单行本出版。1940年毛泽东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邓拓从彭真处读到这部书稿，激动地说：“这本书太好了，是划时代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解决了。”他当即挥毫写诗一首，表达对毛泽东同志的由衷赞佩：

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城绕指到眉端。
阵图开处无强敌，翰墨拈来尽巨观。
风雨关河方板荡，运筹帷幄忘屯艰。
苍龙可得纓在手，且上群峰绝顶看！

1944年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决定由《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邓拓担任主编。这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系统地编选了毛泽东的二十九篇著作。

邓拓在卷前写了“编者的话”，指出毛泽东同志“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作了高度评价。

《毛泽东选集》是在距报社五十多里的，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坡上村排印的，设备简陋、交通不便。在邓拓亲自布置下，印刷厂工人从排字、校对、印刷到装订……各个环节都十分精心，他们用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纸，仅仅四个月时间，就高质量地印出了书，其中有一百本精装的，红、蓝缎子书皮，上面烫着金黄的“毛泽东选集”五个大字。这部《毛泽东选集》出版后，许多地区都以此为蓝本相继出版印刷“毛选”。这是邓拓为传播毛泽东思想做出的巨大贡献。

第四章 人间长此忆真情^①

一 岚

一岚这个来自大城市的女学生，在到晋察冀工作之前，满脑子都是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生活的浪漫幻想。她上学时读过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那红军女英雄骑马驰骋疆场的英姿令她羡慕不已；她还读过萧军《八月的乡村》，那里也有个像男人一样粗犷豪放的女英雄，无拘无束地策马飞驰在山野之间。她想，在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的女孩子，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吧？谁知到了边区才知道，实际工作远远不是那么富有诗意，那么“够味”。

她被分配到晋察冀分局党委机关组织科，科长是聂荣臻司令员的夫人张瑞华。几个新来的年轻人丝毫没有组织工作的经验，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一次，领导让一岚设计个农村组织调查表。一岚凭着想象，费了很大的劲画了一张很复杂的表格，各种调查项目密密麻麻地挤在上面。这份表格发下去后，等了又等，却没有一张填回来的。一问，村支委们说：“我们看不

^①邓拓《心盟》。

懂，不知道咋填。”这件事给一岚当头一棒，开始意识到自己是那样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凭空构筑空中楼阁，连自己都感到可笑。她想起在延安时，毛主席讲过要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的话，就向组织提出到基层工作的请求。

1939年3月，一岚的申请被批准了。临行前，分局党委第一书记彭真同志握着她的手说：“到群众中锻炼锻炼好。要虚心向群众学习，放下架子会学到很多东西。”就这样，一岚高高兴兴来到平山县妇女抗日救国会，担任了妇救会副主任兼宣传部长。

平山县是晋察冀边区的南部屏障，滹沱河水从这里汨汨流过，河两岸修有宽宽的水渠。民谚说：“滹沱百害，惟富平山”，说得是滹沱河水经常泛滥成灾，独有平山水利发达，是重要的产粮区，有“边区乌克兰”之称。平山处于抗日斗争的第一线，是全边区的模范县。妇救会的工作，也开展得轰轰烈烈。

抗战时期的妇救会工作，主要是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支援前线。而要参加抗战，首先要争取妇女独立和男女平等。她们组织起妇女识字班，使千百年来生活在最底层的妇女，第一次有了文化，挺起了胸膛。她们在土改中，争取妇女和男人一样具有土地所有权和继承权；她们解放了地主老财家的丫环，反对包办婚姻、纳妾和童养媳，实行婚姻自主；她们反对打骂和虐待妇女，不仅如此，还使妇女破天荒地有了政治上的选举权，参加了妇女自卫队，站岗放哨、慰劳救护，送情报、锄汉奸，为前线战士做军服鞋袜。她们“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自己则在后方加紧生产，开荒植树、修渠筑堤、送粪锄苗、春耕秋收，多打粮食支持前线。

一岚深深地被边区这火热的妇女工作所吸引。她一到这里，

就与当地的妇女干部田德馨、张文淑、陈静汶、崔亚南等结成了姐妹一般的朋友。她喜欢这些本地干部身上的质朴、爽朗，斗争的坚决性，而本地干部，也很喜欢这位大城市来的女孩子。她文化程度高，脑子灵活，笔头子快，口才也特别好，作报告不用准备就能出口成章，清脆悦耳的嗓音非常富于感染力；她活泼热情，歌也唱得很好，经常边教妇女识字，边指挥她们唱：“窗外太阳红，门前河水清，送郎上前线，杀敌多光荣……”更为难得的是，她丝毫没有“洋学生”的架子，能和大家一起吃苦耐劳。

那时，一岚常常要到三四十里外的区、村进行工作。她背着个小背包，独自跋涉在高山峻岭之间。雨季山水猛涨，淹没了滹沱两岸的堤坝和山路，一岚只得爬上岸边高高的山岩，脚下是奔腾咆哮、吼声吓人的洪水。独木桥断了，大石坡斜插入水中，坡上凿几个窟窿，嵌插上几块小石头。过河的人要跨大步从石头上跳过去，一不小心掉下去，就会被洪水冲走。有时一岚一个人在大山里迷了路，找来找去，翻过一座山梁就要用大半天时间。这些困难对一个女孩子来说，真是严峻的考验。好在她天生一副乐观勇敢的性格，山中遇到的老乡，又都是朴实厚道的庄稼人，他们只会诚心地帮助一岚，而不会心存歹意。

边区生活非常艰苦，敌人的封锁使粮食奇缺，有时只能吃黑豆饼、杨树叶掺在一起的窝窝头。做饭前要拿秤称，一人二两，一点也不能多。有的人一觉醒来，饿得都起不来床。几年才发一套制服，夏天掏出棉花当单衣，冬天又絮上棉花或羊毛御寒。

条件这样困难，同志们之间却充满真挚友爱的气氛。几个本地干部见一岚一个大姑娘家，发的衣服不够换，回家探亲总

要给她带件衣服。一次，田德馨得知一岚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工作，就回家拿了些钱来。一岚见这位平时无话不说，打闹惯了的姐妹从远处边喊边跑着追来，以为又是和自己闹着玩的。她挥着一把铁筷子，边跑边笑嚷招架着。德馨哭笑不得，她终于追上了一岚，把钱塞到她手里。这纯真的战友之情，感动得一岚流下眼泪。

一岚爱唱歌，像只边区的小百灵。她走到哪儿，就把欢乐的歌声带到哪儿。1939年9月边区开联席会议，正值马清藻、赵伯涛夫妇结婚。一岚自己编了一首歌，在婚礼上指挥大家唱：

“专区联席会议开，代表齐来，中秋佳节月光皎洁，红男绿女乐开怀。新郎马清藻抗战英才，新娘赵伯涛喜笑颜开。两人一见多亲爱，站在一排。特别快呀！特别快！明年生下小乖乖，一个叫真真，一个叫爱爱。”

后来，马清藻、赵伯涛果真生下两个女儿，也真的叫了真真、爱爱。

一岚在当地妇女中也特有人缘。她来到村里，妇女们常常把她团团围住，牵着她的手拉家常。一岚就趁这个机会给妇女们讲抗日的道理。河北的老乡说话很“垮”，一岚在和群众的接触中，时时感到要收起自己的“学生腔”，向当地群众学习语言。有一次，一位老太太颤巍巍地抚摸着她的脸，说：“看这俊闺女，脸皮咋这么细呀？”又问：“带了壳子没有？”问得一岚莫名其妙。旁边的妇女们哈哈大笑。一岚闹了半天才明白，“带壳子”是当地话，意思是结婚了没有。

大娘无意中的问话，不禁触动了一岚的心事。到边区后，她虽与赵石英偶有通信联系，无奈山川阻隔，战事频仍，一封信要辗转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到达对方手里。像一岚这样俊

美端庄又有文化的年轻姑娘，在边区是凤毛麟角。打游击时，她腰间插一颗手榴弹，英姿飒爽，被称为“晋察冀边区一朵花”。爱慕她的年轻人自然不少。她总是说自己已有男友，让那些追求者断了念头。然而，在她内心深处，却时时感到自己与赵石英的未来，是那样迷茫难测。

1940年平山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普选运动，民主选举各级政府领导人和民意机关，实行民主建政。妇救会也动员广大妇女，以高涨的热情参加投票选举。无论是刚生下娃娃的妇女、害病的妇女还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都非常珍惜自己手中那神圣的一票。有的老太太投票后激动地流着眼泪说：一辈子被人踩在脚下看不起，没想到今天还能和男人一样投票选举……这都是共产党给咱们的权力。在区选中，妇救会推荐的陈啸当选为全县惟一的女区长。县长的候选人意见比较集中的是赵继昌。为了活跃会场，造成民主气氛，县妇救会提出了一岚，县农会提出崔民生参加竞选。为此，妇救会还专为一岚印发了竞选纲领，上面写着，若选丁一岚当县长，将为县政建设，妇女、儿童的利益做若干若干件好事。一岚坐着牛车，走区串乡到处发表竞选演说。她穿一件边区自产的灰蓝交织的中式棉袄，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演讲词简洁明快，颇具感染力。竞选结果，赵继昌当了县长，丁一岚和另一位妇女干部担任了县议员。

马 兰

正当丁一岚在平山县的妇女工作中锻炼得羽翼渐丰时，邓拓和报社的同志们正在阜平县的马兰村坚持出报，与这里的老

乡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情意。

马兰村是位于北太行余脉的一个美丽、僻静的小村。它四面环山，山坡地边环绕着茂密的树林，盛产核桃、栗子、柿子、黑枣，村前有条清清的胭脂河潺潺流过。1939年三四月间，抗敌报社迁到这里，从此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成为报社的基地之一。邓拓和他的战友们曾在这里共同战斗了五六个春秋，留下终身难忘的回忆。二十年后他为《北京晚报》写“燕山夜话”，以“马南邨”为笔名，正是为了表达对这段战斗生活和马兰村人民的怀念之情。

邓拓忘不了村里那片不见树冠的杨树林。1939年，日寇“扫荡”，又闹水灾，马兰村的乡亲们把小米、玉米送给报社的同志吃，而自己却吃糠、吃野菜、吃杨树叶子。那一年杨树都没了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而报社的同志，也在邓主任的带领下帮助老乡搞编织、运输、补耕补种作物生产自救。在山野里遇到从树上落下来的桃子、柿子，报社的同志就捡起来送还老乡。

报社和马兰村的乡亲们水乳交融，简直成了一家人。邓拓既是报社主任，又成了马兰的“村主任”。谁家多少人，有多少地，谁家生活困难，他都了如指掌。报社进驻马兰村后，村里的风气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姑娘们出嫁不坐花轿，都时兴骑马。邓拓有匹聂荣臻司令员送的枣红色大洋马，非常神气，这马就成了村中的迎亲马。每当得知谁家女儿出嫁，邓拓就让饲养员备好鞍子，把马拉到街心，让新郎骑上去迎新娘。邓拓和报社同志还为村里办民校，扫文盲。他亲自给夜校上课，第一堂课就是“打日本，救中国”。在政治课上，他给村民们讲什么是“二五减租”，还劝妇女“撒脚”（放足）和剪发。

在一次“扫荡”中，敌人抓了马兰村四十多人，威逼他们供出报社的机器埋在哪里。刺刀刺得乡亲们鲜血淋漓，但没一个人吭声。鬼子哇哇叫着，灭绝人性地砍下几个乡亲的头颅，人们眼睛里喷出愤怒的火焰，仍没一个人开口。鬼子气得发疯，又一连戳死几个乡亲，最后还是没有得到埋藏机器的地点。每当回忆起这些，邓拓总是激动地说：我们的报纸，不单是用墨印成，也是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用血写成的。

报社人的鲜血，也洒在这片土地上。村边胭脂河畔，掩埋着七位英勇牺牲的晋察冀日报社的同志，那是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收葬的。安葬时邓拓为他们写了悼诗：

故乡如醉远，天末目栖迟。
沥血输邦党，遗风永梦思。
悬崖一片土，临水七人碑。
从此马兰路，千秋烈士居。

诗 友

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邓拓并没有丢下吟诗作赋的爱好。常常是诗思勃发，不废吟咏。当时的一些战地诗人，如顾宁、雷烨、李肖白、田间、钱丹辉等常常得到邓拓的指点并与他唱和往来。顾宁（笔名司马军城）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1938年从湖北到延安，分配到晋察冀日报担任编辑、记者。他是个热情如火的青年，曾写下许多优秀的通讯和感人的诗篇。陆定一同志称赞他的诗“其作用相当于一篇有韵的论文”。顾

宁与邓拓朝夕相处，谈诗论文，十分投合。1942年顾宁被派往长城以南滦河岸边，游击办报，临行前，邓拓写一首《步韵送军城》为他送行，诗云：“离乱旅途天野阔，轩昂战纛日边明。风沙扑面迷蒙处，端赖惯征识路人。”1944年顾宁给邓拓来信，他从滦水河边向西遥望燕山深处，激情满怀地写道：“你看，朝晖起处，即我在也。”然而不久，他在丰润县白官屯附近突围时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五岁。噩耗传来，邓拓彻夜难眠。他一遍遍展读顾宁的来信，挥泪写下一首挽诗：

朝晖起处君何在？千里王孙去不回。
塞外征魂心上血，沙场诗骨雪中灰。
鹃啼汉水闻滦水，肠断燕台作吊台。
莫怨风尘多扰攘，死生继往即开来。

写过《滦河曲》诗人雷烨，也是踏着战火，穿过封锁线，到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后来在一次反“扫荡”中不幸遇难。邓拓写了《恸雷烨》抒情散文，痛悼牺牲的战友：“呜呼，雷烨，不负乎生又不愧乎死。你的精神永远永远伴随着斗争而常在！”

在血火十年的办报岁月中，晋察冀日报共有三十八位同志在战争中牺牲，十七位同志在繁重的工作中病逝，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五岁，最大的也只有三十四岁。“后死吾曹犹健在，不教胡语乱啾啾”^①，这壮怀激烈的诗句，寄托了邓拓对战友的一片深情。

^①邓拓《哭何云同志》。

1943年2月，晋察冀边区召开参议会。会议期间，邓拓发起组织了“燕赵诗社”，聂荣臻、皓青、阮慕韩、张苏、刘奠基、宋劭文、吕正操、于力等知名人士联名响应。燕赵诗社，取名自唐代古文家兼大诗人韩愈的名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邓拓起草一篇《诗社缘起》：

“古来燕赵，豪杰所聚，慷慨壮歌，千秋景慕。方今板荡山河，寇氛未消，黎明前夜，国难犹殷。有志之士，奋起如云，边区民众，僥议宏开，定反攻之大计，期必胜于来朝。窃谓盛会不常，机缘难遇，诚宜昂扬士气，激励民心，以燕赵之诗歌，作三军之鼓角。为此倡议立社邀集联吟，所望缙绅耆老，硕彦鸿儒，踊跃参加，共襄斯举。”

文章写得简洁有力，音调铿锵，充满振奋人心的豪气。它出自三十一岁的邓拓之手，足见这位才子的大手笔。聂荣臻元帅在1979年悼念邓拓的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情景：

“他很喜欢作诗填词，在艰苦的战争年月，他的雅兴还不小，居然组织起‘燕赵诗社’，团结了不少朋友，并把我也拉进这文雅的组织里来了。”

邓拓的诗，有金戈铁马、黄钟大吕，也有吟风弄月、锦瑟丝弦，然而更多的是战时的行吟诗。

娄凝先同志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写了这么两段与诗有关的往事：

“在一次行军途中，我向他问起诗社的情况，颇触起他的诗兴，他指着沟旁一棵棵高大的白杨树对我说：‘看，这些白杨树活像一枝枝巨大的毛笔，伸直向着蔚蓝的天空，要书写伟大的篇章。’”

“有一位来自北平的女同志，据说曾在中国大学任教，是专讲诗词歌赋的。邓拓同志时常和她交谈，那时是战争环境，室内布置简单：一盏油灯，几排书册如此而已。邓拓同志曾对我描述当时即兴吟咏的联句：‘书如青山任陈列，灯似红豆惹相思。’我不知道这里是否套用了古人的造句，不管如何，在那战火纷飞，生活、工作异常紧张的气氛中，他还有这种闲情逸致，谈诗论词，不能不使我感到讶然，我当时半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忙里偷闲学少年啊！’我们相视一笑。”（《风雨同舟战友贤》——回忆邓拓同志）

这位女同志，就是瞿秋白同志的表妹赵元珠，当时叫肖瀛。她原在北平做地下工作，1943年春到晋察冀日报作编辑。当时，她正遭遇家庭的巨大不幸：在平西根据地工作的弟、妹赵元征、赵元秀，先后在斗争中牺牲了；由于叛徒告密，她的父母也在北平被捕。来到这个革命大家庭，遇到邓拓这样严师益友般的领导、诗友，使她感到莫大的温暖和慰藉。当她在命运打击面前产生悲观厌世的消极情绪时，邓拓曾以诗代信，鼓励她振作起来，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老鹤孤怀超世难，寒村雾里傍花看。乱愁来去都如故，碧海翻腾且自安。”赵元珠老人晚年回忆说，当年邓拓以“老鹤”为笔名写过一些吟咏自然美景、抒发个人情怀的诗，大有唐代诗人李商隐的神韵，艺术性颇高。这些诗多未发表，只在一些战友手中传看、保存。十分可惜的是，经过“十年”浩劫，这些诗大都失传了。

战火中的友情固然可贵，爱情则更加感人。

邓拓来到晋察冀边区已是二十五岁，战斗中倍感寒来暑往、岁月匆匆，倏忽间已到了1941年，邓拓成了报社比较年长的没有爱人的老同志之一。他是报社领导，又是有名的才子，婚姻

大事更加引人注目。周明、陶军等几个年龄差不多的战友常开玩笑地问他：“老邓，你想找什么样条件的，你说呀！”每当这时邓拓总是笑笑说：“不忙嘛，忙什么啊？”是啊，报社的大事小事，都要他这个总编兼社长操心，每天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加上他坐监狱时留下了肺病和胃病，常因劳累而感到不适。这些，都影响他考虑婚姻问题。同志们见他总是不慌不忙，暗暗替他着急。聂荣臻司令员也很关心邓拓的婚姻大事，曾几次嘱咐周围的同志要多帮他张罗张罗。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同志们不断地催促，邓拓也开始隐隐觉得单身生活的不便，他想：也许真的该找一个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了。

有位和邓拓一起从太原坐大卡车来晋察冀，在边区妇救会当组织部长的女同志刘光运，得知邓拓还没有意中人，便暗暗记在心上。一次，她到四分区检查工作，与县妇女干部丁一岚同住老乡家，睡在一铺炕上。见到这位美丽能干的年轻干部，她不禁心中一动：这姑娘与老邓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吗？当她得知一岚与老邓一样，都是福建人，又都是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时，更感到这个红娘是非做不可了。

晚上，光运与一岚躺在炕上，像姐妹一样天南地北地聊开了。渐渐地，话题转向了姑娘最隐秘的心中事。光运悄悄问：一岚，有对象了吗？过去，遇到有人问这个问题，一岚总是随口答道，她已经有男朋友了。可此时，见到这位大姐姐样的人，不知怎么，她点了点头，紧接着，又轻轻摇了摇头，眼里不由泛起点点泪光。原来，光运的问话正好触动了一岚的隐痛。

一岚与赵石英天南地北，一年当中才能通上一两封信，当然无法顺畅地交流感情。前不久石英来了封信，带信的分区领导一见一岚就说：你不要难过，不能在一起，就分开吧。一岚

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果然，打开信，只见石英在信中说：分开这么多年了，你不能到大后方来，我也去不了晋察冀，这种两地分离的情况，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分手，但一岚心中明白，他们的关系结束了。

这个结果虽是意料之中的，但毕竟付出了一场真情，一岚跑到滹沱河边，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还写了一首短诗悲悼这段逝去的恋情，诗中有句：“滹沱呜咽，秋蝉哀泣……”

此时，一岚还未从失恋的痛苦中完全解脱出来，刘光运这位爱情的使者已翩然来到她身边。光运了解到一岚目前的情况，心中不禁暗喜。她风风火火地找到老邓，把一岚大大描述了一番，并且说：“我算是给你牵上线了，以下的事，你自己去进行吧！”

一向办事沉稳又日理万机的邓拓，起初并未将光运的话放在心上，但他记住了“丁一岚”这个名字。

不久，平山县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这件事却促成了邓拓与一岚的奇缘。

1941年2月，平山县东熟泥沟村发生了一桩惨案。一位年轻的村妇救会干部陈珠妮，因为积极参加抗日活动，被封建顽固的公公和丈夫合谋残杀了，尸体被用烧红的铁棍烫得惨不忍睹。兼任晋察冀日报通讯员的丁一岚得知这件事后，不由得义愤填膺。她来到东熟泥沟村进行实地了解，亲眼看到这件令人发指的暴行。她怀着满腔怒火提笔写下近三千字的通讯《血的控诉——陈珠妮惨案详情纪实》，以大量事实有力地揭露了迫害抗日积极分子的不法分子的罪行。她写道：“珠妮的惨死，使边区每个妇女感到像是自己亲身遭遇到的痛苦与不幸一样，她们永远把这个惨痛的烙印和自己火一般的斗志紧紧地结合起

来。”

文章写好后，她署了“路群”的笔名投给报社。邓拓在处理来稿时发现了这篇文章，他深深地为案情所激愤，立即决定用大篇幅刊出这篇通讯和有关的消息。不久，平山县抗日政府依法严惩了杀害珠妮的公公和丈夫。

文章是发出了，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正义激情和那流畅感人的文笔，却在邓拓心中久久徘徊着。“路群”是谁呢？看得出她是做妇女工作的，也有较好的写作基础，这正是报社的通讯员队伍里难得的人才啊！一经了解，真是太巧了，原来“路群”就是刘光运提起过的那个丁一岚！看来这位号称“晋察冀边区一朵花”的姑娘，还真是名不虚传啊！邓拓怦然心动，这回，他不再犹豫了，提笔给一岚写了一封信。

当然，在这封信里，邓拓没有谈及私事。毕竟与姑娘素昧平生，彼此还不熟悉。他只是以报社社长的身份，祝贺文章的发表，称赞她写了篇好文章，并鼓励她今后多为报社采写稿件。

在这之前，一岚只是写过一些短篇报道，如动员参军啦，办识字班啦。这次出于义愤一气呵成的长篇通讯很快变成铅字，又得到社长的亲笔信，令她喜出望外。对于邓拓他早就听人讲起过，在她心目中，邓拓是一位政治、文化水平都很高，有学问有才气，资历不凡的领导干部。她尊敬和钦佩他，却根本没有想到两人日后会成为夫妻。她给邓拓写了回信，从此，两个人开始鱼雁往来，尺素传书，渐渐地加深了一些了解。

祸 福

“珠妮事件”缔结了二人的文字之缘，然而，他们通信好长时间了，相距也不过几十里地，却从没有见过面。

这时，丁一岚已调到四分区工作，住在平山县东柏坡村。一天，报社记者顾宁受邓拓之托，借办公务顺道来看望一岚。顾宁是邓拓的挚友，他对老邓和一岚通信的事知道得很清楚。他一见一岚就直率地说，老邓可是个大好人啊，又是咱边区的大才子，你还犹豫什么，该和老邓见面了！

顾宁走后，一岚想了很多、很多。在书信往来中，她不是感受不到邓拓的才华、诚挚和热情，但她仍有顾虑。一来邓拓长她近十岁，自己只是个二十岁的小妇女干部，不愿别人说她高攀大首长；二来听说邓拓身体不好，患有肺病；三来呢，虽与赵石英早已断了联系，但感情上那点牵扯，还真有点剪不断，理还乱。她想，先不急着重见面，还是保持通讯联系吧。不久，大规模的反“扫荡”开始了，事情也暂时被搁置下来了。

1941年秋季的反“扫荡”，是一岚第一次直接参加那样危险紧张的战斗。当敌人逼近时，他们便急速帮助老乡把熟了的庄稼收割、埋藏好，再把办公室里的文件、书报和桌椅等搬到深山沟的洞子里去。一天下午，一岚他们一行四十来人的队伍从东柏坡往北面的大山里走。爬过一座山，在灵寿县一个村子旁边就地休息时，天全黑了。忽然，听见村那边有几声枪响，有人喊：“敌人来了！”这支没有战斗经验的队伍立即跑散了。一岚和十几个同志跑进山沟，抓着草根树枝，往陡峭的山岩上爬。天黑路险，荆棘丛生，一岚的一只鞋都跑掉了，石子嵌进了肉里。但情况紧急，已顾不上疼了。从驻地出发时，每个人发了两颗手榴弹，领导说，遇到敌人就扔过去，绝不能当俘虏。一岚把手榴弹拿在手里，揭开了盖，拉出了弹弦，套在右手指

上，左手拿着一根探路的木棍，抓着草根树根往山上爬。事后回想起来，一岚还真有些后怕，拿着拉了弦的手榴弹爬山，万一脚下一滑，手一松，或是弹弦挂上草根，不就把自己炸了吗？

他们跑了一夜，口中又咸又苦。天亮了，跑到山下，看到山沟里有条小溪，一岚和战友们忙拿茶缸子，舀起带着泥沙的溪水大口大口喝起来。在她记忆里，再没有比那更甜更清凉的水了！

他们十几个人临时组织起来，青教会的干部小张当队长，一岚当了指导员。大家太疲劳了，决定白天分散隐蔽休息，派出两个小伙子去侦察敌情。通讯员身上都背着地委的文件，他们决定分头找干燥的地方暂时把文件埋了，以免落到敌人手里。

侦察的同志回来了，说，大股敌人已经往西去了。他们休息了半天，傍晚，通过了瓦口川封锁线，天亮时，终于来到南甸村，恰巧有中央分局机关的同志在那里。一岚他们大大地松了口气，这次短途游击转移算是告了一个段落。

在南甸村，他们见到中央分局组织部长刘仁同志。刘仁问：“大家听到其他单位的情况没有？”一岚回答：“听到报社在滚龙沟被敌人包围了，情况很严重。”刘仁听说后十分焦急，忙派人去打听。反“扫荡”结束后，一岚收到邓拓一封来信。出乎意料的是，这封信与邓拓一向的温文尔雅的风格大为不同，他在信中火气很大地说：“有人说报社反‘扫荡’损失很大，不是有意中伤，也是制造谣言。”一岚知道，邓拓这是故意冲着她来的。那次突围情况确实挺危急，但在邓拓沉着的指挥下，报社损失并不大。一岚也是后来才得知这些情况的。然而事情往往就这么怪，这封发火的信，反倒使一岚更加了解了邓拓。她想：这个人可真有股傲劲儿，别人对自己正在追求的人，讨

好还来不及，而他为了维护报社的威信，却不惜得罪于我。姑娘不仅没有生气，反倒因此对邓拓加深了敬重与好感。不知不觉间，她觉得自己的心与邓拓贴得越来越紧了。

心 盟

1941年12月，在一岚的好友任致和刘光运的特意安排下，邓拓和丁一岚这对有情人，终于在瓦口川边的晋察冀边区儿童保育院见面了。近一年之久的书来信往，彼此的思想感情，应当说相当熟悉了，但这久久期待的第一面，仍使二人感到激动。当牵着坐骑的邓拓大步走来时，一岚看到的是一个高高的个子，有点瘦弱，文质彬彬风度潇洒的青年书生，眉宇间却透出战士的刚毅；而邓拓呢？他看到了一个身材窈窕，脸如满月，明眸皓齿的美丽姑娘，文静中又有几分活泼爽朗。他们都觉得，对方正是自己心中千百次描摹过的“他”和“她”！

冬天的滹沱河畔，风沙漫卷，寒气逼人，两个年轻人的心却像火一般炽热。他们踏着月光漫步在长堤上，邓拓娓娓而谈，谈工作、谈学习，谈对未来的憧憬，一岚却保持着少女的矜持，只顾静静地听。

对于热恋中的年轻人来说，长堤再长总有尽头。夜深了，邓拓牵着马送走一岚，独自回到驻地。他夜不能眠，诗兴勃发，写下一首《初晤》，真实地记下见面时的情景：

山村曲水夜深沉，皓月霜花落木天。
阶澈清眸溪畔影，寄将深虑阿谁边？

矜持短语长悬忆，怅惜芜堤不远延。
待得他时行篋里，新诗绮札读千篇。

邓拓对姑娘的心思还有些琢磨不透，但他已爱得很深，并对这爱情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第二天，这首诗连同一封感情热烈而深沉的信，便寄到四五十里外一岚的案头。同时寄来的还有一首《夜别》：

月映长空流灼灼，襟飘微影步矜持。
十年以后重回首，瓦口川边夜别时。

从此，每二三天，邓拓必有信来，而且每信必有诗。邓拓本是诗人情怀，热恋更使他的诗思像喷泉一样奔涌。一天，邓拓向一岚讨了一张照片，在后面写了一首题像诗：

映水霞光耀眼新，两间一瞥欲无尘；
春温秋肃凝冰火，战地烽烟自在人。

邓拓眼中的一岚像霞光一样清新，像春日一样温柔，像秋天般的宁静，还有着冰一样的纯洁和火一样的热情。

冬去春来，梨花开了，他亲手摘了一大束雪白的梨花，插在瓶里让通讯员给一岚送来。这浪漫的举动竟使一岚不好意思起来。在邓拓心目中，一岚正像那带雨的梨花一般清纯动人。据说他曾为一岚写过一首《梨花颂》，可惜这首诗没流传下来。邓拓本来爱花，由于一岚，他对梨花更是情有独钟。报社驻在马兰村时，他写过一首《对花》诗，诗首自注道：“马兰之西

有铁观焉，余所居处满院梨花，因有此作”：

镜前窗下白梨花，恍见亭亭笑不遮。
春景阑珊人亦懒，心旌荡漾望终赊。
山高路远声声怨，院静阳和日日斜。
安得生成飞燕翼，轻身一掠入君家。

一岚每次接到邓拓的信和诗，自然是满心喜悦，仔细吟哦再三，爱不释手。多情的诗人邓拓，终于使矜持的姑娘芳心暗许。多少年后她回忆说：“他的热情和诗把我征服了”。（《诗思·诗情·诗魂》）

1942年春天，他们再次漫步在滹沱河边。在漫天狂舞的风沙中，他们彼此约定：要终身相伴，永远生活在一起。

邓拓给当时任晋察冀中央局书记的聂荣臻司令员写了一份结婚申请报告。这份报告写得感情充沛，文采飞扬，与其说是结婚报告，倒不如说是一首动人的散文诗。这张报告底稿丁一岚一直精心保存到了“文革”前夕，不幸终于毁于那场烈火，令一岚痛惜不已。

1942年“三八节”前夕，聂司令员批准了邓拓和丁一岚的婚事。3月7日这天，邓拓和一岚摆上红枣、核桃等几样山区土产，请来几位战友，算是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第二天是“三八节”，聂司令员和夫人张瑞华又特地为这对新人举行了家宴。一对有情人终于结成了“战地青衫侣”（邓拓《定情》），将在共同的斗争中“风波勉此生”（邓拓《客居上海》）。他们的结合成为边区一段佳话，人们交口赞道：“这可真是‘才子配佳人’啊！”

邓拓和一岚是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结合的，战争的环境和他们所肩负的重任，不允许他们建立一个卿卿我我的安乐窝。婚后第三天，两人便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邓拓以诗代信，给一岚寄来了《心盟》：

滹沱河畔订心盟，卷地风沙四野鸣。
如此年时如此地，人间长此记深情。

第五章 云山比翼双飞梦^①

女 儿

结婚以后，丁一岚仍回到四分区工作，与邓拓过了一段“牛郎织女”的生活。半年后，她调到报社从事资料工作，每天从敌人电讯中摘引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情报，供边区领导参考。从此，她与丈夫一样，终生与新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1年到1943年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也是敌后抗战最残酷最艰苦的时期。1943年秋季敌人发动了又一次大“扫荡”，这时，丁一岚已有六七个月的身孕。外柔内刚的一岚并未随老弱病残“坚壁”，而是随着报社转移。

邓拓选中日卜村作为跳出敌人包围圈的第一步。他说：“那里山高，地区大，活动范围宽，敌人来进攻，还可向外转移。”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

一岚拖着沉重的身躯，随队伍黑夜下山，在深谷中过河，爬坡，真是艰苦备尝。山坡上荆棘丛生，没有道路，一岚跟着

^①邓拓《咏鸽》。

前边的同志，艰难地移动着，一步一步向前行进。

24日“北营突围”那天，一岚跟着队伍冒着寒冷的秋雨往村后山上跑。渐渐地，一岚体力不支，落到了后面。邓拓正指挥队伍突围，跑着跑着不见了一岚，忙回过头来寻找。一岚不愿拖累大家，让邓拓和同志们快走，不要管她。邓拓严肃而又深情地鼓励她说：“不能这样，坚持下去，跟上队伍！”他拉着一岚跑了一段，又到前面指挥队伍去了。一岚望着丈夫沉着镇定的身影，为他那坚定无畏的精神所感染，不由得增添了力量。到了山脚下，一位战友用枪托拉着一岚，硬是把她拉上了山头，脱离了危险。由于夜里情急，一岚始终没弄清这位战友到底是谁，直到五十年后，在一次晋察冀老同志的聚会上，一岚巧遇这位当年的“救命恩人”才解开这个迷。原来，他就是邓拓当年的警卫员靳万起同志。“北营突围”的第二年，邓拓曾写过一首《忆北营之变》的诗记叙了当时的情形：“客秋三月战云迷，苦忆北营遇变时。弹火燃眉随突阵，田梯诀别痛牵衣。突围结屋依崖冷，怀孕离群入穴危。最是寇氛纷扰日，相逢举案又齐眉。”五十年后的1992年，一岚欣逢故人，百感交集。她步邓拓诗原韵，写了《寄战友——回忆战时岁月有感》，赠给靳万起同志：“昔秋三月战云迷，苦忆北营遇变时。弹火燃眉震空夜，壮士牺牲骢马凄。紧握枪托攀险岭，战友情深共安危。寇氛已熄终胜利，举国欢腾红旗飞。”

突围的次日拂晓，邓拓在谷家沟集齐了队伍，来到了“小根据地”日卜村，拖着身孕的一岚和同志们一起，立即投入了编印报纸的紧张工作。这个位于深山峰顶的只有三户人家的小村，只生产土豆，吃粮成了大问题。可当地老乡非常淳朴，他们拿出了自己仅有的口粮说：“同志们不用发愁，只要有我们

吃的，就饿不着你们！”一岚听了很受感动。她把这个情况告诉邓拓，邓拓一面嘱咐炊事班，把借老乡的土豆、柴草，如数记下来，以便日后归还，一面组织人下山背粮，上山砍柴，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出报。

为了摆脱敌人的围捕，报社决定向“无人区”转移。大家顶着刺骨的朔风，日夜不停地奔袭，每天要走百八十里路。身怀六甲的一岚，实在无法随队伍行动了。邓拓便把她“坚壁”在灵寿县深山一个小村里，请村干部代为照顾。小村的山沟里有个大石洞，洞口很狭窄，一岚和留下照顾她的女军医只能爬着进进出出。直到敌人撤退已是十二月，离一岚的预产期只有半个月了，报社派警卫员来接她。冰雪封山，一岚骑在马上，马蹄在冰坡上一步一滑，颠得一岚肚子剧烈疼痛起来，好不容易挨到阜平县易家庄，女军医给一岚检查了身体，说，不能再走了，孩子要提前出世了。

这个村子刚刚经历过敌人的洗劫，许多房子都烧光了，仅剩的一些也是空空四壁。他们找到一间老乡的空房，门、窗都烧得只剩下框，小警卫员从房东那里借来床单，遮挡在门窗框上，又抱来一把柴草。柴是湿的，一烧，沤得满屋子都是烟。正值隆冬季节，刺骨的寒风透过破门窗直往屋里钻，冻得一岚浑身发抖。第二天一早，一个女婴降生了。

孩子出世后，小脸冻得发紫，被烟一熏，哇哇哭叫起来。看到这情景，生死关头都不曾胆怯过的女战士一岚不禁心酸起来，泪水滴落在女儿的小脸上。这是她和老邓的第一个孩子啊！

老乡家都被敌人抢得精光，到哪里给产妇找营养品呢？警卫员费了好大劲才买到一只煮得半生不熟的鸡，给一岚喝了点鸡汤。刚过了半个月，村里乡亲们用四根木头扎了个大担架，

把一岚母女送回阜平雷堡村报社所在地。邓拓见到新生女儿那红扑扑的小脸，非常高兴。为了纪念女儿不平常的出生，也为了感谢妻子，他给女儿取名小岚。

在战争环境中，一岚是不可能自己带孩子的。女儿刚满月，她就把小岚寄养在阜平麻棚村村长陈守元家。陈守元的妻子陈大妈刚给第三个孩子断了奶，奶水充足，正好哺育小岚，夫妻俩把小岚当成自己的亲骨肉，一直带到三岁。

诗 帕

送走了女儿，一岚继续在报社做资料编辑工作。夫妻俩住在邓拓那间又是办公室，又是卧室的小屋里。有了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的丈夫，一岚更加重视读书学习了。工作之余，夫妇常在一起畅谈学习收获，有时也谈论论文。邓拓多年养成晚上写作的习惯，每当夜深人静，他总是就着昏暗的灯光奋笔疾书。写累了，就停笔踱到院中，就着月光的清辉，伸展伸展酸麻的胳膊腿脚，高兴了，还随口吟咏几句即兴的诗作。每当这时，一岚总是关切地为丈夫添上开水，或是走出去陪他聊聊天，换换脑子。这情这景，倒真有几分“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味道呢，还是邓拓本人的诗句更加传神：

孤窗走笔街声沉，小院无人霜月侵。
散稿案前书未竟，狂歌门外意难禁。

1944年，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党校集中起全边区几百个县

团以上的干部，进行整风学习。邓拓、丁一岚夫妇双双进了党校学习班。本来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理论和自我教育的机会，但半途突然插入一个审查干部和所谓“抢救运动”。阴险毒辣、性喜整人的康生在延安说河南的党组织是“假党”、“红旗党”，“河南没有一个人好人”。邓拓在河南工作过，而且还被捕过，自然成了审查对象。这是邓拓第一次被自己阵营的人怀疑和审查。一向对党忠心耿耿的邓拓，内心深处不免会有难言的苦涩与惆怅。但他的组织观念很强，在一岚面前总是隐忍自己的心情，从来没说过牢骚话。

当时邓拓与一岚分别在两个队，一个在山北，一个在山南，见面机会不多。邓拓知道，这次审干审不到一岚这个经历单纯的女学生头上。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妻子年轻热情的心，努力不使她受到一丝伤害。

然而，“文人习气未能无”，邓拓习惯了用诗词表达自己的心曲。在那段是非难辨的日子里，他写过两首赠别陶军的诗，反映了当时的心情：

无才投笔误狂歌，天涯苍茫世愿多。
如故年华过荏苒，伤心梦幻倍蹉跎。
半生事业成空论，未死雄心欲渡河。
走马山林新战伐，鬓丝何憾对风波。
英风文采识名家，忆旧他年听暮笳。
笔墨干戈都到老，江河日月如流华。
三杯鲁酒宁伤别，六幅吴绫愧画鸦。
关塞天涯家国恨，一生九死抱琵琶。

在诗中，他虽流露出“天涯苍茫世愿多”，“半生事业成

空论”的委屈和“如故年华过荏苒，伤心梦幻倍蹉跎”的伤感，但仍像宋代抗金名将宗洋临终时仍壮心不已，还是“未死雄心欲渡河”；也像“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子一样，要“一生九死抱琵琶”，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继续战斗。

又一次大规模的反“扫荡”即将来临，邓拓与一岚分处两地，关山阻隔，命运难卜。他写下长诗《战地歌四拍》寄给一岚：

“一年又值秋风起，北雁只南飞，望南来雁影无踪，算不合关山阻？远水绕荒村，莫是枕经眠未晓？明镜菩提勤拂拭，不着人间尘土。

青丝依样似旧时，镇日书空，孤怀无寄！入乡有意从头认，壮志纵成烟，不向蓬蒿浪掷！心血如潮，七度春秋销北地，数三十又三年，衰逝堪伤天欲晦；问后来岁月，还能几许？古道凄清理诗冢，高山流水休再听，广陵散绝无复当年韵！只如今抖擞旧精神，酬尽心头文字债，待取新衣上征途，好将身手试，长为孺子牛。

鞞鼓又声喧，打叠琴书无着处，缩地失长鞭，脚跟无线，咫尺吴头楚尾。想旦夕四野动烽烟，顾不得惊起伯劳飞燕各西东。漫负笈携囊早登程，且休回首，向莽莽平沙去处舞干戈，莫念那恒岳巍巍云里人。

别离滋味浓还淡，欲诉又笺残，想将心绪谱奇弦，弹与知音人不见；结伴同行重话旧，不识何时也！果不相逢时，强饭加衣好护持，独立西风里，珍重复珍重。”

在诗中，邓拓以隐晦的方式，向远方的亲人抒发了自己重重重重的心事，遥寄心头那一份挥之不去的牵挂。

“镇日书空，孤怀无寄”，“衰逝堪伤天欲晦”“古道凄清埋诗冢，高山流水休再听，广陵散绝，无复当年韵！”是的，作为诗人，在不公正的打击面前，他有壮志难酬的感伤，和前途未卜的担忧，这种情感不能不向至亲的亲人流露，但诗中更多的，还是“壮志纵成烟，不向蓬蒿浪掷”的悲壮和“好将身手试，长为孺子牛”的豪情。邓拓毕竟不是一个文弱书生，而是一个有着书生气质的战士。正因如此，他在以坚强的意志投身革命时，保留了一个书生特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使他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战士，具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人格魅力。

毋庸讳言，这是一首情诗。当又一年秋风乍起，北雁南飞时，邓拓惦记着传书的鸿雁已久久没有捎来爱人的消息了。他问爱人：是否忙于学习，已忘了人间烟火了？“别离滋味浓还淡，欲诉又笺残，想将心绪谱奇弦，弹与知音人不见”，这是多么深的爱，多么浓的情！“果不相逢时，强饭加衣好护持，独立西风里，珍重复珍重。”这又是多么殷切的嘱咐，多么细心的关怀！

诗寄出后，久久未收到回信。原来，丁一岚并未在1944年秋天收到这封诗信。事后当一岚得知这件事，感到很是遗憾。她一遍遍诵读这些美丽的诗句，用心感受着丈夫那深挚的爱情，博大的心胸。她太喜欢这首长诗了。

1948年春天，战争胜利在望。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丁一岚请邓拓用他那优美的草书，把这四首战地歌抄在一方丝帕上。当时正值他们结婚六周年，邓拓回顾六年的共同生活，不禁另

写诗一首，抄录在另一块丝绢上：

忆自滹沱河畔游，鹈鹕形影共春秋。
平生足慰齐眉意，苦志学为孺子牛。
久历艰危多刚介，自空尘俗倍温柔。
六年血火情深处，山海风波定白头。

这两方诗帕，丁一岚一直充满爱心地珍藏着。“文革”灾难降临时，家被抄了个底朝天，一岚想，别的我无法保存，这两方诗帕可不能丢。她把冬天贴身穿的一件丝棉袄拆开，把丝帕缝在里面。她先后下放到房山农场和淮阳干校劳动，这两方诗帕一直伴随着她。寒冬腊月她穿着棉袄干活，汗水浸湿了棉袄，诗帕也被洇得字迹模糊了。这两方带着邓拓的手泽和一岚的体温，洇着斑斑汗迹的诗帕，正是两人忠贞不渝的爱情的见证。

璧 合

1945年，党中央号召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为迎接抗战胜利，解放大城市做思想准备。党校决定编一个剧本，更形象、生动地配合这场学习。为此专门成立了个创作组。党校俱乐部主任陈靖坚持认为，要写好这个剧本，非邓拓出来执笔不可。当时，邓拓是接受审查的对象，有些人不同意他写。几经周折，校领导同意请邓拓出山。邓拓把个人的委屈放在一边，接受了这个任务。这年冬寒来得特别早，宿舍小屋里没有

煤炉，放上一杯水，十多分钟就结起一层薄冰。邓拓盘腿坐在凉炕上，用被子裹着下半身，趴在小炕桌上一写就是十几天。

邓拓是位头脑清醒的历史学家，他深知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大多以李自成进京后那样的悲剧告终，教训是太深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革命自然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不同，它由先进阶级组成，有先进的理论武装，但党内农民成分比较大，革命又在农村环境进行，如果不以历史为借鉴，进城后就以为天下太平，骄傲自满起来，很难不使历史悲剧重演。为了使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道理，他举例说：我们党内1927年“八七会议”到1935年之前的七八年内，就有三次“左”的错误，造成极为痛心的损失！他婉转地以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说服了大家，统一了编剧的指导思想。

剧本写好了。题目就叫《李自成进京》。这是一出四幕十五场的大型京剧。为排这个剧，党校向抗敌剧社借了演员刘流、田华和华江，其余角色一律由党校学员担任。谁知，角色派来派去，竟一时找不到剧中女主角红娘子的合适人选。

有人建议说，丁一岚爱唱爱跳，可以胜任。于是，编剧决定由丁一岚扮演武艺精强，多情多义的女英雄红娘子。

“天哪，我从来没有演过戏，以前在天津上学时，常听别人唱京剧，我有时也跟着哼哼几声，但一段也不会唱啊！”一岚为难地推辞着。编剧小组请邓拓亲自出马进行劝说：

“唱吧！这是宣传教育工作。我也没写过京剧剧本，现在工作需要就学嘛！”

邓拓现身说法，再加上许多同志的怂恿鼓励，一岚终于大着胆子练唱起来。这段夫写妻唱珠联璧合的佳话始终令一岚念念不忘。四十多年后，她深情地回忆当时演出的情景说：

“记得在演出中间我感冒了，发高烧，老邓来看我，照顾我吃药，在黑黑的窑洞前的山路上扶我下山，在校医务室打了退烧针。他鼓励我沉住气把戏演好。于是，我又上台演出了。回想当时情景也很好笑，戏装不多，红娘子全身要穿红衣服，我当然没有，就向村里的姑娘们借，还拆了我们结婚的红被面，披在上当斗篷。我拿着马鞭在戏台上跑着转圈赶路，后面跟着公子李炎。当时我感冒嗓子哑了，唱不出声，幸好，后台还有个帮腔的。就这样热热闹闹地演出，台下观众——有党校同学，附近村庄的机关干部和老乡，邓拓也在其中，不断鼓掌喝彩助兴。这是很有趣的一段生活，老邓编戏，我演出。”^①

《李自成进京》的演出受到军区机关、边区政府干部和当地老乡的好评，在边区很是轰动了一阵。

后来，“抢救运动”紧急中止，邓拓方摆脱精神的桎梏。他和一岚先后回到离别半年的报社。

狂 欢

1945年8月10日晚8时，晋察冀日报社电台突然收到延安新华社火急电报的预告。邓拓和同志们都守在电话机旁焦急地等待着重要消息的来临。午夜时分，电波终于传来特大喜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抗日军民和苏联红军的沉重打击下，被迫发出乞降照会。电文一经译出，全报社一片欢呼。报务员跑出去在

^① 《滹沱河畔订心盟》。

院子里边跑边喊：“日本鬼子投降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八年抗战，终于胜利结束了！

紧接着，新华总社又传来毛泽东主席发表的声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和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的进军令。邓拓当即用手摇电话报告晋察冀分局和边区有关单位，并决定立即赶印大字号外，传播这一胜利喜讯，单页八开纸的《号外》上印着特大字号的标题：朱总司令连发五道命令，百万雄师发动进攻！

在邓拓指挥下，报社立即组织起一个三四十人的宣传队，连夜出发，向当地群众宣传胜利。大家高举火把，敲锣打鼓，向四周村镇一路进发。村民们听到日寇投降的喜讯，也自发地点燃火把，向其他村镇传播。山边小路上，开始只见几束火光在流动，渐渐地，传递的人越来越多，漫山遍野闪耀着一片红亮的火光，整个边区沸腾了！看到这壮观的场面，邓拓按捺不住胜利的豪情，提笔填了一阕《清平乐·庆祝抗战胜利》：

“喧天锣鼓，卷地红旗舞，革命长征万里路，极尽人间艰苦！今朝四海同声，欢呼抗战功成，喜见漫山遍野，火光星月齐明。”

一岚负责宣读抗战胜利的电文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声明命令，宣传队每到一处，同志们高举火把为她照明，一岚站在高凳上，噙着欣喜的泪花，逐字逐句高声朗读，彤红的火光映照着她激动的脸庞，映红了她的全身。一岚觉得，今晚自己的声音格外洪亮有力，感情也格外奔放。人群中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震天动地的锣鼓声。

拂晓，宣传队员们迎着东方漫天绚丽的朝霞返回报社。大家虽然一夜未曾合眼，可谁也没有倦意。他们满怀完成任务的喜悦，一路说笑着，畅谈胜利后的工作和生活。有的同志说：“一岚，你的北平话说得那么好，声音也挺响亮，将来进了城，咱们有了广播电台，你去当播音员吧！”

一岚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句玩笑话竟在两个月后变成了现实。

胜利后的形势发展瞬间万变。8月23日，冀察军区部队解放了华北重镇张家口市。报社接到进驻张家口的命令，同志们兴奋异常，迅速乘火车向张家口进发。经过宣化时，城墙角上还有残余的伪军。铁路有一段离城墙很近，为避免伤亡，大家下车从离城较远的公路上跑过去，空了的火车则以最快的速度开过。敌人虽然开了枪，但没伤着一人。跑过危险地段，大家又上车，一直坐到张家口。站台上堆放着仓皇逃跑的敌人来不及运走的白糖、食盐、煤炭等物品，市郊不时传来断断续续的枪声。

晋察冀日报社奉命接管了敌伪的报馆和“蒙疆放送局”，第一次在城市里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广播电台——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8月24日，负责电台的林明同志和从军区战线剧社派来的帮助播音的陈紫微等同志进入播音室，电台用“XGNC”的呼号正式开播了。

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是党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不久，报社派张庆泰同志去接任台长的工作，还要抽调一批干部担任编辑和播音员，派谁去呢？副社长胡开明对邓拓说：“你爱人丁一岚就是个播音人才嘛！”邓拓说：“她是天津人，播音怕有天津味儿。”胡开明坚持道：“胜利那天晚上，她念稿子不是

念得满好嘛！”邓拓不再推辞，笑咪咪地替一岚答应了。就这样，1945年10月，丁一岚被分配到电台做播音科长，成了人民广播事业最早的播音员之一。从此，开始了她长达四十年的广播生涯。

这时，中共晋察冀分局已改为晋察冀中央局，聂荣臻同志任书记，邓拓担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兼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总编辑。1945年9月12日至1946年10月10日，《晋察冀日报》在张家口出版。张家口是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夺取的第一座较大的城市，也是连接西北、华北和东北的枢纽。邓拓在张家口办报一年，积累了城市办报的经验，报社的队伍大了，家业也大了。邓拓不仅负责报社工作，还统管通讯社、电台、图书出版等，担子十分繁重。

新华广播电台设在张家口市西北边一座两层楼房里，报社则在市东南的山坡上，两地相距较远。邓拓对一岚的工作非常支持。每天凌晨，他都请报社同志把《晋察冀日报》的大样打出两份，一份留报社用，一份送到电台。丁一岚和编辑们根据大样摘出要闻，一大早就要开播。一岚编稿子，选唱片，一天三次播音，忙得不可开交，她只得吃住在电台，与邓拓又过起“伯劳飞燕各西东”的生活。

进入城市后，一切得从头开始，他们都被新的工作体验所吸引，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偶尔相聚，两人都尽量找一些轻松愉快的话题，使对方在紧张工作之余得到休息，谁也不愿用自己的困难分对方的心。一岚有一次在播音室中被煤气熏休克了，被监听人员发现才捡回一条命，她也一点没让邓拓知道。

一岚又怀孕了，工作间隙她忙着缝制婴儿的小衣服小棉被，夫妻俩高兴地等待着第二个孩子的降生。该把小岚接回来了，

一岚想。对出生以后一直寄养在平山老乡家的大女儿，她常怀有深深的歉意。她不愿因为有了第二个孩子而使小岚对父母感到生分，决心把女儿接回到自己身边。

小岚吃了干娘三年的奶，陈家夫妇已将她看成是自己的亲闺女。接到一岚的信，夫妻俩舍不得孩子，双双带着小岚上了路，走了二百里地把小岚送到张家口。

为了给孩子断奶，小岚第一次和干娘分着睡。夜里小岚找干娘哭哑了嗓子，干娘听了受不了，流着泪又把她抱回去。就这样，送过来，抱过去，一夜要折腾好几回。两个母亲，一个在这屋哭，一个在那屋哭，真是可怜天下慈母心！

小岚成了两家的孩子，有了两对父母。直到她也快当祖母的年纪，也没忘记了老区人民用乳汁把她养大这份情。

小岚回来后，邓拓却很少有时间与心爱的女儿亲热。想女儿了，就捎个信给一岚：“替我亲亲她的小脸！”

播 音

虽是接收敌伪电台，战时的工作条件仍十分简陋。没有录音设备，不能自己录制节目，稿件都是直接播出，需要重播时就不再念一遍，这就要求播音员必须有直播的真功夫。一岚的声音感情充沛，铿锵有力，干了播音工作后，又注意勤学苦练。没人监听，她自己给自己写播音评语，一点差错一个小结巴也不放过。很快地，她练就了安然直播的真本事。这使她在未来的广播工作中终身受益。

他们从原“放送局”留下的两千多张唱片中，挑出四五百

张比较进步和健康的歌曲，用《大路歌》作播音的开始曲，《开路先锋》作终了曲。经过一番努力，张家口新华电台的节目开办得很像个样子了，每日除新闻以外，还有文艺节目，受到听众热烈欢迎。电台的短波发射功率在亚洲地区也是比较大的，除了自己的节目外，还每天两次转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节目，成了延安和东北各台的“中转台”。

当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孟启予，至今还记得两地播音员第一次通话的情景：“一天中午刚播完音，正吃饭，同志们告诉我：‘快去播音室和张家口广播电台通话！’我三脚两步又跑进播音室拿起话筒，就听到一位女同志在呼叫我们，我立即回答我们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对方回答，我们是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我说：‘我是播音员孟启予。’她说：‘我是播音员丁一岚’。我们两地的播音员，还是第一次通话，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我和丁一岚也是首先在收音机里互相认识的，我说：‘你们听得清楚吗？’丁一岚说：‘我们每天都收听还转播到其他各省市去了呢！’我说：‘请你对我的播音提点意见好吗？’她说：‘你们播得都很好，只是你的播音还有一些南方口音。’我说：‘对，对，我是苏州人，口音没有完全改好，我一定努力纠正！’短短的几句交谈，显示了解放区同志之间亲密、坦诚的情谊！”^①

电台办得红红火火，一岚也设法与天津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家中来信说，你离家多年，父母已先后去世了。一岚想到自己出来抗日，未能在双亲面前尽孝，虽说忠孝不能两全，还是不

^①孟启予《小毛驴送我上“岗”》。

免悲从中来，一个人跑到没人的地方号啕大哭了一场。

1946年春节，张家口新华电台全文广播了国共和其他民主党派政协会议的五项决议。渴望和平的人们站在马路旁的扩音器下面，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转 移

谁知，几个月后，蒋介石反动政府撕毁墨迹未干的协议，挑起全面的内战。十月的九十两天，敌机轮番轰炸张家口市，解放军决定暂时撤离张家口，报社和电台也随军转移。

丁一岚和同志们依依不舍地做着撤离的准备，决心不留给进犯的敌人任何有用的设备，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就地炸毁。他们捣毁了前置放大器，拔下所有能拔下的电子管，剪下朝夕相伴的战斗武器——话筒，带走了二百多张唱片，准备到了阜平继续播音。

在敌机的轮番轰炸中，报社大部分同志已经撤走。邓拓率领留守人员印完当天的报纸，夜行军徒步涉过桑干河，向涞源方向转移。行军途中，他们发挥了战地报人的战斗作风，报纸仅于11日至14日停刊四期，15日就继续出报了。就这样边出报边行军，报社又回到自己的老根据地——阜平的马兰村和麻棚村。

电台的撤退分两批，副台长李廉士和丁一岚带着老弱病残先走，台长哈文光率领最后一批人撤离。在沉沉的夜色中，城内城外充满轰隆轰隆的爆炸声，许多地方燃烧着熊熊大火，火光映照同志们愤怒的脸。卡车渐渐远离张家口城，他们最后望

一眼笼罩在浓烟和烈火中的城市，默念着：“别了，张家口，不久我们还会回来的！”

对一岚来说，这次历时二十多天的长途行军格外艰苦。七月份她刚刚生下大儿子小云，撤退前工作千头万绪，过冬的小棉衣小棉裤都来不及做，用棉被把婴儿一包就跟部队转移了。行军时，驴背上放两个筐，小岚和小云一边一个。路上要给婴儿换尿布，只得往路边一停，在野地里打开被子包。塞外十月朔风凛冽，冻得小云浑身打战，不停地哭号。严寒和动荡不定的生活使襁褓中的孩子得了病，一直感冒、拉稀，偶尔见小云拉下一条成形的大便，做母亲的一岚就高兴得不得了。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十月中旬到达了目的地——阜平县栗园庄。当天晚上，一岚和另一位带孩子的妇女同志睡上了老乡的热炕头。她们还搞到一些鸡蛋，用装奶粉的小铁筒煮一把挂面，再放点猪油，美美地吃了一顿。她们感到又回到家了。

建 台

回到根据地后，一岚和同志们又投入紧张的恢复电台的工作。栗园庄是个僻静的小山村，风景极其美丽。环村是层层叠叠的树木，树身铺满厚厚的白雪，山峦也染着一片白色。农家的烟囱里冒着一缕缕青烟，散发着草木灰的清香。村边上用鹅蛋般的石头砌成一条通道，宛如镶着一条银色的花边。然而这又是个又闭塞又贫穷的小山乡，山里的乡亲们从没有听说过什么是电台，也弄不懂这电台到底是干什么的。尽管如此，纯朴的老乡还是像当年支援战争一样支援了电台的建设。

女播音员们赶着毛驴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从一百多里外的矿区运来石灰、煤炭和火药；男同志和老乡们一起炸开山石，用石头和土坯建成十几间播音室、机器房和宿舍。播音室需要隔音，就用双层土坯砌墙，中间夹上草秸，女孩子们亲手用白布缝制播音室的墙帷，把麦麸子铺在地上，再盖上地毯吸音。新建成的播音室看上去恬静而又朴素，从张家口带来的话筒端端正正地摆在播音桌上。虽然比在张家口时简陋多了，但在一岚她们眼里，这个深山沟里的广播电台依然是那么可爱。

作为报社社长的邓拓十分关心晋察冀电台的早日开播，他对新上任的台长罗清同志布置任务说：“在延安准备撤出后，晋察冀电台要尽早开播，力争播出延安新华社发的中、英文电稿。在山沟子里用中文，还要用英文播出党中央的声音，这可是件重大的政治任务，在现有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务必努力实现。”

他鼓励大家说：“我们肩负起解放全人类的重任，干着天翻地覆的伟大事业，有什么困难能压倒我们呢？”

新电台终于建成了。1946年12月31日，一岚她们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约定互相通话作为试播。下午，大家围在机器前紧张而又兴奋地等待着。忽然，延安广播电台的呼叫传来了，她们立即作出应答。两个声音在距离遥远的两个地区亲切地呼应着，收音机旁的人们笑着、跳着、鼓着掌，忘掉了两个月来的辛劳。

1947年5月，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开播，威震敌胆的“XGNC”的声音，又重新回荡在祖国的天空。从此，不论是寒风凛冽的冬日的清晨，还是酷热的夏天的午后，不管刮风、下雨、下雪，一岚和播音员们都不辞辛苦准时上山工作。

电台是用水力发电，动力间设在山下河渠上。严寒的冬天渠水结冰把水闸冻住了，不得不在播音前砸开厚厚的冰层，寂静的山野回响着清脆的凿冰声；当夜晚一岚她们播完音下山的时候，水闸就又被冰封住了。她们拄着棍子，拉着手，唱着歌，有人还拿着打狼的枪，摸索着下山的道路。

栗园庄距晋察冀日报社所在的麻棚村仅十里山路，但邓拓与一岚仍很少有机会见面。1947年9月中秋，邓拓正在从察南回阜平的路上，他惦记着栗园庄的一岚和两个孩子，写下相思的诗句：

春去秋还几月圆？中秋又见月如盘。
西风一马无余物，秋色满怀到栗园。

胜 利

1947年12月25日，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讲话很长，为了使播出效果更好，电台决定在每个段落的间隙插播音乐。可当时电台只有京剧和西洋音乐唱片，与文章内容配合不上。怎么办？有的同志提议：“我们来当‘活唱片吧——组织个歌咏队。”这个主意太好了，编辑和播音员们组成了歌咏队，由编辑科长柳萌担任指挥，还请来军区无线电器材工厂的工人小乐队伴奏，赶排了十几首革命歌曲。播音时，一岚播一段，歌咏队就唱支歌。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一岚读着这豪迈的语言，感到周身热血沸腾。文章反复播出了十天，歌咏队员们就天天上山演唱了十天。风雨无阻，有的女同志还背着孩子。在

中外播音史上，这样的播音，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开始节节败退。一年前的预言实现了，11月，晋察冀人民解放军重新解放了石家庄，邓拓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社论《庆祝石家庄的解放》，指出：石家庄的解放，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联成了一片，此后整个华北战场的形势将开始大变”，“我人民解放军完全取得了主动权”。

1948年4月，党中央和毛泽东从陕北来到晋察冀解放区阜平县的城南庄；5月又转移到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共中央决定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刘少奇任第一书记。6月，华北局决定，《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日报》合并，在华北局统一领导下出版新的《人民日报》。

《晋察冀日报》自1937年12月11日创刊，到这时为止走过了十年半的战斗历程。1948年6月14日《晋察冀日报》出版终刊号，邓拓深夜发完最后一篇稿子，思绪万千，难以成寐。血火十年转战山区的办报经历，战火中倒下的一个个战友，根据地人民舍身忘死支援报社的情景，交替出现在眼前。诗人的豪情又一次鼓荡在胸间，他挥笔写下《晋察冀日报终刊》一诗：

毛锥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
故国当年危累卵，义旗直北控长城。
山林肉满胡蹄过，子弟刀环空巷迎。
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恒岳共峥嵘。

此时，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也转移到了平山，晋察冀电台并

入了陕北台。两台合并后，孟启予任播音组组长，丁一岚是副组长，播音员还有齐越、魏琳等。老友新朋，十分亲切。

1948年后，人民解放军大举进攻，三大战役捷报频传，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溃退如潮。一岚他们天天通过空中电波，向全国人民传送这些胜利的消息，有时还直接向敌军喊话劝降。

年底，一岚播出毛泽东的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向全国人民宣布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即将进军长江以南，解放全中国。一个伟大的新中国如喷薄欲出的朝阳，就要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邓拓和一岚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在战斗中度过了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也由此获得了世间最珍贵的爱情。此时此刻，他们携一双小儿女，展望未来，憧憬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

第六章 记者生涯当自励^①

开 国

《晋察冀日报》终刊以后，邓拓到中共中央华北局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1948年11月，中央政策研究室成立，彭真兼任主任。研究室分为政治、经济两个组，邓拓担任了经济组副组长。这时，土地改革运动在华北全境展开，中国革命已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党的工作重点即将从农村转入城市。政策研究室是中央的助手，起着政策参谋部的作用，邓拓和同志们展开了工商、农业生产和全国经济的综合调查，悉心研究土地问题和城市政策。

12月，岁末的寒流锁不住春之将至的讯息，在解放军进军的隆隆炮声中，邓拓随彭真、刘澜涛等领导同志从平山县来到北平西山。他们远眺北平这座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出生入死奋斗几十年，美丽的古都 and 全国大好河山即将回到人民手中，一

^①邓拓《题四川记者站》。

股胜利的豪情油然而生。华北局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北平市委，准备接管北平。邓拓担任了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1949年1月30日，他和市委的工作班子提前进了城。刚刚解放的古城，百业待举，有多少工作等着他们去做！

1月31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驰名中外的文化古城——北平和平解放了！

2月2日，《人民日报（北平版）》作为北平市委机关报创刊，邓拓起草了创刊号社论，由彭真修改定稿，题目是——《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奋斗——代发刊词》。

3月，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到北平。

4月，邓拓接任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在紧张的接管工作中，中共北平市委根据党的城市政策和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制定了一系列适合北平情况的政策法令，邓拓参加了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解放之初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日新月异。

3月15日，华北《人民日报》移到北平出版，《人民日报（北平版）》改名为北平解放报，邓拓兼任社长，8月1日，由于大片新解放的地区迫切需要新闻干部，《北平解放报》奉命停刊，报社人员一分为二，一部分随军奔赴大西南，创办新的报纸，一部分并入《人民日报》。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邓拓作为解放区新闻工作者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定都北京，并通过了国旗为五星红旗，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议题。

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正

式成立了。邓拓受令主持中共中央机关报，担任了《人民日报》总编辑。同时继续兼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

庆 典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邓拓的一家也由根据地迁来北京，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丁一岚随陕北电台进入北京，仍然担任播音员、播音组副组长。她终身难忘10月1日那天，她和齐越在天安门城楼上转播开国大典的情景。

在中国人民的广播史上，对全国进行重大政治庆典的实况广播，这还是第一次。中央广播局领导组织全体编、导、播和技术人员，紧张地准备了一个月。编辑记者一次次地采访阅兵式和群众游行队伍的演习，反复讨论和修改广播稿件，播音员丁一岚和齐越也参加了讨论，以求播出最好的效果。当时的技术装备很简陋，为了使整个广场都能清楚地听到主席台上的声音，并且转播到全国，技术人员设计制作了几部新型的扩音机，把九只喇叭装置在一起，分别设在广场的各个位置，形成强大的音量。大家把这个新装置叫做“九头鸟”。

一切准备就绪，10月1日下午二时左右，丁一岚和齐越早早来到天安门城楼。他们站在播音员的工作位置——城楼的西侧，紧张而兴奋地等待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

主持大会筹备工作的周恩来同志提前来到主席台，以他那一贯严谨负责的作风，仔细检查了各项工作。

二时五十五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城楼西侧高高的阶梯上，健步登上天

安门城楼。

三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祝典礼开始，毛泽东主席以洪亮而又浓重的湖南乡音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刚刚静下来凝神倾听的人群又欢腾起来，海潮般的掌声、欢呼声回荡在广场上空。

接着，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毛主席按动电钮，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上天空，丁一岚用激动的声音向全国人民进行实况转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由毛主席亲手把她升起，参加大会的三十万人都一致肃立致敬，注视着人民祖国的庄严和美丽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各队带队指挥员行举手礼，在队列中间的干部和战士，以及执行勤务的人员都立正。”

这时，国歌奏起，在《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旋律中，一岚的声音显得更加幸福和欢悦：

“国旗已经上升到旗杆的顶尖，开始在人民首都的晴空里迎风招展。她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已经走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将永远地飘扬在人民祖国的大地上！”

二十一响礼炮开始鸣响，一声，两声，三声，春雷般的轰鸣中，阅兵式开始了。齐越以他特有的庄严、浑厚的声音，介绍行进在天安门前的每一个兵种，海军、步兵、炮兵、装甲兵、坦克兵、骑兵，还有二十六架次飞机凌空飞过。和着《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等音乐的节奏，一岚和齐越交替进行广播，把眼前的动人场面及时告知海内外的亿万听众。

丁一岚和齐越在话筒前整整站了七个小时，播了七个小时。他们的播音词已成为史诗性的语言。播音中，一岚一次又一次

含着热泪，仰望蔚蓝天空中的五星红旗，沉浸在巨大的幸福和喜悦当中。她想到离家前铁蹄蹂躏下的故乡天津，家乡父老和全国人民再也不必头顶太阳旗、三色旗、米字旗或其他什么旗而蒙受羞耻了；她想到与丈夫一起度过的战斗岁月，以作为新中国的开拓者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

这天，邓拓作为观礼代表，在观礼台上看到、听到了这一切。他和一岚同样振奋和激动，同时也为妻子感到骄傲。晚上，他们又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了焰火，九点二十分晚会结束，夫妻俩回到家已经很晚了，但他们毫无睡意，孩子们也没有睡。小岚和小云从广播里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正等着向妈妈祝贺呢！夫妻俩兴奋地向两个孩子描述了大典的情景，邓拓忍不住赞扬一岚说：“你今天播得很好！投入了全部激情！”

七岁的长女小岚，也有自己值得自豪的回忆，那就是第一次在政协会上向毛主席献花。

进城后，小岚、小云和根据地来的孩子们进了北京北海幼儿园。园长曾在苏联学过幼稚教育，施行一套十分严格的管理制度。孩子们一律住在园里，星期日也不可回家。再大的干部，想孩子了也只能到园中去探望，而不能把孩子接回来，在全封闭式的教育中培养孩子的意志。幼儿园很重视用音乐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小岚自小爱唱歌，是个认真而又活泼的孩子。政协那天，老师挑了十几个男女孩子给领导人献花，小岚被挑上了。他们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老师带领下来到大会主席台。在这之前小岚只是在像片上见过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今天要代表全国小朋友面对面地给这些领袖献花，心里紧张地怦怦直跳。她年龄稍大，个子高，排在第一个，这真幸运，正好轮上她给毛主席献花。

给朱总司令献花的是排在她后面的郑天翔的男孩。在声震穹顶的军乐声中，小岚把一大捧美丽的花朵献给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还亲切地握了握她的小手。摄像机嚓嚓响着，留下了这一令人难忘的时刻。

然而，在欢庆胜利的巨大幸福中，他们的家庭也经历了一次不幸。

1949年2月一岚在平山时生下一个男孩。进城前的工作真是千头万绪，一岚只得把这个还未来得及取名的小三寄养在老家。进驻北平时，也顾不上带他。当时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劝一岚带上这个孩子，还亲自给邓拓发电报，征询是否同意把孩子留下。邓拓回答说，同意一岚的选择。那时晋察冀的女同志请老乡奶孩子已成了习惯，也未想到会有什么不测。谁知，就在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忘我工作的时候，这个才几个月的孩子得了急病，农村医疗条件差，得不到及时治疗夭折了。对这个亲生骨肉，邓拓还没来得及看上一眼！一岚非常难过，她自责着，如果带在身边，孩子就不会死了。为此她还给廖承志写了一份检讨。这个检查是怎样写成的，一般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天下的母亲谁个没有亲情，哪个又不爱自己的子女？一岚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的事业，才不得不抛舍亲情远离骨肉的啊！如今孩子不在了，还要手握着沉重的钢笔写着难以成文的检讨？这是什么样的情操？又是什么样的力量与意志啊？

进了城，邓拓和一岚仍无暇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他们都在新中国草创的新闻事业中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了同一个城市的“两地分居”者。邓拓住在煤渣胡同《人民日报》宿舍，一岚住在六部口电台宿舍，孩子们都在幼儿园和学校住宿，一家人还像建国前一样，过着“战时共产主义”的生活。

报 人

1949年8月1日，《人民日报》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与此同时，邓拓从北平市委来报社任副社长兼总编辑，社长是民主革命时期长期在大城市办报的著名报人范长江，副总编辑是随报社进城的年轻人安岗。范、邓、安成为《人民日报》领导核心的“三套马车”。

从农村搬到城市，从战争转向建设，报纸工作如何适应这个转变，是新的报社领导首先遇到的问题。报社大多数人过去长期在农村办报，缺乏在城市办报的经验，不熟悉工人、市民、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甚至对街道胡同、门牌号数都感到陌生。而且，长期“只此一家”惯了，对多家报纸竞争的局面感到不适应。

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必须根据中央的指示，迅速反映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各条战线上群众的工作生活，指导恢复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而当时，《人民日报》才发行八万多份，通讯员不过二百人，平均每天收到的读者来信只有四十二封。报社编辑部的人集中在北京，经常感到发稿量不足，有分量的稿件更是缺少。如何改变这个状况呢？

这时，社长范长江和总编辑邓拓提出要“决胜于社门之外”。邓拓说：“编辑部工作的重点应在报社大门之外，不应在报社之内。我们要想出一切办法，把千万根线索伸展到群众中去！”他还说：“不把报社的主要力量撒出去，就不能了解党的政策在各地执行的情况，《人民日报》就不能起到党的耳

目喉舌的作用，就不能改变现在的被动局面。”

他认为报纸力量的源泉在于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报纸的生命所在。报纸要为群众说话，要维护群众的利益。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群众才会关心报纸。这是邓拓在长期实践中凝聚的一个办报思想。

在社领导动员和鼓励下，一大批从解放区来的有采访写作经验的同志，从报社各级领导岗位上下来，走出报社大门，到全国各省、区担任地方记者。同时，还在各省市选拔一批水平较高的干部担任特约通讯员。到1951年，《人民日报》的通讯员由原来的二百来人增加到万人以上，建立了遍布全国的通讯网。人民来信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了。

那时，《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包括工厂工人在内不过三百六十六人，编辑部连同图书资料人在内只有一百一十二人。人少工作多，困难确实不小。邓拓响亮地提出：“我们要拼命。”他说：“我敢预言，我们拼命的结果，将会使我们的事业大踏步前进。”

邓拓本人，就是这样一位“拼命三郎”。《人民日报》的老记者纪希晨、陈勇进同志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他住在煤渣胡同《人民日报》宿舍后院的夹道里，三间平房几乎见不到阳光。后来报社腾出了房子，几次劝他搬家，他还是不搬。说：‘叫别的同志住吧！这比农村打游击时好得多。我经常上夜班，没有阳光也不要紧！’”

这时，邓拓已将父母从福建老家接到北京。一次，他的老领导、老战友聂荣臻同志来探望，见他一家六七口人住得如此简陋，关切地说：“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呀？”邓拓说：“这里安静，我做夜班，对睡觉有好处。”

在这样没有阳光的日子里，邓拓日日夜夜“笔走龙蛇”，撰写文章，修改稿件，签发每天报纸的大样。繁重的工作使他的病更重了。他的腰间用钢骨架紧束着，也常常痛得起不来床，甚至大小便都要人照顾。他还有一种怪病，手心不断地冒虚汗，常常戴着手套，而手套又经常是湿的，有时十几分钟就要换几条手巾。即使这样，他仍在床上坚持工作，每天送到他身边的报纸清样、稿件，几乎盖满他的床被。夜餐送到床边，往往要热三四次。丁一岚眼看着他一天天瘦弱下去，还在忘我地工作，心疼地劝他：“老邓呀！你要注意休息呀，老是这样干怎么得了？”邓拓总是说：“我是任务在身嘛！”

那时，范长江主管对外联系，邓拓总揽编辑工作。在邓拓以身作则的带动下，编辑、记者都有一种拼命精神。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报纸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由于纸张困难实行严格限制，报纸的发行量还是迅猛增长。总发行量1949年底九万份，1952年就增加到四十万份，1953年又增加到五十五万份。

活跃在新中国新闻战线的著名女记者金凤，对笔者回忆了她在邓拓的亲自指挥下完成了一次采访任务的经历：

1951年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一江山、大成岛的战斗。年轻的女记者金凤作为战地记者来到前线。登上大成岛，闪电般的战斗已经结束，而且，新华社和其他报纸已派出了大批军事记者，对战斗发回了军事报道。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怎样进行采访呢？不服输的金凤决心和其他报纸拼一拼实力。这时，邓拓同志从北京打来电话，说金凤你不要写战斗通讯了，我们作为党报应当扬己之长，转而写政治通讯、社会报道！在邓拓的布置下，金凤采访了俘虏营，旁听了对美蒋特务的审讯，

并走遍大成岛的每一个角落，用自己的眼睛进行观察，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她发回《觉醒》、《大成在控诉》、《团圆》等一系列报道，揭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特务的内幕，揭穿了蒋方“守军全部殉国”的谎言，描写了被抓渔民得到解放，骨肉团圆的情景。这些文章见报后，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起到了单纯的军事报道所起不到的作用。金凤深有感触地说：扬长避短，发挥《人民日报》特有的优势，老邓在办报上确实高人一筹啊！

建国初期党指导革命和建设一系列方针政策都要通过党报向群众宣传；对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也要用实事求是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反映和总结。因此，邓拓很重视加强报纸的评论工作。他说：“社论是表明报纸观点的旗帜。报纸必须有了社论，才具有完全的政治价值。”“我们报纸的社论，是全党办报的重要结晶。”而当时撰写社论是报纸的薄弱环节，1949年一年《人民日报》才有八篇社论。邓拓把评论工作作为重点来抓。他不但亲自撰写重要社论，还热情地提倡大家来写。

有一次，邓拓把写整风问题社论的任务交给一个编辑。这位同志说：“我是个普通编辑，怎么能写社论呀！”邓拓笑着说：“你为啥不能写社论？不要把写社论看得那样严重。人都是逼出来的！”在邓拓的具体指导下，那编辑写出了初稿，邓拓又亲自进行了修改。社论送审后得到中央有关同志的称赞。邓拓在编辑记者中广为传播了这个事例，鼓励大家说：“报纸的社论和评论，是每个编辑、记者都应当掌握的战斗的文字体裁。大家都要动手写评论。”从此以后，报纸的社论、评论渐渐多了起来。1952年发表了二百零八篇社论，其中邓拓写的就有十九篇。到了1954年，几乎每天都可有本报的社论或评论了。

邓拓反对当“新闻官”，他自己也没有当过一天新闻官，总是以编辑、记者的身份战斗在新闻第一线上。他长期值“大夜班”，下午三点开过编前会，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每张大样都由他亲自签发，从版面安排到新闻、评论的标题和内容，都一一仔细地推敲琢磨。

除写社论外，邓拓还时常亲自提笔写各类文章。他要求编辑记者十八般武器件件皆通，自己就是这样的典范。消息、通讯、散文、评论、诗词，样样都拿得起。二十年中，总计写了几百万字。

有时遇到国内外重大问题需要报纸及时发言，他就直接来到校对科，写一张稿纸，送到排字房排一张。等到最后一张写好，片刻，社论的小样已全部送来了，他再润色一遍，就可以送审了。

在《人民日报》，至今传颂着邓拓写文章“倚马可待”的一段佳话。

1951年冬的一天，已是深夜十二时了，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毛主席叫写一篇有关朝鲜战争的社论，明天见报。邓拓亲自动笔，一气呵成。两小时后，一篇用清秀的毛笔小字写就的原稿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在稿纸的天头批示：“很好，照发。”除在第一页上，毛泽东用铅笔加了几个字外，其余一字未动。这篇原稿，曾在《人民日报》的展览室展出。

有人问他：“你写文章怎么能这样快？”

邓拓说：“我没有什么秘密，因为有些文章事先有了腹稿。过去战争时期在马背上思考，现在利用乘车、吃饭的时间想问题。有了腹稿，写起来就快了。”

“有些紧急的事情，你怎么也能写得那么快呢？”

他说：“这就需要积累、经验、知识，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积累起来，发展起来的。没有积累，什么也说不上。”

在邓拓一生中，从未稍为放松对知识的积累，他把读书看成紧张工作中最好的休息，这本读累了就读另一本，常常是一边吃饭一边看书，连洗脚时也看书，边读还边作摘录。他常用汉代文学家刘向《说苑》中的故事劝勉大家。晋平公问师旷曰：吾七十，欲学恐暮矣。师旷曰：何不秉烛乎？

邓拓还给大家打比方：“你看农民出门，常背了粪筐，随手捡粪，成为习惯。积累知识，也要有农民那个劲头，不管是牛粪、羊粪、人粪，要见了就捡，统统把它变成肥料。积累知识也是这样，范围要宽，不要限制太多。”

人们说邓拓是个“书生”，他自己也常以书生自况。正是这博览群书的书生气质，使他不同于一般报人，而以一个学问家、文章家的面貌成为报人的楷模。

邓拓常对编辑记者说，办报的人，要有广博的知识和广泛的社会交往。他主张记者到一个县采访，先要研究县志；到了上海，他问记者：你们除了接近工农兵，同鸳鸯蝴蝶派的人有来往吗？他指出记者交了各方面的朋友，才能避免孤陋寡闻，摸到时代的脉搏。

作为学者、诗人，邓拓在知识界有广泛的朋友。他团结广大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学者，给他们出题目，约各方面的专门文章，力求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邓拓常对报社同志们说：“要做一个称职的党的新闻工作者是很不容易的。……报纸工作是重大的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但表现出来的却是日常的具体工作和技术工作，例如排版、组版、标题、校对等等。对待琐碎的技术性工作，我们应该从政

治着眼去看待它。做编辑工作，要注意小事，越是大家不注意的地方，编辑就越要注意。要尽可能把一切都办得让作者和读者看了舒服、满意，对你放心。或者，我们干脆可以说，编辑工作无小事！”

一次，报纸一版文中出现错字，把“美国在日本设有原子基地”排成了“没有”。邓拓发现后，立刻召开全社大会，严肃指出这一字之差“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对许多年轻报人来说，这样的教训是终身受益的。邓拓本人对报纸工作的任何一个环节，大到编辑计划的制定，小到一个标点符号的改动，都极其负责，一丝不苟。1950年语言学家吕叔湘对报纸上一些文章的文法和修辞提出了批评，邓拓马上写文章表示欢迎，并请吕叔湘到报社给编辑人员讲语法修辞。

在建国初期，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还比较浓厚，邓拓继承了在晋察冀办报时报道“刘庆山事件”那种嫉恶如仇的风格，积极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吸引人民在报刊上公开批评党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整党、土改、三反五反运动中，报纸对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蜕化，王振海违法乱纪等重大案件进行揭发，并先后发表了两千多篇自下而上的读者批评信件。针对党内正在滋长的骄傲自满情绪，邓拓也亲自组织文章进行过批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扬了党内外民主，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当时有一个说法：“《人民日报》集中了全国新闻界的精华”，而邓拓就是这支优秀新闻队伍的排头兵，是党和人民新闻事业的杰出指挥员和战斗员。

台 长

开国大典的转播圆满结束后，丁一岚被调到刚刚成立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担任编辑部主任，不久又当了台长。直接对城市人民进行广播，对一岚来说是个全新的工作，她有些踌躇，心里没底。中央广播局的领导梅益同志给了她许多鼓励，说：

“许多事都是从不会到会，你只管大胆去做，有问题来找我！”

当时，电台设在西长安街三号原国民党北平电台的一幢旧楼里，用的是国民党撤走时留下的旧机器。从窑洞到城市，从敌后到公开，全无经验可循。北京电台有十多个年轻的干部，热情很高，一岚和大家一起在实践中摸索城市广播的经验，开办了许多节目。那时收音机很少，电台每做好一个节目，都得到工厂、农村、学校去组织群众收听。不管路多远，大伙都是抬脚就走。当时广播的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对刚解放的人们进行党的政策教育；二是动员群众积极参加建设；三是开展有意义的娱乐活动。开创时期的人民广播事业就这样从无到有地开展起来了。

为了全力以赴地搞广播工作，大家都住在电台集体宿舍里，只是在节假日才回家看看。身为台长、已是几个孩子的母亲的丁一岚也不例外。除了当市台的领导，她还坚持做自己钟情的播音工作。每天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她都回中央台参加新闻联播的直播工作。直到1952年反官僚主义、事务主义时，有人批评丁一岚身为台长搞播音是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她才不得不停止了播音工作。

在丁一岚和同志们的努力下，市电台不断发展完善，人员

增加到八九十人，还开播了二台和三台。1954年丁一岚作为北京市电台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广播代表团”访问苏联，团长是温济泽。在莫斯科，他们参观了这个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建设成就，还重点考察了苏联办电台的经验。回国后，借鉴苏联的做法，市电台取消，划归中央广播局直接领导。丁一岚调回中央台担任总编室副主任兼播音部主任。

繁忙的工作使一岚无暇顾及家庭。从建国后直到1954年，她带着几个孩子住在位于西长安街的电台宿舍。一个周末，一岚在宿舍院里洗衣服，“你怎么不回家？”一位家在北京的同事问。“回家？”一岚愣了一下，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在她的印象里，电台就是自己的家。

邓拓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但他支持一岚的事业，从未提出过调妻子在自己身边的要求。许多年以后，提起当年邓拓两次患重病，她都未能亲自照料，丁一岚仍感到深深地内疚。

幸 福

尽管经常分离，但这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温馨家庭。

建国以后邓拓设法与福建老家取得了联系。他得知年已八十的双亲生活很困难，连房子都卖掉了，便决定将父母接到北京供养。丁一岚至今保留着一封邓拓1950年写给父母的信，那是他托办公室的同志去福州接二位老人时带的家信，字里行间充满对老人的关爱：“来京长途五千里，务望珍摄身体，彬姐及小甥听说身体也弱，亦须注意。路上必要的花费不可过于节俭……敬祝一路平安。”邓拓的二姐邓淑彬一直在家乡当小学

教员，照顾年迈的双亲，这次也携女元兑随之来京。

和平环境生活安定了，五十年代初国家又大力鼓励生育，于是，新的家庭成员接二连三地相继降临。1952年2月生了二女儿邓小虹，1953年4月二儿子邓壮出世，1954年11月小女儿邓岩又呱呱落地。说起几个孩子的名字，也颇有意思。小岚取自母亲的名字；小云是父亲的笔名“云特”所赐（丁一岚亦称邓拓为“大云”）；小虹俨然当年的于虹再世；到了老四，一岚见这个新生男婴壮实得像个小牛犊，全不像战争年代生的哥哥那么瘦弱，遂取名“阿壮”；岩岩呢，是邓拓和一岚名字中各取一个偏旁合成，算是给这个家庭的组成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54年生岩岩后，周末往返的三轮车坐不下了，一岚也实在照顾不过来，才带孩子们搬到煤渣胡同报社的宿舍，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到此为止，邓拓的家庭已是一个有着十多口人的三代同堂的大家庭，虽然父母重任在身，颇为繁忙，但仍不妨碍一家人相亲相爱，尊老抚幼，充满和睦温暖的气氛。

邓鸥予老先生是个极有文化修养的旧知识分子，晚年仍雅兴不减，兴致来了常吟诗一首。邓拓对老人非常尊重，在百忙中，他总要抽空到父母房里去看看，陪他们说说话。他怕老人寂寞，常抄些自己的诗作给父亲看，请父亲批改。邓老先生总是认真地揣摩每一句，圈改一二字。邓拓看改得好，就听取老人的意见。孩子们放学留了作业，邓拓也让他们请退休老教员爷爷批改。在邓拓影响下，五个孩子也懂得孝敬祖父母，常围绕在爷爷奶奶身边玩耍说笑，听爷爷说古论今，使老人尝到含饴弄孙之乐。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55年和1961年两位老人相继安然离世。

邓拓与一岚感情笃深，现在虽不必像战争年代那样诗来信

往了，但一种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恩爱始终保持在他们之间。孩子们从来没有见父母之间红过脸，没听到他们向对方呵斥一句。有一次邓拓外出，一岚不慎把他心爱的一棵高大的龟背竹碰折了一枝；还有一次外出，他喜爱的一只小黄莺又不幸被野猫咬死了。但邓拓回来时只是表示可惜，并没有对一岚发脾气，他知道，出了这样的事一岚心里已是很不安了。

孩子们在这样谦和美好的气氛中长大，兄弟姐妹之间也十分友爱。小岚和小云长弟妹六七岁到十来岁，照看弟弟妹妹成了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西长安街电台宿舍时，十岁的小岚常帮妈妈照顾二岁的小虹；一家人外出有分工；小云带阿壮，小岚带小虹，一岚抱岩岩。弟弟妹妹有了心里话，除了对父母说，也对可以信赖的大姐、大哥说。

在对子女的教育中，邓拓和一岚首先注意从小培养孩子们的优良品德和健全人格。他们从不允许孩子以干部子弟自居，脱离群众，追求特殊的待遇。因工作原因，机关给邓拓配了一部小汽车，但他从不用汽车接送孩子们上学，一岚工作单位较远，总是骑自行车上下班，从不与邓拓“有福同享”。每当开学，一岚总要给住校的孩子打好小行李包，让他们背着挤公共汽车去报到。邓拓看着孩子们背着背包那雄赳赳的模样，高兴地夸道：“真像当年小八路！”邓拓经常外出开会，参观视察，一岚从不陪同，也不肯带子女。一次组织上安排邓拓去北戴河海滨，那时干部带子女到海滨避暑是比较平常的事，几个孩子也非常渴望和爸爸一道去，看看碧蓝的大海和白色的海鸥。可邓拓和一岚却亲切地笑着对孩子们说：“等你们长大了，当上劳动模范再去吧！那才是光荣。”他们从小培养孩子们正直诚实，不吹，不装，不拍，他们常对孩子们讲那些战争年代牺牲

的烈士的事迹，让孩子们向他们学习，却很少谈自己的斗争历史和革命功绩，总是觉得自己为党工作得还太少。有一次小虹写作文《我的爸爸》，老师特意叮嘱她回家请爸爸讲讲他的革命经历。小虹几次三番地央求，邓拓却微笑着，轻描淡写地说：“我那时就是天天出报纸，没有冲过锋，杀过敌人，有什么好写的呀？”邓拓到市委工作后，岩岩好奇地问，“市委文教书记”是干什么的？一岚回答，“是帮彭真伯伯工作的呀！”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几个孩子很少有干部子女的优越感，他们不专横跋扈，不贪图享乐，只是在学习上追求高标准。孩子们在学校都是优秀学生，有的担任了中队长、班长，门门功课成绩名列前茅。

邓拓和一岚注意培养孩子们多方面的兴趣和知识，对孩子们的天赋总是小心地呵护，细心地培植。一次邓拓采纳一岚的建议，在百忙中抽时间举办了“家庭画展”，把自己收藏的几个朝代有代表性的书画作品展示在他的书房里，向孩子们讲解作品的历史背景，分析每幅字画的精妙之处，使孩子们学到了不少历史、绘画和书法知识。小虹受父亲的熏陶也喜欢练字，一岚就给她找来各种字帖，还让她描摹爸爸的书法作品。

小岚从小喜欢唱歌，一岚常带回一些电台教唱歌节目的录音带，让小岚一句句跟着学唱。小小年纪，小岚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识谱，还在歌咏比赛中获过奖。年龄稍长，小岚喜欢上了乐器，一岚又专门为她请了小提琴教师。

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孩子们也个个多才多艺。一家人聚在一起，唱歌、拉琴、滑冰、游泳，共享天伦之乐，兴趣盎然。

生下几个月就跟着妈妈长途行军转移的小云，从小体弱多病，几乎每个月都要发高烧。到北京一〇一中上中学后，他迷

上了体育，竟奇迹般强壮起来，成了田径队一名运动健将。家中有了音乐、舞会票总是留给小岚，运动会球赛票是小云的专利，书画展览的参观券呢，自然要优待小虹。各取所需倒也其乐融融。

在孩子们童年的记忆中，一岚是个慈爱的母亲。每到周末，住校的孩子回到家，总能在属于自己的那个小碟子里找到一块点心、几颗糖果，那是母亲提前为孩子们精心准备的。孩子们依恋和爱戴母亲，他们常滔滔不绝地向妈妈讲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梦想，女孩子悄悄讲自己的初潮和初恋，男孩子讲自己新认识到的人情事理……各式各样的问题都能够在母亲那里得到坦率的回答。他们之间是慈母儿女，又像是同龄人那样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

在孩子们童年的记忆中，爸爸却像一只忙碌的蜜蜂。他们对爸爸最深的印象是一个背影，他总是从早到晚地伏案，总有干不完的工作，读不完的书报。他们习惯了爸爸书房中深夜不熄的灯光，习惯了爸爸在紧张工作中度过的假日。母亲从不允许孩子们打扰父亲，只有在他工作疲劳的时候，才让孩子们到他身边玩耍一会儿，谈谈学校里的生活和学习，问些问题，使父亲暂时停下工作休息片刻。能和爸爸在一起说笑，得到他亲切的爱抚，是孩子们极大的快乐！然而这样的机会是太少太少了。往往孩子们还没有离开，邓拓就已经重新沉浸在工作中了。十几年中，全家人到公园里去玩的欢乐，孩子们只享受过一二次。

正由于团聚的短暂，邓拓家颇为独特的“家庭音乐会”，就显得格外宝贵。至今丁一岚和子女们还珍藏着一盘录音带，记录着五六十年代几次家庭音乐会的实况。这盘经过“文革”

浩劫奇迹般保留下来的磁带，用一岚的话说，已经是“隔世之音”了。

家中有一台老式录音机，那是邓拓出国访问时从苏联带回的。在五十年代，家庭录音还是一种比较奢侈的享受。音乐会一般在春节期间举行，三代人济济一堂。邓拓用地道的福州乡音吟唱他新写的《雷锋》等诗作，邓鸥予老先生和邓淑彬姑姑也用沉郁委婉的福建话吟哦自己创作的诗词，一岚演唱战争时期的《游击队之歌》；几个孩子有的独唱，有的合唱，有的朗诵，有的二部轮唱，大孩子拉琴为弟妹伴奏，他们唱“金屏似的小山”，唱“我爱祖国的蓝天”，唱“蝴蝶蝴蝶身穿花衣”，也唱“赶上那个英国要不了十五年”。孩子们当中还有个寄养在这里的小客人——孟启予的女儿久久，妈妈出国工作三年，她成了这个家庭的第六个孩子。和邓家的孩子们一样，久久也爱唱歌。他们放开喉咙，尽情欢唱当时流行的儿歌和革命歌曲。

生活在幸福中的孩子啊，在他们眼里，“祖国的天空是那样蔚蓝晴朗，祖国的大地充满欢声笑语”^①，作为革命干部子女，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里，他们享受着当时最好的教育和生活条件，在最慈爱的父母身边，无忧无虑地学习、成长。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当之无愧的接班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将来能像父母一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父辈打下的江山里，自己前程远大，未来一片光明。这时的他们怎么能够想到，仅仅是几年之

^①邓云《回忆我的爸爸邓拓》。

后，这美好的一切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失去，他们一家会和全国人民一起，承受着长达十年的磨难呢？

第七章 文章满纸书生累^①

治 学

抗日战争以前邓拓就是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青年史学家了。战争时期游击办报的生活，使他不可能坐下来从事学术研究。建国后，有了安定的工作条件，他决心在繁重的新闻领导工作之余，“忙里偷闲”地挤时间进行著述。1958年他有感于党的“双百方针”的执行，在给驻川记者的一首诗里写道：“毛锥动，彩云生，蜀水燕山若有情。展望高潮弄日夜，文章常助百家鸣。”这首诗，可看成他的自况与自勉。

1949年12月，邓拓受聘担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1950年为北大经济系开设了《中国的土地问题和土地改革》课程。他运用马列主义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土地问题的理论，结合自己长期积累的旧中国土地问题的丰富材料和革命老区土地改革的实践经验，对中国革命和土地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①邓拓：《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研究。

1954年10月，毛泽东支持李希凡、蓝翎两位“小人物”对古典文学研究中“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动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1955年1月9日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的长篇文章。作为致力于明清历史研究的史学家，他运用大量资料深入系统地论述了清代康、雍、乾盛世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形，勾画出孕育了《红楼梦》这部巨著的历史环境，通过研究清代中叶的社会背景来认识《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的意义和作者曹雪芹的思想。他认为这个时期“在封建经济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认为《红楼梦》“反映了当时新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萌芽和新生的市民社会力量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的生活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痛苦。”“应该被认为是代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这篇论点新颖，论理透彻，史料翔实，文章一发表，在当时的学术界和文艺界产生震动。这篇建国初期较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文学作品的论文，引导了对于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

邓拓本人沿着这一学术方向深入研究下去。1956年他在《历史研究》第十期上发表了长篇论文——《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邓拓治学很重视调查研究，努力发掘原始文献与实物、口碑。早在1954年，他就开始对北京市手工业历史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了。他说：“从万历到乾隆这个时期去今不远，我们可以找到当时遗留下来的许多

典型厂矿的契约、文书等，以补充史籍记载的不足。”北京门头沟地区从元朝开始就有了官办的采煤业，到明代中叶开始出现民间的小煤窑。邓拓多次来到这一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他跋山涉水，带病下到煤井深处，爬过深坑窄巷，调查了一百多座百年前小煤窑的遗迹，访问了许多老窑主和老窑工，开了多次调查会，收集了从明朝万历到清朝乾隆年间的煤窑契约一百三十七张，还有账本、家谱、诉讼文件、煤窑图等珍贵资料，对这些煤窑的分布、数量、规模、雇佣关系、经营方式以及煤矿工人的生活状况进行了深入而精辟的研究。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得出门头沟煤矿在明清时期就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结论。这篇文章在史籍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上有开创性的意义，至今仍是研究北京史和经济史的权威之作。

那些日子，一到休息日或稍有空闲，邓拓就和司机驱车四处搞调查。他亲自拜访过北京广安门外拉了一辈子骆驼运煤的古稀老人，还到北京历史上许多历史悠久的店铺进行查访。同仁堂药铺、万全堂药铺、六必居酱园、宣武门前的牛肉馆、琉璃厂书店等等，都留下了他的脚印。他收集了大量的原始档案，包括房契、文书、银账、铺规、合同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他几次想根据这些史料写成北京工商业史研究的文章，但由于工作太忙和运动不断，几篇已开始动笔的文章都未及完稿，为史学界留下了一大憾事。

邓拓在历史学、经济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1955年，他受聘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同时是中国作家协会成员。

1957年夏天，三联书店决定重新出版邓拓发表于1937年的专著《中国救荒史》，请邓拓作了“技术性修改”，由文言体

改为白话体。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救荒史的“扛鼎之作”。旧中国灾荒频仍，哀鸿遍地，青年邓拓把“救荒”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体现了他对人民困苦的深切同情，在这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里，他用丰富的史料，深入论证了造成灾荒的自然原因、社会原因，分析了历代赈灾的效果及弊端，希望以历史作为当前救荒的借鉴。针对有人把灾荒的形成仅仅归结为自然原因。他深刻指出：“灾荒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这部著作的重要性，直到今天仍为人们不断地认识。作家蓝翎1986年曾写道：“（邓拓）是近代第一位真正研究中国历史上救荒策得失的。如果做地方领导的认真读读这部书，过去的‘信阳事件’及后来的‘驻马店事件’，是可以缩小其危害程度，甚至是可以避免的。”^①

对这本学生时代匆促写成的书邓拓本人并不是很满意，再版前，他曾想对原著进行一些修改和补充，把史料补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作进一步的探究，对若干论点展开充分的说明。还是因为太忙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急遽变化，邓拓始终未能实现这个心愿，又是一桩永远无法弥补的千古憾事！

^① 《新时代的“救荒策”》——《文艺报》1986年4月19日。

改 革

1956年，《人民日报》的改版提上了议事日程。

五十年代中期，形势、任务和读者要求都有了很大变化，但由于一些原因，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却显得有些沉闷、死板，落后于生活，不能适应党和人民的要求。5月2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中央倡导反对教条主义，大胆探索的精神，促进我国科学文化和文艺的繁荣，群众的思想十分活跃。这正是新闻改革的黄金时期。《人民日报》的改版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解放，勇于探索的大好局面下开始的。

改版由胡乔木同志代表中央指导进行，由邓拓和副主编胡绩伟具体领导。他们发动全体职工检查报社各项工作，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研究参考中外有影响的报纸，拟定报纸改革的思路 and 措施。在此基础上以《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的名义向中央做了报告，检查了报纸的缺点，提出四条改进措施：克服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习气，提高评论质量，增加各种体裁的文章，努力改进文风；增加工作问题和思想学术问题的讨论使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能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增加新闻和通讯，改进版面安排，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加强编辑部工作，包括加强调查研究，扩大同群众的联系和作者队伍等。8月，中央正式批准并向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转发了这个报告，同时指出：“为了便于今后在报纸上展开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中央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

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致读者》，明确提出了改版的指导思想：“《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我们的报纸名字叫做《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他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靠着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报纸改版后，将着重从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和改进文风三个方面改进工作。”

从这天起，《人民日报》从六个版扩大到八个版，增设了副刊。改版后的报纸内容相当丰富，面目焕然一新，新闻增加了，报道面扩大了，评论的针对性加强了，与群众和实际的联系密切了，出现了不少态度鲜明，笔锋健锐的批判坏人坏事的文章。当年的老报人至今回忆起来，仍神往地说：“可爱可亲的一张张改革后的报纸，多么令人怀念；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它将成为我国新闻宝库中的珍品。”^①

邓拓提倡编辑记者多写反映现实生活，报道工农业生产战绩的文章。他以身作则，带头深入到北京崇文门外一条叫下唐刀的小胡同里采访，写出了清新隽永的著名通讯《访“葡萄常”》。

“葡萄常”是一个造作料器葡萄的手工艺世家，邓拓三次来到这个偏僻的胡同，在矮小的工作间同几位大娘、老太太亲切交谈，他写出这个独特的全部由女人组成的家庭“两代清

^①胡绩伟：《平生赢得豪情在——纪念邓拓逝世二十周年》。

寒”的家世，写出人工巧胜天然”的“百年绝艺”：“做成一串串的葡萄比那园子里新摘下来的也差不多，深紫色的薄皮上覆着一层白霜，柔软的枝干衬着几片绿叶，叫人望见它们嘴里就有酸甜的感觉”；他写出新中国的建立“也正是葡萄常姑侄姐妹扬眉吐气的新时期的开始”；也写出常家姑侄姐妹为了使绝艺不外传，宁可终身不嫁，有的当了尼姑的生活悲剧：“这使我不禁联想到中国历代手工业者用一切方法保守技术秘密的许多悲剧，我疑心这个悲剧在常家一直演到如今还没有终场。”对这个家庭特种工艺的“女儿国”寄予深切同情：“常家三世守贫寒，百年绝艺相传，葡萄色紫损红颜，旧事如烟，合作别开生面……”

1956年8月15日，邓拓在党总支会上作了《关于编委会的领导工作问题》的发言，认为领导工作要在政治上不搞自由主义，但在具体问题上应当提倡独立思考。他认为过去忽视了中国报纸的传统特点，比如报纸设副刊，文章标题的简捷明快等等，这都需要改进。他说，中国的评论，像邹韬奋、张季鸾、王芸生的文章，文体基本上是随感性的，从小处谈起，娓娓动听，对于改进我们报纸的文风是有借鉴的。他还倡导多写自然科学的文章和反映生活中矛盾和问题的杂文。一些著名作家茅盾、郑振铎、徐懋庸等在报纸上发表了有影响的杂文，两个月内报纸就发表了九十五篇杂文和六十篇读者来信。改版使报纸各部门职工情绪高涨，从上到下呈现一片红火热闹的景象。

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以后，中国当代历史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改版后的《人民日报》得到社会各届的普遍欢迎，却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毛泽东认为《人民日报》改得不好，说，纸张紧张，还出那么多版，谁看得完？这以后，虽然《人

民日报》在形式上还是保留八个版，但内容上的改革一直彷徨不定。不久，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以《人民日报》为首的这次新闻改革中断了。

李庄同志回忆这次新闻改革，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当时曾发奇想，‘双百’方针的积极宣传和逐步实践，可能对反右斗争起了某种催生作用，得失之间，实难预测。或者由于心中余悸复萌，或者由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理作祟，或者被这次反复弄胡涂了，此后二十多年，新闻改革再也无人提起，许多人甚至没有再想过，实在是新闻界难以补救的损失。”^①

“左 风”

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不平坦的。

1953年是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邓拓撰写的元旦社论：《中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

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在农村开展。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毛泽东主张加快步伐开展农村互相合作

^① 《我在〈人民日报〉四十年》——《新闻战线》1988年第6期。

运动，到了1955年6月，全国三分之二的农户参加了各类互助合作组织。过快过猛的合作化进程中，一些地区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偏差，引起农村关系紧张。中央农村工作部采取措施整顿收缩，纠正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作风，使矛盾得到缓和。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党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的问题》的报告，讽刺坚持收缩整顿的中央领导同志“像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在那里走路，”指责他们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将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在一片反“右倾”的政治气氛中，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推进，原计划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实现的目标，到1956年12月就提前完成，占全国总数百分之九十六点六的农户被组织进合作社，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占百分之八十七点八。

与此同时，毛泽东决定加快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1956年1月仅仅一个月时间，在一片喧天锣鼓声中，全国大城市以及五十多个中等城市，先后实现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宣告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胜利完成。

在这热热闹闹的形势下，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到了胜利下面掩盖的危机，提出要反对急躁冒进，反对指导思想上的片面性。2月，周恩来同志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作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发言，指出不光要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要警惕急躁的苗头，超过现实可能性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6月，刘少奇同志根据党中央政治局的意见，部署中央宣传部起草一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文章送到报

社，邓拓修改后排出清样，送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再次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同志审定。毛泽东同志批了三个字：“不看了。”从这三个字上，邓拓意识到毛泽东的不满，又特地在定稿上写了：“全文明（20）日见报，改排新五号字”，想用缩小字号的方法减轻其分量。但是这篇文章发表后多次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和指责。1958年1月在党中央召开的部分中央领导人和省市书记会议上，毛泽东重提1956年反冒进，说“这是政治问题”，“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他尖锐地批判《人民日报》：“1956年6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看？”后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提起这篇文章：“6月20日社论有原则性错误，……不能说这篇社论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在‘但是’以后就是反‘左’，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东林党内有君子也有小人，朝廷里有小人也有君子，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以后不要提反‘冒进’，决不要提。”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篇代表党中央多数同志意见的社论，是完全正确的。它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针。这篇社论也可看作是最早的公开反“左”的一篇文章。

1956年9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共产党执政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拓作为八大代表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八大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功绩，它从指导思想上提出和初步解决了几个关系

新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重大问题。八大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得出“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正确结论。同时，《决议》还提出要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如果沿着八大路线走下去，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会走上一条平坦的康庄大道。

还是在我们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他批评了党中央在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的正确方针。

《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作为总编辑，邓拓感到肩上的担子异常沉重。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是力图使自己的思想跟上领袖和党的要求，坚决贯彻上面的指示精神的。对邓拓的工作，起初毛泽东同志也是信任的。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实用主义当中，邓拓曾多次到中南海，直接从毛泽东那里得到指示。但“八大”以后党内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两种政治倾向的争论，常常使邓拓感到左右为难，有一种动辄得咎、无所适从的感觉。正如刘少奇所说，当时的报纸宣传，在组织

上“不服从，是错误的，要犯错误；服从，也要犯错误。”那篇受到上下欢迎的反冒进社论，偏偏受到无理的指责，邓拓有口难言，心中不无委屈。但他和当时几乎所有人一样，没有也不可能怀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性。具有高度党性的他，忍气吞声，从不和人私下议论，也不愿多作申诉，而是更加小心谨慎地工作。在“八大”酝酿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时，好些同志提出邓拓应当作为候选人。他得知后十分不安，马上正式提出辞职。有位同志认为中央党报负责人应是中央委员，何况他在新闻界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坚持要选，邓拓一再劝他不要这样。这中间，除了他本人一向的谦虚品格外，也包含着难言的苦衷。这时，他已产生了想辞去总编辑职务的想法。

挨 骂

随着1957年春夏之交那场急剧的政治风暴的到来，邓拓受到更加沉重的打击。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指出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谈笑风生地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不是大民主啰，而是小民主啰。有一个小字不够，再加一个小字，叫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比较好，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他的讲话不断引起会场上的阵阵欢笑和掌声。

当时国际上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苏共“二十大”全面否定斯大林，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国内因官僚主义导致的风波，都引起毛泽东同志思考：如何避免斯大林和匈牙利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毛泽东的讲话很快通过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向文化、科学、教育、艺术、新闻、出版等各届的党外知识分子传达，毛泽东在会上向党外人士提出：“现在共产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这几个东西还相当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展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党外人士自愿参加，不愿意就不参加。整风的方法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小小民主，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人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的话使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欢欣鼓舞，他们积极参政议政，认真地“帮助共产党整风。”

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决定将改为教师报的《文汇报》复刊，撤消《光明日报》的党组，这两张报由民主党派独立自主来办，以体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精神。《文汇报》的社长兼总编辑是徐铸成，《光明日报》的社长是章伯钧，总编辑是储安平，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报人。新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一出现，深受知识分子欢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度也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他在全党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对徐铸成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再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看看其他报纸。”毛泽东的话使老报人感到亲切、温暖。

这期间，毛泽东针对一些党的干部怀疑“双百”方针的情况，一再指出：“百花齐放，我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

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部队干部陈其通等四人合写的反对鸣放的文章《我们对当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毛泽东批评说，他们的文章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

5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2日又发表《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运动很快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间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率先刊登了许多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著名人士的“鸣放”文章。由于得到指示要“加温再加温”，要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武器，报纸上和群众运动中都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言论，出现了一些局部的紧张气氛。

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形势面前，作为党报负责人的邓拓，采取了冷静的态度。报社有的同志主张像‘文汇、光明两报’一样，在《人民日报》上“大鸣大放”，邓拓说：“我们是中央党报，一切都要听中央的安排和指示，不要街上锣鼓一响就出来。”参加了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后，他立即向报社人员传达，并且拟定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宣传报道计划，送给党中央主管新闻工作的胡乔木审批。1月7日毛泽东批评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后，他让理论部同志写了题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在4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强调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的不够。但由于宣传计划一直没有得到批示，邓拓始终硬着头皮按兵不动。本来，这体现了邓拓一贯的严谨作风，不料却招致了一顿劈头盖脑的责骂。

1957年4月10日下午，邓拓刚吃完饭就接到通知，毛主席要

召见《人民日报》全体编委。胡乔木、邓拓、胡绩伟、王揖、黄操良、林淡秋等同志分乘两部小轿车，直奔中南海。他们当中，只有一位同志是普通编辑，因为这位同志是当天发表的那篇谈“双百”方针文章的作者，被指名叫去的。

他们被领进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穿着睡衣，盖着毛巾被。大概是刚刚游完泳吧，他靠在床上，半躺半坐，不停地抽着烟。邓拓向毛泽东一一介绍来的人，介绍到那位编辑同志时，毛泽东摇摇他的手，夸他写了好文章，“是我们年轻的哲学家”，接着就对邓拓和《人民日报》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看了今天的社论，虽然发的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而让非党的报纸抓住这个旗帜……”

邓拓一上来就作检讨，但他的话多次被毛泽东措辞尖锐的批评打断。会议气氛非常紧张，邓拓如坐针毡，但还是耐着性子听着，记着。

这次接见共进行了四个多小时。胡乔木曾作解释说，《人民日报》的宣传计划，他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他也有责任。

回到报社，邓拓压下自己的委屈，向编辑部作了传达。并且说：“在我还没有调离这个岗位前，我要和同志们一起，为办好《人民日报》而努力。”当时报社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感到很意外也很沉重。他们不理解，一向忠心耿耿，为党的新闻事业忘我工作的总编辑，为何会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国享有崇高的威望，人们心头的疑虑，并不便明说出来。然而在这场风雨中，报社没有一个人出来揭发邓拓，

造邓拓的反，他们只是默默地向自己爱戴的总编辑报以同情、鼓励的目光，并以更加积极自觉的工作，分担总编辑心头肩上的压力。

“阳 谋”

一个多月以后，风云突变。5月15日，毛泽东写了给党内干部看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7月，毛泽东又写了《1957年的夏季形势》一文。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反右派斗争以一种异乎寻常的，被称为“引蛇出洞”的方式进行。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益。”“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领导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自那次被批评后，毛泽东已开始不再信任邓拓，他决定调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到报纸担任总编辑，邓拓被宣布担任社长。他们的分工是：吴冷西主管新闻和版面，邓拓主管评论、理论、文艺。对邓拓来说，这个安排实际是靠边站，明升暗降。不管版面，突然从多年习惯了的紧张繁忙的工作岗位上下来，成了个闲人，邓拓有些不适应。但他坦然接受了这一安排，并无怨

言。因为他对那时天天出现在报纸上的政治喧嚣，对运动中那种翻云覆雨，变幻莫测的情况，实在难以适应，思想感情上感到痛苦，感到不理解。远离斗争的漩涡中心，对于一个不失纯正的书生人格和心态的人来说，也许恰恰是某种解脱。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反右派的信号。从此，反右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不到一个月时间，《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社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积极的反批评》、《工人阶级说话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正确对待善意的批评》、《是不是立场问题？》、《〈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7月1日，毛泽东又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说：“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确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许许多多参加了“鸣放”的人，都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整风初期受到表扬带头“鸣放”的报纸，也被打成右派报纸，社长、总编都成了大右派。而当时被批评为“无动于衷”的《人民日报》，却因祸得福——由于“放”得不够，发表的毒草不多，使报社和许多同志避免了厄运。这不能不归功于邓拓当初的谨慎。事后他不无后怕地对副总编辑说：“可

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如果《人民日报》也被打成右派报纸，不仅大大有损于中央的声誉，不知报社还会增加多少右派呢！”邓拓用一己的委屈换来了众多同志的安全，至今仍令《人民日报》的老同志们心存感激。

有位已定居海外的老记者撰文回忆说，当时有个“左叶”事件，北京的一些记者和一个化名“左叶”写文章的挺有来头的人发生了争论，后来反对左叶的记者都定了右派。他当时年轻气盛，采访后也写了篇文章为记者出冤气。这篇文章写成后一直未获发表。在一次会上，邓拓亲手把文章还给这位记者，并以目示意，让他收好。邓拓以自己默默的行动，保护了这位年轻记者。

有位老同志在怀念邓拓的文章中写道：“老邓最反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那一套‘左’倾幼稚的东西。我们党内有很多反对极左的同志，他们是先知先觉，老邓就是其中的一个。”^①今天，重读邓拓在“反右”运动开始以后发表的一些文章、讲话，感到这个评价还是准确的。的确，邓拓对党是忠诚的，对领袖是热爱的，在运动中，他力求符合党的要求，跟上毛主席的思想，也积极投入了报社和新闻界的反右斗争。但是，他作为一个学者，独立思考的习惯并未泯灭；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也没有削减坚持真理的勇气。因此，即使在那样的高压下，他还是发出了自己的，与当时的潮流不同的声音。

1957年5月邓拓在《人民日报》内部干部会上谈整风反右问

^①胡绩伟《平生赢得豪情在——纪念邓拓逝世二十周年》。

题。他说：“整风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搞起，这是正确的。……百分之九十的意见是对的或基本对的，极少数是不好的。傅鹰（注：一位教授，后被定为右派）的话虽然难听，内容是好的。”“对傅鹰要肯定是好人，爱国主义者，好教授。”“不只整风，今后所有人民内部矛盾都要和风细雨。党外人士对我们如果狂风暴雨，我们要处之泰然，对的接受，错的解释。我们经受得起考验。”这篇讲话发表在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时候，显然是不和谐的。

1957年5月11日，邓拓以“卜无忌（不无顾忌）”为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废弃“庸人政治”》的杂文。文章开篇就说：“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突然领悟的一个道理，这就是唐朝的陆象先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确，我们有的同志，不知道为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做的事情。他们不管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地。”接着，他举了县干部对农业瞎指挥，和人事干部陷在日常“公事”中不能解脱两个例子，接着说：“一定要把这些都说成是‘政治’的话，那么，这只能说是庸人政治。大概地说，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我们眼前的庸人似乎还不少，他们有的还有权发号施令。这样，就不能不在某些地方形成了‘庸人政治’。他们如果进一步发展这一套‘庸人政治’，其结果将如庸医治病一样，会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我自己也患过病，也当过编辑，各种感受都有一些，说几句由衷之言，并非危言耸听。但愿我们的同志遇事深思熟虑，千万不要乱拟方案，像庸医那样乱开药方，以免害死了人；对于自己没有把握的一切问题，还是不

滥作主张为好。”

蜀 道

邓拓同志离开总编辑的岗位，担任社长后，实际上离开了报纸版面的第一线。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当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绩。邓拓从不对个人的进退荣辱耿耿于怀，他放眼全国，为祖国各地蓬勃的建设局面所吸引。1957年岁末宝成铁路竣工，并准备在1958年元旦举行通车典礼。宝成铁路长达六百六十八点二公里，穿越陕、甘、川三省，是建国后建成的一条“钢铁大动脉”。它的通车彻底结束了的自古以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局面。在悬崖绝壁，险象环生，被视为畏途的古栈道上，新中国的建设者们克服了不知多少艰难险阻，终于打破一些中外专家关于这条道上不可能修铁路的断言，修成了这条铁路。邓拓和报社同志商量，决定用一个专版来宣传这一建设成就，并且决定亲自沿宝成路南行，深入第一线进行采访。

1956年12月26日，邓拓乘飞机先到西安。一下飞机，他微笑地对前来迎接的《人民日报》驻陕西记者站女记者李茜说：

“李茜同志，我们一起去宝成铁路采访好吗？我动身前已和记者部商量过了。”李茜是个当记者仅仅两年的年轻人，第一次承担这样重大的采访任务，又是跟随早已仰慕的新闻界前辈邓拓同志，心里不免有几分紧张，邓拓的话使她的心情一下子松弛下来。她没有料道，身居高位的党报负责人，竟是这样亲切、和蔼，没有一点架子。

其实，礼贤下士，平易近人，正是邓拓一贯的作风。邓拓对他身边的同志，从干部到司机，从编辑到秘书，都是以一种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从不用命令式，而总是用商量的口吻，“请你……好吗？”秘书、警卫员做了分内的工作，邓拓也总是向他们道谢。报社资料室的一位女同志回忆说：“邓拓同志写社论常要用资料，有时用的是我管的资料，我便找好一摞剪版，用猴皮筋套上给他送去。刚一进门，他竟站了起来。大家都是干革命嘛，谁跟谁也甭客气，况且他是领导，又是长者，这么讲礼貌，挺奇怪的，他总是和颜悦色地问：“很费事吧？”或者说：“这可太麻烦你了。”^①邓拓这种礼貌的作风，竟使一些进城干部不大习惯。整风时要求给每一位领导干部提意见，秘书白玉峰实在提不出来，就提了一条，说邓拓让同志们干工作时还总是说：“请、谢谢！”太客气了。这种意见，实为褒奖。一位《人民日报》的老同志还讲了这么一件事。五十年代的一天，她与几位年轻的女同志从外面回来，刚要进报社，见总编辑的车停在门前，她们忙闪在一边，让邓拓同志先进。谁知邓拓将门推开扶住，请几位女同志先进去后他才进。这样的小事，几乎每个与邓拓接触过的同志都能说出几件。

邓拓接着对李茜说：“你同意的话，就把手头的稿子写完，我给处理一下，好抓紧时间动身。”李茜将已经写好的一篇新闻和一篇七千字的长篇通讯交给了邓拓。第二天早饭前，邓拓就把厚厚一叠经过认真修改的稿子交还给她，让她寄回报社发稿。李茜感到很内疚。她知道头天下午，省市领导和新闻界的

^①张瑶均《三送邓拓》——《华人文化世界》1997年第5期。

朋友们来看邓拓，晚上，他又听取了长期在宝成铁路工地上体验生活的作家杜鹏程对铁路的详细介绍，一直谈到午夜时分。显然，为了看她的稿子，邓拓这一夜几乎未眠。这时，李茜才对“日理万机”的含义有了切身体会。

当天，他们乘一辆简陋的轨道车，沿着这条即将运营的新铁路线进行采访。每经过一些艰险地段，邓拓就下车仔细察看，还不时走到尚未竣工的施工现场和设在山边的工棚里，与工程技术人员、筑路工人座谈。两天后轨道车到达成都，同行的年轻人都感到非常疲劳，而体弱多病、受伤的腰部还用钢架支撑着的邓拓同志，却精神矍铄。他又工作了一个通宵，写出三千多字的通讯《英雄的路》寄回编辑部。这篇通讯生动地描绘了作者在现场看到的险恶地形，热情歌颂了广大筑路员工创造的中外筑路史上的奇迹。1958年1月2日，宝成铁路通车的第二天，由邓拓亲自采写、编辑的宝成铁路专版就在《人民日报》上见报了。从采访到见报，仅仅用了五天时间。过度的劳累使他病倒了，一连几天头痛、发烧。同行的人责怪他不该这样过量地工作。邓拓却对大家说，搞新闻和文学创作不一样，要特别抓紧时间，讲究效率。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尽快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的新情况、新成就、新问题、新经验，以及人民群众的呼声和建议写出来，告诉读者。“千万不可拖拖拉拉，拖拉作风是新闻工作者的大忌。”

病情稍有好转，邓拓便和同行的同事们一起在成都、重庆、自贡等市参观访问。他们走访了许多城镇、农村和古迹，又乘客轮顺长江而下向武汉进发。一路上邓拓笔耕不辍，陆续写下游记《陈仓道上》和三四十首诗词。邓拓同志一贯主张“不做新闻官”。“总编辑也是编辑”，这次深入建设第一线长途采

访，正是邓拓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不做新闻官，也鲜明地表现在他恪守记者的职业道德，廉洁自守上。在成都访问的时候，他们一行参观著名的昭觉寺。寺里的方丈是位很有学问的高僧，邓拓和他谈起佛经及古代名人字画，津津有味，甚为投机。方丈命徒弟泡上好茶，摆出花生、松子、红枣等干果招待大家。告辞时，邓拓拿出十元钱付给寺院。陪同前来的成都文化局的同志阻止说，按照规定应该由他们单位付，邓拓坚持自己付了钱。

在四川，当地一些朋友仰慕他的书法，请他写几幅条幅留念。邓拓说：“我个人送给同志们的字，不能用公家的纸。”第二天路过一家文具店，他自己掏钱买了宣纸和笔，回到宾馆后，他摊开宣纸，挥笔疾书，写了一幅又一幅，写得兴起，还给同行的杜鹏程、李茜等人各写一张。他给四川记者站的赠诗是：“身居天府写文章，翰墨清新立意强。记者生涯当自励，一言一动慎思量。”邓拓用他本人大半生在新闻岗位身先士卒、严于律己的实践，为这首诗作了最好的注解。

离 别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报人，不久以后却不得不被迫离开他钟爱的新闻工作。

回到北京，邓拓接到通知参加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当邓拓一走进会场，毛泽东用尖刻的语言，对邓拓再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这一切，邓拓只是默默地听着、忍着，做着记录，但精神上的熬煎是不能为他人所理解。回到家里，他

仿佛大病一场。丁一岚关切地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邓拓只是简单地说，受到毛主席的批评，说他“书生办报”，那些刻薄、挖苦的话，他一句也没有提。是啊，他该怎么对一岚说呢？说毛泽东批评错了？在当时这几乎是不能想象的；说自己做错了？他却怎么也想不通。邓拓是个党性很强的人，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愿给党、给领袖的形象带来损害；他又是个铮铮的男子汉，不愿以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而增加妻子、孩子的心理负担。因此，他对受批评这件事，始终保持沉默，直到他离开人世，丁一岚都不知道埋藏在他心里的这段痛苦。

眼见“左”的那一套越来越占上风，邓拓忧心如焚；对他自己的处境也感到十分苦恼。但以他正直不阿的秉性，他从没有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去违心地迎合、去检讨，去见风使舵地转向。他所能做的只是隐忍、退却。他决定连社长的职务也辞去，下到文艺部去蹲点。他约一位比较知心的副总编辑到潭柘寺去散步。在那曲曲弯弯的山道上，在那深幽寂静的寺院里，两个人怀着复杂的心情，拖着沉重的步子，边走边谈，有时就在石头上坐下来。即使在这种场合，邓拓也并没有完全直抒胸臆，畅所欲言，仍保持着严格的吐词遣句，不直接指名点事，因此，那位同志并不能完全领会他此刻的心情。他劝邓拓不要辞去社长，甚至劝他要作一些斗争。邓拓连连说：“难呀！难呀！”长长地叹了口气。他望望这幽静的寺院，不无神往地说：“如果允许的话，我真想留在这寺庙里多读点书，多写点东西，”说这话时，神情有几分凄凉。

邓拓的老上级、老战友，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同志很了解他尴尬的处境和心情。彭真惜才、爱才，想尽力为他创

造一个较为宽松的工作环境。经过一番努力，1958年8月邓拓被调往北京市委，担任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兼任市委的理论刊物《前线》半月刊主编。邓拓是著名的报人，彭真和刘仁同志有意不让他分管报纸，只让他管一个刊物。邓拓充分理解这番保护他的良苦用心。

半年以后，即1959年2月的一天下午，《人民日报》社举行了一次不平常的全社工作人员大会，欢送邓拓。这是一次迟开的欢送会，邓拓同志作了在报社最后一次讲话。肃静中，邓拓走到讲台前，他深挚亲切地注视大家片刻，情绪显得有些激动。他说：“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折衷主义》”，“……无产阶级新闻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在新闻工作中的贯彻。过去我们在工作中常犯错误，总是由于看问题片面。我们要求全面，即是正确地认识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辩证法不是折衷主义和中庸主义，不能把优点、缺点平均起来，这是不能正确反映事物的……”报社的同志们静静地听着，但在当时，许多人还不能理解邓拓以一篇哲学报告作告别辞的用意。直到多年以后，人们才从中悟出邓拓正是“从哲学上进谏并启发领导同志们思考”^①这一深层的含意。

讲话结束时，邓拓念了一首七律，题目是《留给〈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① 《三送邓拓》。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当时任文艺部负责人的老作家袁鹰同志回忆道：

“他一句一句地念着，有的略加解释，如念到第三句时，他谈前几天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意气未能无’，语气间有点自责，也有点自信。邓拓同志在台上神态安详，感情真切，一如十年来他多次在这讲台上作报告时一样，只是声调中略带一点惆怅的情味。报社的同志在台下静静地聆听，却是心绪如麻，感慨万千。我反复吟咏，咀嚼这八句话，感到这不是一般的应酬之作，很有点像前人评诗中用过的‘深情绵邈，寄托遥深’八个字。”^①

会后，报社的同志将这首诗制版复印，人手一份。直到1966年“文革”前，许多同志写字桌的玻璃板下，还压着这首留别诗笺。据说批判“三家村”时，一篇重头文章里引了这首诗，《人民日报》的同志在1957年春并没有起来造邓拓的反，而是和他“风雨同舟”，这也是令一些人始料不及的。^②

挫 折

越来越频繁的政治运动，使经历单纯，参加革命后一帆风

^① 《不灭的诗魂——怀邓拓同志和他的诗》——《忆邓拓》。

^② 参见《文章满纸书生累》。

顺的丁一岚也未能幸免。

1959年“左”倾错误的泛滥，已在全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全国城乡动员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连老百姓家的铁锅铁器都被砸了炼钢，却多半成了废品，没取得什么经济效益；1958年本是一个丰收年，但大办钢铁和其他大轰大嗡的运动占用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大片粮棉无人收获，烂在地里，丰年却未获丰收。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刮“共产风”，将生产队集体财产无偿归公社所有，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吃大食堂”、“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政策，侵害了农民的利益，损坏了农业生产力，粮食等农产品很快就消耗一空，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失去了保障。

在这一纷乱、严重的局面下，中央领导人开始“降温”、纠“左”的庐山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读了他在平江调查时一位老红军递给他一张纸条上的民谣，“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铁，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他上书毛泽东，在肯定1958年大跃进成绩的基础上，指出“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的问题，”“浮夸风较普通地增长起来，”有些经济法规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彭老总的这封信，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高度的责任感和忠诚，反映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呼声，陈述意见的方式也是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然而，毛泽东却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反左变成了反右，彭德怀被戴上“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的大帽子，反“右倾”斗争随即在全国展开，一批党员、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处分，一些同志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庐山会议初期，北京的三大新闻单位《人民日报》、新华

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形势讨论会。丁一岚是广播局总编室副主任，一直列席局党组会议，会上有发言权。在会上，广播局领导梅益同志动员说，希望大家对形势有什么看法就说出来，向党交心。丁一岚学生出身，经历简单，参加革命队伍后从未受过挫折；况且，民主革命时期党内的民主生活还是相当健全的，从根据地过来的丁一岚习惯了那种同志之间直率坦诚的气氛。她快人快语，有什么想法就毫无顾忌地讲出来。对“大跃进”，丁一岚最初的想法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激动、兴奋，觉得不久就要一步迈入共产主义了。但慢慢地，她在采访调查和实地观察中看到不少真实的现象，隐隐感到什么地方不对头，从而产生疑虑。比如，明明是物资紧缺，经济困难，还提出“我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即使我们能进入共产主义也不能先进，要让老大哥先进”，她不理解。出于自己忠诚，她并不怀疑上面的正确性，而是苦恼于自己的想法与党不一致，应该说出来求得解决。于是，她作了个长篇发言，说了诸如“人民公社是否办早了，办急了”，“大炼钢铁是否得不偿失”，“是不是也头脑发热了”这样的话。不久，彭德怀的“万言书”作为反面教材向下传达，丁一岚吃惊地发现，自己的许多说法竟与彭德怀一样！很快地，局里开始反“右倾”，丁一岚成了广播局批判的重点之一。在批判大会，大字报上，她的发言被说成是“向党进攻”，这对丁一岚简直像是晴天霹雳，她第一次尝到不公正对待的滋味，感到满心委屈：自己少年时入党，一直对党忠心耿耿，那次提意见也是为了“向党交心”，怎么能说是“向党进攻”呢？有人劝慰她说：“你动机虽好，但实际效果是向党进攻。”对这样的“开导”，一岚也难以接受。批判持续了一个多月，1959年秋，一岚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失

去了总编室副主任职务，下放到河北遵化县那个颇为有名的“穷棒子社”建明公社劳动。干活、吃苦，一岚都不怕，她只是感到郁懣、委屈，觉得自己被党抛弃了。她放心不下家中几个幼小的孩子，身体上的疾患也来凑热闹。她患了坐骨神经痛，活动不便。经历过战争，吃过各种苦的一岚，似乎这时才真的感到了苦。

在这段时间里，邓拓一直像个挡风避雨的大树，鼓励、安慰妻子，劝她不要泄气。邓拓毕竟经历过更多的风风雨雨，对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比一岚看得清醒。他支持一岚下放，对她说，你放心去劳动吧，我来管家、管孩子。有这样理解自己，相濡以沫的丈夫，一岚心里宽慰不少。在她下放的一年里，邓拓也确实担负起了照顾家庭、教养子女的责任。这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这是难得的、仅有的一次。

在遵化，一岚先在遵化县广播站停留了一段时间。幸亏县里有位会针灸的老大夫，一天两次给她扎针，治好了她的坐骨神经痛。

在劳动的一年里，一岚心里窝着一股无名火，气愤、压抑的情绪始终伴随着她，但是好强的一岚仍勤奋努力地参加劳动，她有个信条：共产党员干什么都要像个样，不能让人笑话。

1962年1月11日，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是一次实事求是，加强民主，总结经验教训，切实调整国民经济方针的会议，会上承认了前几年急于过渡，刮“共产风”搞平均主义等是错误的，实际上是否认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存在。七千人大会以后，尽管批彭德怀的错误没有得到承认和纠正；大部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是被平反了。当一位领导代表党组织对了一岚宣布，

撤消对她处分时，丁一岚激动得大哭了一场。压在心头几年的委屈、怨恨，一下子烟消云散。她像个被抛弃的孩子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心中只有感激。她想：这就像是妈妈打错了孩子，现在妈妈认错了，怎么能怪妈妈呢？今天的年轻人，对这种心情也许不能理解了，但在当时，那确实是相当多的老党员、老干部共有的思想感情。

第八章 健笔终存天地间^①

邓拓离开《人民日报》社，如释重负，精神上也舒畅多了。在北京市委担任文教书记，办《前线》杂志，相对来说，责任减轻了，环境宽松了，使他有更多的时间读书、研究、思考、写作，对邓拓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治学、著述的良机。

然而，研究邓拓的人常常发现，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一些遗憾。

有人说，邓拓作为一位渊博的学者，本应在学术研究上有更大的建树。但他多年来为了革命工作牺牲了自己的学术兴趣，无暇进行更为系统的学术研究，这是他个人的极大遗憾。这一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只说出了一个方面。邓拓的学术研究不仅受到他所从事的革命工作时间上的限制，也受到不正常的社会空气的限制。事实上，邓拓在内心里从未放弃过对学术研究的孜孜追求。1961年春天，《人民日报》社记者金凤随北京市委工作组到郊区进行农村调查，意外地遇见了邓拓同志。邓拓下了汽车，他的秘书在他身后抱着一大叠线装书。金凤向邓

^①引自杨述悼文（《北京日报》1979年4月1日）。

拓问好后，有些诧异地问这位秘书：“你捧这一大堆书干啥？”秘书笑着回答：“邓拓同志正在收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材料，这些书他要随时翻阅，下乡也带来了。”这件事情说明，邓拓并未放弃过五十年代初开始的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他积年累月在自己的书斋里，用大量的时间阅读、研究和思考的东西，也有许多并未以文字保留下来。我们不妨假想，如果没有后来的那场浩劫，无论是在一生从事的历史研究上，还是在六十年代开始的绘画研究上，邓拓都会给后人留下一笔多么宝贵的学术财富啊！

邓拓不是死抱一门学问皓首穷经的学究，他的学术才能适应性很广。因此，在复杂多变的际遇中，他不仅写下过“扛鼎之作”，填补过一些空白，也在大量非常入世的政论、散文、杂文、画论中，体现了自己的学术价值。换句话说，在他潜心研究的同时，他的学者气质和功力，也会通过这些似乎非学术的形式体现出来从而影响社会。六十年代初年各种机遇的巧合，都为他提供了体现这一价值的契机。

政 论

邓拓刚到北京市委时，全国还处于高举“三面红旗”那个“狂热的年代”。到处放“卫星”，大刮浮夸风共产风。中共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前线》就是在这样一个“左”的氛围中筹备创刊的。北京市委作为党的一级组织，当然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然而，市委的一些负责人，也尽可能地对“左”的倾

向作过一些抵制。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在1958年11月25日为《前线》杂志创刊写的《发刊词》中，就有这样的话：“我们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凭灵机一动的‘本能’办事，不能按照片断的材料和表面现象办事，更不能像风筝、氢气球一样，随风飘荡，即跟着空气办事。总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任意乱干。我们必须，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在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按照客观规律改造现实。”《北京日报》登过一篇《朝阳一举盖三钢》的文章，报道北京朝阳区大炼钢铁放“卫星”，市委副书记刘仁同志尖锐地批评说：“朝阳区用土炉子炼钢，只一天搞了个高产，不可能持久，而且质量也不行，你们为什么要吹他们的产量比首钢、北钢、特钢加起来还多？这就实事求是吗？”刘仁对当时几千万人上山炼铁，城乡处处在后院炒钢的作法很反感，他指示石景山钢铁厂的同志说：“你们不能炒钢，不能把国家仅有的一点好铁炒成废钢。计划高了，完不成，到年底我替你们去检讨。”在处处高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当时，说这样的话，是要有勇气的。邓拓在这样一个班子里工作，心情自然比较愉快。

从1958年到1959年4月，《前线》前十期的十篇社论，都出自邓拓手笔。作为党刊，必须要宣传党的中心工作、宣传总路线，社论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但是，作为有一定独立思考精神的政治家，他对当时那种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危害群众根本利益的“左”的一套是有所觉察的。十篇社论中，就有三篇是谈群众路线的，在这些文章中，他尖锐地指出：“有一部分干部又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想到哪里就一下能够做到哪里，违反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又慢慢抬头了。有的干部甚至以种种理由为借口，拒绝实行群众路线，遇事不

同群众商量，往往用简单命令以及其他粗暴的方式行事。这是我们目前必须设法防止的危险倾向。”“我们有的干部，自以为已经懂得了许多实际情况，就不再注意随时随地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不肯耐心地同各方面的群众反复商量问题，就凭自己的脑子一热，灵机一动，就做出判断，乱下命令。”

他提出：“我们的口号是：‘按照客观的可能和需要办事。’”针对当时流行的高指标，他强调一切计划“都必须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任何指标的提出一定要有根据，就是说，要有实现这些指标的充分理由，而不是单凭主观的愿望。没有根据的指标不仅没有实现的保证，还可能招致许多意外的困难。”

在“左”风劲吹的年代，这样的议论，表现了作者冷静、清醒的思考。

邓拓离开《人民日报》后，仍十分关心报社的工作。《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杂志的同志也常去看他，约他写文章。对这样的要求，他总是尽量满足。1959年4月，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令人瞩目的文章《谈“将才”》，从古代选贤任能的标准，智、信、仁、勇、严等方向阐述了一个“将才”思想作风锻炼的重要，抨击了一些领导作风不高明的现象。他说，一个领导人“要善于与自己周围的人交换意见，特别是要能虚心听取相反的意见；要善于观察形势，而又能当机立断。”“对待一切问题要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不含糊、不苟且，不模棱两可，不敷衍搪塞；在大是大非的面前，态度尤其要明确，立场鲜明而坚定，把是非的界限划分得清清楚楚，对于错误的绝不妥协，对于正确的全力支持，……”邓拓的这番话，是他一向律己的准则，也可看成是他心目中作为一个领导者的标准。

从1959年10月开始，一年多的时间里，邓拓先后在《时事手册》、《政治学习》等刊物上发表了八篇政论文章。1957年邓拓不当总编辑以后，全家搬到了遂安伯五号《人民日报》宿舍居住，这批政论便以“于遂安”为笔名。这些政论记录了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一个党的干部、宣传家艰苦探索的足迹。

正如夏衍同志所说：“在左风压人的时候，难免有违心之论，歌德之词。”任何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中，不可能不受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这个时期，从经济上的“大跃进”到思想上的“反右倾”，“左”的危害日益严重。《前线》社论和“于遂安政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趋时的文字。作为一个党的新闻宣传领导者，他以共产党人执行党的路线的坚定性和责任感，热情宣传了党的方针和政策，尽管这些方针、政策在后人看来有些是错误的，但作为一个思想者，他把几十年来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入思考和掌握，运用在对一些时政的重要问题的剖析中，不时发出一些清醒和理智的声音。这在那个要求思想高度一致的年代，已属十分难能可贵了。

夜 话

越来越严峻的现实无情地嘲弄了人们的主观愿望。由于“大跃进”、“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中苏关系破裂，从1960年起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发生严重困难，生产力受到很大破坏，有些地方饿死了人，那种“热气高，干劲大”的局面很难维持下去了。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纠正工

作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号召全党认真总结经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还说，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

这个精神立即在北京市得到贯彻。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克服“左”的倾向，多做实事，少说空话，安排好困难时期群众的生活，依靠群众渡过难关。在会上，邓拓对报纸宣传发表了意见，他说，现在工业下马，农业歉收，物资供应紧张，群众生活困难，情绪低落，许多事情不好报道。报纸应当提倡读书，帮助群众开阔眼界，增加知识、振奋精神，在困难时期保持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这一时期，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个比较活跃的局面。党中央多次强调要贯彻“双百”方针，1959年初毛泽东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批评了不敢讲真话、实话的不良倾向，提倡要有历史上魏徵和海瑞讲真话的精神。1961年以后周恩来对文艺界做过几次重要讲话，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重视艺术规律和艺术民主，力图为杂文、漫画等讽刺艺术样式的发展排除障碍。

正是在这样一个比较健康、民主的政治氛围下，邓拓开始了他生命中一段辉煌的写作时期，写下了闪烁着独立思考的光辉，而日后又因此罹祸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

《燕山夜话》曾在北京轰动一时，几乎家喻户晓，影响遍及全国，而它的诞生，用邓拓本人的话说，完全是被“逼着上马”的。

北京市委常委会议的精神在《北京日报》和晚报传达后，《北京晚报》编辑部的同志都觉得邓拓对报纸宣传的意见很好，为晚报出了个好主意。他们决定在报纸上开辟一个知识性杂文专栏。请谁写呢？有人提出，“解铃还需系铃人”，邓拓同志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对我国实际情况了解比较深入；他读的书多，知识广博，在哲学、历史、新闻、诗词、书法、绘画等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不可多得的“杂家”。请他为此专栏撰稿，再理想不过了。可是，开专栏意味着要长期坚持、定期交稿，邓拓同志以前多是写社论、论文、特写一类的文章，请他为晚报写读书札记一类的短小文章，他是否愿意呢？当时担任晚报副主编的顾行和《五色土》副刊的编辑刘孟洪，决心拿出记者的“磨劲”，一定要请邓拓出马。

果然，他们整整磨了三个月，邓拓一直不肯答应。每当他们提出这个要求，邓拓总是不置可否，以笑作答。

3月的一天，他们有意陪邓拓去看望画家吴作人。邓拓与吴作人合作《诗配画》已有一段时间了，这还是第一次见面。邓拓饶有兴致地看了吴作人的藏画，和吴作人切磋着绘画技法。乘邓拓高兴，顾行和刘孟洪又一次提出了开专栏的要求，邓拓笑着说：“你们的胃口真不小，也真能磨，看来不写是不行了，我考虑考虑再答复你们。”

一个星期以后，邓拓同意了晚报的请求。当天晚上顾行、刘孟洪来到邓拓家，一见面，邓拓开玩笑说：“逼债的来了。”接着，向他们展示了已经写好的两幅字，一幅是“燕山夜话”，一幅是“马南邨”。他说：“栏目就叫《燕山夜话》。燕山，是北京的一条主要山脉；夜话，是夜晚谈心的意思。马南邨取马兰村的谐音，这是我们办晋察冀日报所在的一个小村子，我

对它一直很怀念。”他还建议，这个栏目最好排在版面的右上角，要直排，便于读者剪报，并说：“可以写的内容很多，题目随便想了一想，就够写一两年的。”

就这样，从1961年3月19日开始，“马南邨”的《燕山夜话》每星期二四在《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上和读者见面了。从首篇《生命的三分之一》到终篇《三十六计》，前后共发表153篇杂文，成为我国杂文史上一批不可多得的佳作。

札 记

见《燕山夜话》在晚报上出得红红火火，《前线》的编辑们不由得动了心，他们也向邓拓提出了类似的组稿要求。邓拓身兼数职，一周中得写两篇《燕山夜话》，再承包一个栏目怎么吃得消。但作为该刊的主编，他又不好谢绝。于是，邓拓提议，邀请吴晗和廖沫沙两位大手笔加盟，合办一个杂文专栏。

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抗战时就写过杂文《旧史新谭》。他的杂文被称为“战斗的历史科学的一支奇兵”；廖沫沙是北京市统战部长，他和邓拓有至少三个共同点：同一年入党；都在民主革命时期办过报（廖办的是党在白区的地下报纸）；都是著名的杂文家。这三个人的合作，可以说是珠联璧合。

说是合作，其实也就是合用笔名、专栏名，对文章格式有所规定，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很松散的形式进行的：三个人对文章的题材和题旨没有具体限制，风格也不一样，各人自定议题，文责自负，互不干涉。而且，尽管三个人私交不错，但各

人都忙，平时并无过多的来往，只是在最初商定栏目的设置时，一起在四川饭店吃过一次饭。廖沫沙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在1961年的9月以前，《前线》将开辟这个专栏的事，我是一无所知的。直到9月中旬或下旬，《前线》编辑部的工作同志来通知我：第二天的中午，邀请我到四川饭店聚餐。我也没有问过他们为什么、将有什么人参加。因为我本来是《前线》的编委之一，而且在此以前曾多次给《前线》写过稿；编辑部约请写稿人吃顿饭，在我的写作经历中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三十年代在上海，四十年代在桂林、香港、重庆，五十年代即解放以后在北京，我都被邀请参加过报刊出版社的聚餐，所以我对这类约会，一点也不感觉新奇。到时我就去了。在座的人并不多，邓拓、吴晗两位之外，只有《前线》编辑部的几位同志。入席以前，坐在沙发上抽烟喝茶，邓拓同志随便地谈起：《前线》也想仿照别的报刊“马铁丁”“司马牛”之类，约几个人合写一个专栏，今天就是请你们两位（指吴和我）来商量一下。听说“马铁丁”他们是三个人合用的笔名，我们也照样是三个人取个共同笔名；既是三个人，就干脆叫《三家村札记》行不行？

他们边吃边谈、东拉西扯，开起“无轨电车”来。直到吃完，才又回到本题；三人合用的笔名如何取法。最后确定一个人出一个字，吴晗出“吴”字，邓拓出“马南邨”的“南”字，廖沫沙的笔名是“繁星”，出了个“星”字，专栏的笔名就这样定了。至于文章的内容和写作方法，并没有作为议题加以讨论，只是相约：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宜，每期在《前线》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由编辑部的同志负责协调。这次聚会，就是后来被四人帮指为“三家村反党集团”的“秘密黑会”。

一个月后，即1961年10月，《三家村札记》在《前线》杂志刊出了。专栏一出现，就以其兼具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横生而大受党内外读者欢迎。

圣 人

从1961年3月到1962年9月，《北京晚报》的读者们以极大的兴趣阅读着《燕山夜话》这个新开的知识杂文栏目，倾听一个博学的、睿智的人同他们娓娓谈心。这个叫“马南邨”的人，他谈的领域是多么广泛，学习、工作、时事、哲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琳琅满目，几乎无所不包，真像一部“小百科全书”；他的写法又是那样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他谈天说地，说古论今，旁征博引，妙趣横生，时时给人以思想的启迪，知识的传输与阅读享受。每到星期二四，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去买新印出的一期晚报，他们和“马南邨”交了朋友。

周扬同志说：“就作品论作家，我以为最能表现邓拓同志思考风貌的不仅是他的政治和学术文章，而且还有他的杂文，尤其是读者所熟知的《燕山夜话》，”^①邓拓自己也说过：“我写《燕山夜话》都是谈所闻所感的。如果仅仅所闻，那只是录音机，必有所感，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成为有思想的东西。”诚如所言，《燕山夜话》最动人之处，就在于它对现实中丑恶的、错误的东西，发出了自己理性的声音。

^① 《邓拓文集》序。

有个时期，弄虚作假，强迫命令、滥用民力、瞎干蛮干的风气泛滥成灾。对此，邓拓写了一系列文章，引古证今，予以讽谏。《爱护劳动力的传说》，从春秋时代《礼记·王制》中提到的“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谈起，还引用古代政治家管仲的话：“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明确地提出劳动力本身也是最大的社会财富，“使用民力”要有“限度”，提出：“在农业上实行耕三余一，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上保持三年以上的积蓄，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这个问题上，彭德怀因为直言敢谏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贬斥，邓拓步其后尘，仍敢秉公直言，颇有点“迂”气。不仅如此，他还在《围田的教训》中指出：“围田在许多世纪以来已经有不少惨痛的教训，是稍读历史的人都知道的……围田和圩田等等都是与水争地，盗湖为田，其结果必遭水旱之灾”，“围田，那倒不如采用浮筏式的水上园田，即所谓架田，葑田等，完全不与水争地，却同样可以扩大耕种面积，增加农业生产，这比围田的效果要好得多了。”

对于林彪、康生等人怀着个人野心大搞“天才论”、“个人崇拜”，而最高领导人却对此缺乏应有警惕，邓拓深感忧虑。在《智谋是可靠的吗》一文中，他引用宋代范仲淹的儿子范尧夫劝司马光的一句话：“顾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从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说明个人智慧不如集众人智慧之可靠，一切都只相信自己，就容易造成一些吹牛拍马的人迎合邀宠”，造成闭目塞听，邓拓提醒人们：“有的人常常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不管什么事情，总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有这种毛病的人，如果自己不觉悟，不改正这种毛病，终究会有

一天要吃大亏。”

在《三种诸葛亮》中，他引岳珂《程史》中的典故，分析了三种诸葛亮：事前诸葛亮事后诸葛亮，和带汁的诸葛亮。人们常用“事后诸葛亮”来讽刺有些人事前不明事后明，邓拓从实事求是，注重实践的立场出发，指出事后诸葛亮还是有用的，最要不得的是“带汁的诸葛亮”，即那些不懂装懂，好吹牛皮，为天下人所耻笑的冒牌诸葛亮。他说：“人们总是把诸葛亮作为料事如神的人来宣传，其实，诸葛亮是人，不是神。诸葛亮的长处，在于他遇到了失败，决不灰心丧气，也不蛮干，而是注意调查研究，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承担主要责任。如果没有这么多次事后的诸葛亮，事先的诸葛亮就不会形成。在千变万化的客观事物面前，我们不必过分强调事前的诸葛亮，宁可多一些事后诸葛亮。有一种人，事前，以诸葛亮自居，大话连篇，成了‘三年早知道’；事后，哭鼻子抹眼泪，一副狼狈的面孔。这样的人，就是那种带汁的诸葛亮，过去有，现在也有，因此提出来，引起大家注意。”这样的议论，一针见血，用心良苦，至今读来，仍令人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胆识。

对当时社会上的“流行病”——说大话、空话、套话、好大喜功，虚报浮夸的作风，邓拓深恶痛绝。他写下《两则外国寓言》、《一个鸡蛋的故事》，用中外历史上的寓言、故事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遇事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话要说得少些，事情要做得多些，名声更要小一些。”在《三家村札记》里他还写了一篇《伟大的空话》形容有的人擅长于说话，可以在任何场合嘴里说个不停，真好比悬河之口，滔滔不绝。但是，听完他的话以后，稍一回想，都不记得他说的是

什么了，有人用了许多“大字眼”，“说了半天还是不知所云，越解释越胡涂，或者等于没解释。这就是伟大的空话的特点。”这样铮铮直言的文章，占了《燕山夜话》专栏的大部分。在写《燕山夜话》期间，邓拓给北京晚报的编辑写过一幅对联：“深入实际兼读史，立定脚跟做圣人。”他解释说：“我说的这个圣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圣人，就是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意思。要做圣人，就必须立定脚跟，要敢于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不做人云亦云、随风飘荡的轻气球。而要做到立定脚跟，必须深入实际，认真读书。只有植根于实际和人民之中，才能够不动摇。”做圣人，反映了邓拓不畏权势，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这是构成《燕山夜话》的风骨。邓拓曾引证过东林党人的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以天下为己任，从崇高的理想出发对社会弊端发出不平之鸣，正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

邓拓曾多次对《前线》编辑部的同志说：“我们搞研究、学习、写作，都是为了摸清客观规律，何必有私心？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为真理而斗争，为何不能为追求这个道——真理，为了寻求客观规律而献身努力呢？”

如果说，在《人民日报》时所负的巨大责任和紧张工作，使邓拓无暇对自己的一些想法进行梳理，也无从发表的话，那么，到市委后，天时、地利、人和，都给了他这样一个机遇，使他能运用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并通过一个相当平民化的报纸的一隅，将这些思考传达给大众，从而使他作为一个坚持真理的战士和探求真知的学者的一面，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杂 家

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一开始并不知道《燕山夜话》的作者是谁，但他看得出这位作者绝非等闲之辈。他评价道，这是“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独具一格”。

老舍先生真是慧眼识珠。邓拓写《燕山夜话》时四十八岁，已有近三十年学术研究和新闻领导工作的经验。他将广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高度的理论修养和精湛的写作才能熔铸在一篇篇千字文中，确实给人以厚积薄发，举重若轻之感，在当时的报刊上开了知识性杂文的先河。

《燕山夜话》所引的资料，从《四书》、《五经》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从历代笔记小说到诸子百家、正史、野史；从中国民间传说到外国寓言，可谓旁征博引。有人统计，“夜话”中引经据典达四百多处，而且都是原文，有明确的出处。因此编辑部同志猜想，邓拓一定像有的学者那样备有几大箱子抄录卡片。但他们亲眼所见却出乎意料：他在引用这些史料时，大都是凭记忆顺手拈来的，只是在没有把握时才翻一翻书，核对一下。一百五十三篇文章刊出后，对文中所引的大量史料，除一处有位读者来信提出质疑外，没有发生过差错，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一块瓦片》的写作过程最能体现邓拓这种非凡的写作功力。

一天晚上，几个晚报编辑在邓拓家聊天，一位同志说：“人们发言前都爱说‘我是抛砖引玉’，您是否能就‘一块砖头’发表点意见呢？”邓拓笑着说：“我的文章可连‘一块砖头’

还不如，只能算作‘一块瓦片’”。说到这里，他忽然打住，提笔飞快地写起来。大家一看，原来写的是自唐至明的六首咏瓦的诗。他说：“一说到瓦片，材料倒不少呢！光诗就想起这六首，至于瓦的材料就更多了。咱们这回不写砖头写瓦片，你们看怎么样？”

《一块瓦片》写成后，被《人民日报》副刊要了去，后收入《燕山夜话》合集。在这篇千字文里，竟采用了十四种史料，涉及三国、南北朝、唐、五代、宋、明、清等好几个朝代的史书、笔记、诗词、碑文中有关瓦的记载，那六首咏瓦诗也用上了，有的诗是鲜为人知的。小小一块瓦片在邓拓笔下，成了内容丰富的历史见证。

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下班后无所事事，意志消沉，轻易抛掷时光，有鉴于此，邓拓的《燕山夜话》开篇就是《生命的三分之一》，他从《汉书·食货志》中的“女工一日得四十五日”说起，历数古代政治家珍惜时间的故事，鼓励人们像古人一样，“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活着一天，总要尽量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浪费掉”。在文章结尾，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

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以它匠心独运的标题和发人警醒的立意吸引了广大读者。读者纷纷给报社来信，有的在信中说：“看了《生命的三分之一》，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每天都在浪费着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感谢作者给我们做了重要的提醒，我

们一定要加倍珍惜自己生命的三分之一，让它也发出光来。”

《燕山夜话》刊出的一年当中，编辑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读者的来信四百多封。人们在信中不仅谈自己看了“夜话”受到的启发和教育，还纷纷给作者出题目、找资料，提出自己的见解与作者交流。“夜话”的许多题目，就是应读者的要求拟的。一个报纸专栏在读者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一个作者被那么多读者引为良师和知己，这是非常罕见的。

除了针砭时弊、思考社会问题外，《夜话》、《札记》将传播知识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有人把这些杂文称为“历史随笔”，题材的广阔，几乎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哲学历史、文化艺术，天文地理、农桑医药、军事棋艺、风情习俗、史实掌故、花鸟虫兽等，充分体现了邓拓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杂家”的特色。

《贾岛的创作态度》、《杨大眼的耳读法》，是从文化史上的掌故，生发出一个道理；《北京劳动群众最早的游行》、《北京的古海港》、《米氏三园》，是对民俗学、地域学的考证；《南陈和北崔》、《宛平大小米》，则是描写艺术史上过往的书画家的事迹。这样的例子，在《夜话》、《札记》中俯拾皆是。有一篇题目为《平龙认》的文章，说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堪輿学”即风水问题。邓拓曾根据中国千年以前的一本叫做《平龙认》的堪輿书，得出了中国人早在八世纪就能分解出氧气，比欧洲人早了一千多年的论断。这本《平龙认》的作者，是我国一位并不著名的风水先生，由此可见邓拓的笔触是多么深广。

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刘福林，被《燕山夜话》所体现的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迷住了。他喜欢画国画，盼望能见到作者“请

他看看我画的画，直接听听他的指点”。他的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在报社同志的介绍下，他来到邓拓同志的家里，拿出自己画的兰竹梅菊四幅画向邓拓讨教。邓拓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工人家庭的孩子，从做人到画技用心指点了一番，还分别在四幅画题上了诗。“最是虚心留劲节，久经风雨不知寒”，这正是邓拓对青年一代的愿望啊！

邓拓教导青年要珍惜生命的三分之一，他写《夜话》，就是有效地运用时间的典范。他曾引欧阳修的话“吾平生作文章，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可以属思耳”，邓拓说，我们现在很少骑马，却无妨在路上、车上、船上等空隙构思。后来，他果真把这个想法写进《燕山夜话》，题目就是《新的“三上文章”》。

《北京晚报》的编辑回忆说，副刊必须在头一天预先拼好版，他们和邓拓约定，拼版时在右上角留出一千五百字的版面，他头天夜里把文章写好，当天一早由报社派人取回，看完后即发排上版。从此，一篇篇字迹潇洒清晰，资料翔实有据的《夜话》文稿源源不断地来到编辑部，一年半的时间，一百五十三篇文章，都是这样运作的，一次也没有误期。即使他到外地察工作，也都准时把稿件寄到报社。偶尔有二三次，邓拓由于工作太忙，头天夜里没有时间动笔，就在当天一早赶出来发到报社，从没有影响过报纸发稿。编辑们说，邓拓同志一再要求我们作“放心编辑”，而他自己就是“放心作者”。与这样的作者合作，是编辑的莫大享受。

受《燕山夜话》启发，许多报刊纷纷开设知识杂文专栏，有《人民日报》副刊的《长短录》，广播电台的《历史故事》、《阅读与欣赏》、《云南日报》的《滇云漫谭》，山东《大众

日报》的《历下漫话》等。

收 藏

1962年9月，《燕山夜话》刊出最后一篇《三十六计》后，突然停止了。许多读者写信给编辑部询问，这样一个广受欢迎的专栏文章，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对此周扬同志有一个解释

“……他在表达自己正当的不满时，仍然极力采取委婉的方式；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重新抬头的时候，他就搁笔不写《夜话》这类杂文了。”^①

10月，邓拓结集了《燕山夜话》合订本的最后一集（第五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在前言《奉告读者》中，他写道：“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还说：“前一时期写《燕山夜话》是被人拉上马的，现在下马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等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这是邓拓对读者的交待，实际上，他另有一些难言的苦衷。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邓拓所谓“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移，”指的是这一时期他所热衷的另一项活动：对中国古代书画的研究和收藏。

邓拓对书画研究的兴趣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了的。书香门第的严格家教，使他自小练就一笔飘洒、豪放的书体，后来

^① 《邓拓文集·序言》。

研究中国历史，接触到许多美术方面的史料，对我国历代绘画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在《燕山夜话》《书画同源的一例》中，他写道：“西洋的水彩画和油画等，显然与西洋各民族的文学没有很多共同之点；而中国传统的绘画和书法，却有很多相同之处，甚至于写中国字和画中国画，在用笔的方法上，简直如出一辙”。大概就是这书画同源之故，邓拓在潜心研究书法的同时，对历代的绘画艺术作品产生了深深的兴趣，兴致来时，也挥毫画上一幅。

疾病也是他从事绘画研究的一个原因。因工作劳累过度，他患有严重的偏头痛，每当病情发作时，读书都有困难，他常用梅花针扎自己的颈部，以至渗出片片血迹。每到这时，他不甘心把时间白白浪费掉，就用欣赏和研究古代绘画来代替读书。哪知越钻越深，兴趣越来越浓。他曾风趣地说：“从事画的研究，好处很多，一能丰富知识，二能开拓眼界，三能振奋精神，四能治疗偏头疼”。

邓拓胸中孕育着一个宏大的设想——撰写一部图文并茂的中国绘画史。

要完成这样一部专著，单凭现成的资料和分析显然不成。邓拓说：“中国历代的绘画，艺术水平是很高的，但如果只从艺术角度去看，还远远不够。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绘画本身就是活的历史教科书。因为画面反映的，是当时当代不同阶层人物活生生的写照，是社会状况的缩影。当然，也体现画家本人的精神境界和艺术风格，由画面再及于所用绢丝、纸张、墨质、颜料，还可以观察出生产力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真是一‘研’多得啊！”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邓拓着手搜集古代名人字画。他收

藏文物古画有三条原则：

1. 凡国家需要的，他绝不收藏；
2. 凡属于争论较大的作品，国家文物部门不肯接受的，尽可能加以收集保护；
3. 凡个人收藏，都用自己的钱，绝不动用半文公款。

为此，他花费了大量的业余时间和相当一部分经济收入。在建国初年改工资制时，原拟给邓拓定为三级，邓拓主动降了一级，这个工资级别一直延续下来。在这个多子女的家庭里，邓拓首先要承担为人父、为人夫的责任。他将工资“上缴”丁一岚作为家用，其余的，诸如稿酬、人大代表津贴、学部委员津贴等，则全部用来买画。他写《燕山夜话》共得二万多元稿酬，全都换成文物和古画了。有时遇到珍品，尽管囊中羞涩也志在必得，这时，就不免要“侵犯”妻儿的利益了。1960年丁一岚下放劳动回来，发现与婆婆第一次见面得到的见面礼——一只宝石戒指不见了。一问，又是换成那种黑乎乎的古画了。一岚真是哭笑不得，对他这种收藏癖，一岚难免有点不满。见他把钱都用在买画上，连一件好点的衣服也舍不得买，一岚打趣说：“待有客人来，你就把宋画挂在前面，明画挂在后面，当衣服穿吧！”有的朋友见邓拓搞收藏，个人没有存款，手头经常拮据，劝他要给孩子留点钱。邓拓总是说：“孩子将来可以自立。”

几年下来，邓拓陆续购买了二百多幅古画，其中有倪瓒、徐渭、朱耷、沈周、文徵明、石涛、唐寅、仇英、郑板桥、李鱓、弄等人的作品，他的藏画自五代至明、清，特别是元明以后的作品，各种画派纷呈，基本具备了一个反映我国绘画传统的大致轮廓。

邓拓边收藏、边研究，他与北京的吴作人、周怀民、黄胄、许麟庐，上海的谢稚柳、唐云，辽宁的杨仁凯等画家、收藏家过从甚密，常在一起交流藏品，观赏切磋，为写作收集资料。有同志、朋友来访，他总是挂出自己的藏品，让大家一起欣赏。1961年以后，邓拓先后写了《鉴赏新罗山人作品的感受》、《从石涛的一幅山水画谈起》、《郑板桥和板桥体》、《李鱣和他的山水画》等画论。由于“文革”骤起，邓拓未能实现他的夙愿，完成《中国绘画史》这部专著，为我国绘画史研究留下一个很大的遗憾。

邓拓藏有一幅公元十世纪五代南唐大画家周文炬的《太真上马图》。这幅画曾被国家有关收藏部门判为伪作。邓拓仔细研究了各种历史记载，从周文炬的师承流派，行笔技法、装点设色，绢丝质地，一一进行考证，判明确出自周文炬手笔。他把自己的考证结果写成文章，连同原画发表在1959年第8期的《中国画》上。

更为人们口口相传的，是他对苏东坡《潇湘竹石图》的抢救。

1961年的一天，他从老画家周怀民、许麟庐处得知，四川一位白姓老人拿来一幅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苏轼工诗、擅书、能画，人称“三绝”，但苏画早已失传。这幅画是真是伪，引起收藏家的争论，荣宝斋画店怕是贗品不敢收购。邓拓仔细辨认之后，认为虽然一时还不能下结论，但从画的风格、气势、纸质以及画面上自宋以来二十六家的题跋来看，这幅画很有可能是苏画真迹。他决心倾囊相购。卖主索价很高，邓拓拿出平日积存的全部稿费，再由画店从他那里选取二十多幅古画，作价五千元，才买下了这幅画。有人问他，为一幅有争议

的画花这么多钱值得吗？邓拓说，苏东坡传世之作仅存两件，一件已于战乱时被裹挟到日本，这件如不买下来，很有可能使苏画最后一件真迹流失他乡。为了确证画的真伪，他从历史博物馆借来历代丝绢织样，从作品绢底的织样到笔法、金石、题跋等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半年后，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阐述了自己的鉴认与论证。1985年，经中国文物鉴定小组几位知名专家鉴别，终于确定此画是苏轼的亲笔之作。邓拓在二十多年前慧眼识珠，为祖国的绘画宝库抢救了一件稀世珍宝。启功先生有言：“豪举也罢，痴举也罢，在对民族文化有深厚感情的人说起来，这个举动的艺术并不减于一卷苏东坡墨竹！”^①

谁知，邓拓对古画文物的收藏，却招来一些人的非议，说他是“玩物丧志”，有人还心怀叵测地上告。有位领导人说：把藏画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嘛！其实，邓拓早在收藏之初就说过这样的话：“我搞个人收藏，并不单单出于个人爱好，也不把它当成财产，到了一定的时期，自然捐赠国家。”1960年，邓拓赋诗言志：“八百年间古帝都，石渠秘籍继河图。丹青旧迹嗟零落，翰墨奇缘意婉愉。心爱斯文非爱宝，身为物主不为奴。”这首诗，是邓拓收藏品格的最好写照。早在张家口解放不久，他就将在紧张的游击战争中艰苦收集到一批文物，包括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的出土文物和山西高县古城村汉墓出土文物捐献给当时的华北博物馆筹备处，后运到北京交历史博物馆收藏；五十年代他为研究资本主义萌芽而收集的大量重要实物资料，包括大量契约文书、家谱、账簿、诉状、窑图以及宋代女词人

^① 《谈邓拓同志的书法》。

李清照的画像等，也都捐献给了历史博物馆。1964年，他将个人所藏的最好的一批古代绘画共一百五十四件，包括用重金购得的《潇湘竹石图》在内，裱糊得干干净净，开列出目录清单，注明年代作者，无偿地捐赠给中国美术家协会。自己只留下少量还有争议的作品，如周文炬的《太真上马图》，准备作进一步研究之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弹劾邓拓“玩物丧志”的人，正是觊窥文物、欲据为己有的小人。文革中，邓拓收藏的文物被抄，林彪立即将《太真上马图》攫去，他窃取邓拓的文物书画共达二十二件，仅字画就占十一件；步林彪后尘，陈伯达、江青、姚文元以及黄、吴、叶、李、邱等人，都纷纷把手伸向邓拓多年的收藏，随意拿走许多宋、元重要的古籍抄本和字画。尤其为人所不齿的是那个不学无术的江青，在拿走了许多重要文物的同时，还特意抄走了其实并无多大价值的《清代帝王后妃年表》，暴露了她日思夜想的女皇梦。

相 知

邓拓到北京市委以后，作为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书记，他与北京的文化界人士自然会有密切的交往，作为一个诗人、书法家、艺术评论家，他懂得诗书画创作的甘苦，与文艺家、书法家有着相同的趣味、爱好和兴致，同他们中的许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段时间，是邓拓的诗词创作大量收获的时期。广泛的社会活动中，他常被邀书写题诗，每参观和出差到一个地方，也

常有借景抒怀即兴之作。1960年以后，他几度到江浙、粤桂、内蒙等地，写有《江南吟草》、《南游未是草》、《内蒙吟草》等记游组诗。而最能体现邓拓文心诗心的，还有他这一时期的“题画诗”。当时的报刊上，常有“一诗一画”，“诗配画”的栏目，邓拓先后以左海、高密等笔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前线》等报刊上为不少画家的作品配过诗，这些画家有吴作人、周怀民、华君武、蒋兆和、董希文、叶浅予、黄胄、郁风、张彤云、许麟庐、赵丹、汪慎生、刘旦宅、李克瑜等，他们中有的已享誉画坛，有的是初出茅庐。

1963年2月，邓拓在元旦喜得赵丹《雁荡纪游图》，他欣然命笔，作《赠赵丹同志二十韵》：

赵丹自昔多才艺，侠骨豪情志不移。银灯照耀三十载，声誉飞扬中外知。……我爱阿丹画，时时惹梦思。今逢元旦欣相见，把手欢谈不觉迟，猛忆浙游过雁荡，峰峦突兀胜九疑。愿得壁间一幅山水图，使我梦游其中坐卧复吟诗。阿丹闻我语，慷慨不推辞，遂就案头纸，走笔若龙蛇。中峰悬腕力透纸背有如疾风与骤雨，气势磅礴墨淋漓！霎时龙湫飞瀑来天际，看图更比登临危；恍惚纵身攀绝壁，奋翅盘旋上高崖；又如腾空逐飞鸟，白云深处相追随。我见阿丹用笔、用墨、忽徐、忽疾、或浓、或淡、变化复杂而迅速，益感艺术创作非有过人精力全神贯注不能为！古今画法数十种，终以造化为之师。石涛、雪个、浙江、石溪俱往矣，未来画苑奇峰突起应可期！

这首洋洋洒洒三百多言的长诗，时而叙事，时而评说，时

而赞叹，神形兼备地写出了赵丹这位艺术家的画品、人品、读起来宛如白话，琅琅上口，很能代表诗人师法古风的艺术特色，也流溢着作者充沛的情感。

1961年4月，邓拓为画家吴作人的画《万年红》题诗：“北国飞霜雪，群芳凋谢时；奇花称一品，热血感三仪”……1963年吴作人将病中所作《漠上图》赠予邓拓，邓拓“一再展玩，不忍释手”，在卷末题下长句三十三韵，赞颂了草原上负重跋涉的驼牛风格：“双峰高耸多负重，货物如山车斗量。曲颈微伸八九尺，铜铃在项响叮当。通体紫毛好容色，轩然大步列成行。奔走砂岗与浅水，身随起伏而低昂。大漠流沙如沧海，无边波浪对茫茫。自昔沙陀苦征战，调兵遣将动四方。金戈铁甲悬绝地，五更鼓角声悲凉。东驰西骋突围去，凌霜踏雪冒刀枪。或逢炎天鼻出火，缺粮连日断壶浆；或遇绵绵久阴雨，周身湿热窠生疮。陇西明驼今有幸，天苑银河任徜徉。”并赞吴作人：“作人虽抱病，笔墨倍生光。立意造型与结构，贯通国画融西洋。继承传统兼新创，线条渲染柔中刚。尤爱画漠上，景色莽苍苍。归来每展卷，喜极辄若狂。”

这首诗，表达了一位诗人和一位画家之间那种相知甚深的情意。六十年代初吴作人的几十幅画作，都请邓拓配过诗。邓拓曾为当代的许多老画家如王友石，钱松壑写过画评，他的最后一篇因受迫害未及发表的遗作，就是《吴作人的艺术生涯》，在这篇文章里，他肯定了吴作人油画的中国特色，称之为“中国学派”的油画。1962年春吴作人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水墨画《黑天鹅》，邓拓用《秋波媚》词牌题道：

“雍客闲雅泛涟漪，红啄黑绒衣。几声密叫，两丛新

苇，未解双飞。连天冰雪离乡士，何幸到京师？春风吹梦，湖波送暖，惟我先知！”

谁知“文革”之始，这首优美的咏物抒情诗却成了邓拓的一大罪状，因打头一个“黑”字，被诬为“黑画”、“黑诗”，并说什么“惟我先知”指的是反革命的先知先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邓拓和吴作人都因此罹难。然而，就在邓拓决定以死抗争的前几天，他也没有忘记同甘共苦的老朋友。五月中旬的一天，他给吴作人家打过一个电话。三十一年后，老画家吴作人也已辞世，吴夫人萧淑芳回忆起这个“最后的电话”说：“邓拓的电话是我接的。其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意是他喜欢我画的花卉，要我以后多多作画。他语重心长地要吴先生和我多多保重，要对周围的事物看得开一些，远一些。”几天以后，就传来邓拓含冤而逝的噩耗。这个电话的秘密，夫妻俩曾长时间埋在心底，不敢对外人提起。在漫长的岁月中，吴作人夫妇每忆及这个电话，就感铭于内，唏嘘不已。

邓拓与老画家周怀民也有一段珍贵的友谊。周怀民对中国古代绘画造诣很深，邓拓常常向他请教，发现一些比较好的古画，就约请他来一起研究鉴赏。有段时间邓拓也想尝试画画，周怀民热情地予以指点，成了邓家的常客，有时晚了，就与邓拓一家人共进午餐或晚餐。周怀民的画时代感很强，邓拓常为他的画题诗。1960年周怀民作大幅山水写意画《十三陵水库》，邓拓特地写一阕《水龙吟》：“群山环抱平湖，碧云绿水江南景，飞来北国，妆扮原野浑成妙境。……”

“文革”开始后，周怀民因与邓拓交往比较密切，多次被抄家、批斗，他收藏的古画和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没收，邓拓给

他的题诗许多被撕毁了。恶梦结束后，丁一岚去看望周老，他颤颤巍巍地把冒着危险保存下来的一些被撕成碎片的邓拓题诗送还给一岚，一岚双手捧着这些碎片，感受到老画家对丈夫的一片深情。周老与邓拓一家的友谊，整整持续了四十多年。

敦煌学专家常书鸿，也在心底珍藏着对邓拓的一段美好回忆。那是1962年12月，常书鸿在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后，邓拓特地派车将常书鸿接到家里，请他鉴定自己收藏的几卷敦煌写经，并为之作跋。邓拓对这位为保护文物在大漠中艰苦工作了二十年的专家，十分敬重，礼遇有加。更令常书鸿感到意外的是，当他离京的前一天晚上，邓拓同志亲自来到他住的北方饭店看望他，邓拓一步一步走上狭小的楼梯，来到他的房间，递给他一卷字，并说：“这是我对您二十年在敦煌艰苦工作表示的一点敬意，祝你健康长寿，在敦煌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果！”常书鸿为邓拓诚朴而真实的行动，感动得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展卷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危岩千窟对流沙，廿载辛劳万里家，发蕴勾沉搜劫烬，常将心力护春华。”

常书鸿没有料到，还有像邓拓那样的有心人，选择他在敦煌工作二十年的纪念日送来这样一轴题诗。他把这看成对自己莫大的鼓舞和鞭策。回到敦煌莫高窟的中寺，他把这卷宝贵的卷轴挂在小小办公室仅有的一块没有被煤烟熏黑的土墙上，让它日日夜夜陪伴着自己，给自己力量。在“文革”中，面对非人的打击和折磨，他常像一头失魂落魄的动物一样，独自跑到戈壁滩上，在黑夜刺骨的塞外寒风中把自己埋在沙土里，以求得片刻的宁静和休息，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远方的朋友。1975年他困守金城（兰州），夜不能寐，想到邓拓诗句，伴着依稀可

闻的莫高窟风铃声，他步原韵和道：

危崖千窟对流沙，卅载辛劳万里家。
金城夜夜听风雨，铁马叮当入梦赊。

在邓拓的一生中，这种文人相惜，诗友相和，书（画）友相谐的佳话，还不知有多少。从中我们可感受到他趣味的高致和为人的诚朴，这在政务缠身的高级“官员”当中是颇为独特和难能可贵的。

琴瑟

1960年，丁一岚结束了在建明公社的劳动。她不愿再回留下不愉快记忆的广播局总编室，调到对外部办公室担任主任，兼管专家工作室工作。1962年才获彻底平反。

经过一场磨炼，一岚显得更成熟了。她继续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人民广播事业中去。她的组织才能和灵活应变的秉赋在新的工作中得到很好的发挥。对外广播对一岚来说是个新鲜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一岚以她一贯乐观宽厚的性格与业务干部们形成很好的配合关系，边干边摸索。当时的广播事业局有三十多位外国专家，与这些专家的联系也由一岚承担起来。为了使专家更好地了解中国，他们每月举办一次讲座，向外国专家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经济建设发展情况。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的对外联系逐渐扩大，广播局也不断增加新的语种节目。六十年代中期已达到三十多种外语，工作有序地

向前发展着。

这几年，他们的家庭生活也是比较平静的。邓拓在《人民日报》时，常常要上夜班，几乎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可言。离开报社，闲暇多了，待在家里时间也长了一些。晚上邓拓在书房中读书写作，吟诗作赋，挥毫泼墨，而一岚，似乎又回到了晋察冀边区的那间温暖的小屋，她为丈夫研墨、抻纸，邓拓写字时，她就站在一边，欣赏如龙飞凤舞般潇洒不羁的墨迹从丈夫笔端流泻出来，似不经意间却横竖成行，美轮美奂，她看得呆了，感到极大的艺术享受。她佩服丈夫对事业的忠诚和坚定性，也深深地为他那博大精深的才艺所折服。这种骄傲和喜悦始终伴随着一岚的感情生活。而邓拓也深为自己拥有一位美丽贤惠，善解人意的妻子而自慰。他深知妻子虽是一位贤妻良母，她的价值却不仅属于家庭。他始终非常支持妻子的工作，让她作为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和职业女性的个性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

这一阶段，一岚倒是有些为丈夫担心。经过几次运动，一岚也感到“言多必失”“祸从口出”的厉害。邓拓那些经常见诸报端的“夜话”“札记”，虽说出了人们心头所想，虽然是以一种委婉、说理的语气和风细雨般道出的，但一岚毕竟觉出了它们的分量；此外，习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一岚，对文章中一些说古论今，看似闲情逸致的东西，也觉与当时的气氛多少有些不合。这种种担心变成一种经常的提醒和规劝，它是否使得邓拓下笔时更加谨慎，是否促成他后来终于搁笔，不得而知。不久以后一岚的担心终于变为可怕的现实，却是历史留下的赤裸裸的真实和极大的遗憾。许多年以后一岚说道：多年的夫妻，我当时却并没有真正了解邓拓。人们只看到邓拓儒雅书生温良

恭俭让的一面，对他内心那种坚持真理的巨大激情和勇气，却很少注意。我也是在后半生才渐渐体味、悟出这一点的。

舐 犊

邓拓在家务上是笨拙的，在管孩子上的记录也常常伴着一些笑话。比如，阿壮小时候很淘气，有一次惹得一岚生气要打他，邓拓用作报告似的口吻说：“没有原则性的错误，就不要打孩子嘛！”又比如，岩岩一次感冒发烧要送医院，邓拓大夏天用棉袄棉裤给孩子穿了个严严实实——这种书呆子气常弄得一岚哭笑不得。报社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则佚闻：当年下了夜班的邓拓回到家，竟分不清两个年龄相貌相似的孩子哪个是老四、哪个是老五！好在家中有保姆、炊事员、警卫员，在女主人一岚统领下，一大家人的生活倒也安排得井井有条。

虽不谙生活琐细，邓拓对儿女的舐犊之情，却是处处流露言表的。小虹五六年级时爱上了写大字。邓拓非常满意自己的书法爱好能被这个聪明漂亮的女儿继承。他到处为女儿收集字帖。一些古帖上有封建糟粕的内容，怕对小孩子影响不好，他就亲自一字一字地裁开，再重新组合贴成一本适合孩子用的字帖送给女儿。为了给女儿买一只特别的墨盒，雅好搜古的邓拓带着小虹可着京城转了三四家古玩店，最后在银锭桥下的悦雅堂买了一只圆圆小小的铜墨盒，上刻“清谥”二字，显然是清宫的东西。这只铜墨盒成了小虹的心爱之物，日后她带着它上延安，下武汉，从未中断过练字，至今仍珍藏在身边。

小岚在小学时看了苏联舞蹈家乌兰诺娃的表演，迷上了芭

蕾，上初中后一心想考舞蹈学校。那时一岚正因“右倾”下放到建明农场劳动，邓拓需暂时代替“母职”。他并不很希望小岚从事舞蹈职业，但也并不强迫她放弃自己的兴趣，还用毛笔画了一幅芭蕾舞演员的速写画送给女儿。

小岚听说沈阳舞蹈学校正在招生，便和爸爸商量要去投考，邓拓也想趁此机会让女儿闯练闯练。他与沈阳的老战友联系，并买了车票，亲自送女儿远行。尽管有老战友照顾，小岚毕竟只是个初二的学生啊！邓拓放心不下，又亲笔写信给小岚：

“小岚：接到你的第一封来信，实在像黑夜里盼见了星星那样地高兴啊！……这是你选择自己前途的极重要的时刻啊！我亲爱的孩子！你一定要以自己的聪明智慧，翻来覆去地从各个方面仔细考虑，正确地安排自己要走的道路。比如说，你本来最喜欢芭蕾……如果你要学舞蹈就应该学芭蕾，其他舞蹈就不要勉强凑合。学芭蕾假如不够条件也不应该勉强。你年纪很小，很多事没有经验。你要知道，如果选择学习的时候不慎重，将来年纪大了要改行，就太苦恼了。我希望你能选择一个在各方面都比较适合的学习道路，使你的一生能走一条适合社会需要也符合你自己愿望的最好的道路。你说我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呢？”

邓拓对一个仅十几岁的女孩子，这样平等地对话，循循善诱地谈心，使得当时还十分幼稚的小岚深深感到父爱的温暖。后来小岚经过认真思考，终于接受了父亲的建议，重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高中毕业时考入清华大学。

小岚何其幸运！这封信是邓拓惟一一封写给子女的信。他

太忙了，教养子女的责任主要由一岚承担。这封信小岚一直珍藏着。重修邓拓故居时，她把信捐献出来，陈列在纪念馆里。

不知不觉间，长子小云也长大成人了。

小云是个天分很高，并不很循规蹈矩的孩子，虽自小身体孱弱，但他活泼好动，在男二中走读时，常有淘气的事情发生。为了多给儿子一些约束，邓拓和一岚将他转到远在海淀的北京一〇一中学，这是一所有革命老区传统的寄宿学校，校风整肃。小云在这里，个性和潜质得到健康、充分的发挥。他有很好的歌喉，却从不张扬，连父母都不清楚。一次校庆，他在校史联唱中担任领唱，令几乎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他的体育才能也令人刮目相看，田径运动会上，他总能为班级学校争得荣誉。运动使他摆脱了童年的病弱，长成一个高大壮健的小伙子。

1965年7月，小云该高中毕业了。他填了高考志愿，第一是哈尔滨军工大学，第二是大连海运学院。小云从小就向往着当军人、当海员，他憧憬着自己成为一名英武的军官，神气的舰长，纵横驰骋在蓝色的海疆的情景。然而等待着他的是更大的幸运：这一年空军在毕业生中招飞行员，经过异常严格的文化、素质、体能考核，层层筛选，邓云成了海淀区仅有的三名合格者之一。

对于一〇一中来说，这也是个莫大的荣誉。建国后这个学校还是第一次向空军输送一名飞行员呢！全校举行欢送大会，要小云在会上讲话。小云回到家，问父亲该讲些什么。邓拓沉思了一下，对儿子说：“现在帝国主义还在进行着侵略战争，世界上很不安宁。你要学习白求恩大夫，做一个国际主义战士，随时准备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支援世界上的被压迫人民。”小云在大会上发言时，脑海中还映现着父亲说这些话

时那充满热情期待的目光，在以后几十年的生活道路上，这目光始终伴随着他。

新飞行员要出发去保定航校受训了，邓拓和全家到火车站送行。小云紧紧靠着父亲穿过车站天桥走向站台。车站上彩旗纷飞，锣鼓喧天，到处是热烈欢送的人群。年轻的飞行员——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当小云他们一出现在站台上，立即被热情的人群簇拥起来，人们把他们高高举起，托过头顶，赞美和祝福的话语此起彼落。看到这情景，邓拓感慨万千，他对儿子说：“当年，我们参加革命要背着家里，偷越敌人的封锁线，千辛万苦去找党，找革命队伍，随时都有被捕、监禁、牺牲的危险。今天，你们参加革命，人民敲锣打鼓地欢送，你们多幸福哇！干不好那可对得起谁呢？”

参军三个月后，小云的部队路过北京，邓拓和一岚到车站利用停车的一个小时看望儿子。小云大步跑上前，向爸爸妈妈敬了个军礼。看着儿子那英俊潇洒的模样，邓拓高兴地大笑起来，握着小云的手说：“不再是孩子啦！是个大人啦！是个解放军战士啦！”他认真听中队指导员介绍爱子在部队的情况，又对小云说：“不要骄傲自满，不要搞特殊化，不要只和几个干部子弟在一起，要和大多数工农子弟搞好团结，学习他们的好品质、好作风。你有点散漫的毛病，要多读读《反对自由主义》。”

尽管使用的时代语言不同，但这殷殷父爱，与邓鸥予老先生当年送子健离家求学时的情景是多么相似啊！

列车缓缓启动，载着小云奔向远方，留在月台上的爸爸妈妈招手的身影，逐渐变小、消失了。这时的小云却不会想到，这竟是与爸爸相见的最后一面；邓拓和一岚也不会想到，巨大

的恶运正悄悄地向他们袭来。

第九章 断骨留魂证苦衷^①

山 雨

1962年，随着国际国内一系列事态的变化，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重新抬头，使得邓拓不得不采取审慎的态度。《燕山夜话》对某些人习以为常的思想陋习和“左”的弊端时有针砭，自然会引来一些人的不满；1962年社会生活气氛已不像前二三年那样宽松，更容不得这些鲜明有力的文字。“夜话”中止后，他又为《三家村札记》专栏写过十几篇随笔文章，但已“没有《燕山夜话》的文章的辛辣淋漓，议论风生的特色，也不像《三家村札记》中《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一类文字那样笔意纵横，明快和深刻。到了1964年，当江青一伙抡起文化专制大棒时，他的写作活动保持着一时的沉寂。”^②在多变的政治风云中，一个屡经风浪，连连受挫，又已留下了大量真情谏言文字的作者，“由委婉的方式到最后不得不采取的沉默，是

^①邓拓《颂山茶花》。

^②王必胜《邓拓评传》。

作者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①

1962年9月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即“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同志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结果，林彪、江青、康生等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便以为有可乘之机。一场大灾难，大动乱正在酝酿之中。

邓拓对林彪、江青一伙大搞现代迷信，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鼓吹“天才论”、“顶峰论”，推行一套庸俗的作法是很反感的。1964年3月他到内蒙召开会议期间，多次同《包头日报》的同志谈报纸宣传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雷锋，既不能那么玄，又不能庸俗化，不要贴标签。一方面要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方面也不要轻易把一些事，都说成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②在另一次会议上他还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形而上学，不要繁琐。现在有些人老是这儿念一段毛主席的话，那儿念一段毛主席的话。我们要具体分析毛主席的话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什么情况下讲的，不要死抠字眼。学毛主席著作主要领会精神实质。”^③

他当时却不可能想到，与林彪、江青一伙的分歧，已不是什么思想方法、思想路线之争。这伙野心家窥视的是最高权力，一场亘古未见的文字狱已拉开了大网。

^①王必胜《邓拓评传》。

^②转引自1966年5月28日《内蒙古日报》。

^③转引自1966年5月21日《中国青年报》。这些日后被作为批判材料的言论，正体现了邓拓独立思考的勇气。

早在1963年5月，时刻都在梦想“露峥嵘”的江青，就在张春桥之流的帮助下，炮制出一篇批判廖沫沙同志《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对此她自己说是跑到上海请“支持我们的”人“帮助组织”“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作为“攻”北京的一颗炮弹。从此，她频频往来于京沪之间，与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沆瀣一气，密谋策划。

1965年底，“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帷幕，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祭旗的是民主革命时期就追随共产党、追求光明的历史学家吴晗。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这篇异乎寻常的奇文，邓拓耐着性子读了两遍。他感到，此文根本不是在谈历史和戏剧，无非是借海瑞戏为由头，扣个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在那装腔作势的文风，咄咄逼人的架势里潜伏着一股杀气。

当时，吴晗曾愤愤不平地对邓拓说：“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鸣。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试问，我的剧本写在庐山会议之前，当时既不知道彭德怀同志要被罢官，又怎么能未卜先知地影射1962年才发生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呢？岂非神话！”

邓拓同情地望着这位蒙受冤屈的老友，只能默默地点头。吴晗的话无疑是对的，只是仍未脱书生生意气。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邓拓感到姚文元来头很大，有恃无恐。

实际上，最先提倡学习海瑞精神的，正是毛泽东同志本人。1959年初，毛泽东在上海看了湘剧《生死牌》后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海瑞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中央书

记处的胡乔木同志找到专攻明史的吴晗，请他给《人民日报》写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吴晗很快写出《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后来，又应北京京剧团马连良等人的再三约请，写了剧本《海瑞罢官》。这出戏上演后，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他在家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请他一同吃饭，连说：“戏好，海瑞是好人。”

谁知，1962年以后，江青、康生不断向毛泽东进谗言，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与彭德怀问题有关，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后来还是被“说服”了。他支持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但对姚文元的文章仍感到不满，认为没有打中要害。1965年12月他约陈伯达等人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就使《海瑞罢官》的问题具有更加严重的政治性质。

姚文元文章的发表，在社会上尤其是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人们对姚文元这种捕风捉影，恶意中伤的恶劣行径普遍不满，短时间里《文汇报》编辑部收到三千多件来信来稿，批驳姚文元的谬文。在《文汇报》组织的讨论中，经学专家周予同说：“姚文元的文章是乱箭射人。”历史学家李平心认为：“姚文元说旧时代的清官比贪官坏，是荒诞不经之论。”元史研究专家翁独建教授义正辞严地指出：“姚文元最后一段议论提出《海瑞罢官》影射现实，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和秦桧陷害岳飞的理由一样。”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彭真和北京市委坚决抵制姚文元的文章，通知北京的报刊一律不予转载。毛泽东下令上海将姚文印成小册子，向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征求订数，北京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不作答复。僵持十九天之后，《人民日报》被迫于1965年11月30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但加了一个经周恩来同志修改的“编者按”，强调要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开展多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指出：“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根据这个方针，北京的各大报纸在转载姚文之后，相继发表了许多观点不同的学术文章。

1965年12月，邓拓主持市委大学工作部召集的文科大学学生座谈会，他在会上说：“思想要解放，写文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你的观点是与姚文元不同，不要怕与吴晗有共同点，不要怕扣帽子，要摆事实，讲道理，力求创造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空气，改变过去讨论中的紧张气氛。要养成畅所欲言的习惯。自己是怎样的想法，就怎样写，不要有顾虑，不要一边倒。”^①在《北京日报》的一次会议上，他又说：“《海瑞罢官》首先要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不要扣大帽子，要用商讨的语气，可以说吴晗错的地方，也可以举出他对的地方，对姚文元也一样。”^②他还叮嘱《前线》编辑部的同志：“要培养良好的风气，把不好的风气慢慢扭转过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

^①转引自1966年5月23日《北京日报》。

^②转引自1966年5月14日《中国青年》。

等，都有发言权，不能一批评就不得了。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这些话，表现了他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宣传家坚持真理的勇气。顶风而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尽力作一点拨正的工作。

同时，邓拓以向阳生为笔名发表了《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这篇文章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以李东石为笔名发表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等，都是力求把这场批判引上学术讨论的轨道，对姚文元生拉硬扯，无限上纲的错误作法进行了抵制。孰不知，正当他们和一些专家学者认真写作学术争鸣文章的时候，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磨刀霍霍，一场大规模的思想“围剿”开始了。大批知识分子被诱入他们设置的陷阱，遭到残酷的迫害摧残。翦伯赞、李平心等许多为吴晗说过公道话的历史学家被定为“右派”，遭到批判斗争；在舞台上演过海瑞的演员，甚至对《海瑞罢官》表示过称赞的人，都被株连批斗。这就是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利用《海瑞罢官》对人民进行的封建法西斯专制，施行“钳口术”，从此造谣诬陷成风，全国思想界万马齐喑。

邓拓是研究历史的，对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灾难和教训有着深刻的了解，对多年以来逐渐酿成的不正常的政治空气他早有察觉。那些日子，对电影《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戏曲《李慧娘》、《谢瑶环》和其他一些文艺作品的批判，对学术领域一些哲学、历史理论问题的批判，调门越来越高，口气越来越硬，帽子越来越大。随着批判和专制的不断升级，邓拓的战友、笔友和朋友，一个个被戴上“修正主义分子”、“反

党分子”的帽子，他为他们的遭遇感到委屈和悲哀，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感到担忧。他明显地更加消瘦了，受过伤的腰部阵阵作痛。夜里，他难以成寐，常常被噩梦惊醒。在那难熬的长夜中，他写过一首《记梦》诗，曲折地表达了当时的心情：

五更风雨梦如飞，烟水苍苍夜色微。
话到海山无滴泪，写来笔墨不沾衣。
高情消尽千秋怨，碧血凝成万古诗。
默向长天寻新路，霞光芳雾映春晖。

在这风雨如晦的时候，他仍向往着春天和光明，探寻走出困境的新路。然而，诗中已明显透露出感伤和悲凉的心绪。

此时，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正在加紧酝酿之中。

风 暴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从《海瑞罢官》发难，借《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把邓拓、吴晗、廖沫沙打成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接着上追后台，下扫“牛鬼蛇神”，先砸烂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继而矛头直指“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搞乱全国，揪出所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经过周密思考的一套完整的“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

1965年，中宣部的内部刊物《思想界动向》转载了邓拓的《专治健忘症》，似乎是一个信号。《三家村札记》的三位作者，一个是北京市委书记，一个是北京市副市长，一个是北京市统战部长。他们的党政职务，正是林彪、江青一伙搞阴谋最有用的东西。他们精心擘画了“三家村”的角色安排：吴晗是“开路先锋”，廖沫沙是“执鞭”的“兄弟”，邓拓是领军的“主将”。他们又说，“将”上面还有“帅”，企图借此名目大兴问罪之师，把北京市委置于死地。

4月，北京市委传达中央精神，要公开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讨论的时候没有几个人发言，会场冷冷清清。大家都对这次要兴师动众进行大批判很不理解。尽管如此，以彭真、刘仁为首的北京市委还是遵守党的组织原则，按照中央的指示去做了。16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以三个版的特大篇幅和通栏的黑体大字标题刊登了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材料，并且加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进行批判。邓拓本是主管《前线》的文教书记，这样的批判是令人极为难堪的。彭真同志在材料刊出后亲自打电话给邓拓，劝他不要紧张，要正确对待，严格要求自己，还劝他保重身体，注意健康，将来还要做很多工作。刘仁同志也派人专程来看他，安慰他，让他冷静对待。邓拓衷心感激同志们的深切关怀。这两位老上级，话语不多，却如雪中送炭，使邓拓感受到战友间同舟共济的情谊。但是回到家里，孤灯静坐，却怎么也平息不了满腔压抑、委屈和激愤的心潮。

一天，杨述同志来看他，谈到眼前风云，两位老战友心情都很沉重。邓拓抑郁地说：“我做一年以后再弄清问题的准备。”杨述摇摇头说：“我看这一次可能会长些，可能需要二

三年吧！”这两位具有高度学识水平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这次都不免估计得太乐观了。对这场正在开始的旷日持久的历史悲剧，善良的人们怎么可能事先做出准确的判断呢？

小 舟

对邓拓的打击，使他的家成了“文革”开始后最早被卷入政治漩涡中的家庭，成了一叶在风狂雨骤中挣扎的小舟。

邓拓和丁一岚，从来都是用正面的革命道理教育孩子们，自幼教导他们热爱党，热爱领袖，做忠诚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父母是令人尊敬的革命前辈，也是道德的楷模。要对这样的父亲进行公开的批判，孩子们那纯洁得像水晶一样的心灵该如何接受？他们该如何面对这严酷的现实？比起报纸上那比铅块还要沉重的铅字来，邓拓更不愿面对孩子们那一双双受委屈、受惊吓的眼睛，不愿看到那一束束天真热情的光芒暗淡下去。但这又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邓拓和一岚不愿回避，也无从回避。4月16日报上公开批判前，市委事先向邓拓打了招呼。12日，邓拓叫回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大女儿小岚。小岚在学校品学兼优，已是预备党员了。邓拓望着女儿，一字一句地说：“过几天，报上可能要对爸爸写的一些文章进行批判。《燕山夜话》有些文章宣扬了封、资、修的东西。谁有错误都可以批判，爸爸错了也可以批，批判是为了教育大家，更好地做工作。你们精神上要有准备，要相信党，听党的话，要正确对待。”

小岚是个听话的孩子，她记住了爸爸的话，以平静的心情

返回学校，准备接受这场考验。

过了两天是个星期六，几个小点的孩子放学回家了。一岚将小虹、阿壮、岩岩叫到自己的房间，用认真而又尽可能和缓的语气，将邓拓对大女儿说的话又说了一遍。这年小虹十四岁，正上初二，阿壮、岩岩还在小学。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全都理解。他们只知道，报纸是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那就一定是对的。他们爱爸爸，相信爸爸，但爸爸有了错误，他们也要听毛主席的话，参加批判，那几天，他们天天怀着紧张不安的心情等待着。

批判来了。小虹上的师大附中语文课上，也开始批《燕山夜话》。小虹把自己写的批判作文拿回家，一岚还拿给邓拓看，说帮助爸爸提高认识。

几乎整个春天，邓拓都在沉默中度过。家里再也听不到他娓娓动人的语言，看不到他温文和蔼的笑容。他本来就严于律己，很少同家人随便议论政事，尤其属于党内机密的事，从来绝口不谈。孩子们回到家，见爸爸终日紧锁双眉，心事重重，他们不敢多问一句话，小心翼翼地连大气都不敢出，他们心中充满矛盾和疑问。往日欢快活泼的家庭气氛消失了，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

那段时间，丁一岚正参加电话局的“四清”运动。在三十九局搞四清要经常出入中南海，一岚觉得丈夫挨批，自己留在三十九局不合适，就主动要求调到东城区的四分局。多少年来，工作第一已养成习惯，她很少回家，看到报上一篇篇批判文章，听到来自各个渠道的传闻，她整日忧心忡忡，却难得有空暇同丈夫倾心交谈。这是否加深了邓拓的孤独感呢？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忆及此，常令她追悔不已。

狂 飚

无论如何，北京市委奉命进行的批判，还是力图以思想认识争论的语气进行，尽量和颜悦色，就文论“文”。但4月16日的社论已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的字眼，这使人很难接受，邓拓感到气愤，心情沉重。然而就是这样的批判，仍不能令上面满意，后来被指为“假批判，真包庇。”醉翁之意不在酒，到了5月，江青一伙迫不及待，干脆甩开北京市委，亲自披挂上阵。

5月8日，由江青主持写作，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在《解放军报》发表。文章全部是谩骂和恐吓的口气，污蔑邓拓“对党和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同日，《光明日报》刊登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10月，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在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第二天，由全国大小报刊转载。翻开报纸，天天都是整版篇幅、通栏标题，从一版到四版，批判“三家村”的炮弹越来越密，火药味也越来越浓；打开收音机，“愤怒声讨”，“彻底清除”的声浪从早到晚直往人耳朵里灌。

对江青、康生一伙，邓拓有过长期的接触和观察，深知他们的为人。康生平时道貌岸然，俨然一副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的面孔，然而早在三四十年代，邓拓就领教过他的权谋术，整起人来心狠手辣，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

江青这个30年代上海滩的下等影星，邓拓也知其底里，一直抱避而远之的态度。前两年她为了出风头捞政治资本，要在北京市搞京剧改革的“实验田”，作为市委文教书记的邓拓，不便硬顶，借口偏头疼，躲开了陪她看戏的苦差。邓拓对人说，这是个“有蛇蝎心肠的女人”，心胸狭窄、喜怒无常、性好报复。张春桥在晋察冀日报时曾是邓拓的部下，此人一贯刁钻阴鸷，见风使舵，挑拨离间，并没有在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与邓拓共患难。

那些日子，邓拓整日枯坐在书房里。在极度的悒郁和沉默中度过。他早已被剥夺了辩白的权利，忧思如焚，悲愤交加。他终于明白，这场席卷全国的狂飚，根本不是什么“文化革命”。对那几个小丑几个月来的表演，邓拓渐渐心明如镜，他预感到这回很难躲过那伙野心家的毒手了。

他不怪那些批判自己的群众，强压下自己的愤慨和委屈，他说：“群众是对的，既然宣布我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敌人，他们当然理应表示憎恨。群众向来是相信党，相信党报的。”

然而，夜深人静他扪心自问：“自己怎么可能是敌人！三十多年，风风雨雨，几经挫折，他从未对共产主义事业产生过半点动摇啊！即使是1957年那次无端地被斥责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他也只是反求诸己，默默吞咽难咽的苦果，一如既往的为党为社会主义工作。在1963年，他在题赠杨述的一首诗中曾这样剖明心迹：

当年风雨读书声，血火文章意不平。
生欲济人应碌碌，心为革命自明明。
艰辛化作他山石，赴蹈从知壮士情。

岁月有穷愿无尽，四时检点听鸡鸣。

而现在，有谁还能理解他为人民的一片忙忙碌碌之忱，为革命的一颗明明如月之心呢？

炼 狱

痛苦、愤慨和盛怒咬噬着他的心，使邓拓本来就多病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了。春残夏至，他在房间里还要穿上大衣。他开始变得一言不发了，整日默默地看着报纸上那些连篇累牍，无限升级的“批判”文章——更确切地说，是谩骂和诬陷，陷入深深的沉思。邓拓经历过反动牢狱之苦，经历过战火纷飞出生入死的生涯，也经历过解放以来的风风雨雨，却还不曾有过如此痛苦的炼狱般的精神折磨。他的天性是清高而又倔强的，他不堪忍受这种无端的侮辱，真想冲出去朝所有的人大喊：“这全是谎话！是无耻的诬陷！”然而却没有地方让他讲话，也没有人听他讲话，就连战友们为他辩护，甚至关心一下他的权力也被剥夺了。他像一只深深陷阱中的困兽，被扼住喉咙，全身紧缚，任人往头上泼洒污水，而他还必须“正确对待”。他的心在滴血，发出无声的、痛苦的呻吟……

丁一岚回到家里，看到丈夫日渐憔悴的面容，真是心如刀割，却又爱莫能助。她深深地忧虑：承受着如此巨大的压力，他那瘦弱多病的身子和伤痕累累的心灵，还能支撑多久呢？

1966年5月16日，那最后的、致命的一击终于降临了！这一天是“文革”的纲领——《五·一六通知》通过的日子，是革

命老师“彭、罗、陆、杨”^①身陷囹圄的日子，也是康生、江青、张春桥、陈伯达登上“文化革命”指挥座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全国各报同时转载了戚本禹发表在《红旗》第7期上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中竟有这样一段话：“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时期又混进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一九五七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看到这里，邓拓顿时觉得头晕目眩，眼前一片昏黑。“卑鄙！”他愤怒得拍案而起，把报纸重重的摔在地上。这个姓戚的有什么权利这样无中生有，血口喷人！他不能忍受这种污辱，他要向市委申诉！向中央申诉！

他绕室徘徊，走了几圈，理智又迫使他渐渐平静下来。他喟然长叹：是啊！历来的文字狱，罪名不都是“莫须有”的吗？何须什么根据，什么人证物证，仅仅需要一句话，就足以置人于死地了。他颓然坐下。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下定了以死抗争的决心。“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自古以来忠臣义士的铮铮豪言，一次又一次，撞击着他的心扉。

丁一岚因“四清”住在电话分局。看到那篇文章，她心头就像炸开了一颗炸弹。她深知共产党最憎恨最厌恶“叛徒”二字。多少年共同生活的可敬可爱的丈夫，怎么会突然变成“叛徒”？然而，党刊、党报，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写在那里，

^①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无心干任何事情，急急赶回家，想向丈夫问个究竟。

“这纯粹是诬陷！”望着妻子伤心困惑的眼神，邓拓愤愤地说：“我两次被捕的情况，抗战初期就在太原向黄敬同志讲了，被捕以后，我的组织联系人和我领导的支部都没有受到牵连和破坏。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这是组织上早就调查清楚，做了结论，写在档案上的嘛！”

邓拓那苍白的脸庞因激愤泛起了红晕。一岚从他那坦诚、磊落，喷着怒火又有几分无奈的眼睛里，看到丈夫所蒙受的巨大冤屈，她愿意相信丈夫是清白的，却只有默默无语。

沉默许久，邓拓惨然一笑：“也许这是中央重新给我做了政治结论。看来，我这次是冤沉海底了。”

屋里本来就显得阴冷的空气骤然凝固了。邓拓的话像一记重锤，敲击着她那本已颤栗着的心扉。一岚一句话也说不出，她一头扎进卫生间，放开水龙头，让那哗哗的流水淹没她那久已压抑的悲泣，让苦涩的泪水痛痛快快地流淌。她不愿让丈夫看到自己的软弱而增添心头的重负，更不愿让儿女看到自己的泪水。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还要靠她柔弱的肩膀支撑呢！

诀 别

5月16日文章发表后，市委派一位秘书长来收回邓拓保存的党内文件，这表示，已不把他当作党内一分子看待了。邓拓问：“参考消息是否还可以再送？”来人轻蔑、傲慢地答道：“我看你也不必再看了吧！”小人得势，无异雪上加霜。对于一个毕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来说，有什么比被组织抛弃更令人

痛苦呢？

当日黄昏，丁一岚拖着沉重的双脚踏进家门。她一眼就瞥见邓拓正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伏案疾书。她知道，丈夫是在给市委领导同志写一封长信。她长叹一口气，轻轻走到书桌旁，扭亮了台灯。

邓拓抬起头来，放下笔，搓了搓手，仰靠在椅背上。显然，他写得很疲倦了。

“我看你今天一天都没有回来。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

一岚用眼睛示意邓拓，到书房过道里去说话。五月份以来，家中换了警卫员，这已是监视性的“警卫”了。夫妻二人来到阴暗的过道里，这里很隐蔽，对方的面容变得模糊了。一岚禁不住抱着邓拓的肩头，哭了起来。

“一岚，”邓拓安慰地拍拍一岚的手，缓缓地开口：“我又想了好久，你和孩子们还是同我先分开一段时期的好。家里有姐姐照顾我，不要紧。这样对大家都好。”

丁一岚百感交集，心乱如麻。对这个问题，她不是没有考虑过，也同邓拓悄悄议论过。她虽不相信邓拓真是什么“叛徒”，但既然组织上已做了“结论”，作为老共产党员的她，似应划清界线。但这个界限怎么划？她内心十分矛盾、痛苦。她更多地考虑的是五个儿女。他们生在红旗下，在得天独厚的环境里成长得一帆风顺，坚信自己是革命事业当然的接班人。骤然之间成了“叛徒”的“狗崽子”，无异从七重天一下子跌进了九重地。在学校里，他们受到老师的诘问，同学的辱骂，真想回家在妈妈怀里痛哭一场，可又不愿回这个冷如冰窑般的家。在家里，妈妈只是叹气，只是嘱咐要相信爸爸是个好人，不要对爸爸说刺激性的话。这几天，他们索性一句话也不说，

连走路都放得很轻很轻。

孩子们的凄惶神情和异常举动，自然都落到邓拓的眼中，怎不令他一阵阵如万箭穿心！今天上午，小虹在过道里碰上父亲，女儿美丽的大眼睛里含的是疑惑、怨恨，竟狠狠地瞪了父亲一眼。此时，邓拓突然提起了这件事，神情是那样颓丧和痛苦。不能让他和孩子们再受这种精神折磨了！想到这里，一岚万般无奈地又长叹一口气：

“好吧，我带孩子们先避开一阵……”

邓拓深情地望着她凄苦的脸，说：“早点走，最好明天就走！”

丁一岚心中一怔：为什么那么急？莫非他预感到了什么？莫非他又听到了什么消息？她顾不得多想多问，只是说：“明天走不可能，我无处投奔。”想了想，她又叹了口气说：“好吧，反正等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回来！”

邓拓凄然一笑，摇摇头说：“你怎么这么傻，还有将来吗？”

一岚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忍不住满心酸苦，一把抱住了邓拓。夫妻二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放声痛哭了一场。一岚想不到，这正是邓拓在与她诀别。

二十年后，丁一岚回忆起那个永世难忘的傍晚，仍然幽愤难平，珠泪滚滚：“我是太傻了！我当时听不出这句话的分量。那些日子，老邓好几次问我：你说这场运动到底为了什么？我回答不出。我当时真的不理解，以为无非又来一场跟过去差不多的政治运动，批几个人。用不了多久，问题搞清楚了，该甄别的甄别，该平反的平反，总相信党是了解他的，谁能料到跟着来的竟是那么一场使多少人家破人亡的浩劫，真是太傻了！”

玉 碎

夜深了。被“大革命”搞得纷纷攘攘的古都京城，终于静了下来。位于东单路口遂安伯胡同的这一角小院，也显得异常静谧，在劳累和惊扰中度过了一天的主人，该好好歇息了吧？

然而邓拓书房的灯光，却整整亮了一夜。

多年以来，邓拓和一岚虽是一对感情甚笃的恩爱夫妻，但由于各自的工作，两人常分住两地。到煤渣胡同团聚以后，因为邓拓长期值大夜班，又常常夜间写作，一岚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和睡眠，也是一直分室而居的。为了照顾邓拓，一岚的卧室与邓拓的卧室相连，而邓拓卧室又通着办公室和书房。这一夜，一岚也几乎不曾合眼。她揪心地听着丈夫在隔壁房间踱步的声音，时隐时现。她知道，丈夫正进行着一生中最艰难最严峻的思考，而当脚步停下来时，他一定是在继续写那封长信了。

是的，此时的邓拓，正思绪如潮，奋笔疾书。

窗外，一架紫藤萝，在惨淡的月光下，向小院投下斑驳的花影。正是花开时节，暗夜里飘散着沁人心脾的幽香。多少个这样的夜晚，邓拓伴着这花香或展卷细读，或写下隽永的宏文，或吟哦不朽的诗句，而这一晚，草木有知，也会感到孤寂无主，明明是夏夜，却似有阵阵寒气袭来。

邓拓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发出的声音，面对那些莫须有的批判罪名，他不能再沉默了：

彭真、刘仁并市委同志们：

……尽管在这个斗争中，我已经变成众矢之的，全国

范围的批判运动正在胜利发展，人们一致声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我一直努力带着当前的问题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想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他按照当时的认识，认真分析自己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的背景和不足。他并不满意自己写过的一些诗文，但是，他不能容忍那种断章取义、指鹿为马、黑白颠倒的肆意诬陷。他写道：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邓拓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党性和作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书生气，在这里充分地表露出来。然而，这里用得着他对妻子一岚说的那句话，他是“太傻了！”阴谋家已将锋利的屠刀搁在脖子上了，他还在认真地请组织上指定人去调查核实，还指出：“有一些重要地方与原话有出入，”还要纠正某人将某句诗解释错了。在那些帮凶帮闲的刀笔吏们罗织的文网面前，

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封建专制主义惯用伎俩面前，哪还有什么“理”字可讲。“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任凭你光明磊落，博学多才，为国为民，贡献卓著，到头来常常免不了成为白衣秀士王伦们的俎上肉、刀下鬼。‘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精神和气节，自屈原而后，世代相传，光照千古。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可爱处，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可悯、可悲处。”^①

邓拓更不能容忍的，是对自己政治历史的诬陷诽谤。他在信中详细叙述了自己两次被捕和出狱的情况，在审讯中的不屈表现以及出狱后寻找党组织的经过，以铁一般的事实驳斥了骗子们的谎言，他义正辞严地写道：

因此，我不认为自己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我认为自己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而不顾一切地在努力奋斗。

在追溯那一时期政治形势的时候，他正气凛然，委婉地用曲笔进行了一些揭露和反击。他暗讽了那个几十年来一贯以整人为业的康生，此人批起“坏戏”来声色俱厉，必致人死地而后快，而自己却点名要看《十八扯》之类低级下流的戏。这正击中康生的要害。康生看到这封信后曾咬牙切齿地骂道：“邓拓临死前还咬了我一口！”

在信的末尾，他写道：

^①引自袁鹰《玉碎》。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邓拓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夜

这封六千字的长信，是邓拓用他一生的最后心力，字字泣血般地写成的。邓拓写文章从来是一气呵成，不用誊抄，而这封遗书，却抄写的整整齐齐，没有一处改动的痕迹。“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绝唱。可惜的是，一代新闻家、学者和诗人，在那个时代的挤压下，只能以这样一篇为自己申诉的文字告别他如此挚爱的人生了。

写完给市委的信，他轻轻地走到隔壁卧室，最后看一眼妻子和孩子们。看到亲人们睡梦中还似惊魂未定的面庞，邓拓百感交集，潸然泪下。他回到书房，忍着身心刀割般的疼痛，给亲人们留下最后的话：

一 岚：

……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放下了紧握一生的笔。他感到异常的宁静，也感到突然的疲惫。望着窗外一钩残月，他忽然想起战争年代写给妻子的旧句：“似有难言心事在，行看冷月晚窗移”，心头涌起一阵难以抑止的眷恋和哀伤。

该结束了。他对自己说。生命已不值得留恋，他只有以一死来保全自己的气节，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拿起了摆在床头的，平日借以安眠的小药瓶……

第二天清晨，丁一岚来到邓拓的卧室，看到倒卧在地上，身躯已僵硬了的丈夫，不禁痛哭失声。她伤心地扶摸着 he 冰冷的身躯，泣不成声地对他说：“云特，你安安静静地睡吧，你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

多年以后，丁一岚回忆当时的情景，曾说过这样痛心的话：“邓拓的自杀我是有预感的，但我没有劝阻。我知道他无法再活下去了，与其这样屈辱地活着还不如死了。我认为自己真的爱他，就不能救他。”这是一个妻子对他品格高洁的丈夫最深的理解。邓拓生平最喜欢坚贞优美的山茶花。他在《可贵的山茶花》一文中写道：“前年冬末春初卧病期间，幸亏有一盆盛开的浅红色的‘杨妃山茶’摆在床边。朝夕相对，颇慰寂寥。有一个早上，突然发现一朵鲜艳的花儿被碰掉了，心里觉得很可惜。我把她捡起来，放在原来的花枝上，借着周围的花叶把她托住。经过二十天的时间，她还没有凋谢。这是多么强烈的生命力啊！当时我写了一首小诗，称颂这朵山茶花。”诗曰：

红粉凝脂碧玉丝，淡妆残笑对东风。
此生愿伴春长在，断骨留魂证苦衷。

如今，这四句恰似他的遗诗了。“断骨留魂证苦衷，”不正是对邓拓宁折不弯的高贵品质的真实写照吗？

北京市委一接到邓拓的死讯，立即派人来整理一切文件遗物，从枕下发现两封遗书，立即收抄走了。直到1979年，邓拓的冤案平反昭雪，丁一岚才第一次读到邓拓十三年前留给北京市委的信。

几天后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丁一岚被通知邓拓的遗体秘密送去火化。没有花圈，没有哀乐，也没有送葬的人群。按当时组织的决定，遗体用了假名，除亲属外，谁都不知道那白色被单里裹着的是谁。陪伴邓拓走向最后的栖息地的，只有丁一岚、三哥邓叔群和二姐邓淑彬。

送亲人远行，一岚已顾不得什么风险。她穿上了特为出国才做的讲究、合身的藏蓝色西装，披上缀着雪花图案的白纱。她从庭前紫藤架上采撷了一束邓拓生前喜爱的紫藤花，扎在从花店买来的花束中。

凄风苦雨中，只有三位亲人跟在灵车后面，慢慢地向火葬场走去。三哥和二姐心痛欲裂，禁不住问一岚：“这是为什么？这究竟为什么？”一岚无言以对，只有默默地流泪。

这一年，正值邓拓五十四岁的盛年时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他是最早的牺牲者。他那渊博的学识、杰出的才华，还未得到充分的施展。如果不是这场始料不及的横祸，天假以年，他该能写下多少价值不菲的学术著作、优美隽永的诗文和传诸后世的书作啊！以他作为政论家、宣传家丰富的资

历和经验，又该能为人民的新闻事业做出多少贡献啊！

邓拓的悲剧仅仅是一场更大的悲剧的开始。紧接而来的十年，是“大混乱、大疯狂、大破坏”的十年，是奸佞横行，忠良遭害的十年，是践踏良知，摧残文化的十年，是充满血泪和血腥的十年，是给几代人灵魂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的十年！这场人为发动的号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内乱，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整个民族几乎被拖入绝境。^①

邓拓之死拉开了这场噩梦的序幕，紧接着，田家英、李琪、老舍、傅雷、翦伯赞等一大批干部和文化人用几乎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更有千千万万正直的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在这场浩劫中死于非命。他们的家人、子女，也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在这艰苦漫长的十年，丁一岚和她的家庭是怎样度过来的呢？五个孩子，又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呢？

^① 顾行、成美《邓拓传》。

第十章 乌塔孤依觅朝晖^①

雷 电

送走邓拓那天，天公好像有眼，风雨夹着雷电，劈闪着、震怒着，将胡同口的一棵大树都劈断了，似在替一岚宣泄那一腔的悲哀和愤怒。电闪雷鸣之中，丁一岚给邓拓写了一封信，然后又默默地烧掉。她只有以这种方式，与阴阳相隔的丈夫对话了！二十多年朝夕相伴的爱侣，一旦失去，剩下自己形单影只，一岚心里多么苦啊！以后的八年当中，每到邓拓去世这天，她都要写一封信，哪怕是几句话、几个字。即使关在“牛棚里”，没有纸和笔，她也要默诵一首苏东坡的悼亡词，在心里对邓拓说上几句话，以安慰丈夫那蒙冤的灵魂，寄托自己的怀念和哀思。在那个年代，这些话是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孩子都不能说的！1974年的5月18日这天，一岚步苏轼悼亡妻的原韵，填了一首《江城子》：

^①丁一岚《忆念》。

“八年生死两茫茫，斩愁思，仍难忘，独倚孤窗无处话彷徨。纵使相逢难相诉，泪满面，鬓添霜。幽魂何时返梦乡？别离恨，天地长。回顾遂安惟有泪千行。难忘当年断肠日，风雨夜，雷电长。”

她把这首词工工整整地抄好，然后，默默地划着了火柴，看着火舌卷着诗页，缕缕青烟升向蓝天。

就是在那样的日子，人们心中善良的真情也未完全泯灭。邓拓去世后两天，天又刮起了狂风，下起了暴雨。大风刮断了一岚家门前不远的电线。挨了一天批斗的一岚，在暗夜中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家。走进遂安伯胡同，黑暗的胡同中站着一个邻居，显然他已等候在那里多时了。他小声地提醒一岚：“电线断了，小心触电！”一岚无声地流下了眼泪。她感到，这些普普通通的群众，并未将老邓和他们一家抛弃。

护 雏

邓拓去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大厦顷刻间坍塌了一半。丁一岚，这个外表柔弱，内心却极为刚强的女性，擦干泪水，默默地对自己说：你可不能垮啊！孩子们还需要你，为他们撑起一片躲风避雨的屋檐呢？

从火葬场回来后，丁一岚把孩子们叫到跟前，对他们说：“爸爸住院不在家，跟着妈妈一样，别害怕，有事对妈妈说！”

那些日子是不堪回首的。

丁一岚不能幸免地被批判斗争，作为审查对象，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五个孩子，最大的二十二岁，最小的只有十一岁。

孩子们在学校里、在家附近的街道里，无端地受到歧视、侮辱，他们睁大着困惑、茫然的眼睛，望着母亲；往日的亲友、同志，此刻也是自身难保，没有人敢向他们表示哪怕一点点同情和安慰。丁一岚一面承受着个人的巨大不幸和压力，一面像个护雏的老母鸡，张开翅膀庇佑着一群弱小无助的儿女。

邓拓含恨去世后，北京新市委要求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包括子女）说出自杀的真相。一岚只好用“有病住院”对邓拓的突然离去作出解释。孩子们也没有深究，被家庭的突然变故和无休无止的批判浪潮折腾得身心交瘁的孩子们，觉得爸爸住在医院，也许倒是一种解脱呢。一年多以后他们才渐渐得知，爸爸早已不在人世了。

各种各样的苦难都降临了。对于一岚来说，最大的痛苦在于：怎样从精神上保护自己的孩子。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她必须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公开的场合，必须承认强加给邓拓的那些罪名。可是在内心里，她深深地了解丈夫，相信丈夫是好人，是为革命奉献一生的革命者，他决不会反党、反毛主席。但这些话，她不能对子女说。她不愿孩子们与党、与群众有对立情绪，她要求他们与时代协调。她深知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保护他们，避免更大的灾难降临。

然而，亲口对自己的孩子说：“你们的爸爸是坏人，你们应该批判、打倒他，”又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一岚实在承受不了这两难的压力。她叫来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大女儿小岚，对她说：“妈妈心里也想不通，实在无法教育弟弟、妹妹了。你是大姐，是大学生、党员，你多跟弟弟妹妹谈谈，别让他们跟党跟群众闹对立。我是跟不上了，不希望你们也跟不上。”

心地纯朴的小岚担当起了母亲的嘱托。在保定上军校的大

弟小云和身边的几个弟弟妹妹，心里有了解不开的疙瘩，也通过写信、谈心，向大姐倾诉：

报上说爸爸是反革命，妈妈呢？我们该怎么对待妈妈？

学校批校党委，贴大字报，喊口号，想到人家也这么批判妈妈，我们该怎么办？

小岚理解一向挚爱子女的母亲，无力保护自己孩子那种锥心刺肺的痛苦。她觉得，自己似乎不知不觉中担负起了一部分母亲的职责。她尽量按当时的要求，鼓励弟弟妹妹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对待家庭问题。那时，她不过是个姑娘啊！

一次，一岚在单位挨批斗，被剃了阴阳头。该到回家的时候了，一岚颇费踌躇。在孩子面前她总是整洁端庄的，这么一个怪样子，该怎么向孩子解释呢，会给孩子们多大刺激？有个好心人借给她一顶帽子，一岚挨到天黑才回了家。在家里总得摘帽子呀，一岚横横心，对孩子们说：“群众出于对邓拓的仇恨，才给我剃了头。你们可不要恨群众啊！”说完，才摘了帽子。

谁知这件事还是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了创伤。阿壮长大以后，一想到当时的情景，仍有些愤愤不平：“我知道那些给妈妈剃‘鬼头’的人，只是出于无知的热情，但还是无法原谅他们。”

只有十二岁的阿壮过早的操起了家务。每天傍晚，全家人从单位、学校回到家，总能看见小小的阿壮站在往日大师傅的位置，正满头大汗地蒸馒头、烙饼呢！

那时，红卫兵常沿着胡同，挨家挨户抄家，天天都能听见“黑五类”被打被抄的喊叫声。一天，丁一岚听说红卫兵要抄到自己家了，忙趁中午骑车去北京小学，通知阿壮不要回家。当时宣武门一带正挖沟修地铁，一岚推着自行车，上坡下坡，

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艰难地行走，下午还必须赶回单位参加运动。她心急火燎地赶到学校，不料阿壮和同学去陶然亭游泳了。一岚又赶到游泳池，阿壮他们已经回家了。整个下午，一岚都在心神不安中度过。生怕孩子挨打受辱。好不容易挨到下班时间，回到家，见阿壮刚刚从外面回来。一岚急急地说：“快回学校去，红卫兵要来抄家了！”匆忙之中，连车票钱都忘了给。阿壮走远了，一岚想着两手空空的孩子该怎么到学校呢？不禁又留下辛酸的泪水。

北京新市委在邓拓去世后，曾派人将书房、工作室等贴上了封条，并对一岚和孩子们说，有红卫兵来抄家，就告诉他们，必须经过市委批准才能动。这样一来，那些零散的造反小将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搬 家

终于有一天，《人民日报》的红卫兵来贴大字报，标语糊满了窗户，“勒令”一家人几天内搬出遂安伯胡同。

对于搬家，一岚早有思想准备。她知道，邓拓成了“叛徒”，再住在当年《人民日报》分给总编辑、社长的这所大房子里，是不可能的了。运动之初她曾向广播局提出要房，据说广播局领导也曾考虑分给她两间房，但遭到一些人坚决反对，说不能给邓拓家属提供避风港。一岚真是左右为难。她把一些生活必需品收集起来。堆放在惟一一间没贴封条的屋内，每天离家时，都把被子捆成一个行李卷，以备抄家时被扫地出门，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今天真被勒令搬家，往哪里搬呢？一岚真是有点走

投无路了。

“革命群众”的住房不能占，只有从“牛鬼蛇神”身上打主意了。广播局负责房子的人命令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局长温济泽同志，从他并不宽裕的住房中腾出了一间，算是解了燃眉之急。房子在丁桥麻花胡同电台宿舍，离遂安伯很远，单位不给车，街上的车都忙着拉被轰出北京的黑五类，根本雇不到，家中连个像样的劳动力都没有，这个家该怎么搬呢？一岚正一筹莫展，小岚从学校回到家中，说：“妈，您别急，我们用自行车慢慢驮，反正他们不能说咱不搬！”于是，大姑娘小岚就领着刚学会骑车的小学生阿壮，用自行车一趟趟地驮东西。小岚一次只能拉一个箱子，阿壮的车后面，只能绑个小板凳。一岚望着阿壮跟着姐姐，歪歪斜斜骑车远去的小小身影，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她孤立无援地坐在院内空洞洞的石阶上，看着这家破人亡的凄凉景象，痛哭了一场。

也许是这要强的一家人感动了一些人的良知，广播局终于派了一辆卡车。同院住的漫画家华君武的两个儿子，已是半大小伙子了，也赶来帮忙。说是搬家，其实已无多少东西可搬。不要说邓拓多年收藏的那些珍贵书籍、手稿、字画、文物，就是一应家具财产等也全部被没收了。一岚只带上自己和孩子们最必要的衣服什物，半卡车就装下了。就这样他们告别住了十来年的这个家，搬到麻花胡同那小小的蜗居里。

车到麻花胡同，远远看见黑压压的人群，不禁令人感到吃惊。原来，这是那些街坊、邻居们，听说邓拓一家要搬来，出于革命“义愤”聚集在一起，举行这么个特殊的“欢迎仪式”的。1966年9月，批“三家村”正开展得如火如荼，谁不想见见邓拓的“黑老婆”、“黑子女”的真颜呢？丁一岚和孩子们是

在群众的口号声、叫骂声中进院的，他们预感到，在这里生活，将会更加艰难。

房间只有十三四平米，却要住大大小小五口人。箱子从地面一直擦到了天花板，一个大床、一个小床并排摆着，还是睡不下，一岚领着孩子们到北郊木材厂买来一些木板，拼在脚下；床下面塞满了东西，缝纫机和厨房用的一些杂物也堆在当屋，这样一来，能露出地面的就只有走一个人的小通道了。

不速之客——那些好奇的邻家孩子们，不时来造访，弄出些使人哭笑不得的恶作剧。咚——一块石头砸在门上，伴着“狗崽子，出来！”的喊叫哄笑；哗——窗户被捅开个窟窿，塞进一个写着侮辱语言的小纸条。

从小到大，邓家的孩子们得到的是老师同学的鼓励、赞美，是奖状和鲜花，何曾受过这样的屈辱？他们伤心、委屈、愤怒，但他们毕竟是有着书香家风的子弟，是邓拓和丁一岚这样的长辈调教出来的孩子，他们隐忍着，不与群众发生冲突。

听，院里孩子又在唱那首家喻户晓、传遍全国的歌了：“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条藤上仨黑瓜，反党反人民反国家，你说该杀不该杀？”最后一句，一个孩子竟对着家门口，大声地质问起来。小岚冲门外应一声：“该杀！”孩子们讨个没趣，一哄而散了。

人心总是肉长的。群众虽被煽动起了对“黑帮分子”天然的仇恨，但与一岚一家相处长了，看到这家人无论大人、小孩，都彬彬有礼、谦让温和地待人，全家人同甘共苦互相帮扶着艰难度日，也不由不产生一些敬意，那些无理的骚扰，也渐渐变得没趣起来。一岚一家终于开始与邻里相安无事，相对平静地住了下来。

挨 斗

作为“三家村黑掌柜”的妻子，一岚自然成了批斗的对象，尽管她算不上什么当权派，尽管她政治历史清白，一向工作积极。邓拓死后，一岚情不自禁流下的伤心的泪水，她不顾压力为丈夫献上的鲜花，都成了她与邓拓划不清界限的罪证，罪加一等。开始还被允许回家，后来干脆被关进“牛棚”——设在真武庙电台编辑部那所灰楼的学习班。

进了“牛棚”，一岚感到自己一下子成了“贱民”，不准下楼打开水，不准用监督员的笤帚扫床，被拉去“批斗”成了家常便饭。昔日一起工作的同事，却有了人“鬼”之间的差别。

一岚内心保持着做人的高傲和尊严。她可以接受审查，但不能忍受人格的侮辱。

批斗会上，“造反派”对被批的人极尽丑化之能事。他们给丁一岚带上高帽子，穿上纸背心，脖子上挂个牌子，手里还拿个棍子。有一次，一岚被用细铁丝在脖子上挂了个大牌子，上写：“三家村老板娘丁一岚”，面前放个小凳，上面还放个麦克风。一岚觉得那牌子越戴越沉重，里面一定放了东西！这是干什么？她想，批判不应是变相的刑讯。于是她跑到主席台前说：“这里有东西，我要求你们拿出来！”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使主席台上的人一愣，想不到这个“黑帮分子”有这么大胆，这当然成了“抗拒批判”的又一条罪行，愤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丁一岚回到自己站的地方，慢慢地抠开那个糊成盒状的牌子，发现里面放的是两块砖。她拿出砖块放在面前的小凳

上，响声通过话筒“咣”地一声震动了整个会场，全场一片哗然。事后，一同住“牛棚”的人悄悄对她说：“你忍着点，不就没事了？”一岚没说话，她只是用沉默表示自己执拗的抗议。

各式各样的批斗会，丁一岚场场不落，有时是“主角”，有时是“陪绑”。中央台的台长梅益、市台台长汪小为挨斗，她都陪过，有时甚至一天几场，斗争会多了，开个摩托车把她接来接去，简直成了名演员赶场。

一次在北京体育馆召开批判“四条汉子”^①的万人批判会，宣传部门的“走资派”都要去陪斗，来了个吉普车接走了广播局的丁一岚和侯宝林，由红卫兵押送。到了会场，“造反派”指令丁一岚向一同被斗的“黑帮”们收钱和粮票，买一些干粮当午饭。一岚一个个收着，见到不少熟人。吴冷西伸出的双手黑漆漆的，后来才知道那是在报社印刷厂劳动，染上的洗不掉的黑油墨。走到吴晗面前，一岚心里不禁一阵辛酸，这位当年在反饥饿、争自由的斗争中和闻一多等著名教授一起拍案而起的民主斗士，如今却低垂着头，说不出的颓丧和委顿。他忧心忡忡、满面愁容，始终没有抬起头来。他竟没有意识到，站在对面接过他手中粮票的，就是同“村”难友邓拓的妻子丁一岚。当时，“黑帮”之间是不允许随便讲话的。这是丁一岚和吴晗的最后一次见面，不，应该说，是丁一岚“见”吴晗的最后一面！

比起批斗会来，丁一岚倒更愿意去劳动。她正值四十岁的壮年，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是不怕吃苦的，她扫过厕所，清过

^①即周扬、夏衍、林默涵、田汉。

煤灰，烧过锅炉，抹过房顶。她曾登上广播剧场高高的塔楼天棚打扫卫生，也曾下到地下的冷却水池、电缆沟里拉电缆。心灵手巧的一岚还能干许多“技术活”，她做过木工，描大标语字牌，一手美术字也写得像模像样。不管干什么，她都干得干净、利落，就是刷厕所，也把便池、脸盆擦洗得洁白发亮。好强的一岚干什么都要干出个样儿，在这中间她多少感到一种创造的价值，一种劳动的愉快。

然而这种劳动毕竟不是正常年代的劳动，有时是以折磨人为目的的。有一次大概是要来外宾，广播局的“黑帮”都被轰到院子里，刷洗被层层叠叠的大字报污染的墙。墙是用砖、细砂、石子筑成的，大字报纸深深陷在墙缝里，却不给任何工具，让“黑帮”们用手去抠、去刷，很快一岚他们的手就磨破了皮，露出鲜红的肉，一碰就疼得钻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岚在劳动中接触的普普通通的工人，却给了她那个年代所缺乏的，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真情。

“文革”开始后，过去的熟人、朋友都避之惟恐不远，就是不期而遇，也赶紧把目光转向别处，似乎一岚脸上有不祥的符咒。整整五年，几乎没有人主动向她问候一句，说一句家常话。过去一向群众关系很好的一岚，尝到了被人群抛弃的、难耐的、孤独的滋味。只有那些朴实的工人不管那一套，他们不是以兴衰荣辱来评价一个人的价值的。一岚的工资停发了，每月只有十八元的生活费，孩子的更少，每人只有十五元。在冷冻机房劳动时，中午带饭，一岚为了让正长身体的孩子们吃得好一点，她每天只吃咸菜、白饭。工人们看在眼里，就时常带点肉菜分给一岚，那可是油、肉都要用票配给的年代啊！有一次，造反派要揪一岚去批斗，工人们把她藏在机房的最低层，

门上写着“机房重地，闲人免进”，工人们守在门口，不让造反派进入，就这样保护了一岚。

还有一次一岚回家，碰上邻居的女孩，那孩子叫了一声“丁阿姨”说：“我要下乡了，向您告别。”一时间，一岚竟以为听错了，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称呼了。一声“阿姨”使一岚流下了热泪，感受到人间还有温暖。

更让一岚感到慰藉的是几个懂事的儿女，苦难使他们迅速长大了，过早地自立了。一岚先是进学习班，后又下放，无暇顾及孩子，倒是孩子们，常常给妈妈精神上的支持。台里的人送生活费时，悄悄对小岚说：去看看妈妈吧，你妈妈在里面可想你们了！

小岚一阵高兴，她忙收拾了衣服、肥皂、牙膏什么的，去看望蹲牛棚的母亲。那情形真像探监一样，见面时，“黑帮”们只能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同自己的亲人讲上几句话。小岚给妈妈带来了弟妹们的字条，上面是小虹那清秀的笔迹：“妈妈，你好好学习、改造吧，改造好了，还是我们的好妈妈！”

1967年，丁一岚和广播局的“黑帮分子”被送到房山的一个发射台干农活，半年后参加整党回到局里。丁一岚多时没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了，心想这下该解决问题了，心里很高兴。然而她想的太简单了，这次整党根本没打算解决她的问题。有人为她说道公道话，说丁一岚很小就参加了革命，又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应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说这话的人不久就遭到了批判。后来才知道，实际上领导运动的宣传队是想借整党把她开除出党。一岚心里明白，她的命运是和邓拓的问题连在一起的。只有当邓拓的冤案昭雪了，她才有出头的那一天。

生活是艰苦的，可怜的生活费怎么省也用不到月底，只好

卖报纸、卖过去存下的餐具，甚至卖多年舍不得吃的几根人参贴补生活，一岚时常是手里掂着几个硬币盘算着怎么度日。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一岚，生活再苦都能忍受，她感到难以忍受的是政治上的歧视。交党费，没有人收；每逢有什么重大的活动，群众上街敲锣打鼓、游行欢庆，她站在街边暗自神伤。从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的一岚，觉得自己真的被党、被组织抛弃了，她感到政治上的孤独，内心十分痛苦。

转 机

林彪的“一号动员令”下达后，大批机关干部、知识分子被驱赶到各地的“五七干校”。

1971年，一岚随广播局的“黑帮分子”下放到河南淮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就在这期间，我国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林彪外逃摔死在温都尔汗，在周恩来等老同志的力争下，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主持工作。这是形势要发生转化的一个光明的先兆。

丁一岚下放干校后，劳动虽然艰苦，但周围的气氛缓和多了。多数人都是挨整的，彼此彼此，有些年轻人还管年纪大些的叫“老干部”。一岚觉得自己在这里不像个“专政对象”了，和别人可以平起平坐了。

然而厄运仍如影随形地存在。下放前，部门领导说，下去后你们继续整党，争取解决组织问题。一年过去了，大多数人恢复了组织生活，惟独丁一岚毫无音讯。一次次检查，均被认为认识不深刻，与邓拓划不清界限，通不过。过了关的人陆续

回北京了，一岚来了倔劲，不恢复组织生活不回去！她不愿在抬不起头来的环境、在没有尊严的城市里生活。

1972年，另一批“五七干部”也要走了。组织上通知一岚做检查准备，争取一个星期解决问题。一岚对事认真得有些傻气，她感到一个星期不够，要求再延长。上面派了个人来启发她说：“你认真想想，邓拓为什么要写《燕山夜话》，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想清楚就能过关了！”一岚却老实实在地回答：“我不能写这个，否则就是替邓拓翻案了！”没想到这次检查交上去，居然顺利通过了。

丁一岚被调回局里，分配在国际台办公室做一般的行政工作。虽然还不是彻底平反，但有工作做，一岚仍感到很高兴。这个工作实际上就是打杂，成天订煤气、分电影票、分配幼儿园名额，甚至扫地、打水……但她勤勤恳恳，干得一丝不苟。有人纳闷：这个资深的“老广播”怎么干什么都那么认真？一岚说：“即使什么都不是了，我还是个共产党员，干什么都要干出个样子。”这位1921年出生，1936年入党，与党同龄的老党员，虽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仍对党忠心耿耿。恢复工作后补发多年扣发的工资，她一次上缴党费五百元，想到前些年想交党费却无处交的苦恼，她感到在政治上又回到“娘家”了。丁一岚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得到许多人的钦佩。1979年邓拓问题平反后，1980年，她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原因之一，就是即使在接受批斗的日子里，她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劳动、生活。

生活条件也有了一些改善。

一家人在那蜗居的小屋住了一年多。1968年，小云要从部队复员回来，实在住不下了，怎么办呢？

院子里有个房屋管理员，是个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十分同情丁一岚一家人，曾对一岚说：你那哪像个家啊，简直像个仓库！有机会，我想法给你调调！

一岚知道，那个年月像他们这样的家庭想调房，简直像做白日梦，她也不愿为此连累这位老同志。可小云一个二十大几的小伙子，总得有个落脚之处啊！机会终于来了。大院的最深处有个独立的死角，有个老人刚刚患癌症去世了，留下两间小平房。别人嫌晦气，都不愿去。那管理员问一岚：你嫌弃不嫌弃？一岚说：我还顾得上嫌弃吗？打扫打扫就行了。就这样，大儿大女总算能分室而居了。其实，这两间比起原来的一间来，也不过大了六平米。好处是地处僻静，少了许多外界的干扰。远飞的候鸟一般的孩子们，从各自插队的农村、工作的工厂回来，也有个温馨的栖息之地了。孩子们都喜欢音乐，都有乐天的性格，每当聚在一起，有的吹口琴，有的拉手风琴、小提琴，有的唱歌，充满乐融融的气氛。邻居们感到奇怪：这一家人怎么还这么高兴啊？

1973年，广播局为一岚做了一次结论，取消了处分，但仍得留有：“与邓拓划不清界限”一条。

在那漫长的、阴霾蔽日的岁月里，丁一岚始终没有疏忽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说：“邓拓遇难后在孩子们面前，我感到有两件事要替老邓完成好，一是，教育孩子正确对待父亲的死，不要对党、对国家有怨恨；二是，要把孩子培养成国家的有用之才。”

在一岚的影响下，孩子们也各自同不公的命运抗争着。因为父亲的问题，他们失去了正常升学、就业机会，被迫改名换姓，流落四处。清华毕业生小岚在山东泰安一个药厂劳动，小

云几经周折进了北京一家锅炉厂当车工，小虹、阿壮去陕北农村插队，岩岩中学毕业后来到北京郊区黑山寨务农。他们像小树在岩缝的挤压下顽强地扎根、伸枝、长叶，显示出活泼旺盛的生命力。

地 火

艰难困苦使本来就刚强的一岚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了。邓拓去世时她曾伤心地痛哭过。她遵守组织原则，连对孩子都没说出父亲已经死去，但她觉得不该向组织隐瞒，就向国际台党支部负责人汇报了邓拓之死，汇报时控制不住感情，掉了眼泪。谁知这竟成了她与邓拓划不清界限的罪名。从那时起，她一横心，再也不在人前掉泪！直到“文革”结束，漫长的痛苦的十年中她只哭过有数的几次。丁一岚说：我天性乐观，遇事想得开，好像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难关。孩子们也继承了我这种性格，因此即使在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时候，我们家也有笑声。就是这样一个生性开朗、挨批挨斗都不掉泪的一岚，在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时，却又悲愤万分的大哭了一场。

那天，一岚在办公室里打开收音机，听到低迴的哀乐，是周恩来总理逝世了！她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她哭总理、哭邓拓和那许许多多含冤去世的人，也为党、为国家、为自己一家的前途和命运哭泣。

“四人帮”不准群众带黑纱、白花，不许设灵堂悼念总理。他们幸灾乐祸，加快了抢班夺权的步伐。那真是最寒冷的日子。

在那些日子里，丁一岚百感交集，一腔愤懑。她和全国人民一道流泪，一道思考。她感到人民的悼念正像地下运行的烈火，一触即发，随时可能喷出炽热的岩浆！她不由得想到老邓对周总理的尊敬和爱戴。在一次国庆晚会上，岩岩挤到总理身边和总理握了手，回来后邓拓笑着责怪她说：“小岩岩和总理握了手，这是很大的荣耀，可是那么挤，挤坏了总理可怎么办？”看到天安门前群众献的海潮一般的花圈和挽诗、挽联，她又联想起在那举国欢腾的日子里，曾写过“春秋大事书万卷，不敌英雄纪念碑”诗句的丈夫，如果能活到今天，又该写出怎样哀痛的诗词和愤怒的檄文啊！

送灵车那天，丁一岚独自骑车来到东单公园，长安街两旁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排成厚厚的、长长的人墙。人们无声地哀悼，默默地哭泣，目送总理灵车缓缓驶过，车轮碾在地面上的沙沙声都清晰可闻。一岚夹在人群中，和人民群众一起共同感受这巨大的悲哀！在这静穆中，她心中默念着：这不公的、苦难的一切，该结束了、该结束了！

“既然冬天已经来了，那春天还会遥远吗？”^①

^①雪莱诗。

第十一章 八方泪洒马南鹏^①

昭 雪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加速了他们的灭亡。历史永远不会忘记1976年10月6日，这个铲除奸贼、结束噩梦，中国人民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日子。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确立了正确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扬起了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大旗。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一大批受迫害的领导同志开始得到平反，一批批冤假错案，相继得到昭雪。

丁一岚想，该是为邓拓伸冤、平反的时候了。

1979年1月，丁一岚到人民大会堂参加郭沫若的追悼会，遇到了《人民日报》的同志。一位邓拓当年的秘书悄悄地问她：老邓的问题怎么样了？丁一岚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但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反映上去。那位同志出主意说：“报社的领导很支

^① 引自《人民日报》全体同志悼念邓拓的挽联。

持为被诬陷的老同志平反，你写份报告，可以登上《人民日报》内参，这样，很快中央书记处就可以看到了。”这真是好主意！丁一岚回到家，立即给《人民日报》主持工作的同志写了一封信。果然，信送上不久，北京市委的同志就找到一岚，告诉她，已经成立了邓拓专案的复查小组。

1979年2月，北京市委对所谓“三家村”反党一案进行了彻底平反。这场在当代历史上长达十三年之久的，骇人听闻、震惊全国的大冤案，终于得到纠正。就是在这时，丁一岚才第一次看到十三年前那个黑暗之夜，邓拓写给市委的遗书。

捧着这封浸着丈夫血泪的遗书，一岚恍如隔世、百感交集。她拿起笔来，一口气写下洋洋八千言的《忆邓拓》一文。文章开头引用了一段邓拓遗书，把邓拓十三年前无处申诉的话，悲痛地公开告诉广大读者。她在文章中回顾了丈夫几十年为革命的战斗生活，回顾了十三年前那个永世难忘的夜晚，愤怒声讨了那伙野心家陷害忠良，制造封建法西斯“文字狱”的滔天罪行，寄托自己无尽的哀思。她写道：

“我至今还仿佛听到他长叹一声，呼不尽他胸中的悲愤抑郁，放下了他终生紧握的战斗之笔，忍痛永别了他如此热爱的革命事业、革命战友、子女亲人和翰墨生涯。这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敌我斗争，真理在我们的党、广大群众和邓拓、吴晗同志……等千万个受害者的一边。”

这篇文章在1979年2月的《新闻战线》发表了。当时，邓拓同志的追悼会还未公开举行，许多群众还不知道“三家村”冤案已经平反的消息。文章的发表无异一块击浪的惊石，引起层层波澜。“三家村”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一大案，它牵涉到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工人农民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株连的面

之大之广，是亘古未闻的。也许人们沉默得太久太久，也许是造孽者积怨太重，一岚的文章引来人们思念的滚滚春潮。《人民日报》转载《忆邓拓》文章的当天上午，往日令人谈虎色变的“邓拓”二字由许多人口中亲切地呼出；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人们纷纷向一岚表示慰问，局里一些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跑来和一岚拥抱、握手。有位《人民日报》的女同志，看到了一岚的文章后，辗转打听到一岚的电话。她在电话里边哭边说，足足半个小时，表达自己对老社长的思念和冤狱终于大白于天下的激动心情。

继一岚文章之后，邓拓的好友、同事、亲属、学生纷纷写纪念文章追忆、缅怀故人，一吐胸中块垒；他生前的老首长、老领导聂荣臻同志撰写了《光明正大，耿直不阿——对邓拓同志的怀念》一文，对邓拓的生平作出高度评价：“他是有名的报人，历史学家和诗人。他博学多才，才华出众。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耿直不阿，正大光明，坚持真理，嫉恶如仇。”聂帅说出了许多人心头想说的话。

1979年9月5日，中共北京市委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邓拓同志的追悼会。

追悼会庄严而又隆重，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送了花圈，李先念、彭真、胡耀邦、薄一波、姚依林、刘澜涛等以及北京市的负责人参加了追悼会。这些领导人中，许多是邓拓的老首长、老战友，在“文革”中，几乎无一不受磨难。如今云霁日出，悼念故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原北京市委干部子女三十多人列队来到灵堂，悼念敬爱的邓伯伯。这些孩子在邓拓去世那年，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只有

六七岁。市委是文革的“重灾区”，他们的父母、叔叔、伯伯一夕之间全被打倒，许多人被害得家破人亡，孩子们也备受歧视欺凌。有的孩子受不了这种打击，精神失常。最惨的是副市长吴晗一家，夫妻双双被迫害致死，女儿小彦几次被关进监牢，惨遭凌辱，最后被迫自杀，全家四口人只剩下幼子吴彰。如今，在十年炼狱般的生活中长大成人的孩子，在邓拓灵前献上两个大鲜花花篮，表达对被迫害死去的爸爸妈妈、叔叔伯伯的无尽哀思。

邓拓的儿女、亲人，从各个地方赶来参加追悼会。小岚和丈夫带着女儿小明明从山东赶来了；多年与邓拓一家相依为命、荣辱与共的二姐淑彬从武汉赶来了；邓拓的侄子邓刚也代表同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著名科学家、父亲邓叔群及一家人赶来了；还有邓拓的外甥女、侄女……他们都曾受“三家村”冤案的株连，度过了十年艰难的时光，终于盼到了真相大白于天下的这一天！

追悼会前，丁一岚领着儿女们到贵宾休息室向来参加追悼会的领导同志表示谢意。李先念、胡耀邦、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姚依林同志和丁一岚及孩子们紧紧握着手，安慰这悲伤的一家人。彭真抱起邓拓的小外孙女小明明，把脸紧贴着孩子那稚嫩的脸蛋，心中默念着久逝的老部下、老战友：邓拓啊，冥冥之中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你的第三代人啊！

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的家属们，在“文革”前并不相识。共同的厄运把他们连在了一起，在苦难的十年中结下了友谊。“三家村”惟一的幸存者廖沫沙，在浩劫中吃尽了苦头，被打落了满口牙齿，但他在狱中仍写打油诗，以其特有的乐观和机智做着抗争。此时他带着妻子儿女和丁一岚及孩子们以及

吴晗的遗孤吴彰合了影。这是多么悲惨，令人扼腕叹息的一张合影啊！后来，廖沫沙写了《忆邓拓》，诗曰：“每见遗容肠欲断，遗篇一读一伤情；多才自古终为累，屈贾于今岂独吟。”

追悼会大厅里，充满了悲痛肃穆的气氛。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各有关部门、各群众团体负责人，邓拓的生前友好、首都新闻界及各届的知名人士，共一千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会场正中悬挂着邓拓的遗像。消瘦的面庞、深邃的目光，透着一股刚毅和自信，而仔细端详，却似含着一丝隐忧。这是他在1956年参加党的“八大”时照的。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拓谢绝了选他当“八大”中央委员的好意，也从那时起拉开了他命运不幸的帷幕。邓拓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邓拓是党忠诚的儿子。当年火化时，却连使用真名的权利都被剥夺，骨灰也不得不寄存在三哥叔群家，五个儿女，长期不允许被告知父亲死去的真相，这是多么惨烈的人间悲剧！

人们望着邓拓的遗像，每个人心头都涌聚着千万种思绪，痛定思痛，感慨万千，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挤得满满当当的会场，悲伤、静穆的气氛仿佛将空气都凝固了。低徊的哀乐响起，人群中开始发出轻轻抽泣，抽泣声越来越大，有人竟失声痛哭起来。

追悼会由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同志致悼词。悼词回顾了邓拓一生的革命经历，公正地评价了他作为一个革命者、共产主义战士、人民新闻家的历史功绩。悼词说：“邓拓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新闻宣传事业。”“在主持《人民日报》工作期间，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

呼声和要求。他一贯遵循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和方法，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歪风邪气。……”

致悼词后，人们排成长长的吊唁队伍，缓缓地、默默地移动着，向邓拓的遗像致敬，向丁一岚和家属们表示慰问。

会场上，铺天盖地地悬挂着上百幅挽联和挽诗。对于邓拓这位一生用诗抒发情怀，以诗书赠友人的诗人来说，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诗的形式纪念他、赞扬他。

刘澜涛的挽联，寄托了晋察冀时期的老上级对战友的哀思：

四十年出生入死，挥笔扫千军，传播马列，鞠躬尽瘁
昭日月；

两百天血雨腥风，横眉对群丑，壮志愈坚，忠魂永在
仰高风。

原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上将，1939年在平西根据地写了长篇小说《浴血罗霄》，邓拓是第一个把初稿从头到尾看完并提出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的人。如今他百感铭心，与蹇先佛合写挽联道：

乌云迷漫惊奇案，惟罪惟功，青史无情得公论；
采翰飞奔警世情，任劳任怨，黄泉闻报慰英魂。

著名演员赵丹，1963年元旦喜得邓拓当场挥毫写下的二十韵，在“文革”中他也曾备受摧残。他与夫人黄宗英共写挽联：

悼念故人，一腔直言，竟以身殉。
瞻望来日，万种艰难，尤须奋斗。

著名作家萧军，一连写下四首挽诗，一唱三叹，回顾战友情谊：

丹心凛凛路迢迢，一夜风狂怒海潮。
文字狱兴莫须有，抄家讞定逋难逃。

十年血碧燕山月，此日魂招金水桥。
漫道才高憎命促，“满江红”赋雨潇潇。

卅四年前喜识君，夜阑杯酒共论文。
春风紫塞张家口，结伴还乡哈尔滨。

杨柳依依天外路，征尘滚滚岭头云。
何堪此日成追忆，岂有苍苍丧斯人！

原《晋察冀日报》的战友，用挽联表达他们对老社长的一片心意：

一腔忠贞，文章满纸，书生奋挥如椽笔。
十载血火，风雨同舟，战友长怀英烈魂。

《人民日报》全体同志的挽联，更是动人心魄：

闽海波涛，长城风雪，四十年笔战生涯，何期奸佞逞凶，千古伤心文字狱！

燕山血泪，云水襟怀，百万里长征道路，永记忠贞垂范，八方洒泪马南邨。

邓拓的二姐淑彬，1962年主动报名，全家下放到湖北农场。在邓拓最后的日子，她特地来到北京，朝夕陪伴、悉心照料和抚慰蒙难受冤的弟弟。如今，她又千里迢迢赶来，与丈夫一起献上挽联：

哭拓弟灵前：

一生为党，才华尽吐；书直言，遭横祸，闽江滹沱齐咆哮。

十载蒙尘，玊珠重光；听民意，喜昭雪，五洲四海颂英明。

淑彬 永芎 泪挽

邓拓的灵台前，安放着一岚亲手编制的精致的花圈，照片两侧悬挂着一对挽联，上书十六个撼人心扉的隶书大字：

云特安息

山海风波，心盟永忆。

万冢恨雪，云际长明。

一岚泪挽

十三年来，这是她第一次能够公开祭奠自己的亲人。十三年中，每到邓拓的忌日，她都默默地焚化一篇写给丈夫的书信；

她将邓拓手书的两方诗帕缝在贴身的棉袄里，伴着这诗句熬过那“人妖颠倒是非淆”的十年。邓拓一生给一岚写过许许多多的诗，一岚也非常喜爱这些诗。但在邓拓生前，她没有给他写过诗。今天，在这庄严的追悼会上，她第一次为丈夫献上这样的诗句，作为对他三十一年前写给自己的那首“山海风波定白头”诗的应答。

永 忆

1979年，“拨乱反正”刚刚起步，人们的思想还未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脱出来。邓拓同志的追悼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为邓拓平反的市委专案组，基本上仍是当年为“三家村”立案的那个班子。追悼会的规模受到限制，只允许六百人，而且处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参加。然而，许许多多与邓拓一起工作过，因“夜话”、“札记”受过株连的同志悼念邓拓的愿望非常强烈，不允许他们参加，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丁一岚以个人名义印发了一百多张讣告。谁知持有这种讣告的人却被阻拦在公墓大门外。人们愤愤不平地说：“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在大门外边开另一个追悼会！”后经刘仁同志的夫人甘英和《前线》编辑部的李筠同志据理力争，才被允许进去，但不能进入主会场，也不能进骨灰堂向遗骨告别。这些同志只得站在会场之外，向邓拓的遗像默哀、致敬，无形中成了一个“民办”的“分会场”。丁一岚感激这些同志，也怀有无奈的歉意。追悼会后，她带领子女们来到门外，小云捧着父亲的遗像，小

岚捧着骨灰盒，一家人站成一排，向这些自发前来致哀的朋友们深深地鞠躬！

追悼会实际参加的人数是一千二百多人，而当时的新闻媒体按统一口径仅报道了六百人。这些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怪现象，不能不令饱经运动反复“折腾”的丁一岚感到忧虑。今天的平反昭雪会不会在明天出现反复？她心有余悸地想，不管怎样，今天人们对邓拓的高度评价，纪念缅怀邓拓的真情挚言不应随着时间泯灭。她决心为丈夫编印一本纪念小册子。

在子女和一些老朋友的帮助下，她收集起人们的纪念文章和挽诗、挽联，自己编辑、自费印刷了这本小册子。蓝色、朴素的封面上，印着邓拓的遗像，里面收入聂荣臻等同志的纪念文章、丁一岚的《忆邓拓》和邓云代表兄弟姐妹们写的《回忆我的爸爸邓拓》，还收入邓拓的生平照片和九十多首挽诗、挽联，小册子印了一千多册，免费赠送给全国各大图书馆、新闻、文化单位和研究机构，也分送一些给亲友。

值得庆幸的是，一岚担心的事不仅没有发生，而且随着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看到了邓拓的价值。十八年来，各种形式的对邓拓以及“三家村”纪念、缅怀、研究、探讨的活动，一波又一波，不绝如缕地进行着。

丁一岚知道，对邓拓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整理和保存凝聚着邓拓一生心血的大量诗文、书法作品，将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献给人民了。早在1979年春，丁一岚就开始搜集和整理邓拓的遗作。邓拓一生约写了五百多首诗词，十年“浩劫”中，这些诗词遭到劫毁，大部分散佚了。丁一岚和子女们向亲朋好友、向社会广泛征集邓拓的诗词。人们打开记忆的闸门，一句句，

一首首追忆着、寻找着曾经读过、背过的邓拓诗词，或邓拓写给自己的诗词作品，寄给一岚。有些作品寄来时，已残缺不全了，有的上面还被打上黑“×”，留下了那个恐怖的年代的痕迹。一岚知道，这些诗词能保留下来，是要冒极大风险的。那些珍藏这些邓拓遗墨的人们，是怀着对邓拓怎样深厚的尊重和忆念啊。

说起对邓拓诗词遗物的保存，还有一些令人感慨的故事呢！在“文革”中，接待“外调”成了一岚的一大生活内容。来自各地的外调人员，常常想从被调查对象所存有的邓拓诗词、书法中，挖出其人与邓拓、与“三家村”的“黑关系”。对这些蒙难的同志，一岚自然是三缄其口，尽力保护。但几次下来，一岚不禁受到启发：这到是个记录、保存邓拓诗词的好机会！于是她请示监督员说：为了便于弄清和查找情况，她想对外调内容作个登记。她的请示得到批准。于是，再来人外调，问起邓拓给某人写的“黑诗”时，一岚就说：我记不清了，请你提示几句。来人就顺口念上几句作为提醒。久之，一岚的笔记本上记满了邓拓的诗句。她用这种方法，使丈夫的一些佚作得以保存。

“文革开始”后，丁一岚实在想把那盘家庭录音带保存下来。但五十年代的录音磁带都是大磁盘，无法隐藏。一岚想那些造反派中对英语感兴趣的恐怕不多，就把录音带上《家庭音乐会》的标签撕掉，把磁带插在几盒英语教学录音带中间。抄家时，录音机、录音带以及其他家具物件全部被抄一空，一岚也无心顾及它们了。“三家村”冤案平反后，一部分抄走的东西退了回来，录音机没有了，音乐戏曲磁带也缺了不少，惟独英语录音带全部退回，混迹其中的“家庭音乐会”录音带居然

安然无恙！遭劫十几年后又听到邓拓的声音，一岚高兴得不得了。

丁一岚和全家人为搜集邓拓诗稿费尽了苦心。如《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过东林书院》等诗，当年被作为罪证夹在邓拓的档案里，是邓拓平反后经过丁一岚的要求才被退回来的；有些诗是从旧报刊上查到的，有些诗作为散页夹在邓拓的书籍或笔记本里；还有些是朋友们抄存的。1979年她将收集到的三百多首邓拓诗词选编成《邓拓诗词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丁一岚一家收集、出版邓拓诗文的活动，得到了许多人的理解和鼎力相助，这些热心人中也有外国的友人。来华访问的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邓拓的博士生齐慕实，听说丁一岚正在到处寻找邓拓于三十年代在上海《新中华》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时，立即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篇文章提供出来。

为整理、编辑、校订邓拓的作品，一岚常向文化界的有关专家、朋友请教。出版邓拓诗文前，她多次与胡绩伟、李肖白、邵燕祥、顾行、陈柏生等同志商讨研究。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厚的果实。经过丁一岚全家和出版界的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拓的作品不断得到出版和再版，在各届人士和广大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1979年再版了杂文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在后来的几年中，《燕山夜话》发行了一百四十多万册，并被译成英文、德文和俄文在海外出版。1986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四卷《邓拓文集》，收进邓拓自三十年代以来撰写的重要政论、专著、杂文、通讯、散文和诗词等作品；到1988年为止出版的邓拓作品还有《邓拓书法选》、《邓拓诗词墨迹选》、《邓拓书法作品选》、《邓拓藏画集》等。1993年，

丁一岚将陆续收集到的邓拓诗词重新编辑，再次出版了《邓拓诗词选》。她说：“这个集子里刊登的四百多首，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完全的邓拓诗词了。”这本诗词选是由大学教授、《北京晚报》老记者顾行的妻子成美作注、北京“三家村文化实业有限公司”组织出版的。同时出版的还有美国学者写的传记《时代之子——吴晗》。

1997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了“三家村文库”，丁一岚又将许多珍贵的经过精心整理的邓拓诗词、文稿捐献出来。其中有1958年邓拓采访宝成铁路参观李白纪念馆写下的《咏李白》遗稿手卷，被认为有极大的文学、文物价值。老舍之子、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舒乙先生特为此作跋曰：

“这位因智慧而闻名于世的人，因智慧而横遭灭顶的人，因智慧而永垂不朽的人……”

邓拓同志一生爱好文学，写得一手好诗、好字，他功底扎实，聪慧，有才气，自幼崇喜李白、东坡和板桥，他的旧体诗作在现代作家中与田汉、郁达夫、老舍诸位的诗作并列，堪称一流……”

198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将已发表的几十篇邓拓的好友、同学、同事、学生的纪念文章收集起来，出版了《忆邓拓》一书；1987年，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将有关邓拓一生的系列文章编辑在一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二本纪念邓拓的文集《人民新闻家邓拓》。1986年，青年学者王必胜写出《邓拓评传》，率先对邓拓的生平事迹和学术创作成就进行了评述；1991年老报人，邓拓的亲密朋友顾行和妻子成美穷十年之功写就的《邓

拓传》出版，在邓拓的研究上又前进了一步。顾行作为《燕山夜话》的约稿人和编辑，“文革”中曾备受摧残，夫妻双双受到监禁，被逼自杀，历尽折磨终于活了下来。他们怀着对邓拓的爱和尊敬，对那伙野心家的无比憎恨，追述这段历史，写下了邓拓不平凡的、战斗的一生。

时至今日，国内外的作家、学者们，从未停止过对邓拓的追忆和研究，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纪念邓拓、阐释邓拓的精神和成就，研究邓拓和“三家村”现象的文章，时时见诸报刊和作家的文集中。人们将邓拓作为战士和学者人格高度统一的优秀范本，将他放在二十世纪中国风云变幻、历史沧桑的时代大背景下进行研究，看到一个品质高尚，学识超群，多才多艺而又忠实于共产主义的人，是怎样在这个伟大辉煌的事业中，在这段令人叹惋的历史时期中，生活、战斗，大喜大悲、大起大伏的；他和他的家他挚爱的亲人，又是怎样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悲欢离合，而生离死别的。在这种追忆和研究中，人们得到精神的启迪，吸取了历史教训，也越来越深地产生了对邓拓这位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悲剧主人公深深的同情和敬意。邓拓已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只要人们对这段难以说尽的中国历史仍有研究的兴趣，就永远不会淡忘邓拓。

海 外

在海外，邓拓的研究是与“文革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66年以前，邓拓的名字并未受到西方学者特别的注意，海外掌握的资料非但很少，错讹也非常多。直到1966年《人民日报》

狠批《燕山夜话》，邓拓开始作为“文革”最早被批判、被打倒的党内知识分子高级干部，受到西方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出版的书籍、资料、研究论文也渐渐多了起来。

有意思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出了个专门研究邓拓的学者，而且与众不同的是，他是把邓拓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人物来研究的。他就是前面提到的齐慕实。

齐慕实（原名蒂姆什契克）是美籍澳洲人，少年时就对历史，尤其是东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上大学三年级时读到一位西方教授的文章《在中国，文化人批评中国》，接触到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知识分子问题。1976年，他偶然读到邓拓的《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下子被作者丰富的历史知识吸引住了。后来，当他得知邓拓是一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当过《人民日报》总编辑；同时又是一位渊博的历史学家，写过《中国救荒史》等史学专著时，他感到非常惊异，决心将邓拓作为自己硕士论文的研究课题。

1980年秋，齐慕实进入哈佛大学攻读中国史博士学位，翌年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的短期培训班，自费来到中国。他拜访了邓拓夫人丁一岚。丁一岚热情接待了这位年轻的外国学者，并将《忆邓拓》一书赠给他，鼓励他继续深入研究。

齐慕实一头扎进北大图书馆，他借来《北京晚报》合订本，将《燕山夜话》一书收入的文章与晚报发表的原文一一进行校对。日后他在美国翻译出版了《燕山夜话选》，并作了一些必要的注释。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写成了《玉碎——邓拓评传》一书。

齐慕实把邓拓称为自己“学习中国文化的导师”，他说：“我开始研究邓拓，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了解很少。许多基本

知识得力于《燕山夜话》，是邓拓提高了我的汉语文化水平，是邓拓使我接触到中国文化的瑰宝。从研究邓拓开始，我才发现中国文化是如此丰富、厚实、源远流长。

应该说齐慕实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邓拓思想和精神的精髓，与西方一些学者将邓拓仅仅作作为“文革”的受害者甚至“自由知识分子”的误解来，齐慕实将邓拓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放在一起研究，是难能可贵的，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大学读学时，我的教师在讲课中说，《三家村札记》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是中国文坛的自由主义者。可是，当我有机会细读了他们从三十年代到现在的许许多多的作品后，认为我的教师错了。他们不是这个制度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在用活泼的形式，巧妙的语言，宣传自己的见解和信仰。他们的思想是和自己国家的制度完全一致的。”

1986年齐慕实被特邀到福州参加《邓拓学术思想讨论会》，会上，他用英语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认识邓拓，认识了中国文化》：

“首先他的名字，其次他的文章，
触动了我的心，
《事事关心》——那意味着什么？
再其次，他的家庭，他的诗句，
引导我进一步思考——这又意味着什么？
现在，他的朋友、亲属和故居，
又把我带到一个新的起点——
我开始理解到，这位学者为他的国家献出了一切，
而且相信他自己没有错。”

齐慕实对邓拓精神一往情深的关注与探寻，正反映了邓拓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世界性价值和历史价值。

父 老

“三家村”一案平反昭雪后，对邓拓深情地怀念，从首都北京波及到全国。邓拓曾生活、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尤其是他的第一故乡福州和第二故乡河北阜平马兰村的乡亲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这位优秀的儿子。

1984年1月，当年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首府阜平县，建立了晋察冀日报社忠魂碑，纪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晋察冀日报社先后牺牲的三十八位烈士。来自各地的原晋察冀老同志，来到阜平参加纪念碑的揭幕仪式，缅怀牺牲的战友。丁一岚也在这个“回乡”的队伍中。

仪式结束后，马兰村的乡亲派出代表，接老同志回当年的“家”——报社驻地。这里长眠着《晋察冀日报》的七位同志，他们都是马兰村的乡亲冒着生命危险收尸安葬的。如今，乡亲们又刚刚将烈士墓重新修葺一新。

从《晋察冀日报》终刊到这时，整整三十六年了。丁一岚和老同志旧地重游，看到曾经那么熟悉的山山水水。物是人非，真是感慨万千。烈士墓坐落在村前的胭脂河畔，洁白的汉白玉碑上，刻着当年邓拓手书的《题马兰烈士墓》的诗句。马兰村小学的少先队员们正在这里举行队日，缅怀革命先烈。老师已告诉他们邓拓伯伯的事迹，为了同一个信念，这位先辈继牺牲的战友之后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献出了生命。

人们在烈士墓前默哀、致敬，孩子们已飞跑回村，叫着：“报社的同志来了！报社的同志来了！”

整个小山村沸腾了，乡亲们扶老携幼，来到村头迎接亲人。有人在人群中发现了丁一岚。“啊呀，这不是老邓家的吗！”人们呼啦一下拥了过来，抢着和一岚握手。年过花甲的国际台台长丁一岚，仿佛又成了当年那个青春年少的新媳妇，那个英姿飒爽的老邓的爱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伸出一双颤颤巍巍的手，挂着满脸泪珠，抚摸着一岚的脸庞、胳膊；邓拓当年的老房东、六十六岁的李贵老大爷，拉着丁一岚来到她当年和邓拓住过的屋子里。一进屋，李大爷止不住哭出声来。边哭边痛心地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村里的乡亲没有一天不在思念老邓，大家真想把老邓再接到马兰村来。反扫荡那样艰苦，我们都和老邓一起走过来了，不想这一回，我们没有掩护好老邓……”一岚和乡亲们的泪流在了一起，屋里屋外，已是一片抽泣、叹息声。

马兰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三中全会以后，一多半的乡亲盖了新房，家家顿顿吃上了细粮。回想当年和报社一起撸树叶，煮黑豆度饥荒的岁月，乡亲们破涕为笑，纷纷端来满簸箕的花生、核桃、梨、枣，将一岚和老同志们们的口袋塞得满满当当。同行的一位年轻人从未见过这样鱼水情深的场面，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邓拓战斗过的五台山区，人们也不曾忘记这“挺笔荷枪笑去来”^①的老社长。定襄县河边镇出产的五台山砚、石雕久负盛名，河边石刻工厂听说丁一岚想刻两尊邓拓诗词的阳文诗

^①邓拓《和于力老先生》。

碑，立刻挑出手艺最好的工人师傅，从邓拓与丁一岚当年“订心盟”的滹沱河边选来上等石料，精心设计了两幅诗屏。刻诗屏的绿石，翠绿中略带墨晕，是经过漫长的地质积淀自然形成的文石，石雕艺人刘师傅把凹下去的底子沙成麻点状，将字反衬得更富立体感。他按邓拓墨迹的体势，精雕细琢。一幅刻的是邓拓亲手写在丝帕上，又被一岚贴身捂了多年的那首“忆自滹沱河畔游”；一幅是写于《晋察冀日报》终刊时的“毛锥十载写纵横”，这两首都是记载滹沱河边可贵的战斗生活和爱情的。一岚捧着这对难得的工艺珍品，感受着滹沱河畔人民对邓拓的深厚情谊。

1986年5月10日到14日，在邓拓逝世二十周年前夕，邓拓的家乡福州市举办了邓拓学术思想讨论会。来自全国的四十多位邓拓生前的老战友、同事、研究者参加了会议，丁一岚带着邓小岚和邓壮，也分别从北京和山东赶来。史学界、文学界的专家学者和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在会上宣读了八篇论文，对邓拓在哲学、史学、新闻政论、诗词散文、杂文、书法绘画研究等方面取得的学术成就和贡献进行了深入探讨，特别赞扬了他在新闻工作和社会科学研究中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学风。丁一岚也在会上发了言，回顾了邓拓一生的新闻实践。

邓拓学术思想讨论会结束的第二天，5月14日，福州鼓楼区“三山诗社”邀请全体代表参加了在邓拓故居——第一山房举行的“怀念、学习邓拓同志”诗会。

邓拓的家乡素有作诗吟词、举办诗会的传统，邓拓少年时就经常参加家乡的“诗钟”活动，从此便终生与诗相伴。诗会，可以说是对邓拓最好的纪念形式了。

丁一岚和邓小岚、邓壮，是第一次踏上这片故乡的土地。邓拓生前，一岚曾多次听他描述过福建诗会的情景，十分神往。她也早想和邓拓一起走走婆家，探望一下乡亲父老，看看家乡新貌，可惜的是一直未能如愿。邓拓二十年前含冤去世，使“青春作伴好还乡”成了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如今，与子女应家乡之邀，又是参加这样一个高雅、悲壮的诗会，丁一岚不禁感动万分。

会场设在第一山房的堂屋里，一幅绘有梨花背景邓拓遗像，微笑地面对各位诗友和来宾，仿佛他又回到了乡亲和亲人们之间；厅院四壁，满满地悬挂着诗词和对联，这是诗会在短短几天时间里收到的一百五十多首诗词，除福州老诗人的诗作外，还有李志民、廖沫沙、袁鹰、左漠野、常书鸿等人从北京寄来的诗。

天上淅淅沥沥地飘起了小雨，百余名老人在雨中默默地坐着，他们正在倾听一盘邓拓用福州方言吟唱诗词的录音磁带。听着这位离别家乡五十二年之久的老朋友、老同学熟悉的乡音，老人们不禁潸然泪下。

院子里，邓拓幼年时栽种的青竹已长得高大过人；丁一岚请福州老雕刻工人在故宅的山石上镌刻了一首邓拓的诗。此时，这首刻在诗碑上抒怀明志的诗，正由诗社卢伯华老先生高声吟唱着：“当年风雨读书声，血火文章意不平。生欲济人应碌碌，心为革命自明明……”

对当时的情景，邓壮作了这样深情的描述：

“唱诗声像轰鸣着的古钟，沉重、悠扬，给人以鼓舞，以力量。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诗社陈景汉老先生吟唱父亲的诗作《颂山茶花》，诗笺在他手中瑟瑟地颤动着，他的吟唱底气刚

扬，铿锵如铁，有时却又像一支古琴曲，隐寓着一丝凄凉之情。当他唱到最后两句：‘此生愿伴春长在，断骨留魂证苦衷’时，激动得以手击案，悲壮之声，动人心魄。我伫立在父亲出生的木楼旁，看着密布在墙上飘动着的诗篇，视线模糊了，我听到身旁一些老人低低的啜泣声。母亲是个坚强的人，但此时泪水也从她的面颊上流下来了。诗会进行中，一位身材修长、满头银发的老人被人搀扶着进来，经人介绍，她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刘元栋的胞妹刘衡女士。她今年九十二岁，特地冒雨赶来参加诗会，献诗一首，并亲自登台，用沉稳、清晰的声音吟唱着：

天授英雄赤色心，漫言义士少知音。
堪夸文武才兼备，却奈晦明理独深。
遗墨燕山留夜话，正声梁甫共悲吟。
念君忧国情未已，长使后人痛不禁。

母亲赞叹这些吟唱‘诗音绕梁，百日不绝’。”

诗会还以“怀，拓”第一唱为题的折枝诗缀句进行了吟唱。邓拓的老战友陶军吟的是：“怀沙忧远追屈贾，拓业兴邦恻邓吴。”陈春森吟道：“怀君文旗随战鼓，拓边北岳共峥嵘。”福州诗人吟唱的有郭毓麟的“怀此故山称第一，拓其遗泽播千秋”。郭道鉴的“怀念英才扬正气，拓开新局展宏图”。

在大家的盛情邀请下，丁一岚讲了话，她感谢乡亲父老为邓拓举办这次诗会。她特别提到，邓拓在晋察冀边区曾组织过“燕赵诗社”，意欲以诗歌为三军之号角；他早岁就喜欢作诗填词，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仍满怀雅兴，走到哪，写到哪，

可以说是一位行吟诗人。丁一岚饱含热情朗诵了她最喜爱的那两首“丝帕诗”《战地歌》四拍和《无题》，作为对诗会的献礼。

诗会期间，正赶上邓拓的母校——福州市第一中学建校纪念日，丁一岚将邓拓书毛泽东诗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大字条幅赠给学校，福建一中的师生们回赠以校庆纪念画册和印有校园图案的杯子，并献诗一首：

两件小小礼品，
奉献你的灵前。
母校怀念你，
——邓子健

有你这样的学生，
母校更加懂得：
应该怎样去培育，
更多的民族精英。

1992年2月，为了纪念邓拓八十诞辰，福建教楼区文联和三山诗社又举办了一次诗会，来自全国各地数十个诗社二百三十多位诗人寄来了二百五十多首诗词和七十多幅对联，其中有邓拓生前的战友、中国诗词学会会长孙轶青和纽约美国中华楹联学会会长、纽约四海诗社副社长潘力生书写的对联。在会上，邓壮吟诵了母亲丁一岚写的《七律·忆念》：

鱼雁相呼誓永随，烽烟弥漫乱云飞。

滹沱河畔豪情共，灵寿山村夜战危。
荣辱如尘何足虑，狂雷击顶实堪悲。
廿年幻海难成梦，乌塔孤依觅朝晖。

1994年初，福州市人民政府将邓拓故居修葺一新，辟为邓拓纪念馆正式开放，实现了丁一岚一家和福州人民多年的心愿。

修复后的“第一山房”，整个庭院一千多平方米，再现了邓家世代书香门第、清贫家风的历史旧貌。在邓拓住过的房间里，陈列着主人青少年时代所用的家具、文具和阅读的书籍；约二百五十平米的展厅里，陈列了八十六幅照片，三十九首诗词，六十七册书籍和十六幅字画，大量实物和上百块文版详细介绍了邓拓的生平事迹。这些珍贵的资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邓拓家人提供的。邓拓生前曾将大部分收藏的文物字画捐献给国家，保存在中国美术馆；这一次邓拓的家庭又将邓拓本人的大部分文物资料捐献给了国家、捐献给了家乡。

在邓拓故居同时展出的，还有这个家庭走出的另一位名人——邓拓的三哥、真菌学家邓叔群。邓叔群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专家、一级研究员、学部委员，在我国科学领域有突出的成就。他的名字，与四弟邓拓列在《辞海》的同一页上。这位1928年从美国回国，1949年拒绝乘国民党派来的飞机前往台湾的科学家，“文革”中却因“三家村”一案受株连，被监禁拷打，于1970年5月被迫害致死，死的时候整个腹腔都积满了血水。

“对我们家来说，5月真是一个最不吉祥的月份，”邓小虹说，“爸爸、爷爷、伯伯，都在5月去世。”

第一山房，为中国人民献出了两位优秀的儿子。

祭 灵

1996年5月17日，在邓拓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一个简朴、庄重的纪念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骨灰堂举行。“三家村”三位作者的亲属、朋友以及原北京市副市长刘仁同志的亲友近五十人，又一次聚在一起，邓拓的长子邓云和幼女邓岩也专程从美国赶来，与国内亲友一起祭祀父亲，怀念四位相继含愤去世的老同志（此时廖沫沙同志也已于1991年病逝）。刘仁同志是邓拓在晋察冀时的老上级，也是“三家村”三个人共同的同事、朋友。在“文革”中，他被无情的手铐白天黑夜地连续锁了五年，终于死在狱中。

在安放邓拓、吴晗、刘仁同志的骨灰盒及廖沫沙同志遗像的灵桌上方，悬挂着诗人熊鉴《怀念邓、吴、廖三公》的七绝中堂：

三家当日本无村，留在人间却有痕。

一自黄钟遭毁灭，遗音震醒万民魂。

默哀之后，人们献上已出版的十几种有关四人的传记、著作和纪念文集。

刘仁同志的夫人甘英和丁一岚都在这个小小的纪念会上读了祭文。她们的祭文追忆往事，声泪俱下，灵堂内一片唏嘘抽泣之声。丁一岚肝肠寸断地一对四位挚爱亲友的亡灵说着心里话。最后她对邓拓说：

“应该做的事我都尽力做了。”

云特，我们的孩子都是很正直、勤劳和善良的，他们不愧是你的后代。我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又身染重病，不会太久我们就要相会了。”

第十二章 死生继往即开来^①

丁一岚在邓拓纪念仪式上说的话，确实堪慰亡夫在天的英灵。他们的五个儿女，在失去父亲后的日子里，并没有被扼杀，也没有沉沦。他们各自走过了一条布满荆棘却又通向光明的人生道路。他们的步伐汇在三十年来几亿中国青少年成长的大军当中，走得是那样艰难又是那样坚实。

小 岚

1966年，“文革”的狂潮令人毫无准备地涌起时，小岚是邓拓家惟一个成年的孩子，也是父母惟一个能以对大人的口吻对话的子女。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小岚都是个听话、用功、勤奋的孩子。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原子能化学，这在六十年代可是顶尖的科学，是个保密专业，只有政治上最受信任

^①邓拓《祭军城》。

的家庭的孩子，才能进入这个系学习。1966年，她已是二年级的大学生了，因为表现好，还成了预备党员。

当对父亲的批判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时，小岚一开始并不十分紧张，她说，这就像一个人从未见过洪水，还不知道洪水的可怕一样。何况，批判开始后，父母特意把她从学校叫回家，对她说，这只是群众对爸爸文章中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正常的批判，帮助爸爸认识错误。是啊，毛主席不是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吗，谁有错误都可以批判。小岚相信党，她回到学校，照常学习，也参加运动。

批判提到了吓人的高度，小岚开始感到惶惑、震惊。那么亲切，那么勤奋工作的父亲，怎么会是“叛徒”，怎么会反党？她想不通，也不敢去想。她是忠诚老实的。4月份，党员预备期满了，小岚对组织说：“父亲受批判，先不要给我转正了吧。”

所幸的是，小岚生活在清华这个有着民主传统的学校里，生活在一个亲密友爱的班集体中，尽管社会上妖氛四起，清华还是以她博大的胸怀，保护了这个“全国最大的反党集团黑掌柜”的女儿。尽管按照上面的布置，学校也组织了批“三家村”，但从未对小岚进行过个人的攻击。别的年级有的学生贴大字报，说对邓小岚太客气了。小岚的同学们挺身而出，说：你们想怎么样？敢对邓小岚无理，刁难，就试试看！

小岚是惟一在父亲死后就得知消息的孩子。小岚忘不了5月19日那天，她突然被妈妈叫到中关村科学院宿舍的三伯父家，妈妈痛哭着，对三伯父、三伯母和自己讲了爸爸服安眠药去世的消息。几个长辈都哭了起来，连声问妈妈为什么。小岚被这突然的变故震懵了，她不知该怎么安慰悲痛的长辈，慌忙中她记起了学校的教育，于是她强忍眼泪对妈妈说：“要是爸爸是

敌人，他去世，我们这个家庭还应该是革命家庭，你们也别难过了。”回学校的路上，天下着雨，小岚心里有说不出的凄苦，一路任雨水合着她的泪水从脸上流下来。她是长女，与父亲思想上的交流比别的孩子更多一点，这深厚的父女之情，怎能一下子割断呢？她知道自己不能去为父亲送葬，只觉得老天爷似在替自己抛洒着流不尽的泪水。

小岚没忘记自己是预备党员，她向党组织如实汇报了父亲的死，并表示要“正确对待”。但在内心深处，她不是没有怀疑：自己所看见的父亲，一直在那么辛苦的为党工作，一个“叛徒”，再装，也不能装一辈子啊！她悄悄对最要好的同学说：“《牛虻》中的亚瑟反对大主教蒙特里尼，但心里对他却有着父子的深情。我对父亲邓拓，就是这种感情。”

抄家时，小岚喜欢的一些书籍也被抄走了。父亲在她初二时写给她的那封亲笔信，她怎么也舍不得丢。她巧妙地把《毛主席诗词》卷轴的芯子抽出，将信卷成细卷保存了下来。她想，这也许是父亲留给自己惟一的纪念了。

妈妈被关在集训队，小岚把岩岩、阿壮带到清华，给两个年幼的弟妹母亲般庇护，他们可不像大姐那么幸运，在学校、街道，曾饱受歧视。有一阵，小岚和也是“黑帮子女”的同学刘英东结伴上外地串联，就把弟妹托付给了同学。阿壮和岩岩被大学生们照顾着，有时还乐呵呵地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到街上贴标语。

到了1970年，在校大学生该分配工作了。这时，小岚已有了一位男朋友，小伙子的父亲是一位老干部，当时也因所谓“叛徒”问题在干校劳动。这位哈尔滨军工大学的毕业生，被分配到山东泰安县一个工厂。那时候，正常的科研、生产秩序已被

砸烂，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们，即使家庭没有问题也不要指望干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何况小岚他们这样覆巢之卵呢？清华对小岚还算照顾，把她也分到了泰安，在一家只有三百人的制药厂当操作工。

这是一家隶属于农学院的、新成立的小药厂，一起分配来的，还有华东工学院，南京药学院和山东大学的几位大学生。这些本该在现代科技领域一展才能的青年人，刚到这里时，干的仅仅是灌药水的简单工作。

说起干活来，小岚与母亲丁一岚如出一辙：即使是最简单、最琐碎的劳动，她也一丝不苟，勤勤恳恳地去干。她戏称，许多日子她们成天打交道的就是“三水”——红药水、紫药水和碘酒。盛“三水”的瓶子一抱一大包，别人往地下一掼，稀里哗啦地，总要碎一些。她却格外仔细地一个一个码好。凭着这种工作态度，小岚逐渐得到工人们的信任。后来，她担任过车间技术员，车间主任，又被调到实验室工作。

善良温和的小岚，爱情生活上，却受到意想不到的挫折。她与男友谈恋爱好几年了，一岚已在悄悄为女儿准备结婚的东西，谁知男方家长却反对这门亲事。请不要责怪这些人吧，运动的冲击已使他们几乎成了惊弓之鸟。在这多事之秋，两个不幸家庭的结合将意味着什么？小岚尝到了失恋的滋味。她不怨恨别人，她知道，爱情的苦果是更大的时代的悲剧酿成的。

一岚得知女儿的不幸，当天就买车票赶到泰安，她担心年轻的女儿经受不住这个打击。还好，小岚足够坚强，她很快就从感情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不久以后，重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小岚与丈夫是在患难之中相知相恋的。公公是军队老干部，

1959年受彭德怀一案牵连落了难。老伴在“文革”的摧残中惨死后，1969年老人带着年幼的子女被迫离京，返乡来到泰安。巧的很，婆婆生前还是遂安伯小学的副校长呢！小岚的丈夫刘青岗，是五十年代援藏的公安干部，曾把青春的汗水，洒向那片高原的热土。1975年小岚与丈夫在泰安建立了自己的家庭，随后，有了一儿一女。和千千万万朴实的中国老百姓一样，他们诚实地工作，辛苦地养儿育女，以淡泊的心态，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1979年，“三家村”一案平反昭雪，小岚全家回北京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在贵宾休息室里，彭真同志抱起了小岚年仅四岁的女儿小明明，亲了亲孩子可爱的脸蛋。小岚泪光闪闪，叫一声“彭伯伯！”随着这声呼唤，她感到多年郁结于胸的冤屈终于吐出，从此可以自由地、舒畅地呼吸了。

追悼会后，小岚和一家人回到泰安，仍在原来的工厂工作。一年年过去了，插队的弟弟妹妹相继上了大学，回到北京工作；妈妈也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小岚和丈夫不是没有想过，回到自幼生长的北京，给儿女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但一向严于克己的小岚，不愿为自己调动的事，再向母亲开口，向组织提出要求。丁一岚何尝不愿长女回到身边？但她觉得组织上对他们一家已很照顾，女儿一家在泰安也算安居乐业，也就一直未提调回的事。就这样，邓小岚在那个制药厂，整整工作了二十五个春秋。她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是在泰山脚下，圣人故乡这个小小的城市度过的。

直到1995年，小岚的儿女都将从山东的大学里毕业时，年过半百的夫妻俩才想到，该叶落归根，给儿女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天地了。经过一番努力，夫妻俩双双调回了北京市公安局。

学化工的邓小岚到了科技处，丈夫则到了企业管理处。对于刘青岗来说，他这是老兵归队——三十多年前，他正是从这里去支援西藏建设的。

小岚的女儿，山东师大毕业的刘明明，在北京石景山区一所新建的中学当了一名音乐教师，儿子刘继伟子继父业，也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

今年五十四岁的邓小岚，每天除上班外，还担负起了照顾年迈体衰的母亲，帮助母亲整理父亲遗作，办《肾友之音》小报等等责任。像在过去的几十年岁月中一样，她默默地生活着，尽着自己的一份力。

1997年夏季的一天，当笔者在北京茂村居小区第一次见到邓小岚时，不禁暗自感到惊讶：面前这位脸上已有了皱纹，体态微胖的中年妇女，看上去是那样朴素，那样平凡，丝毫没有名人之后的骄矜。她谈吐谦和，举止淳朴，酷似父亲的面庞上带着诚恳的微笑。这就是那个给毛主席献过花，跟朱总司令照过相的小姑娘小岚吗？就是那个爱用银铃一般的嗓子唱歌，爱学乌兰诺娃跳芭蕾舞的中学生小岚吗？对，不要忘了，她就是那个晋察冀边区妇女用奶水养大的小岚，就是那个念念不忘自己农村养父母的小岚！

1967年当株连之风正盛时，小岚的干爹和干娘不顾危险，让农村的哥哥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打听到厂桥麻花胡同看望小岚和一岚一家；小岚还记得小时候有了好吃的，干娘总是留给自己，哥哥偷吃要挨巴掌；和哥哥玩时吵了嘴，干爹也总是护着她，吼上哥哥几声。她不曾忘恩，父亲平反以后，曾多次带着子女回到“老家”，探望年迈的养父母。1997年初夏，小岚和妹妹小虹，又有一次难得晋察冀“故乡”之行。姐妹俩循着

父母当年生活、战斗过的足迹，来到西柏坡，来到阜平，到来马兰村，她们看到了保留着晋察冀日报社遗址的滚龙沟，看到母亲当年播过音的陕北发射台；她们在父母当年订心盟的滹沱河畔徜徉，在父母结婚的农屋前合影。更有意思的是，在母亲生下小岚的麻棚村，她们遇到了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妈贾瑞，这位大妈还记得当年的“小岚子”，她大声叫着小岚的乳名，啪啪拍着她肩膀说：“当初，我还差点奶了你呢！”她们每到一地，都感到了乡亲们那浓浓的亲情，如今五六十岁以上的乡亲说起报社、说起老邓来，似乎在说家中刚刚离去的亲人一样。当邓小岚指点着她们此行拍下一大摞照片，用激动的语气向笔者叙说这一切的时候，我从心里感到：老根据地妇女的乳汁已融化进小岚的血液里了。

小岚的半生过得那么平凡，但谁能不说，这平凡中有像金子一样闪光的东西呢？

小 云

“今天正好是5月18日，是父亲去世的三十一周年。对我们整个家庭来说，这是个黑暗的日子，是个能勾起无穷的痛苦回忆的日子。每年到今天，我都不会特意对妈妈提，她也不说什么，但我知道妈妈心里在想什么。我们是心照不宣，各自默默地悼念着父亲。今天早晨我还跟妈妈通了电话，我们谈了不少家常，谁也没提今天是什么日子，这已经是三十年的习惯了。在妈妈的晚年，我希望她能轻松愉快地生活，尽量少受些伤心痛苦回忆的刺激，可这对她来说又谈何容易呢！人怎么可能不

回忆过去呢……”

这是邓拓的长子邓云于1997年5月的一天，寄自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封长信中的一段。他永远忘不了三十一年前的那一天，从那天起，他和他家庭的命运，那美好的一切都突然改变了。

1965年夏天的小云，是天之骄子，是个人人羡慕的大男孩。他有良好的家世，优良的学业；他高大，壮健，俊美，一副嘹亮的歌喉，还是运动场上令人瞩目的健儿；他目光炯炯，充满自信，似乎集中了十九岁的高中生应该有的优点。尤其是，在那崇尚“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当兵”的年代，他已经被中国空军招为第十四期飞行学员，这是在众多应征的优秀男儿中，层层淘汰，硕果仅存的一个啊！他成了母校一〇一中学的骄傲，也是父亲邓拓和母亲丁一岚的骄傲！鲜花、彩旗夹着赞誉向他飞来，母校为他举办了欢送大会，父母和全家专程到车站为他送行。伴着父母那般切的目光，谆谆的嘱托，他来到保定航校受训。

小云一入伍就被任命为一班长，还被推选为团支委和士兵委员会委员。他没有辜负长辈和上级的期望，刻苦投入训练，1965年底的大考核中，他射击总打成绩优秀，手榴弹扔出七十多米，刺杀无人匹敌，各项智力考核和地面训练项目都取得全期学员第一名。他还帮助文盲战友，偷偷地给家庭生活困难的农村士兵家里寄钱，被部队誉为“王杰式的好战士”，评为“一帮一、一对红”的标兵，多次受到校党委和北京空军党委的表扬和嘉奖，1966年3月，即要被发展入党，远大的前程正向他召唤。当时我国航天技术已有很大的进展，在给家人的信中，他曾用充满自豪的口吻写道：“中国第一代宇航员，将从我们中

间产生！……”

1966年5月18日，“这一切的一切”“已如梦幻般逝去”。

①当时，小云正在山西大同陆军连队里当兵锻炼。邓拓遭到公开点名批判后，陆军部队坚持“正面教育”，干部战士们对这个勤勉的战友，仍怀有淳朴的感情，并未因父亲的“问题”而找碴为难他，小云持有的一支半自动步枪，也未被收缴。

8月份，陆军班长回北京郊区顺义县休假探亲，听到“邓拓已经死了”的小道消息，回来告诉小云。小云如雷轰顶，立即写信向家中询问。母亲回信证实了这一消息，但是，父亲是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死后是怎么料理的，信上都没有说。小云体谅母亲的难处，也没有问。

一时间，小云感到五内如焚。他一遍遍地想起去年的10月，他随部队路过北京，爸爸妈妈到车站看他的情景。他真后悔没有充分利用那短暂一个小时的每一分，每一秒，再仔细看看爸爸慈爱的容颜，聆听爸爸最后的赠语。现在，这一切再也不可能重现了！

当然，这些，只能是小云在夜深人静、泪湿枕巾时悄然的思想活动。白天，他还要表现得和父亲“划清界限”呢！9月，小云回到航校，发现自己已被打入“另册”。他所担任的班长、团支委和士兵委员会委员职务，全被撤消，入党更是不可能了。当时，正值毛主席在北京大规模检阅红卫兵，北京军区各院校的干部、学员全部被调进京，执行训练红卫兵的任务。小云他们航校除了每个大队留一个看家的外全都走了。小云自然是没

①邓云《回忆我的爸爸邓拓》。

有资格训练红卫兵的，他探亲的申请也未获批准。小云只得留下，过了一个多月只身子影的生活。

小云独自住在一幢空楼里，校园里空荡荡地见不到一个人，只有在吃晚饭时，才能与大队值班的大师傅见个面，打声招呼，陪伴他的，只是一个篮球。

大队人马回校后不久，大部分学员都转到各处学飞去了。小云明白，自己因为父亲的问题，已被从政治上淘汰，此生再不可能当飞行员，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了。他感到万分遗憾。

小云和因各种原因不能学飞的三十多人被留在航校。部队院校也开始搞“四大”，打派仗，乱得不可收拾。在这动乱的环境中，是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的。

1968年5月，航校领导批准小云探家。他回到离别三年的北京，找了好久，才找到厂桥麻花胡同那间低矮窄小的平房。父亲已是踪迹难寻，母亲和姐妹怀着幽愤难言的心情迎回了家中惟一长大成人的男子汉。小云不得不和一家人挤在这间十四平方米的蜗居中住了两个星期。看到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被整得那么凄惨，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心里怎能不有气、有火？他感到像一只年轻的猛虎被锯断了钢爪，束缚住了四肢，恨不能向长空发出隐忍了许久的凄厉的长啸。

回航校后，小云的脾气变得异常暴躁，他想发泄，想向所有的人大喊：我们也是人，也有生存的权利！他想不通：我邓云仍是三年前的那个邓云，为何只因是邓拓的儿子，一下子从香饽饽变成了烂泥巴？然而，这正是那个荒谬年代的法则。“黑帮的狗崽子”当时处于最低下的地位，任何人都可以对之歧视和侮辱。他不仅不能喊，就是对这种歧视和侮辱也是无力抵抗的。这种来自整个社会的权势，是那样强大。

小云毕竟是个年轻健壮的小伙子，周身奔流着来自父亲那不甘屈辱的血液。他把无处发泄的精力用到了体育锻炼上，每天俯卧撑，仰卧起坐、单杠、双杠，他给自己提出“锻炼身体，保卫自己”的口号，直练得筋肉发达，胸宽臂壮。平时生活中与周围的人们难免会有些小摩擦，一般的争论，争完了就完了，他并不去计较；但是，如遇有人敢恶言相向，“邓拓的狗崽子”一类辱骂一出口，小云就会热血上涌，不顾险恶的处境，让那小子吃一顿老拳！在性格上，小云可比父亲邓拓冲多了。那三个月中，他因反抗侮辱打了三次架，心中一股子怒火顶着，一次比一次打得凶，对手也一个比一个伤得重。终于，1968年8月，他被迫复员，回到了北京。

小云复员后，当务之急是得找个工作养活自己。这批复转军人有一些中小学教员和服务行业的安置指标，而小云被告知：他的出身背景不能当教师，会把下一代教坏了；服务行业呢，连海淀副食基层店卖油盐酱醋的岗位，也只有“根红苗正”的人才能担任，小云只好待业在家，成了海淀区安置办的“老大难”。

幸而，安置办有个当过老红军的好心的老主任。第二年春天，北京锅炉厂向海淀安办要五十个复员军人，正好有一批复员兵刚分下来。老主任就给了锅炉厂四十八个，加上小云和另一个“老大难”蒋南翔的儿子蒋延东，正好五十名。名单送到“北锅”劳动科，两个“黑帮子女”的档案被退了回来，让换两个。老主任早有所料，对来说：“要就五十个都要，不要就都退回来，以后再也甭跟我要人了！”“北锅”没辙，只好收下这两个烫手的热山芋。就这样，小云于1969年3月进锅炉厂当了一名车工，一干就是十年。

虽然进了工厂，但小云丝毫也没尝到那年头备感荣耀的“工人老大哥”、“领导阶级”的滋味。他仍是“邓拓的狗崽子”，仍要受到名为师傅，实为监督员的人随时随地的监视，他的一言一行，常被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进行报复”的“反动言行”，他动辄得咎，常常挨批判、写检查。

进厂后不久的一件小事，令小云感情备受挫折，至今难以忘怀。那是一次民兵集会，小云自知这种活动不该有自己，就埋头干活，没有动。可几个同车间的民兵一边往外跑一边招呼：“走哇，邓云，复员军人都是民兵！”小云跟着去集合，站进了队伍。谁知民兵连长，一位老转业军人一见他就喊起来：“出去！这儿没你的事儿。”小云在众目睽睽中被迫走出队伍。那一瞬间，一种深深的屈辱之感咬噬着他的心！

然而，自幼聪明过人的小云却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技术，因此车间里一进新车床，主任就让小云开。有人提意见说这是“路线问题”，主任一瞪眼把那人顶了回去：“那没办法，新床子精度高，干精活不让他干让谁干？你去？来了精密活你干得了吗？！”

滑稽的是，在技术上受到重用的小云，在长工资上却受到了刁难。作为复员军人，一进厂就是二级工，每月拿四十元零一角的工资，这个工资八年未动，每次调工资都没有他的份儿。直到1977年有文件说：1966年参加工作的，不够三级工的一律调成三级，小云才长了一级，拿到四十七元的工资。

1973年小云结了婚，妻子郭北满是中央歌舞团的舞蹈演员。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时，小云到厂医务室泡了几天病假，汇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悼念总理的洪流中。他用照相机拍下了

一个个珍贵的镜头：如山如花的花圈、标语和诗词；哀痛、愤怒的人群。他感到了一股强大的、正义的力量，这力量正欲冲破十年的黑暗，迎来一个云开雾散的黎明。

几天以后，他被叫到公安分局，让交待是否参加了这次悼念活动。小云一口否认，审讯的人说：“你们锅炉厂有三千多人，为什么我们不找别人单找你呢？”

“对了”，小云脱口而出：“锅炉厂虽有三千多人，可邓拓的儿子就我一个，你们不就是欺侮我这点吗？！”

他在心里喊着：你们老想用家庭的情况来欺侮我，我就是不服！

这种“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可怕的血统论，终于随着“文革”的结束，成为可笑可叹的历史。

1978年底，中央决定给邓拓的冤案平反，小云通过父亲生前的好友调到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搞摄影。

1979年，“三家村”一案公开平反，小云发表了感人至深的长文《回忆我的爸爸邓拓》。

已经三十三岁的邓云，扪心自问，还谈不上“而立”。他还有一个未圆的梦——大学梦。十三年前，无情的现实击碎了他的蓝天梦。如今，噩梦醒来，该在人生的道路上再奋力一搏了。然而机遇又一次与他擦肩而过。虽然1977年恢复了高考，但小云已超过了规定的年龄线，在国内上大学是不可能了。他不甘心，在国内读不了大学，就到国外去读！1981年的一天，邓云在亲友的帮助下，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殿堂。

在国外求学是艰辛备尝的。刚到美国时，邓云完全不懂英文，不会讲，不会写，上课听不明白，他非常着急。令他意想

不到的是，这时父亲邓拓在海外知识界已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却奇迹般地帮他度过了难关。

1981年底，邓云在芝加哥，除上学校补习英文外，很想找个懂中文的美国人做交换语言，互相辅导。用这种方法可以不必付钱，因为他已付不起额外的学费了。

朋友为他介绍了一个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工作的馆员比尔·奥斯勃。这是个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的白人，年轻时曾在加州美国空军的语言强化中心学习中文，然后派驻在亚洲某地服役，做中文资料工作。

1982年1月的某一天，邓云按约定时间来到芝大图书馆。他很容易地在中文部找到了比尔。比尔是个有着大啤酒肚的胖子，一见面，就把邓云带进一个隔音间，在那里可以大声讲话，不会影响其他人。

隔音间里有一张长桌，围着十来把椅子。他们在桌子一角的椅子坐下。比尔提议，第一次见面先互相做自我介绍。他的中文比邓云的英文好得多，那天他们就全用中文交谈。比尔先讲了自己的家庭、身世、经历，然后对邓云说：该你讲了。

邓云也是从出生讲起：1946年生于张家口，1949年随父母到北京，1965年7月高中毕业后到工厂当工人，干了十几年车工，1979年转到社科院当摄影师，然后出国。

在这里，邓云有意隐瞒了参加空军那三年的经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难以对一个外国人说清的。

谁知，他面对的却是比尔这么一个“中国通”。比尔一下子听出了漏洞，穷追不舍地问：“你高中毕业，为什么没上大学？”

邓云说：“你一定听说中国那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学生们都上山下乡去工厂了，学校都停学了。”

“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才开始的，可你说你是1965年7月高中毕业，应该是可以进大学的。”

邓云被他这么一问，不知如何作答，只好“招”了实话，告诉他自己高中毕业进了中国空军当飞行员，可后来爆发了“文革”，没飞成，只好进了工厂。

“为什么‘文革’一爆发，你就不能做飞行员了？”

“因为我父亲被作为反党分子、反革命黑帮头子而受到全国批判。”

“他叫什么名字？”比尔似乎是有所预感地问。

“邓拓，他的名字叫邓拓。”

这时，戏剧性的场面发生了。没等邓云话音落地，比尔“嚯”地站了起来，好像给邓云立了个正，说：“真没想到，在我面前是那样一位有名的人的儿子。”说着，他用手指一勾，说了声：“跟我来！”

邓云跟着比尔走出隔音间，绕来绕去穿过许多书架，最后停在两排书架之间。比尔极其熟练地取下一本名人大辞典，迅速翻到“邓拓”那页，放在一张桌子上；又取下另一本人名大辞典，照样翻到“邓拓”那页，也放在了桌子上；不大一会儿，他共拿下三种不同版本的名人大辞典，还有《燕山夜话》合订本，《三家村札记》、《中国救荒史》，以及“文革”初期批判“三家村”期间的《人民日报》合订本等等，摆了满满一桌子。他对邓云说：“你爸爸是个了不起，非常伟大的人！”

邓云有些激动。他没有想到，在异国他乡，父亲的名字能被这些不同国籍不同种族的人所记得、所崇敬，也没有想到，在这遥远的太平洋彼岸，能一下子见到这么完备、丰富的有关

父亲的著作和资料。

后来邓云才知道，在美国堪称一流的芝加哥大学，在图书馆里中文书的藏书量名列全美第三位，它给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和环境。

比尔接着对邓云说：“我要介绍一个人给你。”

邓云又跟着他在书架间穿行，径直走到一个书架组成的小天井，在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位年纪大约五十多岁头发灰白的女士。她就是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十多年后写成《时代之子——吴晗》一书的作者，马紫梅。

当时，马紫梅女士正在研修中国语言和历史博士学位，天天埋头在这浩瀚的书海之中。

比尔和马紫梅，这些对中国有着特殊感情的美国朋友，给了邓云热情的帮助。他顺利度过了语言关，进入印地安那州立大学。他继承了父亲热爱艺术的秉赋，专攻东方艺术史专业。

不久，邓云的妻子也来到美国，他们在美国定居下来。虽然远在地球的另一端，但他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父亲洒下热血的土地和故乡的亲人。他在工作之余积极从事中美文化交流活动，参与了北京三家村文化实业公司的筹建，并担任副总裁。从1993年到1995年这个公司组织和资助出版了《邓拓诗集》、廖沫沙的《瓮中杂俎》和马紫梅的《时代之子——吴晗》，为继承父辈的遗愿，弘扬中国文化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996年5月，邓云专程回国参加父亲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会后，他返梓拜谒邓拓纪念馆，感谢家乡的父老乡亲。这年五十周岁的邓云，第一次踏上故乡福州的土地。他冒雨游览了鼓山，亲履了父亲留有照片的喝水岩，抚摸着留下父亲手泽的摩崖石刻；他回到故乡第一山房，在父亲的卧室、书桌前流

连忘返，与族人晤谈，在祖居前合影留念。他眼眶饱含泪水，年至半百，终于圆了故乡梦。

邓云并未陶醉在逆境中奋斗半生所创造的今天的成绩上。因为在他心中，有一个无比高大、辉煌的参照系——父亲邓拓。在接受电台记者采访时他说过这样的话：“我已接近当年父亲离世时的年龄。可以说，对父亲的感情是在父亲死后才明显深刻起来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父亲的理解和敬爱与日加深，对比父亲一生创下的丰功伟绩，我们这一代是永远达不到那个高度，只能自叹弗如。”

在接受笔者书面采访的信中，邓云还说了这样一段话：“对于我们的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不论以当时的眼光看，还是以现在的眼光看，都是灾难！刻骨铭心的灾难！丧失了父亲和改变了我们一生命运的灾难！！那痛心疾首的创伤和损失是终生无法治愈和挽回的。我不想用什么一分为二的方法去分析我们的遭遇，不想用‘文革使我们在大风大浪中，在逆境中得到了锻炼’这类的词句来安慰自己、欺骗自己，因为我知道如果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文革的话，现在一切都会更好的。”

这两段话发人深思，令人叹息。我相信，研究现代中国历史和“文革”现象的学者，会从这两段话中得到某种启示。

小 虹

邓家的孩子可分为两组：出生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的小岚、小云是一组；50年代一个追着一个降临人世的小虹、阿壮、岩岩是一组。邓家的孩子个个漂亮聪慧，开朗活泼，多

才多艺，然而硬要论起谁最“聪明”来，则有两个说法：小虹说，大哥最聪明，只是机遇不够好；而母亲和大姐说：小虹最聪明！是啊，在被称为“老三届”的一代人中，邓小虹不愧为佼佼者：她读了大学、研究生院，取得了医学硕士学位，还留过洋，会熟练使用两国外语；她刚过不惑之年就担任了北京市妇产医院副院长、研究生导师，出版过学术著作，是该院肿瘤科深受患者和同事们爱戴的好医生；此外，她的书法大有乃父之风，还写得一手好文章……一般的人，有这些长处中的一个，就已经值得自豪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虹确是个才女，是个令人羡慕的生活的强者。

然而，谁能想到，二十多年前，她还是陕北一个偏僻小山村的“婆姨队长”，而且从未想过有一天会离开那片黄土高坡呢。

1966年4月16日首都各报纸公开批判《燕山夜话》后的一天，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二学生邓小虹，在教室里的大批判壁上贴出了一张批判文章，上面用秀丽的笔体写着：尽管邓拓是我的父亲，我也要党和人民站在一起，坚决进行批判。一时间，壁板前人头攒动，女孩子们纷纷议论着：“原来邓小虹是邓拓的女儿，真想不到……”

小虹心里很紧张，从四月开始的对父亲的公开批判，尽管语文课上成了批判课，她也被要求和同学们一起写了批判文章，但是，同学中没有几个人知道她的家世。在这所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女聚集的名牌学校里，小虹从来不炫耀自己的父亲。而在这批判的浪潮中，小虹从小受的教育却促使她站出来表态。她知道，这样一来，自己无异被拉到大庭广众中示众，被架到了烈火上烤。越烧越旺的斗争火焰将把她和她的一家带到哪里，

她不敢去想。

当时，姐姐弟妹都住校，哥哥在部队里，暂时还未被卷入漩涡的中心。小虹是惟一走读的孩子，她最直接、最深切地感受到了家中那死一般的沉寂和压抑的气氛。

5月17日，大喇叭里播出了戚本禹的那篇文章。“叛徒”！这卑鄙的字眼狠狠刺伤了小姑娘的那敏感的心。小虹从小爱读文学作品，叛徒，不就是出卖江姐的甫志高那样的人吗？她不敢把那个形象与自己光明磊落，一向受人尊敬的父亲连在一起。可是，同学们向她射来了一道道憎恨、仇视的目光，她像是突然被判为患了麻风病的人，连平时最好的朋友也悄悄躲开了。她心里充满矛盾、痛苦，却无处诉说，也没有人能向她解释这一切。

小虹一路哭着跑回了家，爸爸正巧从书房回办公室，在过道上碰了个正着。几天来，她一直回避和父亲见面，不知该如何面对父亲。仓促间，小虹使劲瞪了爸爸一眼，一低头过去了。这一眼是恨、是怨、是疑？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然而这竟成了与爸爸对视的最后一眼！就是这一眼，给小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痕，每一想起，便痛苦追愧不已。

晚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从卧室旁的洗脸间里传来妈妈的哭声，那是一种压抑的，痛彻肺腑的悲泣。爸爸的书房门紧闭着。她不知道，父母间刚刚进行了一场生离死别的谈话。

18日是个星期日，不知为何，姑姑房里传来姑姑的隐泣声和妈妈小声的劝慰声。爸爸不见了。问妈妈，妈妈说爸爸犯心脏病住院了。那一瞬，不知为何，小虹竟感到了一丝轻松，爸爸不在家，至少不用担忧如何面对父亲了。

要强的小虹照旧早出晚归上学校。她是“狗崽子”，没有

资格参加红卫兵，那些颐指气使的“红小将”随时可以欺侮她。

“邓小虹！自行车拿来使使！”于是，小虹的自行车被抢走，一连几天不还，她只好步行十里上下学。

那时，学校里已是一片混乱。高音喇叭整日喧嚣不休，各派造反组织都在慷慨激昂誓死捍卫“真理”；师大女附中昔日文静的“淑女”中，突然冒出了一批凶神恶煞，打人打出了名。民主革命时期就参加了北平地下党的温文尔雅的女校长，就惨死在这些造反英雄的棍棒之下。特殊的时势调动了残留在一些人灵魂中恶的基因。小虹看到这毛骨悚然的一切，不禁开始心生怀疑：难道这就是“革命”吗？

一年以后，小虹隐约听到有人传言：邓拓死了！她问妈妈：爸爸还在不在？丁一岚这才告诉她弟弟、妹妹，爸爸已经死去一年多了！

乱了一阵以后，最高统帅挥手，上山下乡的热潮开始了。小虹是个不服输的女孩，她要用坚决下乡的行动表明自己革命的愿望，向同伴显示自己不是时代的落伍者。去哪呢？她想到了母亲。母亲当年去延安，不正是自己现在的年龄吗？在小虹心目中，延安是一块革命的圣地，也是一块净土。她报了名，干脆，连名字也改了，就叫母亲当年在延安叫过的名字：于虹。两代于虹，都在十六岁时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和激动的一件事啊！

丁一岚非常支持女儿去延安插队。当时十几元的生活费，是无法为女儿准备行装的。她写申请，列购物清单，向广播局领了一百多元，凭女儿的下乡证明信买了箱子、塑料布和球鞋等用品。1969年新年，全家在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片，欢送家中第一个上山下乡的孩子。

节刚过完，全家孩子到车站为小虹送行。月台上挤满了下乡知青和他们的亲人，许多人都哭哭啼啼的，小虹却欢天喜地。她像一只出笼的小鸟，总算摆脱了那个令人窒息的环境，想到那广阔的天地去试一试羽翼。

车到铜川，换敞篷大卡车，行驶在山峦起伏的黄土高原上。正是旧历新年的前夕，山野披挂着皑皑的白雪，知青们却一路唱着歌，脸蛋兴奋得通红，丝毫不觉得寒冷。到了延长县黑家堡公社，老乡们拉着小拉拉车来接各村的知青。粉条猪肉白馍馍，唢呐、吹鼓手呜呜哇哇地吹，好一派热闹的喜庆劲。小虹高兴地想：妈妈当年到延安，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吧？

于虹他们一行九人：五个女附中的女生，四个三十一中的男生，跟着小拉拉车，一走三十里山路才到了那个小山村，住进老乡为他们预备下的窑洞。热情的老乡们送来了过年才吃的油糕油馍，满满盛了一大筐箩。第二天一早起来，开门就见老乡踏雪来送水，一群穿家织的粗布红袄绿裤的陕北娃围在门前，见知青们用牙刷刷牙用脸盆洗脸都是那么新鲜；一个娃娃把小虹的塑料布顶在头上，在这个闭塞的小山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城里人早已司空见惯的物件哩！

接下来的现实就远不是那么浪漫了。

小山村没有电，吃水要走十来里山路下山去挑；吃的粮食是用沿袭了几千年的古老的耕作方法种出来的。男人们扶着犁铧播种，操着镰刀割麦；婆姨们挥着镰铜脱粒打场，赶着毛驴绕着碾道磨面，那有节奏的拍打声，碾子的吱呀声和着悠长的“信天游”，似乎在这片土地上回响了几千年。

知青们干了一天累活，回来后还得自己砍柴担水拉风箱烧火做饭；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村中大人娃子多数是文盲，天一

黑，劳作了一天的人们便上炕歇息了。这时候满怀豪情的知青们才开始体会到：“共产主义”离得还很遥远呢！

最初的新鲜劲、热烈劲很快便消失了，水土不服使许多知青身上长了大疱，流出黄水。不到半年，知青们受不了啦，一个接一个离开了小山村，最后只剩下虹。

小虹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她也不奢望自己能像别人一样回城。她只希望能在这里适应下来，自食其力，尽量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

好在，从小参加少年体校游泳班，使她练就了好的体质和吃苦精神。她干起活来像陕北女子一样泼辣，被推选为“婆姨”（妇女）队长。

她回京探亲，千方百计借来不少世界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毁灭》，就着小油灯，她在贪婪的阅读中度过长夜。

一位知青朋友带来一架手摇唱机，成了他们惟一的文化生活“奢侈品”，七十八转的胶木唱片，把他们带入世界名曲，瑶族舞曲组成的仙境。

在现实生活的磨炼中，她变得成熟了，开始对父亲和自己一家的命运进行思考。那么多革命的功臣都被打成了走资派、内奸，入过狱的都成了叛徒；那革命是靠谁搞成功的？为什么被打倒的叔叔伯伯许多都是像爸爸一样和蔼可亲勤奋工作的人？她开始重新认识父亲，父亲的博学多才，父亲的言谈笑语，重新变得那么亲切而富于永久的魅力。她从家中带来了母亲珍藏的父亲的诗篇，用当年父亲给她买的小铜墨盒，开始摹仿父亲那潇洒苍劲的笔体练习书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从父亲的遗诗和书作中，体会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底蕴。

不仅独善其身还要兼济天下，她要改变周围落后的面貌。她办起了扫盲班，自己刻蜡板，印成识字课本发给老乡。乡亲们真实在，过去吃了饭就上炕，如今再困也要来小学校听于虹上课。她给乡亲们的门上贴个“门”字，窗上贴个“窗”字，……过了几个月，大字不识的汉子婆姨居然能撇着山里腔念《谁是最可爱的人》了。此外，于虹还当过一阵子民校教师，村里的墙报上，是她画的漂亮的宣传画和写的美术字。

在延安这片僻远的黄土高坡，曾经历过两次文明的冲击，一次是红军建立抗日根据地，全国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这里，延安成了革命的摇篮，延水河畔集中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一次就是六七十年代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管历史将如何评价这场运动，它毕竟又一次给蒙昧闭塞的黄土地撒下了文明的种子。知识青年自发的传播文化的活动，至今已从那些上了大学中专的陕北娃身上，从乡亲们告别了刀耕火种般的传统生产方式，步入现代文明的进程中，看到了效果。而两代于虹，正是在这两次文明冲击中来到延安，把她们青春的热情奉献给这片热土的。所不同的是，母亲当年是作为一个光明事业的精英分子在这里受训，一切是那样的灿烂和美好；而女儿则是背负着命运的十字架在这里“改造”，前途未卜，吉凶难料。

一个女孩子独自在山里生活是艰辛的更是危险的。有一次，干活时下起了倾盆大雨，小虹从山头背着一大捆麦子往窑洞赶，雨水将黄土路冲得溜滑站不住脚，小虹用镰刀刨一个坑，迈一步，小心翼翼地向下摸索。暴雨遮住了视线，一个陡坡，她收不住脚，向山下滑去，幸好一个老乡路过拦住了她，不然她会摔个粉身碎骨。这样的险境在她插队的七年中，遇到了多次。

夏季延河发大水，小虹和在地里干活的婆姨们被拦在了河

对岸。她施展游泳运动员的本领，一气游过滔滔的洪水，到了岸上，一身的黄泥汤子使她和周围黄土地“不分彼此”了。

小虹下乡三个月后，弟弟阿壮也到了这里，在离小虹所在村二里地的岳口村插队。1972年陕西省在知青中招工，岳口村的知青也走光了，只剩下阿壮一人，小虹才转到条件比较好些的岳口村和弟弟相依为命。

那时候，知青中大规模的招工招生已经开始，但小虹阿壮姐弟自知没份儿。公社开招工动员大会，别人成群结伙有说有笑地出山开会，他们却像往日一样和社员一起进山干活。小虹并不羡慕去工厂，工厂里成天搞运动、大批判，充满火药味，远不如这农村“世外桃源”来得清静，淳朴的农民对这些落难的娃儿没有歧视，反而敬重他们是大地方来的文化人。在她内心深处倒是怀着一个从小就有的愿望：上大学！她总是不觉地来到延安大学的围墙外，远望校园里灯火通明，心里羡慕不已。她毕竟是数代书香之后，学者、诗人邓拓的女儿。她开始找来中学课本，学习数理化。

一年年过去，大学大专年年招生，年年于虹榜上无名，她有些气馁了。

1975年夏天，小虹回京探亲，经过延河大桥，碰上一位熟悉的县里干部。那干部一见她就说：“于虹，咋要回家，不上大学了？”

小虹一愣：“能报名吗？”那干部一笑：“往年不能，今年能！”

原来，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工作后，开始纠正一些错误的做法。所谓“黑帮子女”们看到了希望，就往中央文革、市革委会投书要求上学、招工的权利。妹妹岩岩也往中南海的信箱

里投过信替兄姐鸣冤。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央专案组给小虹所在的地区来了信，说明父亲的问题不应影响子女分配，正巧这时有几所西北地区的院校来县里招生。

小虹欣喜若狂，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该报哪所学校哪个专业呢？父亲在“文革”中的遭遇，自然使她不愿考虑文科。她想到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想到与自己相好的一位大嫂，因为难产大年初一死在炕上的惨状，决定报考西安医学院。那时没想到还能返城，只是想，学好医，将来回来为乡亲治病。

小虹被西安医学院录取了！电报发到北京，母亲丁一岚高兴得哭了，没有想到，女儿还有机会迈进大学校门。

小虹确实聪明过人，而更重要的是她有超过常人的勤奋和毅力，靠着这些，她成了大学里的优秀学生，成了陕西省肿瘤研究所的第一批业务人员。1979年父亲问题平反，小虹调回北京，又成了北京市肿瘤所的一名妇科医生。

进入八十年代，小虹深感知识更新迫人，她决定报考研究生。这年三十二岁的小虹早已结婚，还怀了孩子。无论是做学生还是做母亲，都算高龄了。但这些并没有动摇她继续深造的决心。经过严格的选拔，她通过了武汉同济医学院研究生院的初试，体检是请妹妹岩岩代替的。待她登上去武汉的列车去面试时，离分娩只有不到一个月了。

导师见到这位“大腹便便”的学生，深为她的精神所感动。复试顺利通过，小虹回北京生下了儿子，产后四个月，小虹就去读研究生了，孩子由婆婆照顾。待她拿到硕士学位回来时，儿子已经三岁了。

小虹回到肿瘤所，几年后又调到妇产医院。她勤奋工作着，在患者中享有很好的声誉。一年多以后考取了日本一项医学奖

学金，赴日本学习一年。

回国后小虹当了妇产医院副院长，主管教学科研。她本来有很好的英语基础，去日本进修在学习尖端技术的同时又“顺手牵羊”攻下了日语。她从未离开过医疗第一线，为癌症患者解除病痛，是她此生的追求。

1997年夏的某天，当笔者在北京妇产医院采访邓小虹时，亲眼看见这位副院长忙碌的一天：上午，她主持院内学术交流；下午，她给两名研究生上了课，起草科研报告和培训计划；晚上，她穿着手术服，一副临战待发的姿态，边在病房带班，边与笔者侃侃而谈。她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始终充满自信，举重若轻，大有其父的实干精神和其母的泼辣干练。

她有个幸福的家庭，丈夫王新毕业于河北大学哲学系，现在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他像岳父当年支持岳母一样支持妻子的事业。

对父母，小虹怀着深厚的敬爱，并且随着时光的推移这种感情与日俱增。她说过一段与哥哥邓云所说的颇为相似的话：我是在父亲去世后，从他的著作和不断发表的对他的回忆、纪念文章中，才逐渐了解了父亲，从而理解到他的伟大。她以自己是邓拓的女儿而感到骄傲，而她在文学上的才华，也在帮助母亲整理父亲遗著的工作中得到了提高。

阿 壮

阿壮比生在战争年代的哥哥幸运，一生下来就壮得像个小牛犊儿，因此得了这么个威武的名字。

阿壮在学校的小班集体里挺有威信，不是因为学习拔尖，也不是因为当班干部，而是因为他“玩”得好——他是班级足球队的中锋，又是校鼓号队的大鼓手，那股子灵劲儿挺让老师和同学喜欢。

因此，1966年春天爸爸挨批判，老校长看见十三岁的小学生阿壮也跟着跳着脚嚷嚷呢，不禁同情地说：“阿壮，你怎么还跟着人家斗啊！”阿壮闪着纯真的大眼睛，理直气壮地说：“毛主席让我们这么做嘛！”老校长叹口气，只有摇头苦笑。

对爸爸的批判“升格”以后，小伙伴跑来对阿壮说：“阿壮，你爸爸是反党分子！”阿壮像个大人样一本正经地回答：“我爸爸是反党分子，我也不能答应他反党、反国家，我要和你们一样批判他嘛！”

星期日下午该回学校了，阿壮向爸爸的书房望着，心里犯了嘀咕：该不该去和爸爸告别呢？往常，每到返校的时间，总是要去向爸爸亲亲热热道别的，而今……阿壮犹豫再三，还是推开了书房的门，眼睛看着地，闷闷地说一声：“爸爸，我们该上学了！”爸爸正心事重重地看报，随口“嗯”了一声，连报纸都没放下。而平时，爸爸总要放下手里的书报，走过来拉拉孩子的衣角，整整红领巾，亲切地嘱咐几句的。一切都变了！阿壮心里酸酸的，却又像个大人似的叮嘱爸爸：“报纸和广播上的批评，你可要正确对待啊！”爸爸又“嗯”了一声。这一刻阿壮觉得，就像自己平时犯了错，爸爸开导自己一样，怎么“革命”一来，一切都颠倒了个？

出来碰上姐姐小虹，阿壮又嘱咐不住校的姐姐：“最近爸爸看着身体不好，你多照顾着点儿！”从小就善解人意的小小的阿壮，说完这句话，才觉得心里轻松了点儿，上学去了。谁

知，当他下个星期放学回来爸爸却不在家。妈妈说，爸爸犯心脏病住院了。阿壮想去看看爸爸，但一想到要“划清界限”，就没敢提。直到一年以后，他才知道，再也见不到爸爸了。

北京小学也搞开了运动，老校长怕六年级的阿壮受欺侮，就让他提前回家，不必到校了。家中警卫员、保姆、炊事员都走了，赋闲在家的阿壮成了全家人的炊事员和“阿姨”。打扫卫生，买菜买粮食，做全家的饭，这对十三岁的男孩子谈何容易！好在阿壮从小心灵手巧，爱琢磨。他自己用木板钉了个四轮小车，拉着买蜂窝煤。煤有了，可炉子怎么生呢？一问邻居，才知道得先劈劈柴引火。炉子会生了，馒头怎么蒸呢？阿壮学着别人的样，把面揉成一个个圆坨坨放到锅里，蒸了半天还是一个死疙瘩；又听人说得放碱，就往面团里掺了许多碱面，再一蒸，成了一个个黄球球，尝一口，又苦又涩；他又试着用小苏打当酵母，把面放在热地方发，心想这下总该成了，谁知黄球球又变成硬木家具那样的古铜色，还有一股馊臭味儿。最后阿壮终于弄明白了面肥发酵的道理，蒸出了一锅又白又胖的大馒头！阿壮心里这个乐呀！别出心裁地又蒸了糖包、糖饼。晚上，妈妈和姐妹们从纷乱喧嚣的学习班、学校回来，总算能吃一口阿壮做的香喷喷的饭菜，解一解身心的疲惫了。

搬到麻花胡同后，阿壮上了北京十三中，那时中学的课程，语文学毛主席诗词，政治学毛泽东选集，英语学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数理化”、文化课成了封资修黑货被取消，大批判却成了主课。邓拓的儿子分到这个班，正好有了批判的靶子。教室里横七竖八地拉着铁丝，挂满批判阿壮的大字报。大小批判会上，让阿壮做检查，认罪认错。这时的阿壮已不像小学时那么幼稚，他不明白自己有什么错，难道邓拓的儿子就天生有

罪？他倔强地不低头，检查就总也过不了关。

学校里日子不好过，渐渐地，阿壮有了一些合得来的朋友。他们多是与阿壮命运相同的孩子，家里遭了难，孩子们便聚在一起彼此安慰。有的朋友带来家里幸存的电唱机和被视为禁品的音乐唱片，在精神生活贫乏得令人发慌的日子里，这可是难得的艺术享受。他们海阔天空地聊天，交换着“禁书”和各个渠道来的小道消息，暗地里嘲笑和调侃着那几个权势了得的大人物，这些自然引起保持着高度警惕性的居委会大妈们的注意，被认为是反革命家庭子女的串连活动，是一种社会不安定因素。那时候每逢过年过节就要搞社会大清查，把小偷流氓、影响社会治安的可疑分子拘留起来。1967年春节前，阿壮也被列上街道向公安局提交的名单，关进了拘留所。这个春节，阿壮是在拘留所睡地铺、吃窝头喝萝卜汤度过的。回家探亲的大姐小岚和大哥小云来看望他，送来了被褥。那时候，他们是没有资格为弟弟鸣冤的。

一关二十八天，阿壮又莫名其妙地被放了出来。阿壮的情况令丁一岚非常担心，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无力保护自己的儿女，真是莫大的痛苦！正在这时，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阿壮是六九届初中生，还未到毕业的时候。但他对那个缺乏温暖的班集体已没有一丝留恋。他决定不等毕业去延安找姐姐。

二姐下乡叫于虹，他也跟着改名叫了于峰。他约了一个患难小友，司法部老部长的儿子，自作主张转了户口，奔赴早已向往的延安。

阿壮急于离开这个令他感到压抑和恐怖的都市，到母亲曾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去寻一片自由的天地。他甚至要求，要插

就插个彻底，到山沟沟的最深处建个知青点！但公社并未批准他们的豪举，而是对这个年仅十五岁的孩子给予照顾，把他分配在离姐姐于虹的村子仅二里地的岳口村。

阿壮很快喜欢上了农村，虽然自然条件落后，精神生活贫乏，但这里有洁净的空气，纯淳的乡情，没有歧视，没有咒骂，没有盯着自己一举一动的怀疑和仇视的目光。繁重的农活和艰苦的生活也没有吓住阿壮，他反而觉得在农村连呼吸都是畅快的。老区的乡亲们从不把他们当“黑子女”看待，他们对这些孩子的父辈仍怀有深深的怀念、感激之情。离这儿两里地住着邓小平的女儿邓毛毛，那个村还是当年红军指挥部所在地呢！老乡们心中有自己评判是非的标准。他们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父母是好人，是功臣，你们就是落难的公子，别怕，有我们保护着你们哩！

1972年，姐弟俩各自村中的知青伙伴都回了城，善良的乡亲们把小虹调到交通方便，比较富余的岳口村。正巧这一年村中通了电，亮起来的小山村似乎为姐弟的命运也带来了一线光明。

乡亲们早就发现阿壮是干技术活的料，有了电，就让他管磨坊。在阿壮的操办下，村里第一次开始用机器碾米磨面，婆姨们再也不用在烈日下，一筐箩一筐箩地筛，一碾道一碾道地转了。接着，阿壮又对照着一本《农村实用手册》，为村里安上了抽水机、扬场机、脱粒机，小山村开始走向机械化。

对于没有文化的乡亲来说，电这玩艺又神奇又可怕。他们缺乏用电常识，常有触电事故发生。阿壮就在夜校里给乡亲们讲用电的知识。乡亲们看到阿壮穿着胶鞋站在木牦上，熟练地接线头而不被“咬手”，都佩服得不得了。

不识字的乡亲们到城里，连公厕的“男”“女”都不认识，常闹笑话，阿壮就给他们办了扫盲班，教他们认字、唱歌、写自己的名字。

1972年北京派慰问团来看望知青，慰问团的干部来到阿壮住的窑洞，只见泥墙上贴着洁白的墙纸，还用画报上剪下的画片和美丽的羽毛装饰墙面；灶台边搭了个写字台，拉上了台灯；破木桌上一个瓶子里还插了把野花；墙上挂的吉他、炕上靠的手风琴，显示着小主人独特的生活情趣。干部们惊讶不已：就是女孩子的房间也没见过这么干净整齐的啊！他们觉得这个男孩子真把这里当做了家，他生活态度的乐观、积极，和知青中普遍存在的沮丧情绪形成了对比。

是啊，和母亲、姐姐一样，阿壮对困境有极强的适应能力，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保持乐观的心态。他不是没有幻想过，有一天父亲问题解决了还能回到北京，但他感到希望是那样渺茫。他打定主意踏踏实实在这里生活下去，并且在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乡亲们服务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的价值，感到周围的人对自己的信任，这些已足以暂时慰藉一个有家难回的孩子的心了。

命运的转折是悄悄走近，又是突然发生的。

几乎与小虹上大学的同时，他被招到西安汽车修配厂；过了三年，又和二姐几乎同时回到了北京。

他也不曾料到，自己会成为邓家子女中惟一个继承了父亲的事业，搞文字工作、新闻工作的人。

1979年，担任北京晚报副总编辑的顾行同志找到丁一岚，对她说：邓拓同志为我国新闻界培养了那么多人才，你们家里该有一个孩子继承老邓的事业，让阿壮到我们报社工作吧！丁

一岚有些犹豫，说：阿壮不过初中毕业，行吗？顾行同志说：怎么不行，我们这些搞新闻的许多是自学成才的嘛！

就这样，阿壮到北京晚报当了一名记者。顾行对邓拓怀有深厚的感情，虽然他在“文革”中因受“三家村”一案牵连饱受折磨，但他总忘不了是自己再三拉邓拓写《燕山夜话》的，甚至对此怀有歉疚。为此丁一岚还宽慰他说：“别为过去的事追悔了，没有你，还留不下一部《燕山夜话》呢！”

顾行这位优秀的报人，怀着对故人的崇敬，对阿壮悉心培养、严格要求，邓壮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肩上责任重大，要干好新闻工作，一定要有扎实的文化基础。他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夜大，边工作边读大学课程。三年以后，拿下了大专文凭。他不满足，还要继续攻读本科。这时邓壮已经结婚，家住离师大很远的宣武门，母亲和爱人都劝他算了，但邓壮凭着一股毅力，下班后仍风雨无阻地奔波在上学的路上。两年后，他成为师大历史系本科的合格毕业生，具备了作为一个记者应有的学识。在工作实践中，他逐渐练就了一双敏感的“新闻眼”和一手漂亮的文章。在父亲当年倒下的地方，他重新拿起了笔。

1985年，邓壮调到文联出版公司，担任编辑室副主任。他在工作中不恋虚名，惟注重扎扎实实的实绩。

作为邓拓的儿子，他深知自己对弘扬父亲的精神遗产负有重要的责任。他积极参与了邓拓故居的重建和开放，参加组织了一系列纪念邓拓的活动，写出了许多情理并茂，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也是母亲丁一岚整理出版邓拓遗著的得力助手。

邓拓在天之灵，如看到小儿子，那个当年的顽童阿壮已变成了自己毕生所从事事业的后来人，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岩 岩

从性格上论，如果说活泼开朗的小虹更像妈妈，那么文静内秀的岩岩就更像爸爸。

1966年，那个在家庭录音音乐会上依偎在爸爸膝头，像小鸟一样呢喃撒娇的幼女岩岩，已长成了十二岁的小姑娘。面对这场革命风暴，她比哥哥姐姐更不能理解，也更感到弱小无助。她大睁着惊恐的眼睛，颤抖着纤细的身子，战战兢兢地看着这骤然降临的一切：批判、声讨、抄家，她和她的家庭像狂风巨浪中的一叶孤舟，随时可能被倾覆，被吞没。

好在她有个坚强的妈妈，和两双手足情深的哥哥姐姐，他们组成一道屏障，保护着家中这位最小的成员。她跟着大姐住进了清华大学，那些胸前别着校徽，来去匆匆忙于运动的大学牲们，也没忘了给这个小妹妹一份关爱。岩岩暂时忘记了那使她困惑和恐惧的一切，她高高兴兴地帮助大哥哥大姐们印小报，撒传单。搞革命，我小岩岩也要参加呢！

岩岩没有忘记分担母亲和兄姐肩头的担子。她知道，妈妈每天在单位受审查、劳动改造，心里不知有多苦，身上也不知有多累呢！她和小哥哥用细瘦的胳膊洗那沉重的床单、被罩，好不容易洗干净，晾在铁丝上，一转眼，被邻居的孩子洒上了煤灰和污水！岩岩知道自己没有申诉、反抗的权利，她咽下泪水，把弄脏的床单再洗一遍。

看到妈妈在劳动中，手都磨破了，岩岩找来尼龙绳，拆成一条条尼龙丝给妈妈织手套。织了一双又一双，她要用这丝丝缕缕女儿的爱，支持身心俱疲的母亲。有时，母亲一觉醒来，

看到小女儿还在灯下为自己织手套。她不禁一把抱过女儿，热泪滴在岩岩那双灵巧的小手上。

初中毕业，七〇届的同学大都留在北京的工厂了，岩岩却被分配去北京西郊黑山寨当农民。对此岩岩很满足了，她参加了农村女孩子组成的“铁姑娘队”，学着干各样农活，力求不落在后面。

岩岩在农场一干就是五六年，1976年，她被招工回城，在西单服装店当了一名售货员。

1977年恢复高考，岩岩早拿起书本复习上了。她知道自己没上过高中，底子薄，还有一道“政审”的关口拦在前面。但倔强的岩岩不服输，她一定要凭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她把英语单词、语文知识点、数学公式记在小纸条上，利用等车、工休时间念呀背的；服装店站柜台不许看书，她就利用没有顾客的间隙，在脑子里一遍一遍“过知识”，在那嘈杂的环境里，她竟能心静如止水。下班回到家，她则一头扎进自己的小屋里，演习题，做算式。

母亲问她：岩岩，你想报什么学校，哪个专业？

岩岩说：我早想好了，像姐姐一样，学医！不过，姐姐学医疗系，解除的是病人身上的病痛，我要报精神病学系，解除病人精神的痛苦！

一岚吃了一惊，一个年轻轻的女孩家，怎么想到要学精神病学呢？

听着岩岩娓娓地陈述，一岚理解了女儿的追求。原来，岩岩目睹了“文革”中许多人备受精神折磨，罹患精神病的种种惨状，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光是市委干部的子女就有好几个在家庭变故中精神失常。岩岩早就立下志向，有了机会，要当

一名精神病医生，为这些可怜的人驱除“心魔”。况且，作为邓拓的女儿，她不能不多了一层忧虑：万一“政审”遇到麻烦怎么办？精神病学是冷门，许多人视为畏途，比较容易录取。

一岚暗暗惊服：女儿长大了，有了自己缜密的思考。她无法不支持女儿的志向。1978年，岩岩通过大学考试，进入北京医学院分院精神病学系学习。

四年后岩岩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安定医院，成了这所著名的精神病院多年来第一批年轻的业务骨干。她实现了自己为精神病人解除痛苦的夙愿。

1987年，在大批青年人出国深造闯世界热潮中，岩岩也来到美国的芝加哥。和许许多多出国的中国医生一样，岩岩发现自己一下子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处境：国内学医的学历和从医的经历在这里是不被承认的。一切得从头开始。她接受大哥的建议，开始学习护士。在美国当护士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通过非常严格的专业训练和考试，取得护士从业执照。岩岩有医学的基础，加上刻苦努力，用两年多时间考取了执照，进入医院当了一名护士。

岩岩对护理工作认真负责，业务熟练，使院方非常满意。在美国虽有一定的种族歧视，但真正奋发有为的人，无论你来自哪个种族，还是会受到尊敬的。岩岩同时在两个医院当护士，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她的勤勉给同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生活，岩岩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她没有结婚，但把独身的生活安排得丰富而潇洒。她拼命工作，攒了假，就约上几个朋友一起到各地旅游，夏天去佛罗里达海滨游泳、划帆板；冬天去洛基山脉滑冰、滑雪；春天去洛杉矶迪斯尼乐园观光；秋

天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游玩……用国内流行的一句话，是干得出色，玩得开心。

岩岩，你是否真的从少年家庭不幸的阴影中走出，是否真的在异国他乡找到快乐和归宿了呢？

晚 年

邓家的五个子女，性格各异，所走过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确实如丁一岚所说，是正直、勤劳和善良的。他们在逆境中，各自用自己的脚走出了自己的路。有这样的子女，使晚年的丁一岚备感安慰，她觉得自己可以向早逝的英魂作个圆满的交代了。

丁一岚从没有忘记自己作为邓拓妻子的责任，也从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党的老干部、老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在新时期，年近六旬的丁一岚重新焕发了青春，为我国的广播事业做出了贡献。

1982年，几位老领导干部退出一线，六十一岁的丁一岚经国务院的任命担任了国际台台长。经过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新时期的中国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正在到来。中国急需走向世界，世界急欲了解中国，国际台正担负着这样一个对外广播、宣传中国、沟通中国与世界上重要工作。丁一岚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团结台里的中年干部，为开辟对外广播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扩大开放，他们不断请进外国专家，并组织国内干部出国培训，为后来大规模的国际新闻交流打下了基础。

1984年由选民直接选举区人民代表，虽然作为台长的丁一岚一再推辞，还是被推举为广播局的候选人。在与选民见面的大会上，她耐心地解答群众提出的诸如住房困难等问题。有选民问：“假如选民意见与政府意见不一致，你作为人民代表该如何办？”这类问题是很敏感的，无异于将了她一军。丁一岚沉着地回答：“我有责任向上充分反映选民意见，如果意见合理，要争取实现；但意见不符合国家利益、当前政策，我要向选民解释，使选民与领导意见趋向一致。”丁一岚的回答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最后以最多的票数当选为区人大代表。事后有人说“你答选民问太精彩了，像一次竞选。”

丁一岚保持着年轻时的机敏和口才，几十年中又积累了宝贵的生活工作经验，这使她在频繁的出访和对外交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1985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邀请，组成由丁一岚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美国。这是中美文化交流项目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十几天时间里，丁一岚率代表团一行访问了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和美国的同行们进行了广泛接触，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美国广播博物馆和新的广播公司大楼，还拜访了国会议员，在广播事业现代化方面学到了许多先进经验。她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她说：“我们两个台虽相隔万里，但做的都是同样的工作：让我们的听众了解各自的国家，了解世界。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非常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进行现代化的建设。”在波士顿，丁一岚愉快融洽地与哈佛大学的学者们座谈。在这些学者眼中，这位有着四十年广播经历的中国妇女，简直就是新中国广播业的化身，她作为邓拓先生的夫人的身份也使他们

大感兴趣，好奇地向丁一岚提了许多问题。

丁一岚不仅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访美的，她落落大方、不卑不亢的风度给美国同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从她的介绍中也发现了可以向中国同行借鉴之处。

有一次座谈间隙到美方台长办公室休息，这位台长是哈佛的毕业生，墙上挂着一幅画，背景是世界地图，哈佛大学画在中央。台长指着这幅图开玩笑说：“哈佛很骄傲，把自己的学校画得这么大，其他国家很小，中国在边上很小很小。”丁一岚知道他并无恶意，但她必须作出应对。她笑着接口答道：“这符合视觉原理，近大远小。就像在地球上看到太阳，太阳很大，看上去却很小。”她机智的回答既不失自尊，又很得体。陪同的美方翻译大为赞赏地对一个中国团员说：“你们的团长简直可以竞选议员！”

访美归来不久，丁一岚觉得六十四岁的自己，已不宜担负这么繁重的领导工作，她主动要求从台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让更富有开拓精神，更年轻的同志接棒。由于她四十年为人民广播事业的勤奋工作，国务院给予她特殊荣誉奖励。

离休后的丁一岚是闲不住的。她和当年晋察冀的老战友又聚集在一起，开始了《晋察冀日报史》的编写工作，历经十载终于完成了这部长达五十万字的著作；她还与同在建国前后就参加新闻工作的姐妹汪溪、金凤、陈柏生、陈敏等一起，筹备成立了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与此同时，她还两次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办的中华老年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学习，1992年，已经七十岁的丁一岚兴奋地拿到一本红色的毕业证书。

上大学是丁一岚少年时就怀有的愿望。几十年追随革命，从事人民广播工作，使她无暇顾及自己的学业，这个愿望终于

在离休后得以实现。而对于丁一岚来说，选择中国古典文学专业还有着更深层的意义。

丁一岚与邓拓相知相伴，携手走过了二十四年。“文革”初起邓拓被迫害而死时，丁一岚只有四十多岁，但邓拓在丁一岚心目中始终占据着无人可以替代的位置。在失去丈夫后的漫长岁月里，她是伴着丈夫留下的诗词，凭着对过去美好的一切的追忆和留恋，坚强地走过来。到了晚年，她更是把整理、出版邓拓遗著，将这份精神遗产留诸后世作为自己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和生活中最主要的内容。丁一岚非常喜爱邓拓诗文，但她时常感到在丈夫非凡的才学面前，常有“高山仰止”之感，还不能深入地领会其内涵。老年大学文学专业的学习，使她加深了文学上的造诣，与丈夫的思想感情更加贴近了，整理起邓拓遗著来也更加得心应手。1993年出版邓拓的新版诗集，丁一岚亲自写了一篇长文《诗思、诗情、诗魂——我喜爱邓拓的诗》，阐述邓拓一生的诗作以为序。

正当丁一岚乐乐呵呵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孜孜不倦地整理、编辑、出版邓拓的遗稿时，无情的病魔却悄悄向她袭来。1991年，经检查发现她双肾功能衰竭，很快发展为尿毒症晚期。从1992年底开始，她不得不每周三次到北京友谊医院接受血液透析以维持生存。这对一向自认为身体非常强健，总是精力充沛的丁一岚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打击。每当她静静地躺在洁白的病床上，听着透析机发出“嗡嗡”的微响，默默注视着鲜红的血液从自己体内汩汩流出，经过净化又无声地注入自己体内时，常常不免会想到死神随时可能降临。

有一次，在医院做血液透析时，血压突然下降。当医生发现异常，询问她的感觉时，她只说了一句：“我冒汗了”，就

陷入昏迷之中。当她清醒过来时，方知道医护人员经过艰难的努力才挽回了她的生命。病历上记载了那一刻的危急症状：“呼吸停止三十秒钟。”

对于死，她抱着平静、超然的心态。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她写了一篇回忆自己一生的长文，其中写道：“我已年逾七十，不论哪一天去见马克思都算是长寿了。现在，可能是我生命途中最后一站，我还有些力量，应该继续做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

她把目光投向那些在生命线上挣扎的肾病病友和他们承受着巨大经济、精神压力的家属。肾衰竭不是绝症，做血液透析可维持生命，换肾手术可以治愈，但这两项都要花费大笔的款项，一般家庭是难以承受的。丁一岚在治疗中接触了一些病友，目睹了许多催人泪下的场面：一位教师患了肾衰竭，千难万难借到五万元换了个肾，手术却未成功，他的学生为了挽救恩师的生命，自动组织起来卖血攒钱，为他筹集血液透析和另一次手术的费用；一位二十四岁的姑娘做血透已经四年，为了治她的病，哥哥辞去工作干起了个体户，可挣的钱仍不够一月五千多元的费用，哥哥一狠心：一辈子不结婚也要救妹妹的命！

丁一岚萌生了一个想法：她要创办一张报纸，让人们认识肾病，尽早防范，鼓舞患者与疾病斗争的意志，为千千万万个肾病患者服务。

她拖着病衰的身体，给老朋友打电话、写信、四处化缘，自己又捐出了一部分钱作为小报的开办费。她的行动得到多方支援，一些肾病专家、新闻界朋友和肾病患者纷纷出钱出力，前卫生部长崔月犁亲自担任了顾问并为小报题写了刊名，丰台医院主办的《丰台健康报》协助出版，小岚所在的山东泰安制

药厂也给予经济赞助。众人拾柴火焰高。1994年5月，第一期《肾友知音》报问世了！丁一岚担任了该报主编，撰写了发刊词，并亲自写文章与病友娓娓谈心。这个报设了许多栏目：请专家、医生谈防治肾病的知识，交流肾友们治疗、休养的体会，介绍海内外治疗肾病的药品和新方法，尤其是，它传达着一种动人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了肾友们一个充满爱心和互助温暖的大家庭，从而增强了他们战胜疾病，克服困难的勇气。她家的电话几乎成了肾友热线，常有患者来电话讨教治病养病的经验。

《肾友知音》小报为季刊，每期印刷四千多份，全部无偿在北京各个医院向肾病患者赠送。这份小报受到广大病人、家属和基层医务工作者的欢迎，报纸一印出，立即被分发一空，有的外地医院也来信索要。一些离休干部、医生和肾病人得知办报资金紧张，纷纷解囊，寄款资助。人们盛赞这是一件救人济世的“义举”。

这项义举也得到子女们的支持。丁一岚晚年是幸福的，有一群孝顺她、理解她的儿女。儿女们不仅轮流陪她做透析、悉心照料她的饮食起居，而且他们明白，支持母亲干她想干的社会工作，正是对她最好的安慰。母亲的生命已不属于她个人，而是属于人民、属于社会。她一辈子与新闻媒体结下了不解之缘，办报，也许是她“老有所为”的最好方式了。他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也参加了母亲的编务工作：组稿、写文章、编辑、排版、印刷、搞发行，连女婿、儿媳都参加进来，办小报，几乎成了全家共同的事业。

1997年3月，丁一岚在《肾友知音》上发表一篇《共同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文章，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勉励病友积极与病魔斗争。她说：“我这个人有个优点，心胸开阔，豁达无忧……

患病之后，我给自己定了两个奋斗目标，第一个目标争取看到香港回归，第二个目标要跨入二十一世纪，使自己的生活有个奔头。……我有勇气和大家一起跨入二十一世纪，为那灿烂美好的社会主义未来再作贡献！”

七十六岁的丁一岚丝毫不像一个重病缠身的老人，她依然充满活力，忙碌着自己钟爱的事情。然而她也并不惧怕死亡，对“死”抱着达观和超然的态度。她认为，一个人活着要充满生机，体现生命的价值；死时也要保持尊严，没有痛苦地去死。因此，她和一些老同志联合签名提倡“安乐死”。她已对身后事做了周密安排，而最重要的就是：给身边的三个子女作了分工，把整理和保存邓拓遗著的工作继续下去，在留给儿女的遗嘱中她这样写道：“人最终都是要死的，这是客观规律，但我无怨无悔……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我只希望能静静地躺在床上，听一曲《延安颂》……”

在那亲切熟悉的旋律中，她会重新来到延水河边，来到滹沱河畔吗？她会沐着那纷纷扬扬雪白的梨花雨，与丈夫一起重温当年那战地浪漫曲，重赴邓拓那美丽的诗词订下的白头之盟吗？

丁一岚非常喜欢夏衍在《风雨故人行》中的一段话：“时光流逝，从二十年代后期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年代，又是一个晨光初展的年代；这是一个腥风血雨的年代，又是一个英豪辈出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年代，又是一个积习难改的年代。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为了民族和人类的自由、解放，无数仁人志士，无数先进的知识分子付出了血、泪和生命的代价，前赴后继，九死无悔地经历了这一漫长而艰险的路程。”

邓拓和丁一岚，不正是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一代先进知识分子和爱国仁人志士的优秀代表吗？尽管他们的生活道路曲折艰辛，血泪交加，历尽种种心灵磨难和生离死别，但他们仍无怨无悔，为曾作为战士走在民族解放和自由的最前沿而倍感骄傲和自豪。

不管后来的人们会怎样评价这段历史，怎样看待他们虔诚信仰和毕生献身的理想，但我们子子孙孙永远不应忘记他们，永远怀着尊敬、感激和钦佩的心情，记住他们为我们的今天和明天所做的一切。

后 记

半年前，一个偶然的机缘，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编审洪钧先生来到我家，当他约我为“名人传记丛书”撰稿时，从几个传主中，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邓拓和他的一家。从此，半年中，我几乎将全部业余时间用来追寻一个伟大的灵魂，探索一个历尽坎坷的中国人家庭走过的道路。而我自己，不夸张地说，也经历了一次心灵净化和提升的过程。

邓拓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抹不去的记忆。如今中年以上的中国人，有几个没在三十一年前那个春夏之交唱过：“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棵藤上仨黑瓜……”？几代中国人的命运和整个中国的命运，都在那个时候被改变了，阳光灿烂的童年和少年也从那时起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几乎动摇了我们自小所接受的教育构筑的那个精神世界，也使我们在黑暗的摸索中逐渐获得了一双自己的眼睛。

“文革”结束后那个思想解放和恢复理性的年代里，我有幸接受高等教育。阅读面的扩大和思考能力的加强，却使我产生另一种困惑：似乎与上一辈人产生了某种“代沟”。巧得很，我父亲也是从晋绥抗日根据地过来的一位“老八路”，两代人之间虽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但思路却总是朝两个方向走。近年来，我对知识分子问题产生研究的兴趣，也发现不同年代的知识分子有着迥然不同的心态和风貌。我渐渐悟出：时势、时运对人们灵魂与性格铸造的作用是多么巨大。

应当说上一代人比我们幸运，他们经历的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亲手砸碎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新世界，这种自豪

感和成就感伴随他们生命的始终。无论这个事业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么大的挫折，无论个人和家庭经受了多少委屈和磨难，他们始终不渝。这从邓拓含恨而逝前写下的遗书和丁一岚的忠诚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邓拓是我们父辈中最优秀的一员。他集学者、诗人的才华智慧与革命者的忠诚于一身；集理性的批判精神与忘我的牺牲精神于一身；集刚直不阿的道德情操与谦逊自省的隐忍性格于一身。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二十世纪伟大的中国革命所共同孕育的结晶。他特殊的遭际和令人叹惋的早逝，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块警示碑，提醒人们永远不要让这民族的悲剧重演。

丁一岚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女性之一。她对事业和爱人的毕生追随，她身上体现的母性光辉和奉献精神同样值得歌颂，因此本书用较多的篇幅写了这位可敬的长辈。

而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吃“狼奶”长大的孩子，也有一个好处，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不幸，使我们靠自己的双脚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尽管走得是那样艰难，但终于从石缝和荆棘中长大，并在新时期获得一个广泛吸收世界优秀知识文化的契机，成为目前这个社会中坚的、承上启下的一代人。在与邓拓几个子女的长谈中，我非常鲜明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不正常的社会生活会产生两种人：一种是圆滑的钻营者和苟且者，另一种是坚持做人的尊严，不向命运低头的抗争者。邓拓的儿女显然属于这后一种人。虽然与父辈有着不尽相同的认识和性格，但他们毕竟是沿着少年时父辈所塑造的人格理想走过来并继续走下去。他们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中比较优秀的一些人。

正如本书结尾所说，我认为我们这一代应该充分理解上一代人，应该“永远怀着尊敬、感激和钦佩的心情，记住他们为我

们的今天和明天所做的一切”；同时，我们也欣赏更加潇洒、开放、自如地生活着的年轻的下一代人，他们毕竟没有那么多痛苦的记忆，他们完全有理由在一个越来越富裕、发达和自由的社会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为了他们，我们和父辈所共同经历的一切痛苦和坎坷，似乎都有了一个存在的理由，成了“历史”发给我们的一枚徽章。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许许多多人的帮助。首先我要感谢丁一岚同志和邓小岚、邓小虹、邓云和邓壮（因条件所限，对邓岩只是间接采访），他们在百忙中一次又一次接受了我的采访，为我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丁一岚同志在病中逐字审阅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不少宝贵的修改意见；同时我要感谢陈勇进、袁鹰、胡绩伟、金凤、赵元珠、姜德明等许多在《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和邓拓同志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他们给了我许多热情的鼓励和支持；我要感谢顾行、成美、王必胜等邓拓研究的先行者，他们所做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本书提供了素材（正当笔者准备采访顾行先生的时候，这位“文革”中饱受摧残的新闻界前辈在医院溘然长逝，又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我还要感谢更多的同志撰写的纪念文章，他们也成为这本书的资料来源（在使用这些资料时我尽可能地注明了出处）。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完成这部“急就章”的。

本书在文学上的得失姑且不论，但自认力求做到了传记所要求的真实可信。

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和责任编辑为出版这套书所作的努力。这套描述二十世纪几个有代表意义的中国人家家庭的书，将作为对新世纪的一个礼物。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为来不及将文稿整理得更为理想，对

读者感到歉意，希望今后有机会做出弥补。

作者

1997年9月于北京团结湖